殷墟新出土青铜器

RITUAL BRONZES RECENTLY EXCAVATED IN YINXU

RITUAL BRONZES RECENTLY EXCAVATED IN YINXU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2-05547-6

Ⅰ.殷··· Ⅱ.①中···②安··· Ⅲ.商代铜器－研究
Ⅳ.K876 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801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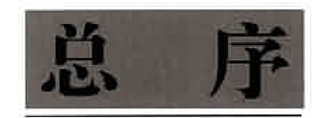
出品人
汤汉清

出版执行人
王晓燕

责任编辑：王晓燕 李银和
装帧设计：王睿韬
责任印制：陆卫华

书　名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28.75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5547-6
定　价	699.00元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编辑委员会



总序

王巍

夏商周考古学见证了中国考古学自初创到繁荣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支柱之一。殷墟考古则是夏商周考古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首项考古发掘，它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

在1928年至1937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发掘团”，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主要有三大收获：一是获得近25000片刻辞甲骨，不仅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还有清楚的地层关系，并有与其他商代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为甲骨文和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天地；二是在小屯发掘了晚商王朝的宫殿宗庙区，从而揭开了先秦时代帝王宫殿、宗庙等礼制建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序幕；三是发掘了包括王陵在内的11座带墓道的大墓和数千座祭祀坑，被誉为中国古代王陵考古发掘的先声。这15次发掘的意义在于：首次把现代考古学田野发掘方法运用到商代考古科研实践中，堪称我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开创之举；培养了一批蜚声中外的甲骨学家、考古学家，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队伍基础；小屯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的发掘，为迅速切入商代考古学研究的核心课题准备了资料，并以铁的考古学事实证明了我国在商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从而打破了当时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全面否定，使得以“二重证据法”为武器的新史学充满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在新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考古学者便把目光重新聚焦在殷墟遗址上，对安阳殷墟武官村商代大墓进行了全面的揭露。自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新组建专业学术机构——安阳工作站，专门负责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持续在殷墟遗址展开有目的性的科学发掘，如小屯东北地“凹”字形基址群、孝民屯铸铜作坊和居址群、后冈圆形祭祀坑、妇好墓、殷墟西区墓地、郭家庄160号墓、花东54号墓、小屯南地甲骨、花东3号甲骨坑等遗迹的发掘，均有重要发现，同时获得大量内容丰富的刻辞甲骨、精美的青铜重器、玉器、陶器、骨器和铸范等珍贵文物。在此基础上，学者对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商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殷墟的布局、内涵、年代、分期、性质等诸问题都得到基本解决，为以都城考古为核心的商代考古的全面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殷墟遗址的东北部，又发现了“洹北商城”，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明确提出的“中商文化”的概念以完美的诠释，完善了商代早、

中、晚期的文化序列。洹北商城已发掘的一号宫殿基址，是现知规模最大的先秦宫殿基址，其布局结构对于先秦宫殿制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洹北商城的发现，为21世纪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殷墟考古在新世纪再创辉煌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们曾将夏商周考古学数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为学科初创期，主要指20世纪20—40年代，商代考古一枝独秀，夏代和周代考古尚未成形；二是基础建设期，即20世纪50—70年代前期，在大量考古勘察和发掘的基础上，基本建立了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完成了文化类型划分与年代分期，夏商周考古学在全国全面铺开；三是学科发展期，指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夏商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年代、分期等基础课题更臻完善，考古学理论建设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备受重视；四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受“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力推动，形成了以学术目的明确的主动发掘为主、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新景象，使夏商周考古学为国内外所瞩目。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殷墟考古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承夏启周，发挥着重要的领军作用。

殷墟考古已走过了八十年的风雨历程。随着殷墟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多学科参与、多角度研究的局面已经形成，以各种现代科技检测为手段的合作研究已全面启动，并在多数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器物学”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器物学的传统主要是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图录的编制。自北宋的《考古图》到清王朝时期的《西清古鉴》，中国学术界在数百年间累计出版了一批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的古器图录。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后，新编的图录开始具有了更多的考古学意味。清以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古器铭文，兼带关注器物的形态、重量、尺寸。现代意义的古器图录，则在注重古器铭文及器物尺寸、重量的同时，视野扩展到古器出土地点、出土单位、伴出器物组合、不同器类间的关联、器物制作工艺、器物花纹、器物收藏等方面。一部现代意义的古器图录，不仅是一部器物形象资料的汇集，更是一部综合了多方面学术成果的学术体现。

由于殷墟出土商代遗存丰富、发现时间早、发掘历史长，各类殷墟器物图像已散见于数百种图录中。即使在国外，诸多博物馆出版的图录都包括了大量殷墟出土的铜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但单纯的殷墟出土文物图录并不多。最早的有黄濬的《邺中片羽》，随后有罗振玉的《殷墟古器物图录》。由田野考古工作者编辑出版的则有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殷墟玉器》、《殷墟青铜器》、《安阳殷墟出土玉器》，以及安阳市文物工作队编写的《安阳殷墟青铜器》等。

2007年，安阳工作队的同志们提出完全依据考古发掘成果，编辑的“殷墟系列图录”。今天我喜见他们的首部成果问世。

新编写的这套图录从现代考古学的视角，以单件器物图、器物局部特写（如花纹、铭文、工艺细节）、器物组合图等形式，配合以准确的文字说明，向学术界提供具有详细考古背景资料的商代器物信息。这是对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殷墟遗址核心价值的有力宣传，对于考古工作者和广大文物爱好者都是极大的喜讯。这是一部顺应潮流、响应时代召唤的产物。“殷墟系列图录”的出版，将为商代考古，乃至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008年8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Contents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概述（代前言）

岳洪彬 岳占伟 刘忠伏 何毓灵 孔德铭

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殷墟青铜礼器公开发表的已达2000余件[①]，其中相当部分仅公布了组合和数量，而不见照片或线图。由于整理和资料发表滞后等原因，尚有相当数量未能公布，实际出土数量远大于上述统计数（详见下文）。再者，在以往公布资料的简报或报告中，常常受篇幅或出版经费的限制，青铜器的彩版较少而且图片排得很小，使读者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缺乏全面、具体的了解，不利于对殷墟青铜器的深入研究，而且也不利于众多商代青铜器爱好者的鉴赏。故此，我们将殷墟近几十年来新出土的青铜礼器，以图录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以飨读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了《殷墟青铜器》[②]，将建国以来至1982年以前殷墟出土的青铜礼器精品悉数收录。因此，本书收录仅限于1982年以后殷墟新出土的青铜礼器和以前没有收录的部分形制特殊的铜器，故定名为《殷墟新出土青铜器》。该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计划编著“殷墟系列图录”的第一本。

本书共收录1982年以来出土于武官村北、大司空村、小屯村、郭家庄、苗圃、洹南花园庄、刘家庄北地、范家庄东、小庄、四盘磨、安钢、后冈、徐家桥、新安庄等地点的200余件青铜器精品，时代包括殷墟一至四期。在标本筛选方面，我们打破殷墟保护区的内外界线，把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整体来考虑，不仅挑选殷墟保护区内出土的铜器，而且还照顾到殷墟外围区的发掘成果；在图版编排方面，我们不仅着重器物局部特征的表现，同时也重视同一墓葬出土铜器群的组合关系，该书中同墓所出全部青铜礼器的“全家福”照片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另外，在本书图版中，尽可能多地附上铜器主要部位的纹饰拓片，以便于学者研究。

①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殷墟青铜礼器”，特指青铜容器和乐器，不包括其他具有仪礼功能的青铜器具。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一 1982年以来的发现情况

按出土时间顺序，逐项介绍（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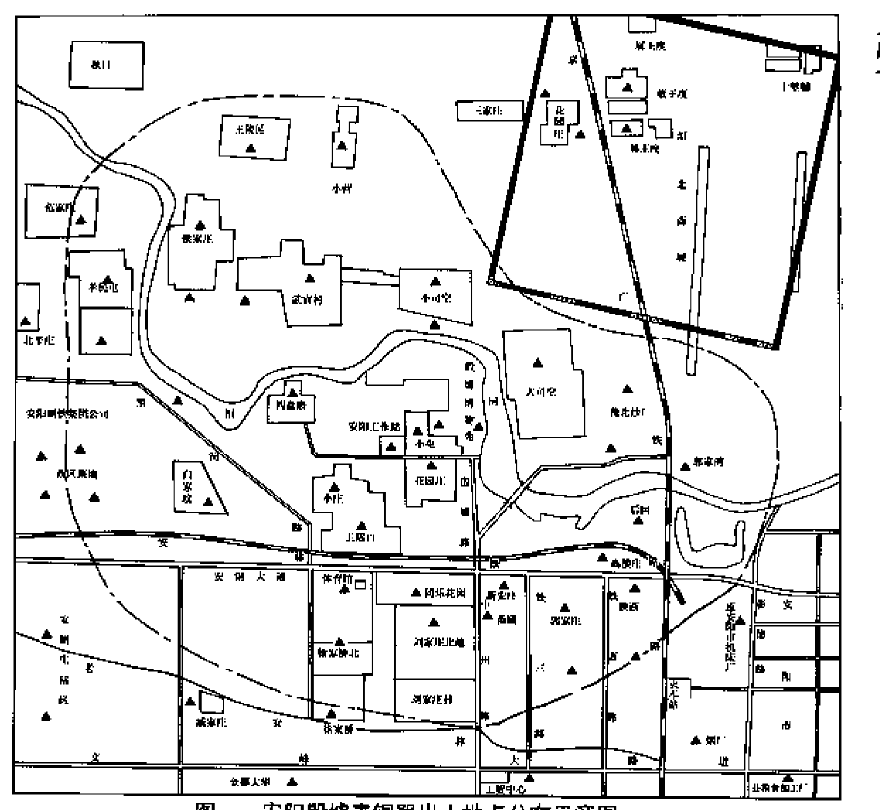
1. 1982年

出土地点有五处：小屯西地、苗圃北地、郭家庄东南、安钢、戚家庄东。其中小屯西地M1①和戚东M63②最具研究价值。小屯西地M1出土19件铜礼器，为3套觚爵的规格；戚东M63出土10件铜礼器，为2套觚爵的规格。两墓均保存完好，为殷墟四期墓葬研究提供了不同规格的完整墓例。

共计86件。计有鼎19、簋11、甗1、觚21、爵20、尊2、斝3、卣3、觯2、斗1、铙3。

2. 1983年

出土地点有五处：地区农机局家属院、市供电局、安钢、郭家庄南、戚家庄东。其中戚家庄M231和M235③较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两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完全相



图一 安阳殷墟青铜器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③孟宪武、杨松山、李贵昌：《殷墟南区墓葬青铜器群综合研究》，载于《安阳殷墟青铜器》，第1—2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同，皆为2套觚爵的规格，且均属殷墟四期偏晚阶段，应是一组墓葬；不同的是M235还随葬铜锛和凿等生产工具，M231则随葬铜戈和镞等兵器，两者间的差别可能反映出墓主职业或性别的不同。

共计39件。计有鼎5、簋3、觚12、爵13、尊2、卣3、觯1。

3. 1984年

出土地点有九处：武官村北、苗圃北地、豫建七公司、市供电局、市水泥厂、水泥厂家属院、安钢、白家坟北和戚家庄。其中安阳市水泥厂家属院M26、戚家庄M269[1]和安钢GM1713[2]最为重要。戚M269属殷墟三期偏早阶段的典型墓例。M26和GM1713皆属殷墟四期，其中GM1713出土的亚鱼鼎有铭文三行21字，寝鱼簋和寝鱼爵均有铭文两行12字，都是帝辛时期的标准器，极具学术价值。

这段时期共出85件。计有鼎18、簋7、甗4、觚16、爵17、尊5、斝2、罍2、卣4、方彝1、觯1、斗1、盘2、盉1、器盖（应是“殷式筒形卣”的盖子[3]）1、铙3。

4. 1985年

出土地点有七处：花园庄南地、白家坟南地、市供电局仓库、刘家庄村北和村南、市职工大学教学楼、梯家口村西。其中刘家庄村北M9[4]较为重要，系属殷墟四期偏晚阶段3套觚爵规格的标准器群。

共计74件。计有鼎9、簋4、甗2、觚23、爵25、尊3、斝1、卣3、觯4。

5. 1986年

出土地点有九处：苗圃北地、刘家庄村北、市供电局仓库、大司空村南、花园庄南地、市轧钢厂家属院、郭家庄南（平原制药厂）和北地、北太平庄。其中郭家庄北M6[5]较为重要，为殷墟四期偏晚阶段的3套觚爵规格的标准器群。

共计76件。计有鼎10、甗1、觚25、爵26、簋5、尊1、斝1、壶1、罍1、卣2、觯2、斗1。

6. 1987年

出土地点有八处：郭家庄南地、西南地、大司空南地、市水利局家属院、梅园庄东南、安钢、市供电局仓库西院、梯家口村西。其中，郭家庄南M50和M53[6]较为重要。

共计44件。计有鼎8、鬲1、簋4、豆1、觚9、爵10、尊1、壶1、斝1、卣4、罐1、觯2、觥1。

7. 1988年

出土地点有七处：刘家庄村北、安彩暖厂、安钢、市五交化家属院、高楼庄南房管所、刘家庄村北(抗震)、范家庄连环寨。这一时期没有发现保存较好的规格较高的铜器墓。

共28件。分别是鼎3、簋2、觚10、爵10、尊1、卣1、盘1。

---

①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2期。
③岳洪彬、苗霞：《试论商周筒形卣》，载于《三代考古》第三期，待刊。
④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⑤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8. 1989年

出土地点有四处：刘家庄村北（武警部队大院、农行东院、汽建楼）、大司空南地、安阳市山河大道、安钢。其中山河大道M4是较为重要的一座墓葬，共随葬青铜礼器13件，为殷墟四期2套觚爵规格的标准器群①。

共计58件。分别是鼎7、鬲1、簋2、甗1、觚19、爵19、瓿1、尊1、斝1、卣1、觶2、铙3。

9. 1990年

出土地点有五处：刘家庄村北、郭家庄南、梅园庄、铁西区税务局家属院、安钢。其中郭家庄M160最为重要，是目前所知保存完好的殷墟三期墓葬中规格最高的墓例。②该墓共出土铜礼器41件，为10套觚爵规格的高级贵族墓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墓多见方形器，如方觚10件、方鼎3件、方尊和方斝各2件，占所出铜礼器的41%强，为殷墟以前发掘所不见。另外，此墓用10件角代替10件爵的现象，也为目前所仅有。

共计74件。分别是鼎10、簋1、甗1、觚20(其中10件方觚)、爵9、角10、尊3、斝3、罍1、卣2、觶1、斗1、盉1、盘1、卢形器1、铙3。

10. 1991年

出土地点有九处：安阳县物资局院内、小庄村西南、铁西区政府、安钢、安阳大学图书楼、刘家庄村北计生办公楼、徐家桥村北、东八里庄、后冈。其中后冈M9虽然被盗掘，但劫后幸余的2件方爵仍为目前殷墟所仅见；另有一件觥，虽器体不见，但所余觥盖通体高浮雕，满装花纹，制作精致，为难得的一件艺术珍品③。

共计55件。分别是鼎9、簋5、甗1、觚16、爵19、方彝2、觥盖1、觶1、豆1。

11. 1992年

出土地点有十四处：刘家庄村北、豫建七公司、安阳市山河大道、王裕口村西、市计量所内、安林路北防疫站、郭家庄西土地局院内、小庄村西北、安钢、大司空南地、新安庄、花园庄东地、苗圃南地、火车站和平路。

共计104件。分别是鼎12、簋4、甗1、觚33、爵39、瓿1、壶1、尊3、斝1、罍1、卣1、方彝1、觶3、铙3。

12. 1993年

出土地点有六处：王裕口村南（市体育馆）、新安庄、安钢、花园庄西北地、白家坟（铁佛寺储运站）、刘家庄村北（市戏校）。这一时期发掘的铜器墓最多，近250座，其中多数是只随葬青铜兵器的小型墓，保存完整的墓葬中没有超过2套觚爵者。

共计出土青铜礼器205件。分别是鼎32、鬲3、簋15、甗1、觚57、爵64、瓿9、尊2、壶5、斝2、卣2、方彝2、觶5、斗1、盘1、铙3、箕形器1。

13. 1994年

出土地点有六处：安钢、刘家庄村北（市戏校）、安阳市西大街小学、安阳大学东院、武官村东、大司空东地。其中大司空东地发掘的M7④、M9⑤最为重要。两墓随葬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尚未发表。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④本图录为首次发表。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尚未发表。

铜礼器的组合基本相同，均为2套觚爵的规格，墓葬方向和墓室面积也大致相同，应是时代相同的一组墓葬。但两墓其他的随葬品存在较大的区别，如M7随葬大量玉器，而M9则不见玉器，却随葬大量的兵器。

共计122件。分别是鼎16、簋9、甗3、觚32、爵32、瓿1、尊5、斝4、罍2、卣7、方彝1、觯6、铙3、箕形器1。

14. 1995年

出土地点有八处：大司空东地、纱厂路东（铁西地产公司院内）、武官村东、武官平原兽药厂、铁西路、郭家庄东南、西郊乡小庄村、体育中心。其中郭家庄东南M26[①]保存完整，出有2套觚爵，属殷墟二期。该墓所出铭文“𠤏”，在郭家庄附近区域常见，该区域应是𠤏族的所在地。

共计53件。分别是鼎7、簋3、甗1、觚14、爵15、尊2、斝1、罍1、卣1、罐1、方彝1、觯1、盘1、铙3、箕形器1。

15. 1996年

出土地点有四处：体育中心家属楼、小司空村北、白家坟东地（黑河路）、孝民屯南地。

共计44件。分别是鼎8、簋3、觚14、爵14、尊1、斝1、觯1、罐1、盘1。

16. 1997年

出土地点仅有三处：安钢、白家坟东地、小庄村西。这段时期发掘工作较少。

共计出土青铜礼器18件。分别是鼎3、簋1、觚7、爵7。

17. 1998年

出土地点有五处：安钢大道南体育场西、小屯村西（考古工作站）、小司空村北、白家坟村北、安钢。

共计20件。分别是鼎2、簋1、觚9、爵8。

18. 1999年

出土地点有八处：安钢大道南体育场西、西郊乡王裕口村、市轧钢厂、白家坟村东、安钢、刘家庄北同乐花园南区、苗圃北地、洹北花园庄。其中苗圃北地M229[②]、刘家庄北地M1046以及洹北花园庄M10和M14[③]最为重要。M229为殷墟二期1套觚爵规格的墓葬，所出盖斝、鸮卣和方罍均制作精致，为1套觚爵规格墓葬中所罕见。M1046出土青铜礼器33件，为殷墟四期偏晚阶段较高规格的标准器群。而M10和M14虽然仅各出一件铜礼器，但其时代较早，属洹北商城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共计94件。分别是鼎14、簋4、甗1、觚21、爵28、角2、尊3、瓿1、斝3、方罍2、卣4、提梁卣1、方彝1、觯3、斗1、四足盉1、盘1、铙3。

19. 2000年

出土地点有四处：刘家庄北同乐花园、孝民屯村东、市水利局、高楼庄南。

共计出土青铜礼器36件。分别是鼎6、簋3、觚10、爵12、觯4、觥1。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②本图录为首次发表。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 2001年

出土地点有两处：安钢三博和花园庄东地，发现的铜礼器墓仅有3座。其中花园庄东M54和M60最为重要[①]。M60属殷墟铜器第二期偏早阶段，M54属殷墟铜器第二期偏晚阶段，均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墓例。

共计51件青铜礼器。分别是鼎7、簋2、盂2、甗2、觚13、爵12、尊2、牺尊1、斝2、罍1、瓿1、方彝1、觥1、斗1、铙3。

21. 2002年

出土地点有四处：王裕口南体育馆西、安钢、苗圃北地七公司、任家庄。这一时期没有发现保存完好的高规格墓葬。

共计出土青铜礼器24件。分别是鼎3、簋1、觚8、爵8、斝2、卣1、卢形器1。

22. 2003年

出土地点有三处：刘家庄北地、安钢、孝民屯。

这一阶段主要发掘都集中在孝民屯。共发掘殷墟时期墓葬千余座，其中属殷墟一、二期墓葬较少，绝大多数为殷墟三、四期，尤以四期为最多。[②]由于目前资料正在整理当中，出土青铜礼器的具体数目尚未统计，估计应不少于200件。

23. 2004年

出土地点有两处：孝民屯、大司空村东南。其中孝民屯发掘仍继续2003年的发掘项目，出土墓葬较少，大司空村东南地则是这一时期发掘的重点。共发掘殷墟时期墓葬500余座，其中大司空村东南M303最为重要。该墓属殷墟四期偏晚阶段，为10套觚爵的规模，是目前所知殷墟四期保存完好的规格最高的墓例。[③]

共出土青铜礼器81件。分别是鼎16、簋7、甗1、觚16、爵21、尊3、斝3、罍1、瓿1、提梁卣1、卣3、方彝1、觯1、斗2、盘1、盉1、铙3。

24. 2005年

出土地点有六处：安钢、小司空村南、孝民屯东南地、孝民屯北地、殷二路北侧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小区内、范家庄东地。其中，文源绿岛M5[④]和范家庄M4[⑤]较为重要，均为殷墟二期偏晚阶段的特殊墓例。

共计出土青铜礼器27件。分别是鼎9、簋4、甗1、觚5、爵5、罍1、卣1、箕形器1。

25. 2006年

出土地点有三处：安钢、刘家庄北地、铁三路。其中刘家庄北地墓葬较为集中，铜礼器墓也较多。

共计青铜礼器41件。分别是鼎8、簋2、觚12、爵12、斝1、卣2、壶1、觯1、盘1、铙1。

据初步统计，自1982年至2006年底，殷墟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不少于1600件。由于殷墟遗址的保护区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负责发掘，而外围区域由安阳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④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5号商代墓葬》，《考古》2008年第8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尚未发表。

市文研所负责，限于种种原因我们仅获得部分安阳市文研所的资料，因此本文的数据是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发掘资料为基础，加上部分安阳市文研所的资料，实际数量应不止于此。

二　资料发表情况

1982年以来殷墟新出土青铜礼器的资料发表仍以简报、中篇报告、报告专集和图录四种形式为主。

简报共有23篇。公布青铜礼器236件，均为首次发表。其中较重要的有83ASM663①、84GM1713②、86郭家庄北M6③、91后冈M9④、95郭家庄M26⑤等。

中型报告4篇。集中发表了五座墓葬的资料，其中戚家庄M269⑥、刘家庄北地M1046⑦和大司空村M303⑧最为重要。共公布了94件青铜礼器，除戚家庄M269曾在《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发过简报外，余均为首次发表。

发掘报告专集2部。即《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⑨和《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⑩，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前者公布青铜礼器87件，其中编号M001出土的铜觚、爵、卣、觯各1件曾发表于《考古》1986年第8期，余均为首次发表，书中M160的青铜器最为学界关注。后者公布青铜礼器至少65件⑪，其中M42、M54和M60出土青铜器最为重要。

图录专集1部。即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3年出版的《安阳殷墟青铜器》，是继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之后出版的第二部专门公布殷墟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图录专集。该图录共有图版128幅，发表青铜礼器114件，其中有78件为首次向学界公布，另有70余件仅公布了出土数目和组合情况，未公布图片资料。

在以前发表的资料中，为了行文方便，往往对墓葬的发掘年代和出土地点进行编号。通常前两位数字代表发掘的时间，后面的英文字母则是墓葬所在地点汉语拼音的缩写。如04ASM303，“04”代表发掘时间是“2004年”，“A”代表“安阳”，“S”代表墓葬所在位置“大司空”，“M303”代表“303号墓葬”。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③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家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M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⑪其中M60形制特殊，随葬的陶器和铜器均打碎后平铺在人骨架之下，所出铜爵破碎严重，且碎片有缺失，仅依所出爵足数量判断铜爵为至少2件。

历年来殷墟发掘的墓葬编号缩写与地点对照表如下：

编号缩写	AS	AXT	APN	ALN	AGN	AG	AWB	ASJ	AF	ASP	AHG	AXS
墓葬位置	大司空	小屯	苗圃北地	刘家庄北	郭家庄南	安钢	武官村北	三家庄	范家庄	四盘磨	后冈	孝民屯南

除上表所列外，还有习惯用简略汉字表示的，如“郭北”代表“郭家庄村北地”，“郭南”即代表“郭家庄村南地”，“郭庄北”或“郭庄”代表“郭庄村北”，“戚东”代表“戚家庄东地”，“花东”代表“洹南花园庄东地”，“苗北”代表“苗圃北地”，“苗南”代表“苗圃南地”，“刘北”代表“刘家庄北地”，“刘南”代表“刘家庄南地”，“武北”代表“武官村北地”，“梯西”代表“梯家口西地”，“徐北”代表“徐家桥北地”，“薛”代表“薛家庄”，“梅”代表“梅园庄”，“董”代表“洹北董王度”，“太西”代表“北太平庄西”，“和”代表“安阳市火车站和平路”。

三　研究情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殷墟所出铜礼器数量的不断增加，如郭家庄M26、戚家庄M269、郭家庄M160、安钢M1713、刘家庄北M1046、花东M54、大司空M303以及三家庄诸墓的发掘和资料的公布，大大丰富了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为殷墟青铜礼器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这一阶段关于殷墟青铜礼器的研究可概括为几个方面。

（一）资料的整理方法和著录体例更为科学化

这一阶段，殷墟发表的有关铜器墓的简报或报告，原则上力求出土资料的完整性，如《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殷墟戚家庄东M269号墓》、《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和《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等，均以墓葬为单位，不但公布铜礼器，同时还公布伴出的铜兵器、工具、玉器，尤其是陶器等完整共出组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无疑会更为科学，更为客观。

除大量的简报和报告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的郭家庄墓地和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等专刊，也以极为科学的方式公布铜器材料。郭家庄墓地专刊，是继殷墟西区墓地之后发表的又一本反映殷墟族墓地的报告集。它不仅科学完备地公布铜礼器材料，而且还公布了清晰的墓葬分布图，给人一种完整的时空概念，使得殷墟铜器不仅仅是古器物，而且还是殷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关殷墟铜礼器的图录类著作也有多部，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殷墟青铜器》和《安阳殷墟青铜器》。前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完全收录解放后由考古所发掘出土的殷墟青铜器，绝大部分为礼器，其中不乏分期断代的典型单位，如PNM172、GM2579、82小屯M1等均为第一次发表。后者为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和市博物馆编著，主要收录1949年后由市文物队发掘出土的铜礼器和由博物馆收藏的出自殷墟的晚商铜礼器。这两本图录共同的特点，就是收录器物除市博藏品未能确知出土地点

外，余皆出自殷墟；不同的是，前者所收器物以殷墟铜器第二期和第四期为多，后者以第三期和第四期为主，属第一期的铜礼器也较前者为多。二者可互为补充。

（二）分期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殷墟陶器分期体系建立的基础上，殷墟铜礼器的分期体系也大体构建完成。主要以1985年出版的《殷墟青铜器》收录郑振香和陈志达、杨锡璋和杨宝成等的两篇关于殷墟青铜礼器分期的文章①为代表。他们都依据1982年以前殷墟出土的第一手资料就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分期体系。郑文把殷墟铜器分为四期，各期基本上与陶器之四期对应；杨文重申了他以前的分期观点，并讨论了商代铜器组合关系的早晚变化以及与周初铜器组合关系的异同，从而分析商周礼制之差异。另外，日本的林巳奈夫②、美国的柏哥雷（W.Bagley）③等，都在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看，通过自殷墟科学发掘至1982年前后数十年的努力，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体系已基本建立，各期特征也已相对明确。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以前的分期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如对殷墟青铜礼器第一期和第三期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关于殷墟铜器第一期，实际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以武官M1、YM331和YM188等为代表的一组铜器群是归属第一期或是归入第二期；二是关于第一期铜器的年代如何考订。近年来在洹北花园庄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又出土了部分铜礼器，这些铜器与原解放前小屯发掘的几座早期墓葬所出铜器一样，都属于殷墟铜器第一期。通过对花园庄遗址整体文化面貌的整理和认识，基本可以解决殷墟铜器第一期的年代问题。

关于殷墟铜器第三期，学术界分歧较大，或将其独立出来作为第三期④，或将之归入第二期晚段⑤。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除对殷墟铜器的整体认识不同外，主要是受资料的限制，以前属于第三期的典型单位不多，像出土青铜礼器较多的戚M269和郭M160等资料，都是1991年以后才发表。目前依据这些新资料，可以对第三期的问题做详细讨论。

随着1982年以后殷墟青铜礼器资料的不断发表，学界对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体系提出了新的看法。主要以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和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为代表。

1995年，朱凤瀚把殷墟青铜礼器分为早、中、晚三期，中、晚期各分两段，即三期五段⑥。其中把武官MI、YM331和YM188等为代表的一组铜器群归属于第二期早段，将戚家庄M269和郭家庄M160均归属于第三期早段。

2006年，岳洪彬依据2000年以前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资料（并结合大量尚未发表的青铜器资料）对殷墟青铜礼器进行综合考察，提出殷墟青铜礼器分为四期，二、三期

①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日]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年。
③W.Bagley.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④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载于《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⑤杨锡璋：《殷墟青铜容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⑥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各分早、晚段，即四期六段①。其中完全赞同朱凤瀚先生将武官M1、YM331和YM188等为代表的一组铜器群归属于第二期早段的观点（当然YM331和YM188两墓中包含有偏早的铜器，这种现象在商周时期铜器墓葬中不乏例子），但认为戚家庄M269和郭家庄M160还是存在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不应将其与相当于殷墟四期的铜器群归为同一期，而应独立出来单独划为一个时期，即属于殷墟铜器第三期，且以戚家庄M269为代表的一组铜器群和以郭家庄M160为代表的一组铜器群也存在差别，应分别归属殷墟铜器第三期早段和晚段。而以YM232、YM333、YM388、三家庄M3、1号铜器窖藏坑和99AHBM10为代表的铜器群应属于殷墟铜器第一期，时代相当于洹北花园庄时期，约略为盘庚、小辛、小乙以及早于盘庚的一段时期。②本书所收青铜器的分期均采纳《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一书的分期标准。

另外，唐际根和汪涛也依据最新发掘资料对殷墟第四期文化的年代进行讨论，提出殷墟第四期墓葬又可分为五个小段（即IV1－IV5），其中IV5段所代表的遗存是殷墟文化延续到“商纣亡国”之后，或是跨商末周初的。而殷墟西区的GM1713的上限“不能早于帝辛时期”，其下限年代“当在帝辛七年至周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以前，其葬于帝辛之后的‘武庚监国’时期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③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殷墟第四期的年代提出的最值得重视的新观点。日本学者难波纯子依据各地出土的最新青铜器和铸范资料，并结合藏家手中的相关藏品，考察了殷墟第四期新出现的青铜器制作的动向，尝试对殷墟出土的具有西周风格的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编年研究。④

（三）组合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

早在20世纪60年代，郭宝钧先生就根据商周青铜礼器不同器类数量上的宏观考察，提出商周存在着“重酒”和“重食”之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整理殷墟西区墓葬时，就开始利用组合研究来探讨殷商社会关系等问题，曾指出在殷墟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以觚爵最为常见，墓中随葬铜觚爵及其他器类数量的多寡，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政治地位和身份的不同。⑤后邹衡和徐自强又根据墓葬的大小、觚爵套数的多少及时代的早晚等，来探讨墓主的身份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等。⑥这样，就从单纯的铜器分期和组合研究提高到对殷代礼乐制度及社会关系等变化方面的研究，这是青铜器研究历程中的新进展。

后来，根据各地出土的新资料，杨锡璋和杨宝成又对殷商时期青铜礼器不同时期组合的变化、殷周之际组合的异同以及组合与墓主的身份的关系等作了补充探讨。⑦

孟宪武依据殷墟南区出土铜器墓结合殷墟其他区域新发掘的铜器墓资料，对殷墟墓葬的铜器组合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殷墟末期商人不仅重酒，而且“鼎、簋、觚、爵”组合的常见也显示了商人重食的一面，即提出殷墟末期商人“重酒重食”的看法。⑧

---

①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122－1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②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载于《夏商周文明研究六　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③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④[日]难波纯子：《关于殷墟四期青铜器制作之新动向》，《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年—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⑥附载于郭宝钧先生的《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204—207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⑦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载于《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⑧孟宪武：《殷商青铜礼器组合的演化趋势》，《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刘一曼对殷墟青铜礼器的组合进行了重新分析，针对孟宪武提出的殷墟末期为"重酒重食"组合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她认为殷墟末期商人仍未改其"重酒"的观念，并对殷墟晚期明器化器物大量出现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①

岳洪彬依据墓葬分类的统一标准——即墓室规模的大小——对殷墟墓葬等级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讨论殷墟青铜礼器的组合，提出了晚商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财富与地位差现象"。②

总之，这一阶段对组合关系探讨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和研究深度，都是以前所无法比拟的，它已触及到商史研究的深层领域。

（四）殷墟铜器与周围地区的比较研究

这一阶段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殷墟大规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铜器资料，而且殷墟以外地区商代青铜器大量出土，如郑州商城的窖藏铜器③、罗山县蟒张商墓④、鹿邑大墓⑤、老牛坡商墓⑥、灵石商墓⑦、益都苏埠屯商墓⑧、前掌大墓地⑨、湖北盘龙城商墓⑩、新干大洋洲铜器群⑪、广汉三星堆铜器群⑫等，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多数有完整的组合和科学的层位关系，使得殷墟青铜礼器与周围地区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对商代青铜器展开了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比如"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概念的提出⑬、对殷商文化的区域研究⑭、对非中原地区青铜器文化圈的划分⑮、对南方商代青铜礼乐器的研究⑯等等，都是在殷墟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非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所得出的成果。通过这些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使得人们改变了许多对殷商青铜文明的传统看法，不再把目光仅仅聚焦于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是认识到周边地区亦有较发达的青铜文化，它们既有与中原铜器相同的一面，又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共同构筑着殷商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

---

①刘一曼：《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②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刘开国：《罗山天湖商周墓地的重要发现与研究》，载于《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⑥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海金乐、韩炳华：《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⑩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⑬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载于《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⑭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⑮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载于《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⑯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五）铜器成分的测定和铸造工艺研究方面

1．成分测定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殷墟青铜器成分测定方面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1976年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460多件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化验室从中广泛采取样品，其中有65个样品采自青铜礼器，是历年来礼器采样最多的一次，并于1982年发表了测定结果：其中47件礼器为铜锡二元合金，18件为铜锡铅三元合金。[①]经分析发现，铜锡型大型礼器的含锡量略偏低，可能与有意节省锡料有关；某些成对、成套礼器，含锡量都比较接近，推测可能是同时铸造的。铜锡铅型礼器的含铅量在2.1％－7.8％之间，说明"铅的加入是有意而为，也就是说当时已掌握冶铸三元合金的新工艺"。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西周时期才出现三元合金，而妇好墓铜器的化验结果表明，早在武丁时期已成功冶炼三元合金。这项新的收获，后在考古所实验室对殷墟西区墓地14件青铜礼器的测定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证实。[②]

戚家庄269号墓和郭家庄160号墓发掘后，属于殷墟第三期的铜器标本较前有了很大丰富，由此掀起了殷墟铜器成分分析研究的又一轮高潮。

1997年，季连琪发表了对郭家庄160号墓出土铜器的成分分析报告。

2004年，赵春燕首次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技术对殷墟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极为重要的现象。如，不同时期同一器类合金成分不一，相同时期不同器类合金成分也不相同；不同等级墓葬中同一器类的化学成分不同，等级越高，其铜合金中锡含量越高；同一器物不同部位的样品的化学成分是不相同的；若将器物以相同铭文分为不同的铜器群，同铭同类器物其化学组成相似，不同墓葬中同一铭文的铜器群其合金化学组成也相似。通过这些现象，基本可以判断殷商时期已经掌握了锡铅含量对器物性能的影响，从而才能按照不同器物功能选择合金的化学组成。[③]

另外，金正耀对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来源的探讨[④]，也给殷墟青铜器及商史研究以很好的启示。

2．铸造方面

随着大量铜器标本的出土和1999年以来对孝民屯铸铜遗址的发掘[⑤]，使得殷墟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步上新的台阶。如谭德睿[⑥]、华觉明[⑦]、刘煜和岳占伟[⑧]等，都针对殷墟出土的最新铸铜资料先后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岳占伟和刘煜对殷墟出土的第一手材料充分研究后发表的《殷墟铸铜遗址综述》可为代表。[⑨]该文不仅高度概括了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一）——妇好墓铜器测定》，《考古学集刊》第2集，第181－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②李敏生、黄素英、季连琪：《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③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④金正耀：《论商代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成因铅》，《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⑤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商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3—2004年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⑥谭德睿：《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技术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⑦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109－110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

⑧刘煜、岳占伟：《殷墟陶范的材料及处理工艺的初步研究》，《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⑨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殷墟的铸铜遗存，而且对殷墟铸铜遗址有关的几个问题，如模、范和芯的问题、分范问题、炼铜和熔铜问题、鼓风问题、陶“盔”形器的用途，以及利用陶范反映出来的新器类和新器形对殷墟青铜器进行断代等学术界关注的话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四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的学术意义

（一）出土地点增多，分布范围扩大

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资料，殷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基本局限于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殷墟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大约16—1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20世纪70年代配合安钢扩建发掘了殷墟西区墓地，才知安钢东半个厂区也都坐落在殷墟遗址上，殷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竟覆盖了洹河南北两岸大约24平方公里的区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基建发掘的范围也迅速扩大。就目前所知，殷墟遗址的规模大约有36平方公里，东西、南北延伸均约6公里以上。集中分布在京广线以西，安钢厂区内原北辛庄村以东，向北因洹北商城的发现分布范围大为扩展，向南迈过万金渠可达徐家桥一带。

多年来，安阳市文物工作队（现为“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外围做了很多田野工作，收获颇丰[①]，发现不少新的青铜器出土地点。如向东南越过殷二路南，在文峰立交桥附近发现带墓道的殷墟晚期大墓[②]；向东迈过京广铁路，在彰德路西亦发现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的殷墟晚期墓葬[③]；向南甚至在文峰大道以南的工贸中心、大华和安钢生活区都发现了铜器墓和车马坑[④]；向西北青铜礼器的出土地点已延展到范家庄村东、村北[⑤]；东北方向所做工作较少，目前所知仍限于郭家湾村北一带[⑥]。

（二）数量迅速增加，并出现部分新的器形和组合形式

从1982年以来的25年间，出土青铜礼器不少于1600件，比1982年以前55年间所出青铜礼器的总和还要多。

青铜礼器的器形较以前有所增加，主要有如下几种：

1. 四足盉，见于99ALNM1046[⑦]。
2. 提手钮盖的提梁卣，见于99ALNM1046和2004ASM303[⑧]。
3. 圆柱体筒形卣，目前殷墟仅有1件，出土于92ALNM350车马坑[⑨]。
4. 青铜扣壶，仅余器盖、口、腹和底部的铜扣箍，其他木胎部分均已朽尽。出土于彰德路西原安阳市机床厂内的一座殷墟晚期的墓葬中。[⑩]

---

①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②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尚未发表。
③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尚未发表。
④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尚未发表。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尚未发表。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尚未发表。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2004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⑨本图录首次发表。
⑩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尚未发表。

5. 捉手钮盖的扁圆卣，见于94ASM7[①]。

以上诸器形，均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殷墟发掘所未见。

殷墟各期段的器类也大为丰富。如以前殷墟二期墓葬所出的铜卣只有圆形提梁卣和鸮卣两种，但2005年在侯家庄西隔河相望的范家庄村发掘的殷墟二期偏晚阶段的M4中发现1件扁圆卣，应是目前所见扁圆卣最早的形态。[②]以前发掘的铜瓿都不晚于殷墟二期，但据最新资料，发现殷墟第三、四期都有铜瓿（徐家桥综合楼M1、94ASM7和花东M42），只是颈和圈足较早期所见为高；第四期还新出现铜方彝（91后冈M9和99ALNM1046）。

另外，2000年以来在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不少如横出棱脊的华冠凤鸟卣范、直棱龙纹方形器座范、直棱龙纹鼎范、长乳钉直棱纹簋范、长垂珥的簋耳范等新器类。学术界以前通常将这些器类认为是西周早期铜器的风格特征。而这些陶范在殷墟孝民屯的出土，明确地证明了这类风格的铜器早在商代晚期已在殷墟被铸造出来，并有学者提出"基于现有的材料，并考虑新风格的产生或许有较长的萌芽过程，这批原来一般定为西周早期的铜器，尤其是没有科学考古发掘可对应、而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器形及风格基本一致的博物馆藏品，如直棱龙纹鼎、方禁（本文注，指方形器座）、长尾凤鸟卣等，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③]此观点值得学术界重视。

青铜礼器的组合形式也更为丰富。如1982年以前发掘的殷墟第二期铜器墓中妇好墓规格最高，而低于妇好墓的就是1977年发掘的小屯M18，为5觚5爵墓，从等级上说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距，2001年发掘的花东M54为9觚9爵墓，可填补两者之间的等级空缺。1982年以前属于殷墟三期的铜器组合中没有规格高于2套觚爵的墓葬，而戚家庄M269为3套觚爵，郭家庄M160为10套觚爵；同样，属于殷墟四期的铜器组合中也没有规格高于3套觚爵的墓葬，而新发现的刘家庄北M1046为7套觚爵，大司空M303为10套觚爵。这些高规格墓葬的发现，均补充了各期、段墓葬等级资料的不足，使得不同时期相同规格墓葬组合关系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另外，单墓随葬青铜礼器也出现不少新的组合方式。如2005年在殷二路北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小区院内发掘的M5保存完好，出土青铜礼器组合有觚1、爵1、鼎4、甗1、罍1和箕形器1。从所伴出的陶器和兵器判断，该墓属殷墟二期偏晚阶段。目前属殷墟二期的墓葬中，出土4件鼎以上的墓葬仅有妇好墓（出土32件鼎）和花东M54（8件鼎），其中妇好墓出53件觚、40件爵，花东M54出9件觚、9件爵；甚至小屯M18出土3件鼎，伴出5套觚爵；大司空M539出土1件鼎，还伴出2套觚爵。由此看来，随葬觚爵的套数应不少于鼎的数量，像文源绿岛M5出土4件鼎仅伴出1套觚爵的情况极为罕见，其中应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历史信息。

（三）各期段的标准器群得到不断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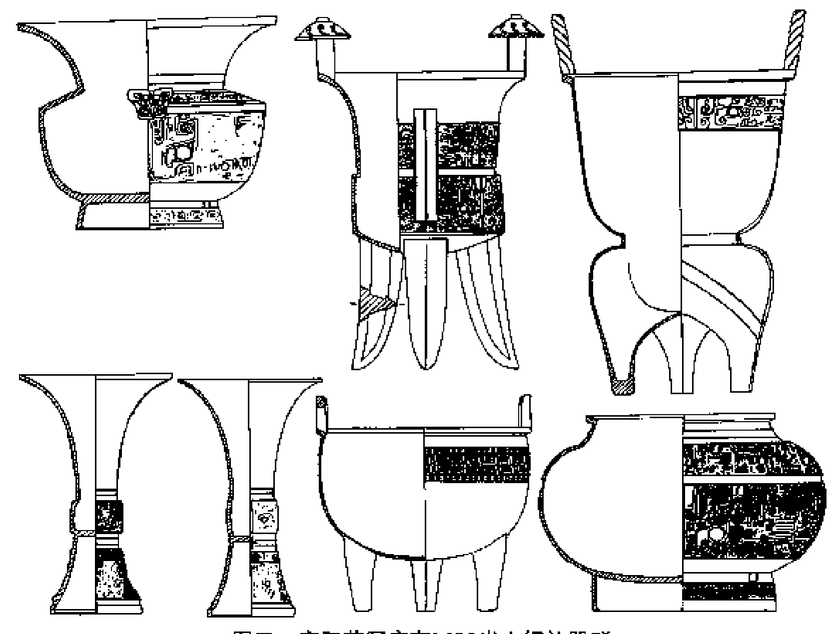
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可用于分期断代的标准器群也越来越多，使得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体系更加完善。

---

①本图录首次发表。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5年安阳殷墟范家庄村东村北发掘简报》，《考古》，待刊。
③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第3期。

1．花东M60

2001年春发掘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墓室面积约1.56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器有鼎1、觚3、斝1、甗1、瓿1、折肩尊1，另有至少2件铜爵和近30件可复原的陶器。从器物特征判断，M60应不早于小屯YM232、YM333、YM388等墓，与59武官M1时代相近，该墓的铜器应属殷墟铜器二期早段的标准器群（图二）。



图二　安阳花园庄东M60出土铜礼器群

2．花东M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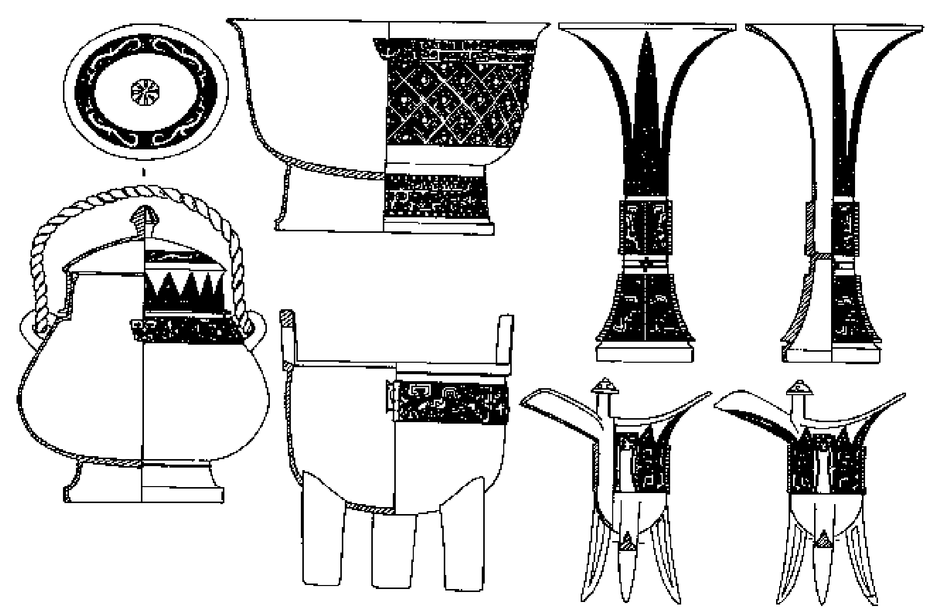
2001年春发掘于殷墟花园庄东地。墓室面积约27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器圆鼎6、方鼎2、簋2、甗1、盂2、勺2、方斝1、方尊1、觚9、爵9、方罍1、方彝1、觥1、牛尊1、斗1、铙3，另有青铜兵器、工具、玉器、陶器等数百件。

此墓随葬的青铜器大体上还应归为殷墟二期，但部分器物已具有了殷墟三期的特征，如M54大圆鼎整体形制和装饰风格明显晚于妇好墓的“亚弜”圆鼎，而近似于郭家庄M160“亚址”大圆鼎；M54铜方罍底部内凹，肩部双耳已出现殷墟三期以后常见的衔环；方彝盖面弧脊近直，圈足缺口较窄；乳钉纹铜簋（M54：177）束颈，鼓腹，高圈足，双兽首鋬，整体形制近似于属殷墟三期早段的戚家庄M269所出铜簋；铜斗也非殷墟二期常见的直柄，成为殷墟三期始多见的曲柄形；另外，M54还出土3件卷首刀和2件长胡多穿戈，卷首刀和长胡戈以前常认为始见于殷墟三期。同墓所出大量陶罍的组合方式也多见于殷墟三期以后。因此，M54的时代应属殷墟二期最晚阶段或二、三期之间，大致在祖庚、祖甲时期或可延至廪辛早年。该墓的铜器群应是殷墟铜器第二期最晚段的标准器群。

3．范家庄M4

2006年在与侯家庄隔河相望的范家庄东地发掘一座铜器墓，编号2006AFM4。出土7

件青铜器，计有鼎1、簋1、觚2、爵2、卣1，另有陶觚、爵、簋等。该墓伴出陶器均为殷墟二期偏晚阶段，而同出的铜卣并非殷墟二期常见的圆体卣，而是扁圆体卣。目前所见的扁圆体卣仅GM2575所出为殷墟二期晚段，余均属殷墟三、四期。该墓所出的折沿直腹高圈足长乳钉簋以前也不见于殷墟二期。由此判断，范家庄M4应与花东M54大致同时，亦当祖庚、祖甲时期（或可延至廪辛初年）的墓葬，但规格较花东M54低，为殷墟铜器第二期偏晚阶段2套觚爵墓葬的标准器群（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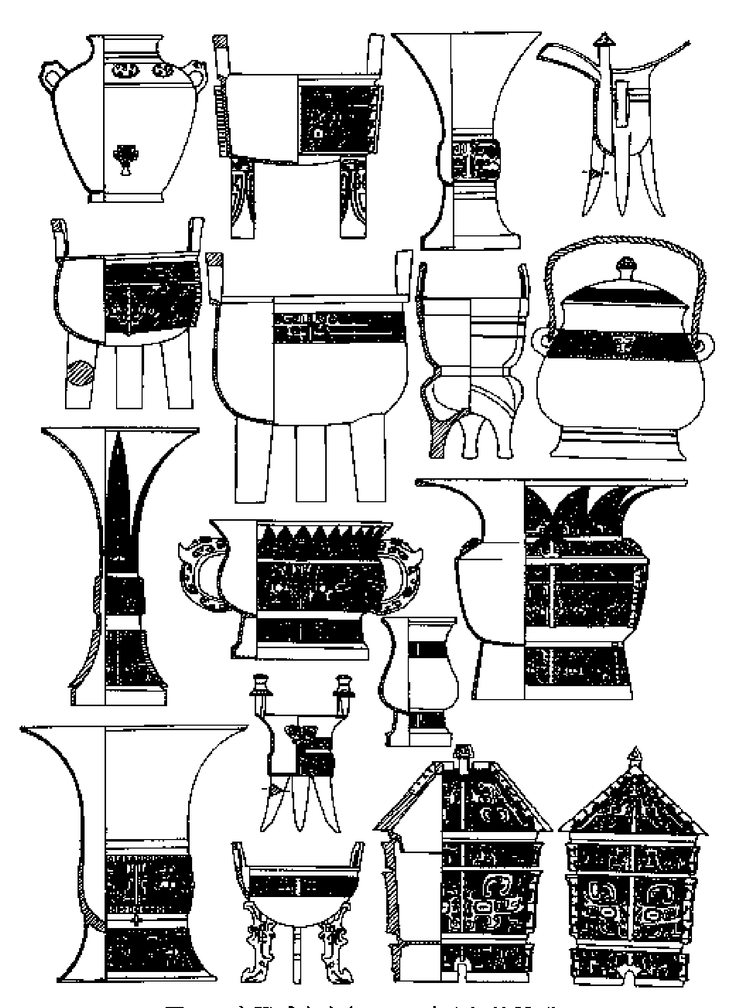
图三　安阳范家庄东M4出土铜礼器群

4. 戚家庄M269和郭家庄M160

1984年于殷墟遗址的西南戚家庄东发掘M269，墓室面积6.5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器有鼎4、簋1、甗1、觚2、爵3、尊2、罍1、斝1、方彝1、卣1、觯1、斗1和器盖1（图四），另有数十件青铜兵器和陶器等。从随葬陶器看，此墓应属殷墟三期。

1991年在郭家庄东南地发掘M160，墓室面积12.7平方米。随葬青铜礼器有鼎6、簋1、甗1、方斝2、分裆斝1、方尊2、圆尊1、方觚10、角10、盉1、卣1、罍1、觯1、盘1、卢形器1、斗1、铙3，另有青铜兵器、陶器和玉器等。该墓随葬陶器亦属殷墟三期。

虽然戚M269和郭M160皆属殷墟三期，为殷墟三期铜器研究提供了较高规格的范例和标准器群。但两者的青铜器群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如M269罍为矮圈足、肩部双兽首鋬无衔环，M160罍圈足较高、肩部双鋬均呈兽首衔环状；M269甗为直口内出台以承盖，乃早期特征，而M160甗为侈口无台，系晚期特征；M269为尊式斝，不见分裆斝，M160除尊式方斝外，还出现分裆斝；尤其M160所出凤鸟卣和提梁方鼎，均为殷墟四期以后常见的特征。因此，戚M269早于郭M160，前者随葬的铜器应是殷墟铜器第三期偏早阶段的标准器群，后者则为殷墟铜器第三期晚段的标准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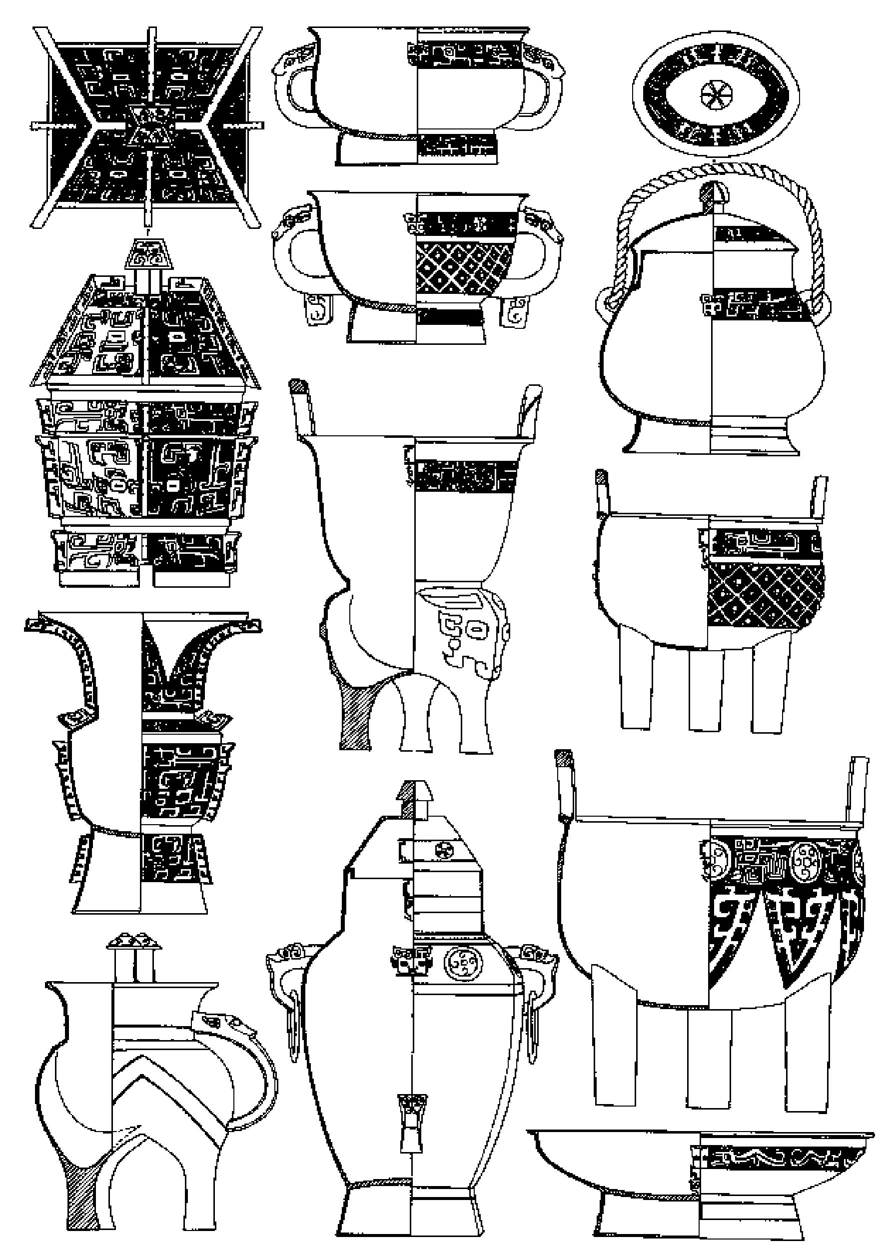
图四　安阳戚家庄东M269出土铜礼器群

5．大司空M303和刘家庄北M1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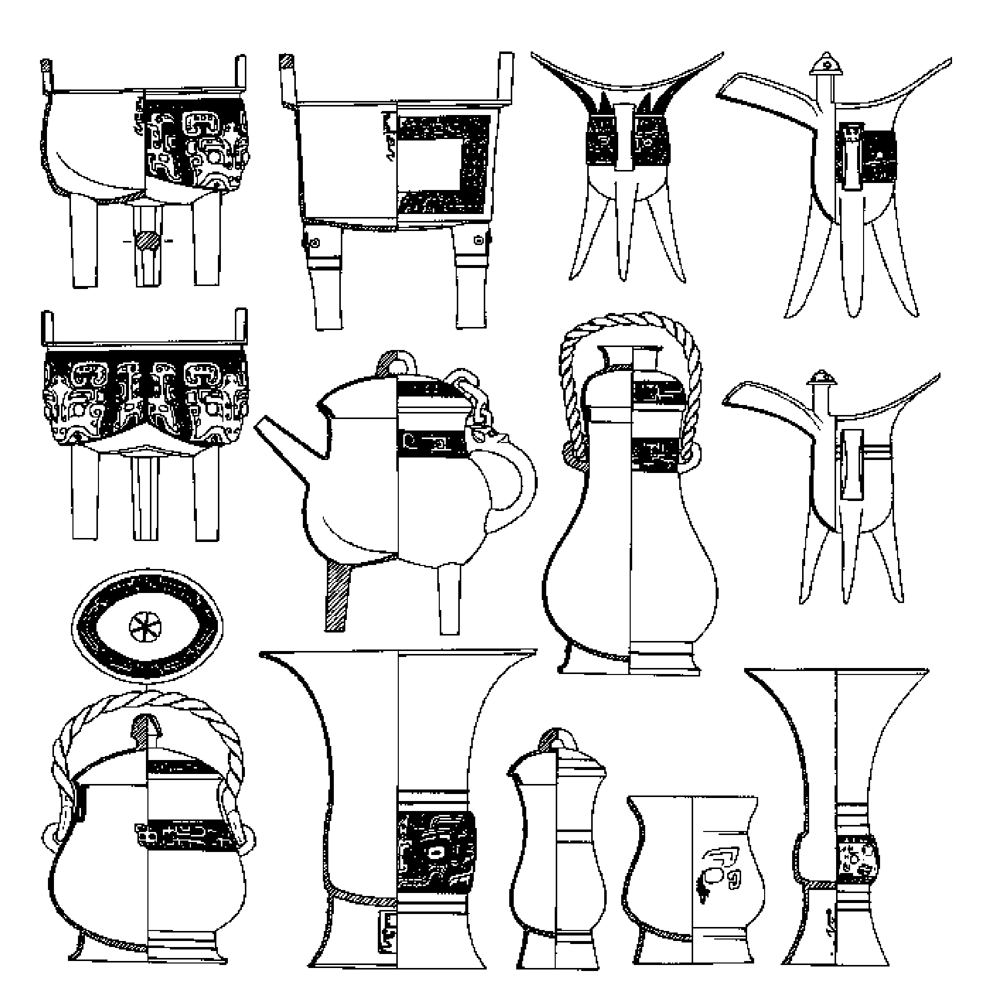
1999年在安钢大道南刘家庄北地发掘M1046，墓室面积11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器有鼎6、簋2、甗1、分裆斝1、方尊2、圆尊1、觚3、爵5、角2、盉1、卣2、提梁卣1、罍1、方彝1、觯2、斗1、盘1，另有大量铜兵器、陶器和硬陶等。从随葬器物群特征判断，此墓应与GM1713年代相同，属殷墟四期晚段七套觚爵规格的标准器群（图五、六）。

2004年在安阳大司空村东南豫北纱厂内发掘了M303，墓室面积9.2平方米。出土青铜礼器有鼎7、簋2、甗1、尊式斝1、分裆斝1、圆尊1、觚形尊1、觚6、爵10、盉1、卣2、提梁卣1、罍1、觯1、斗2、盘1、铙3，另有大量陶器、玉器和青铜兵器。此墓属殷墟四期晚段，是殷墟四期晚段难得的10套觚爵规格的标准器群，是目前所见殷墟四期保存完整的墓葬中规格最高的墓例。

刘家庄北M1046和大司空M303虽均属殷墟四期偏晚阶段，但两者器物群特征仍存在一些差别。如虽两者均随葬有具有晚期特征的提梁卣，但M303所出较M1046肥硕；M1046的觯形体瘦高，盖钮为桥形；M303铜簋仅有双耳，M1046铜簋耳下带有长方形垂珥；M1046的铜罍特征也明显晚于M303所出铜罍。综合比较，M303应略早于M1046。若M1046和GM1713一样属帝辛晚期墓葬不误的话，M303大致应相当于帝辛早期。



图五 安阳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铜礼器群（一）



图六　安阳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铜礼器群（二）

到2008年为止，殷墟发掘已走过了八十年的风雨历程，一代代殷墟考古人追寻着商人的足迹，孜孜以求，笔耕不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对于为都250多年、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殷墟遗址来说，八十年发掘所获得的认识仅是殷墟遗址的冰山一角；迄今为止所发掘的近万座商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也只是殷墟为都期间所铸青铜器的九牛一毛而已。因此，殷墟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征程还很漫长，相信还会有大批青铜器不断出土，将三代青铜器的研究推向新的辉煌。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铭文概论

严志斌 岳洪彬 岳占伟

自1982年以来，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陆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许多青铜器都有铭文，已公布的约有如下几批：1984年的孝民屯南M1713号[①]、武官村M259[②]、戚家庄东M269[③]、苗圃北地M123[④]、刘家庄M2[⑤]；1985年的梯家口西M3、刘家庄北M1、刘家庄南M63、M22、M32、M19[⑥]、刘家庄北M9[⑦]；1986年的大司空南M29[⑧]、郭家庄北M6[⑨]；1987年的郭家庄M50[⑩]、郭家庄东南M1[⑪]、梅园庄M20、M30、M59、M92[⑫]；1990年的郭家庄M160[⑬]、梅园庄M1[⑭]；1991年的后岗M9、M21、M33[⑮]、高楼庄M1[⑯]、徐家桥北M23、八里庄M52[⑰]；1992年的苗圃南地M47、M58[⑱]、郭家庄M38、M53、M135、M220[⑲]；1995年的郭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③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
⑤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⑥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⑦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83－198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
⑨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家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第10期。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91年第2期。
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梅园庄西的一座殷墓》，《考古》1992年第2期。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高楼庄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4年第5期。
⑰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⑱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报告未明言这4座墓葬的具体发掘年份，仅说明是1982—1992年间发掘的，故暂置于1992年内。

家庄M26[1]、小屯北大型建筑基址F1出土青铜盉[2]；1997年的王裕口南地M1[3]；1999年的刘家庄北M1046[4]；2001年的花园庄东地M54[5]；2003年的孝民屯M17[6]；2004年的大司空M303[7]，以及本书中首次公布的1994年大司空村东M7、刘家庄北地M637和M793、1999年苗圃北地的M229、2005年郭家庄南发掘的文源绿岛M2和M5以及范家庄东M4等。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多达350件以上。下文拟对其中的部分铭文略作讨论。

1984年11月戚家庄东269号商墓，为典型的殷墟文化三期墓葬。出土铭文青铜器28件，其中鼎4件；甗、斝、罍、方彝、觯各1件；爵2件；觚3件；铙一套3件；戈10件[8]。还有1件器盖。铭文内容有25件都是“爰”字，如此，器主与墓主当是爰族宗主级的人物。爰族铜器在269号墓发掘之前也有过著录，计有11件，简列如下：

爰父癸甗（集成[9]00824），现藏故宫博物院，铭“爰父癸”。

爰爵（集成07459），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铭“爰”。

爰爾爵（集成08174），1982年出于殷墟西区875号商代墓葬（M875:2），铭“爰爾”。同墓还出一件爰爾卣（M875:6），与爵同铭。

子□爰爵（集成08766），铭“子□爰”。

爰□觯（集成06180），现藏英国私人，铭“爰□”。

爰父癸觯（集成06339），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爰父癸”。

爰斝（集成09126），传出于安阳侯家庄大墓，现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铭“爰”。同出一对，形制、铭文相同。

爰卣（集成04738），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陈列馆，铭“爰”。

爰戈（集成10684），1943年出于安阳，原藏梁上椿，铭“爰”。

如此，爰族铜器共发现有36件。铭文“爰”字一般皆作两手分居一棍两侧作上下援引之形，唯M875所出的铜器铭文中，爰字一侧作手形，而另一侧则着重表现出人形，更清楚的表现出“爰”字的造字本意。这种铜器铭文采用原始式的字体形式来表现，是一种郑重的表示，并不说明器物时代更早。器物形态学的证据也表明M875的铜器的时代也是殷墟三期时器。就目前所见，爰族铜器有出土地点者皆出于河南安阳殷墟，并有中、小型墓葬，表明爰族在安阳聚族而居。

与爰有复合关系的族氏有□、爾两族，其中的□族，或释作蚰，但此铭文的形体与商周铜器纹饰中的所谓肥遗者近同，是一头双身蛇的形象。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撰文指出过这一点[10]。□族可能即以这类神物形象作为己族的标记，故而似不宜强隶作某字。商代□族铜器笔者见有13件，其时代或可早到殷墟二期，晚到殷墟四期，也是一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5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5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2004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⑥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⑧实际公布的有3件。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⑩[日]林巳奈夫（蔡凤书译）：《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日本考古学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第149页，东方书店，1990年。

个传续时间较长的族氏。铜器铭文中与𦍌族有复合关系的族氏还有兮、羊、来等。爰𦍌觶铭文所示，当是说明爰族与𦍌族关系紧密，可能有分支或姻亲一类的关系。商代的爾族铜器，凡三见，皆酒器。爾族与爰族之关系，限于材料，尚不易讨论。

1990年发掘的郭家庄M160号墓是近年殷墟考古发现的重要收获之一，出土青铜礼乐器44件，其中有大量的方形器颇引人注目。有铭青铜器41件。铭文内容可分为三组：亚址、亚𩠚址（止）、中亚𩠚止。很明显，部分铜器铭文中的“止”其实是“址”的省形。而这批铜器中，铭“亚址”者最多，共有33件。发掘者推测M160的墓主是址族之首领或址族的上层人物①，当属可信。

同铭“亚址”的铜器还有如下4件：

中觶（集成06482），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铭“中作妣己彝，亚址”。

亚址耀方鼎（集成01759），现藏故宫博物院，铭“址亚耀②”。

亚址父己爵（集成08926），铭“亚址父己”。

亚址父己卣（集成05079），铭“亚址父己”。

这几件铜器的年代被定为西周早期，表明亚址族氏可能延至周初。同铭“亚𩠚止”者，还有一件鼎，集成01424，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

“𩠚”族铜器，共有27件，除M160所见8件，另外还有19件，此暂不一一列举。时代皆为商代晚期，出土地点有三：河南安阳、陕西陇县、江西遂川。与𩠚复合的族氏除中、址（止）外，还见有孤竹、𠂤、宦、明、皇祈。出土地中的陕西陇县与江西遂川，当是偶尔流入的。关于𩠚，张亚初从孙诒让说释其为胡字③。曹定云先生认为相当于“孤”，𩠚竹即是文献中的孤竹④。铜器铭文中有如下诸例：亚𩠚宦（集成02427）、亚𩠚 𠂤（集成08777）及亚𩠚址，在这些铭文中，𩠚是否是孤竹之孤，是有疑问的。而且𩠚都与亚形同出，唯不见𩠚竹二字同在亚形之中的例子，而“亚𩠚”常单独出现，𩠚与竹是否连读也是还需探讨的。亚𩠚父丁卣（集成05271）铭文为“亚𩠚宦孤竹父丁”，𩠚与竹之间有宦字，表明𩠚与竹并不能连读。冯时先生以为“亚𩠚”是孤竹的小宗⑤，意即𩠚为竹之分支族氏。按照这样的解释，则需将亚𩠚聞䊷（集成01944）、亚𩠚皇祈（集成05100）、亚𩠚止中（M160:22、23、41）之聞䊷、皇祈、中以及上举三器中的宦、𠂤、址（止是其简略形式）都认定为私名才能妥当。笔者认为聞䊷 、皇祈作私名解是可行的（但“祈”在甲骨刻辞中是作为一地名出现的，也有作族名的可能性⑥）。商代“中”器有17件，时代为殷墟三、四期。西周时期的“中”器见有7件，时代可延至西周晚期。与“中”有复合关系的族氏还有大、◇、𣥄、征、成、䀠等。目前“中”器多出于河南安阳。在甲骨刻辞中，中是人名（《甲骨文合集》388），也作地名（《小屯南地甲骨》2529，下文简称“屯南”）。由此，中是一族名。甲骨刻辞中的犬中（《甲骨文合集》27902，下文简称“合”），即来自中族的犬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第12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②此字暂从张亚初释，见张氏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

③张亚初：《从古文字谈胡、胡国与东胡》，《文博》1992年第1期，第9页。

④曹定云：《殷代的“竹”和“孤竹”》，《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52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⑤冯时：《殷代史氏考》，《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⑥祈用作地名之例如南明498、合7912、合488、合7920、合946、合7919、屯南7。

官，其职责主要是观察兽情，以备商王田猎，有时也参与战争。在安阳王都内出现的“中”当是小臣中（合5574）一类的在商王廷任职者。笔者倾向于“中”、“址”是族氏名的可能性更大。由此，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亚㠱与竹两者之间的复合关系不是分支族氏关系。

作为与㠱复合的族氏之一的孤竹，是目前少数几个被学界基本认可的商代国名之一。商代竹器共20件，时代为殷墟三、四期。在甲骨刻辞中，武丁时期多见竹的活动，廪、康时期偶见。竹为商之属国，两者关系紧密。武丁时期（或稍后），竹即受册命为侯，并任贞人；竹国还为商王朝提供职事服务，竹还参与对㇋、召方的战事。并以召方之人为牺牲祭祀。竹国还要向商王朝贡纳龟甲等物，而安阳妇好墓中出土的石磬（M5:315）上刻有“妊竹入石”，表明此石磬是竹国所贡。甲骨刻辞中仅有“竹”之称，文献中则有“孤竹”之称。金文中的“孤竹”，虽然学界对字的考释上还有一些分歧，但也都肯定“孤竹”的存在[①]。竹与孤竹有着承接关系。关于孤竹的地望，《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国也，姓墨胎氏。”唐兰提出辽宁喀左一带是古之孤竹[②]。李学勤先生认为孤竹城在今河北卢龙县境。其又据《史记•殷本记》之“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认为目夷是子姓的古国，而孤竹君既然是墨胎氏，孤竹便是子姓国[③]。曹定云先生认为古之“竹”的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④]。彭邦炯先生认为竹地望“在今日河北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竹国范围内的重要城邑了”[⑤]。这种见解已被学界广泛接受。

与竹有复合关系的族氏有：亚彭（集成09810）、旗（集成04852）、劦（集成05006）、耳（集成08269）、聑（集成06932）、㇏（集成08270）、㇙（集成08271）。孤竹亚彭罍1973年出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的商末周初青铜器窖藏[⑥]，铭“父丁，孤竹，亚彭”。林沄先生以此认为孤竹国乃是彭人所建方国之一[⑦]，似有不确，但点到孤竹与彭之间的国与族的关系，则是很有启发性的。商代彭族之器还见于父乙莫觚（集成07264），为殷墟四期器，铭“亚父乙彭莫”。亚彭之与孤竹的关系和亚㠱与孤竹的关系相同。亚彭或是与孤竹为平等的联系的关系，或是宗族分支的关系。对此，笔者有一假设：竹与孤竹是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名称。竹原是一族氏，到商代晚期，成立了孤竹国，亚㠱与亚彭则是孤竹国内的两个族氏，其与竹氏或有婚姻关系，但不一定就是竹族的分支小宗。孤竹与亚㠱、亚彭的关系是国与族的关系。

---

①晏琬：《北京、辽宁出土的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第276页。曹定云：《殷代的“竹”和“孤竹”》，《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48－52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②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第11页。
③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又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56、57页。
④曹定云：《殷代的“竹”和“孤竹”》，《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55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⑤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又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28册，第24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⑦林沄：《释史墙盘铭中的“逖虘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又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80页。

然则亚址与亚窦以及址、窦、中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上举中觯（集成06482），铭为“中作妣己彝，亚址”，如果此铭中的“中”是族氏名，应该可以认为“中”族氏当属于亚址族氏，是亚址的分支族氏。中族之器目前所见年代最早者为殷墟三期晚段，多数出现在殷墟四期，延至西周，作为亚址分支族氏在年代上不存在抵牾之处。址、窦之间的关系限于材料则还难以廓清，但鉴于址、窦、中三者在同一器上出现，三者的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1999年发掘的刘家庄1046号商墓，出土青铜器300件，其中容器33件，计有方鼎、圆鼎、甗、簋、方尊、圆尊、方罍、方彝、卣、盉、斝、觶、觚、爵、角、盘、斗等。出土铭文青铜器24件，铭文可分为三组：亚玨宫、亚玨、亚。以“亚玨”最多见。有的学者也将此铭文隶定为“𠪚”。其实，此组器铭采取了商代族氏铭文常见的重复对称的表现形式，亚形在上，亚形下的玨字作左右对称的两个蹲居拱手的侧面人形。与此相同的表现方法在商代铜器铭文中比比皆是，如大家熟知的册，多数都重复对称，作“册册”形，再如執公父丁卣（集成5074）中的執，也作“執執”。皆其例。M1046号墓的墓主，当为亚玨族宗主级人物，亚玨宫之“宫”很可能即是墓主私名。而发掘表明，此墓旁边还有若干小墓，出土的青铜器铭中也出现有亚玨，说明安阳殷墟的亚玨族也行聚族而葬的墓制。

除1046号商墓集中出土的这批玨器之外，历年来也有玨器见世，举例如下：

玨爵（集成07342），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铭“玨”。

玉玨觚（集成06923），现藏美国圣路易美术博物馆，铭“玉玨”。

玨册觚（集成06995）现藏故宫博物院，铭“玨册”。

亚玨丁觚（集成07182），现藏故宫博物院，铭“亚玨丁”。

玨斝（集成09112），澳大利亚国立维多利亚美术馆，铭“玨”。

玨卣（集成04774），铭“玨”。

玨觟戈（集成10849），传出于安阳，现藏故宫博物院，铭“玨觟”。

玨天戈（集成10850），现藏上海博物馆，铭“玨天”。

这8件铜器，时代皆为商代晚期。玨册器铭表明玨族中人曾担任作册职务。而与玨复合出现的玉、天、觟的性质，以族氏名的可能性为大。玉玨觚与亚玨丁觚铭中的玨也是重复对称的，作“𠪚”形，而亚玨丁觚的构形与亚玨宫构形更是极为近同。这也说明亚玨宫之宫与亚玨丁之丁性质近同，丁当是亚玨族之庙号（或家族成员的另外的某种排序）为丁者。1046号墓同出一批墨书玉璋，其中M1046:114书“尖于祖丁”、M1046:111书“尖于大子丁”、M1046:108书“尖［于］大子丁”、M1046:109书“尖［于］甾君丁”。亚玨丁觚铭中，“丁”被置于亚形中，重复对称的玨在其下，铭文中的“丁”即可能就是玉璋中的某位“丁”。如果这一假设可以成立，则还可能对亚玨族氏名称中的亚的性质作一推论。有学者提出与族氏名同出的“亚”是小宗族氏的标志，如果放在这里看，“大子丁”与“君丁”表明此“丁”决非小宗旁支（至少在其同辈中）。另外，这批墨书玉璋还表明，商代家族中长子并不一定就是太子，M1046:118玉璋书“尖于长子癸”，此长子癸与大子丁显非一人。同时这也说明，认为以十干作为商人出生早晚的时间排序说也是颇可疑问的，因为这长子与大子，或以“癸”、或以“丁”，距排第一的“甲”都有距离。若说女子也参与排序，则这位长子癸之前就需有九位女子，而这样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2000年底至2001年初发掘的花园庄54号商墓，出土铜器310余件，其中礼乐器达

43件，是近年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该墓出土铜器上基本都有铭文，而且有的铜器上的铭文还多处出现，如同一件戈内的两面、同一件方尊口沿外壁都重复出现，表现出器主对铭文的特别的热衷，让人惊叹。花园庄54号墓所出青铜礼器的铭文分二种情况：亚长与长，以“亚长”多见，以此可知，“长”当是“亚长”的简省。根据54号墓的出土物可以推定墓主当是长族之人，在武丁时期此人拥有相当的权势。除此墓外，长族之器目前少见。另外，在河南鹿邑太清宫发现的周初的长子口墓①、湖北黄陂县鲁台山发现的西周早期的长子狗铜鼎（集成02369）、1954年陕西长安县普渡村出土的西周中期长由诸器之长子口、长子狗、长由可能也是长族之后裔。

花园庄M54墓的亚长之长与长子口墓的长字写法相同。关于“长子口”的“长”字，学界还有不同意见。王恩田②、松丸道雄③、高西省④等先生将其视作“微”，认为长子口即微子启。但长与微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54号墓的族氏是长而不是微，对此，林沄先生已有专文进行驳正⑤，所论允当。

以上是集中出土族氏铭文铜器的4座墓葬。另外的一些中小墓葬，铭文铜器数量较少，内容也较纷杂，下文择其要者略加评说。

1984年11月孝民屯1713号墓发现的5件铜器，是近年来殷墟出土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器物。其中亚鱼鼎（M1713:27）铭“壬申，王赐亚鱼贝，用作兄癸尊，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寝鱼簋（M1713:33）铭“辛卯，王赐寝鱼贝，用作父丁彝”；亚鱼父丁爵（M1713:43、44）铭“亚鱼父丁”；寝鱼爵（M1713:50）铭“辛卯，王赐寝鱼贝，用作父丁彝。亚鱼”。铭文表明1713号墓主为鱼族人。就目前材料，商、周时期的鱼族铜器见有83件，是一个传世长久的世家大族。鱼族器之出土地点除殷墟一地外，还有：陕西长安、凤翔、岐山；辽宁喀左；湖北随县；河南南阳、鹤壁；山东青州。陕西与河南几处出土的鱼族器皆为墓葬，辽宁一地则是窖藏。

甲骨刻辞中鱼有用作人名、地名或族氏名者，如合17801反、合10471、屯南1054。综合甲骨刻辞与金文，说明“鱼”族氏从殷墟二期时已出现于历史舞台上，到殷墟四期时鱼族氏得到了极大的壮大。西周早、中期此族氏还存在。关于鱼族的地望，青铜器出土地点过于分散，难作推断。与鱼族有复合关系的族氏名（或职官名）有正、佮、雀、羌等，正、羌、雀皆非鱼族的分支族氏，鱼族也非这些族氏的分支。佮止前所见只与鱼复合，可能是鱼族分支。鱼族在商代晚期势力较强，常随侍商王（帝辛）左右，而商王也屡屡赐贝褒奖。目前发现几件商代重器都与其有关：戍嗣子鼎（集成2708）铭“丙午，王赏戍嗣贝廿朋，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鬲。唯王窨阑太室，在九月。犬鱼”。甗方鼎⑥铭“乙未，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佣，王返入阑，王赏甗贝，用作父丁宝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鱼”。由这些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鱼族与商王的关系密切，有担任“寝”职者，当是商王的近臣。另外，鱼族中还有任“犬”、“戍”者。阑地在商代末期有着重要意义，戍嗣子鼎和甗方鼎中，鱼族之人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启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③[日]松丸道雄（常耀华译）：《文献与考古学的邂逅——实地考察鹿邑周初大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第7版。
④高西省：《从“长子口方鼎”谈太清宫大墓墓主身分》，《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3日第7版。
⑤林沄：《长子口墓不是微子墓》，《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⑥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甗方鼎和荣伯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都与阑地有关，说明鱼族可能就在阑地附近。阑有太室，帝辛常在此地举行对帝乙的祭祀大典，估计距殷都安阳不远。而安阳殷墟西区的M1713，与此当不无关系。

1985年刘家庄商代9号墓葬出土铭文铜器3件，铭文均为"冀父癸"，其中的爵铭冀作"丮"形，当是冀的简省或失范之故。冀族是商周时期的望族，铭有"冀"的青铜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青铜器器型，其延续时间从殷墟二期到西周中期。就目前材料可知，冀族铜器约有224件，如果加上铭作"丮"形之器22件，则将达到246件之巨。出土的地点有河南安阳、郑州、鹿邑；陕西麟游、长安、扶风；山东长清；甘肃灵台；北京房山等地，分布广泛。而复合族氏也很多，有[illegible]、[illegible]、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等。关于"冀"的地望，学界已有较多的讨论，但目前还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甲骨刻辞中也有"冀"，字形或作"[illegible]"。从[illegible]及𢀛方与[illegible]两条卜辞看，[illegible]还参与过征伐𢀛方与[illegible]的战事，[illegible]地何在，尚不得而知；而𢀛方的地望，论者或有分歧，但大方位定在殷之西北，则是为学界所接受的。学者如李伯谦在其《冀族族系考》推论"冀"也应在殷西、殷北或殷西北一带[①]。但据青铜器的出土情况来说，这种意见也有问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冀"器不多，山东长清县兴复河北岸与河南安阳是出土较为集中的两个地点。另外传说出于山东费县的也有一批。此外，陕西麟游县九成宫镇后坪村和西安老牛坡也出过，而洛阳也传出过。殷都安阳出土者情况特殊，商代多数族徽在安阳多有出土，不能表明其为"冀"族聚居之地。这样，山东长清和费县一带就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地区。我们再从铜器铭文的相关内容来试着讨论。小子[illegible]鼎铭文为："乙亥，子赐小子[illegible]王赏贝，在[illegible]（襄）次。[illegible]用作父己宝尊。冀。"关于[illegible]，甲骨刻辞中也是一地名，字形或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诸形。甲骨刻辞中还常见有"[illegible]"，与"[illegible]"等可能是一字之异。于省吾先生释[illegible]为襄字初文[②]。不少学者认为，古襄地在今山东东明县。与襄地接近的"大"地，甲骨刻辞中也多次出现，郑杰祥认为此"大"地当即春秋时代的大城，又称作大乡城，位于今山东菏泽西北[③]。东明县与菏泽相距直线距离不过35公里，与甲骨刻辞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小臣缶鼎铭文中表明小臣缶出身于冀族，"湡积五年"，年为积的计量单位。积指贮积，粮草委积之类。此铭文谓商王赐给小臣缶湡地五季的贮积。这里的"湡"地，也见于甲骨刻辞，如屯南2232、屯南2212、合36531、甲279，宋镇豪以为"湡"当即《尧典》的"嵎夷"，位于东方，很可能在山东境内[④]。小子𠭰卣器与小子[illegible]簋两器铭中的"人方"即指夷方，是商人在东方的劲敌，商王曾亲自出征，也派妇好、侯告等去征伐，帝辛时期对人方的战事尤盛。人方在今天的山东西部一带，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冀族的小子𠭰和小子[illegible]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与征伐人方，其住地必得在人方附近。如此，冀族的聚居区当与人方毗邻。小子[illegible]簋中提到一处地名"上[illegible]"，该地名也见于甲骨刻辞，上[illegible]又作王[illegible]，或单称[illegible]。李学勤认为上[illegible]近于莒，商王且涉沭而至莒，其地应在沭水以东一带地区[⑤]。综上，笔者倾向于认为冀地当在山东西部一带，长清等地及以西地区可能就是商代冀族所居之地。

---

①李伯谦：《冀族族系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
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襄》，第132—134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③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20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④宋镇豪：《甲骨文中反映的农业礼俗》，《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6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李学勤：《论商王廿祀在上𫑡》，《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59—6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85年刘家庄南63号商代墓葬出土铭文觚、爵一套，铭“息父己”。当是安阳殷都息族人之物。息族铜器集中发现于河南罗山县蟒张乡竹竿河边的天湖村晚商墓地。该墓地主要进行了三次发掘。1979年基建时曾发现5件铜器，同年的第一次发掘清理了6座商墓①。1980年第二次发掘了11座商墓②。1985年又在后李发掘了3座墓葬③。发掘表明这些墓葬的墓圹均作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大部分墓都设有腰坑并殉狗。棺椁之间或填土中还有殉人现象。随葬铜器的组合以鼎、觚、爵为基本组合，有的还有卣、尊、斝以及戈、矛、钺、刀等兵器和工具。多数墓葬中的觚与爵都是成套的。各类铜器的形制与出于殷墟者近同，少数铜器的一些装饰风格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在花纹中填漆的作风。陶器组合中常见的是鬲、簋、罐。或者单用鬲或罐。大部分陶器与出于殷墟者相似，但还有一些陶器器形尚不见于殷墟。天湖墓地也不见用陶觚、陶爵相配随葬的习俗，这是与殷墟不同的。比较特别的还有墓中喜用漆木豆随葬，一般都成对出现。这些是天湖墓地的特点。

罗山天湖墓地存在等级区别：最高一级为随葬3鼎和5套铜觚爵者（M6、M28）；其次是随葬2鼎和2套觚爵者（M41）；再次是随葬1鼎和1套觚爵者（M43）；最低一级则仅随葬陶器④。据报告，天湖墓地出土有铭文的铜器共40件，其中有“息”字铭文的共26件，占全部有铭文铜器的65%。出“息”字铭文铜器墓有9座，占全部商代墓的41%，特别是10座中型墓中有8座出土“息”铭铜器，占80%⑤。学者多认为天湖墓地为息族墓地⑥，殆无疑义。息族铜器的年代多相当于殷墟三、四期。其中河南罗山县天湖村M28:7的息母觚有较早期的特征，应不晚于武丁时期；而武丁时期的甲骨刻辞中就见有“息”，如合2354臼、合3449、合20086，所以，说息族主要存布于殷墟二期到四期，是可以的。妇息的存在，表明息与商王朝存在婚姻关系。而刘家庄南M63出土的“息”铜器表明，息族人有在商王都为官者。西周铜器中还有“息”的活动，如西周早期的息伯卣（集成5385、5386）铭：“惟王八月，息伯赐贝于姜，用作父乙宝尊彝。”此息伯与甲骨刻辞中的“息伯”可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周代的息国可能位于今河南息县境内⑦，春秋时期息国为侯爵，与郑国有过战争：“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归。”（《左传・隐公十一年》），并于鲁庄公十四年被楚灭国。

1991年下半年发掘的后冈9号商墓是南北二墓道的中字形墓，有亚形椁室。因已被盗，器物组合难见全貌。但还有随葬品96件，其中青铜器52件。而比较突出的是有方形器，如方爵。从这样一些零星的资料，也可说明此墓墓主的身份等级比较高。中字形的墓道，应该是仅次于四墓道者，比甲字形墓等级要高；亚形椁室或墓坑，一般都出现在较高等级的墓中，如商代的安阳后冈大墓、西北冈1001、1003、1004、1500、

---

①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②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第4—13页。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153—198页。
③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第14—20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9页。
⑤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193页。
⑥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第33—35页。
⑦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第33—35页。

1400号大墓[①]；青州苏埠屯的M1[②]；周代的如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③]、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④]。方形器的出现也是等级较高的一个标志，如苏埠屯墓出土的亚醜诸器，很多都是方形器；安阳郭家庄M160也出土较多的方形器；太清宫长子口墓中也出有方觚方爵。由此三方面的特征可知，后冈M9墓主的身份等级较高。出土铭文铜器4件，其中2件方爵铭“囗虎”，M9的墓主可能与虎族或虎方有联系。

1994年在安阳刘家庄北地发掘一座殷墟四期的墓葬，出土一组青铜器，计有鼎2、簋1、甗1、觚2、爵2、瓿1、卣1、斝1、觚形尊1、觯1。其中觚形尊腹内壁有三行12字：“辛丑，亚易彭吕，用作母丁彝。未。”是近年新出铜尊铭文最长者。此尊铭文已有典型的西周早期铭文风格。据文意，此尊作器者私名为“彭”，可称为彭尊。铭末之“未”，当是彭之所属族氏名号，此族至西周早期尚存世。

商末周初有彭母器群，计有鼎、簋、甗、觯、卣诸器，铭载“彭母彝。冉。”为冉族之物，当与此尊无涉。这件尊铭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亚给彭的赏赐物。原铭作上下两个圆点之“吕”字，见于甲骨著录。如《金璋》511“王其铸黄吕，奠血，叀今日乙未利？”《甲》1647“丁亥卜，大贞……其铸黄吕，……作凡（盘）利叀……”林沄认为，“黄吕”指的是“由矿石冶炼而成的铜料块”[⑥]，可信。铜器铭文中早期“金”字，所从之二圆点或三圆点，是铜锭的原始象形。成周王铃（《集成》00416）的铃字，意符“金”以二圆点表示，因此，我们认为“:”是“金”之初形。就以往甲骨金文所见，商代出现在赏赐活动中的赏赐物有贝玉等货贿，有牛、豕等牲畜，有地产（积）、有臣民、有祭肉、有兵器，尚不见直接赏赐作器之金者，此尊的出土，说明商代末期，铜锭等青铜礼器铸造原料也成为赏赐物品。这对理解商末的青铜铸造工业、管理与流通等都有重要意义。西周赏赐内容则较繁杂，有祭酒、服饰、旂帜、车马、车马饰、贝、玉、金、土地、臣仆、彝器、兵器、牲畜动物等。或略为九类：秬鬯及圭瓒、命服、车马、车马饰、旂旗、兵器、土田、臣民、其他。两相比较，唯西周恒见的与册命制度相关的赏赐物不见于商代赏赐铭文。盖商代称册之事，尚未及于彝器上。

1995年郭家庄东南M26所出5件铜器，皆铭“旟”；2006年安阳市文物队在郭家庄南配合基建中发掘了一座殷墟二期晚段的墓葬M5，出土10多件青铜器，多有铭“旟”者，其中箕形器柄部有重复对称的“旟”字（见本书图版一〇五）。由此看来，安阳殷墟郭家庄南一带应是“旟”族的居住区。另外，上海博物馆藏一戈铭“旟”（集成10646）。而戋与旟者出现在宾组刻辞中：

辛卯卜，贞：旟其先冓戋，五月。（英593）

……允贞：令旟比𠬝侯璞周。（合6816）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将这二辞同列于“旟”字条下（第1168页），笔者以为是可取的。族氏铭文中还有旟，有亚若癸鼎（集成2400—2402）、亚若癸尊（集成

---

①高去寻：《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义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本下册，1969年，第175—188页。

②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第17—30页。

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鹿邑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9期，第9—23页。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第4—19页。

⑤林沄：《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第5期。

5937、5938）、亚若癸觚（集成7308、7309）、方彝（集成9886、9887）、杯形觯（《古文字研究》第10辑，第262页图7），诸器皆铭“亚。受丁、旃乙、若癸、自乙。”亚若癸戈（集成11114）则铭“亚。旃乙。亚。若癸。”旃、旃、旃应该是一字繁简不同的写法。如此，旃族铜器19件，时代为殷墟二期到四期。另有一件亚若癸觯（集成6430），盖内有铭文3字“亚若癸”，器内底铭文1字“[illegible]”。如果此觯的器与盖为原配，则此“[illegible]”可能是“旃”的省形。不过，这仅是一个推测。

[illegible]族也是商周时期的望族，[illegible]之器也是大量出现的，延续时间从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的[illegible]族之器近百件，安阳殷墟出土的有8件，如安阳殷墟西区M355、苗圃南地M47、戚家庄东269、苗圃南地M58、八里庄M52、郭家庄北M13皆有[illegible]族器。其中1992年苗圃南地58号商代墓葬出一觚，铭“[illegible]”，也就是“[illegible]”字，当是制作过程中的失误所致。如此，苗圃南地58号商墓[illegible]器成觚、爵一套组合，是[illegible]族人之墓无疑。而戚家庄东269号这样的爰族墓中出现[illegible]器，当非其自作之器，而当由它法获得。与此类似的，M269中的疋未鼎与子觯，性质与[illegible]器盖同。而这样的现象，在商周墓葬中都是屡有发现。这种情况提示我们，族徽铜器的出土地与其族氏的分布区域之间很可能会脱节，应当根据出土物的组合等情况具体分析。

以上粗略讨论了铭文中所见的部分族氏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族氏，如羊、饮、戈、[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聑、戏、受等，可能也分布在安阳，或是通过赙、劫掠等方式从域外进入的。

在这些铜器铭文中，还见有一些职官，也略作讨论。

1984年出于安阳西区M1713的寝鱼簋与1986年出于大司空村M25的寝印爵中皆有“寝”。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所见寝某还有寝灶、寝出、寝玄、寝[illegible]、寝孜、寝蔑、鼓寝、寝孳、寝馗。卜辞中寝是一种建筑物，为居住之所[1]。其实就是宫室名，如王寝（合32980、怀1595）、东寝（合34067、13569、13570）、西寝（合34067）、新寝（合13571、24950、24951）、祖乙寝（屯南1050、2865）。出于河南安阳西北岗M1400的寝小室盂（10302）铭“寝小室盂”，表明其为寝之小室中所用之器。卜辞中，还有“寝”可能是当职官讲的，如合35673：乙丑，寝弘易殳……在寞□……在殷墟末期的肋骨刻辞中，也出现了职官“寝小疳”：壬午，王田于麦录（麓），隻商戠兕，易（赐）宰丰，寝小疳兄（贶）。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甲骨文合集补编》11299）张亚初先生以为寝是主管宫寝之官，大概相当于后世的寝尹[2]。如《左传·襄公十八年》：“柏举之役，寝尹由於以背受戈。”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寝也当是职官名。李学勤先生认为寝孳之寝系官名，当为管理宫寝者，类似《周礼》的宫伯[3]。常玉芝先生也认为商代寝官的职能大约与后世周代的“宫人”一样，是“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凡寝中之事，埽除、执烛、共炉炭，凡劳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还认为殷墟西区1713号墓中所出的劳动工具与武器，就分别是为王寝之修，为王巡守、征伐时所用的[4]。寝孜簋中说，在辛亥日，商王在寝，并赏赐给寝孜贝二朋。这一条青铜器铭文资料为上说也提供了佐

---

①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寝”字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②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6月1版，第91页。
③李学勤：《寝孳方鼎和肆簋》，载于《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第49页。
④常玉芝：《“寝孳方鼎”铭文及相关问题》，载于《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证。如果“寝”这一职官果是王的管理宫寝之官，“寝”这一职官可能是王的近臣，或即宫庭内职官。寝官可能是由去势的阉人充任①，所以常侍于商王左右，除管理王的寝这一本职之外，并参与商王的行政事务，如寝麇就有“省北田”之事。卜辞合17503正还有这样一条：贞，多寝②得……辞中见有“多寝”之称。青铜器铭文中同属二期晚段的寝出、鼓寝、寝印；同属四期的寝鱼、寝麇、寝孜、寝孳、寝馗、寝小焰，应该就是“多寝”了。目前所知铭“寝”某之铜器多出土于河南安阳。还有1980年出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的寝出爵、鼓寝盘③；而从作册般铜鼋铭文可知，王、作册般、寝馗的活动就在安阳殷墟。如是，寝官自己的生活区域大概就在安阳大司空一带。与王室生活区较近。这样也便于出入王命，侍奉商王。

1987年郭家庄50号商墓出土作册兄鬲与兄册爵各1件，其中的“作册”是职官名，又简称“册”。梅园庄M92出一件衛册觚。商代青铜器铭文所见作册有作册、作册般、作册豊、作册友史。作册一词常见于《尚书》等古籍中。《尚书•雒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又：“作册逸诰。” 逸，是人名。“祝册”和“诰”表明所行的职务是掌策命之事。《尚书•顾命》亦有“作册”官名：“丁卯，命作册度。”旧注将“作册”之“作”视为动词，孔传云：“命史为策书法度。”并没有将其作为职官名。直至孙诒让才将“作册”定为官名，曰：“内史掌为册命，书云‘作册’是也。”④认为作册与内史职责相同，管理册命之事。铜器铭文出现最多的“作册”一官是作册般，共有三件。因同属殷墟四期时器，故这三器中的作册般应该就是同一人。在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有一著名将领“师般”，关于这个师般，于省吾先生推断其为《尚书•君奭》中的甘盘⑤。是武丁时期的重臣。如果般在殷晚期被作族氏名，则作册般可能就是师般的后裔，与师般属同一国族。作册般之般为人名亦为国族名⑥。但这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在作册豊（或释作豐）鼎铭中，作册豊因受赐贝而为父己作器，而在作册般甗中，作册般也因受赐有贝而为父己作器。从器铭内容与字体风格而论，两器均为殷末帝辛时期之器，两器基本是同时的。朱凤瀚先生以为作册般与作册丰（笔者按：即作册豊）可能是兄弟行⑦。但作册豊鼎中所言作册般新宗，是指生人作册般还是已故作册般尚难以肯定，有学者以为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⑧。甲骨卜辞中的作册官名还有两例：一为“作册西”（合5658反），另一例为“作册口”（京703反）残去人名。另外，出土于甘肃庆阳的一件玉戈上亦有作册官名“作册吾”。⑨关于这些任作册职的“西”与“吾”，齐文心先生以为“西”是人名又是国族名。卜辞有“王往省西”、“王省比西”（乙7308）。“西”在此为具体的地名而非指方向。“作册吾”中的“吾”也是国族名。作册吾表明“吾”国的要人在商朝担任史官之职。由此，齐文心先生总结认为商朝官史的称谓结构一般由官名和国族名组成。表明商朝存在着贡职制度，除任用

①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1版，第462页。
②此辞中多与寝分列两行，多字下已残，也可能并不能构成“多寝”一词。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第509—517页。
④孙诒让：《古籀拾遗》卷下，第7页。
⑤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第13页。
⑥齐文心：《庆阳玉戈铭“作册吾”浅释》，《出土文献研究（三）》，中华书局，1998年10月1版，第32页。
⑦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9页。
⑧朱凤瀚：《作册般鼋探析》，《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9页。
⑨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第93页。

子姓王室贵族之外，还有相当数量异姓国族的君长或贵族在王朝担任要职。这是商朝任官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①。

若如上文所论，作册般与作册豊可能是兄弟，笔者以为作册豊为作册般之弟，在作册般新故以后继任作册一职。果如是，这里就出现一个情况，那就是作册般之般与作册豊之豊是否也是标示其出身的族氏名？作册般亡故后是设有“宗”（作册般新宗）的，当然是一位宗子，即为其族长，自然有其族号，可能即是“般”。但在作册般甗中，铭末有族徽“来册”，所以以“般”为其族名的可能性不大。作为其弟的作册豊，可能是另开宗立派，由此也另设族名，可能就是“豊”。西周早期铜器小臣豊卣（集成5352）中还见有小臣豊，也许与作册豊是同一族氏的。这样当然也还不能排除其为族名的可能性。商代铭文中还有作册孥、作册兄。这里的孥、兄是否是族名也还不能说明。因此，职官名后一字，是族名还是私名，还应该根据材料详作分析，而不能简单化。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作册之官，如作册昗、作册麦、作册令、作册绅、作册嗌、作册折、作册寰、作册微、作册寓、作册吴、作册魅、作册矢令、作册大。其中作册职官名后一字有很多就是私名。作册的司掌，按其字面来说，就是起草文书政令。就西周时期作册的职事，学者曾概括为：献胙；铸造礼器；册告；代王出使；管理旗帜②。商代青铜器铭文所示作册的职事，是伐人方，或侍于商王左右达行。其具体司掌难作推断，估计也可能兼有军事事务。寝蔑鼎铭中有“作册友史”，则是作册的僚属③。西周时期的作册内史可能与之有渊源关系。而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作册尹在商代还没有出现。商代或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很多还与族氏名联缀的“册”字，学者或以为这一“册”字表示某族氏曾担任过作册这一官职，缀上册字以示其出身④。笔者以为此说可从。

郭家庄M26、郭家庄M135、刘家庄M2都出土铭有“宁”的铜器。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宁”的出现形式有二：其一，单铭“宁”或加日名。时代为殷墟三、四期。出土地点多在河南安阳，河南罗山也见。其二，“宁”加族氏或职官名。时代为殷墟一期至四期。地点除河南安阳外，还见于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陕西岐山、山东章丘等。如宁[illegible]、宁鳥、美宁、宁劦、宁酉、宁尹、宁告、宁矢、宁戈、宁朋、[illegible]宁、[illegible]宁、亚宁、娸亚宁、宁未口（8801）、启宁工、宁月、宁葡⑤。甲骨刻辞中“宁”的含义至少有二：其一，为人名、族氏名或地名，如合6647反。其二，可能用为职官名，如：乙亥卜，其呼多宁见丁。永。（花园庄东地甲骨275）。张亚初认为卜辞中的“多宁”、“宁壴”之“宁”有可能是职官名⑥。关于卜辞中的“宁壴”，有学者也认为：宁，官名；壴，国名或人名。“宁壴”即为担任“宁”官之“壴”国诸侯⑦。卜

---

①齐文心：《庆阳玉戈铭“作册吾”浅释》，《出土文献研究（三）》，中华书局，1998年10月1版，第32、33页。

②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5月1版，第35页。

③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6月1版，第94页。

④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文物》2000年第2期，第48页。

⑤安阳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5—78页。出于安阳戚家庄东M63共7件。

⑥张亚初：《商代职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91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68页。

辞中“多宁”与“御正”对贞，说明多宁确当是职官“宁”的集合称谓。而辞中的失宁、[illegible]宁等可能就是多宁之一。上举青铜器铭文中的宁[illegible]、宁鳥、美宁、宁荔、宁酉、宁告、宁矢、宁戈、宁朋、[illegible]宁、[illegible]宁、宁未口、启宁工、宁月等宁之前、后一字多是族氏名，其“宁”可能是职官名。宁尹、亚宁、娸亚宁、宁葡的情况则又需作具体分析。如果这里的宁作族氏名解，则是“宁”族之任尹、亚、葡之职者，（娸亚宁则是娸族之任宁与亚者，或者表示曾任此职）；或者当是尹、亚、葡族之任“宁”职者，但现在尚无法区分。

要之，自1982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主要还是族氏铭文，这些铭文对我们研究与认识殷都族群的社会结构与空间布局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但这些铜器多是出土于墓葬，毕竟与现实生活情态有一些距离。对族氏铭文所代表的族群的研究还有待于对生活居址的考古揭露。这些在殷墟发现的族氏铭文，大多数在殷墟之外也都有发现，有些族氏的聚居地，因为有集群性的铜器与墓葬发现，因而也是可以确定下来的，如息在河南罗山天湖、䢅在山东费县、丙在山西灵石等。这些殷都外的族氏在殷都出现，原因有多种，但是由此体现出的商王对它们的控制则是一目了然的。

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

岳占伟 岳洪彬 刘煜

以前由于考古实物资料的匮乏，学者对商周陶范铸造工艺和分范技术的研究，主要是根据青铜器上遗留的范线，来推测用范的块数及组合方式。然而，大部分青铜器铸造完成后要经过修整打磨，为了美观，青铜器上的范线常常被抹去，尤其水平方向的范线极难观察到，且铜器出土时表面普遍覆盖一层绿锈，这样就更难观察出范线的具体位置。因此，依据青铜器上的范线无法完全正确判断范的组合方式。

目前，随着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发现，遗址内大量铸铜遗物的出土，尤其数万块陶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分范技术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些陶范，虽然绝大部分为青铜器铸造成型后的废弃物，但不少陶范残块保留了修治平整的分型面，且分型面上常见与相邻范扣合所设置的榫卯。这种修治平整的分型面和分型面上的榫卯，直接反映了铸型分范的具体位置。因此，如果能辨识出陶范残块用以铸造的铜器器形以及该范块在铜器上的相关位置，即可知道各类铜器所使用的陶范数量与组合方式。这种分范方式比直接观察铜器范线要可靠、科学得多。

过去学者多认为商代的铸型工艺，主要沿器物垂直方向进行分范，由于水平方向分范可能增加铸型组合的难度和降低其稳定性，大部分学者不予考虑，仅部分学者如万家保、巴纳德（Noel Barnard）、华觉明等考虑到了水平分范的可能①，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殷墟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普遍存在水平分范工艺，且简单论述了鼎、罍、觚等容器的分范技术②。本文主要依据安阳市铁路苗圃北地、孝民屯东南地和孝民屯村南地等铸铜遗址内出土的陶范，再结合殷墟出土的表

①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台北，史语所出版，1964年。
N. Barnard,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 1961, Canberra, pp. 110-168.
华觉明等：《妇好墓青铜器群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②李永迪，Anyang Foundry: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thesis for Ph. D to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日]难波纯子:《关于殷墟四期青铜器制作之新动向》，《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文明》（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第3期。

面残留较明显范线的青铜器，较为系统地谈一谈殷墟时期陶范铸造青铜器的分范问题。由于出土的陶范较碎，可辨认的器形种类有限，且有的虽辨认出了器类，但陶范本身残留的分型面较少，再兼之殷墟发现有明显范线的铜器很少，故本文所谈到的分范技术不可能完全反映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问题，但由于本文所用的材料均是直接反映这一问题的，推测的成分很少，所以，本文对殷墟青铜器铸型分范技术的论述，虽不全面，但比较准确。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在表述时把垂直所分范称谓“扇”，水平所分范称谓“段”，铸造一件完整铜器所用的范总和称谓“块”。浇注时安装在顶部的用以与芯扣合的范称谓“顶范”。由于出土的泥芯多碎裂成小块，无法直观地判别是否是一个整体，只能按照常规推测是用一块泥芯形成容器腹部的空腔，较大的器物还需设置底范与这块腹芯相连，不同器形没有大的差别，所以在探讨铸型分范问题时如无特别需要指出之处，不再特地注明。

殷墟铸铜遗址内出土的陶范已辨认的种类有容器、兵器和工具、车马饰、其他等四大类。下面逐一论述不同器类的分范方式。

一　容器类

无论是器类和数量均占绝大多数。又可分为（长）方形器和（椭）圆形器两亚类。

（一）（长）方形器

辨认出的陶范有鼎、彝、尊和器座等。

1.鼎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4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每面为1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方鼎需5块范。此分范方式多适用于形体较小，纹饰简单，无扉棱或简易扉棱的方鼎（图一，2）。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8扇，每面为对称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9块范。此种方式是殷墟时期最常见的分范方式（图一，1）。

（3）无水平分范，但足是后铸的。腹部垂直分为8扇，每面为对称2扇。每足垂直分为2扇，四足共有8扇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共需17块范。扁足方鼎多采用此方式。

（4）在颈部和腹部之间水平分为2段。每面上下段又各垂直对称分为2扇，四面共有16块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17块范。此种分范在殷墟时期少见（见本书花东M54:191）。

小型鼎范的耳是和口沿连在一起的，有时还会被扉棱分开分属相邻的范块（如图一,1），少数大型鼎的耳采用后铸法铸接，如司母戊鼎。耳部空腔由腹芯在相应部位突起的泥芯块形成，除方鼎外，圆鼎和甗也是如此。

2.彝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8扇，每面各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方彝需9块范[1]（图一，3）。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58—26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3. 尊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在颈部、肩部、腹部、圈足之间水平分为4段。每面垂直分为2扇，这样每面需8块范，四面共有32块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方尊共需33块范（见本书刘家庄北地M1046:45）。

（2）在颈上部、肩部、腹部、圈足之间水平分为4段，颈下部和肩部连在一起。每面垂直分为2扇，这样每面需8块范，四面共有32块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方尊共需33块范（图一，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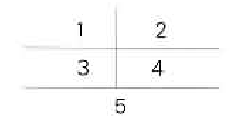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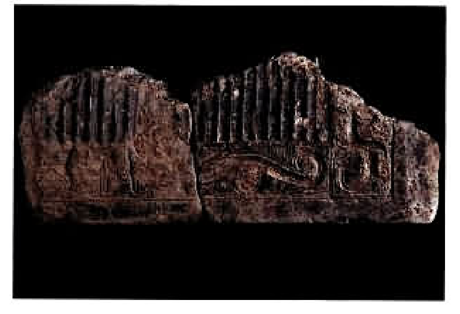






图一　方形器范
1 鼎耳部和腹部范（03AXSH472:1）
2 鼎腹部范（03AXST1907⑦:11）
3 方彝范（03AXSH225:1）
4 尊颈部和肩部合范（03AXSH683:53，59）
5 器座范（00AGH31:6）





方尊肩部的兽头多数采用榫卯式后铸法，即铸造方尊时，在装兽头的位置铸出榫头，然后在榫头上安装兽头范，再进行浇注，这样兽头便和器体铸在了一起，如本书M54:84方尊。有的方尊上的兽头和器体是分别铸造的，方尊肩部在装兽头的位置铸出榫头，在兽头底部铸出卯眼，这样两者可安装在一起，如本书M160:128方尊。

4. 器座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每面各1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方座需5块范（图一，5）。

（二）（椭）圆形器

辨认出的陶范有鼎、甗、瓿、簋、罍、卣、尊、爵、角、觚、觯、盘、斗、盖等，还有兽头、鋬、钮、帽等附件。

1. 鼎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8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3扇，无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3块范。此分范方式较少见（见本书洹北花东M10:1）。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3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4块范。设置1块顶范是殷墟时期铸鼎最常见方法[①]（图二，3，4）。

（3）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7块范。分裆鼎多采用此方式（图二，2）。

（4）无水平分范，但足是后铸的。腹部垂直分为6扇，每足垂直分为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共需13块范。扁足圆鼎多采用此方式（图二，8）。

（5）在颈部和腹部之间水平分为2段，上段垂直分为6扇，下段垂直分为3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10块范（图二，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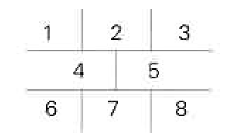
（6）在腹部近底处水平分为2段，上段垂直分为6扇，下段垂直分为3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10块范（图二，5）。

（7）在腹部近底处水平分为2段，上段垂直分为3扇，下段垂直分为3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7块范（图二，7）。

（8）在颈部、腹部中间偏下处水平分为3段，各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鼎需19块范。形体大的青铜鼎可能采用这种方式[②]（图二，1）。

①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台北，史语所出版，197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58—26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图二　圆鼎范

1 鼎腹部和足部范（00AGH31:3）
2 分档鼎范（03AXST1907⑦:1）
3 鼎范（61APNM52:1）
4 鼎范（03AXSH573③:53）
5 鼎腹部范（03AXSH596③:1）
6 鼎耳和上腹部合范（03AXST2007⑥:9，H481③:1）
7 鼎腹部范（05AGLBH32②:1）
8 鼎足范（03AXSH481③:5）

2. 甗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在腹下部近束腰部位水平分为2段，垂直分为3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甗需7块范（图三，2）。

（2）在颈部以下（带状纹饰下）和腹下部近束腰部位水平分为3段，上段垂直分为6扇，中段和下端垂直分为3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甗需13块范（图三，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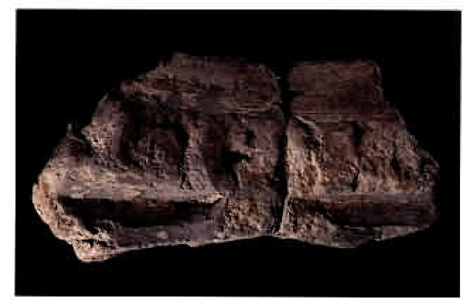
3. 瓿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在腹部偏上处水平分为2段，垂直分为8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瓿需17块范。有扉棱或肩部饰兽头的瓿多采用此方式（图三，4，5）。





1	2
3	4
5	







图三　甗、瓿范

1 甗口部和颈部范（01AGH6:7）

2 甗腹近底部和裆部范（03AXSH664③:49）

3 甗腹近底部和裆部范（03AXST1906⑤:14）

4 瓿腹部和圈足合范（03AXSH573③:41，55）

5 瓿口部和上腹部合范（03AXSH685:6，62）

4. 簋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簋需5块范。多数簋采用此方式（图四，1，3）。

（2）在腹下部近圈足部位水平分为2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簋需9块范（图四，4，7）。

簋颈部兽头有的是和主体范上的纹饰做在一起的（图四，1）。有的是在兽头的位置做一凹槽，然后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图四，5，6，8）。簋鋬范有的是和主体范做在一起，直接浑铸（图四，9），有的是在铸造器身时，在鋬的位置铸出榫头，再安装鋬范，进行第二次浇注（图四，2）。

1	2	3
4	5	
6	7	
8	9	

图四　簋范和兽头模

1 簋范（00AGH31:9）
2 簋鋬和垂珥范（00AGH31:12）
3 簋范（03AXSH570④:25）
4 簋圈足范（03AXSH685:8）
5 兽头模（00AGT15扰坑:1）
6 簋合范（03AXSH573②:31，34）
7 簋口部和腹部范（03AXSH683:3）
8 簋范（03AXSH683:47）
9 簋范（03AXST2212⑤:38）

5. 罍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3种：

（1）在颈部、肩部、腹中部、圈足处水平分为5段，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罍需31块范（图五，2，4，5，7，8）。

（2）在颈部、肩部、圈足处水平分为4段，腹部为一个整体，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罍需25块范（图五，1）。

（3）在颈部、肩部、腹中部水平分为4段，下腹部和圈足连在一起，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罍需25块范（图五，9）。

罍鋬范是和主体范做在一起，浑铸而成，鋬部空腔由自带泥芯形成。鋬上的兽头有的是另再装兽头范（图五，6，10，11），有的是和鋬范做在一起的（图五，3）。鋬内的垂环是先铸好，安装罍范时，把铜垂环安装在鋬范内（图五，12），再进行第二次浇注。

1	2
3	4

图五　罍范

1 罍腹部范（00AGH31:44）

2 罍口部和颈部范（01AGH28:1）

3 罍下腹部范（01AGH28:4）

4 罍下腹部范（01AGH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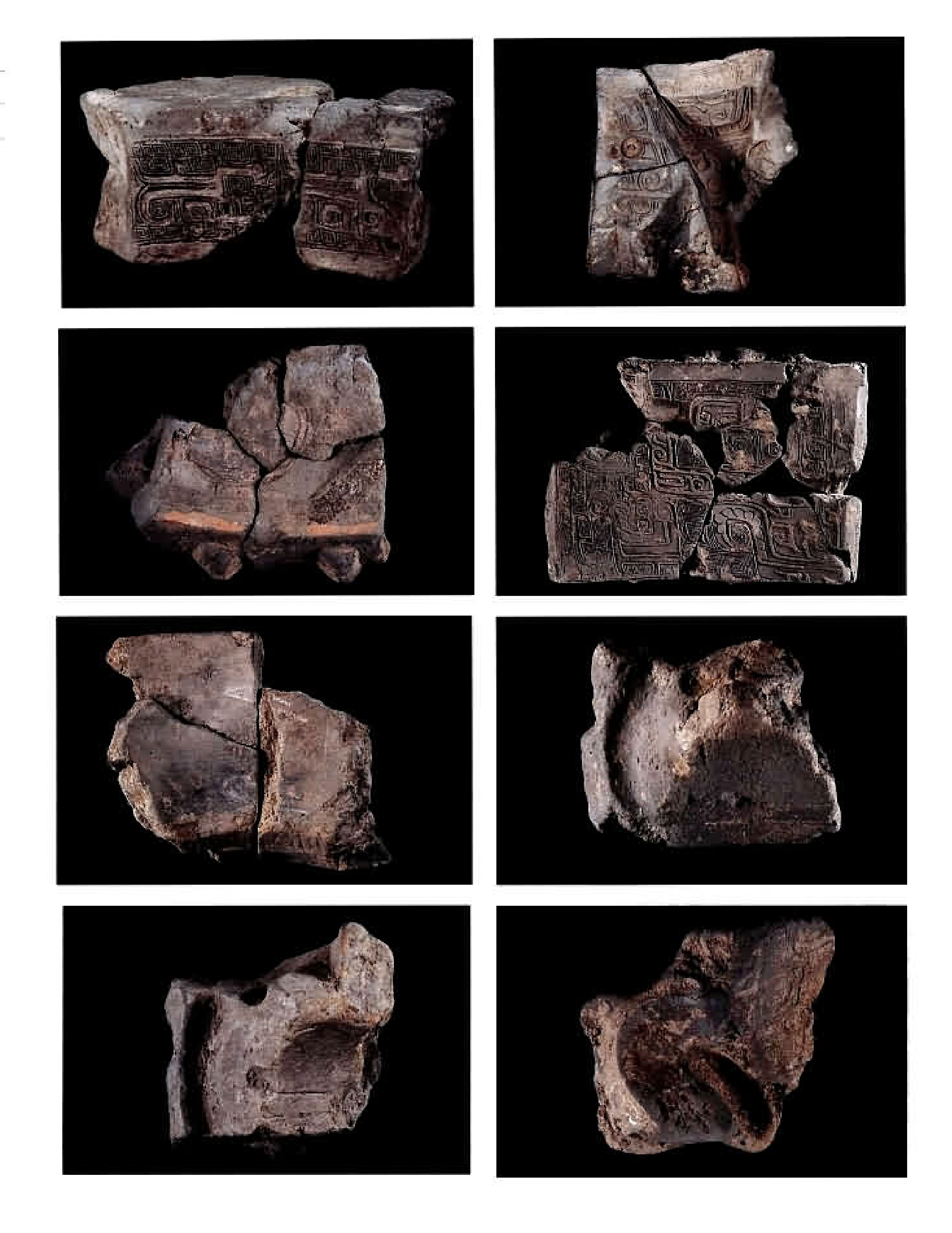






5 罍圈足范（01AGH28:6）
6 罍鋬和鋬上兽头合范（01AGH28:8，13）
7 罍肩部范（01AGH28:14）
8 罍上腹部范（01AGH28:18）
9 罍下腹部合范（03AXSH220①:4，5）
10 罍鋬和肩部范（03AXSH220①:7）
11 罍鋬和肩部范（03AXSH426:5）
12 罍鋬和肩部范（03AXST2007⑤:9）

5	6
7	8
9	10
11	12



6. 卣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卣需5块范（图六，8）。

（2）在肩部水平分为2段，每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卣需9块范。这是殷墟时期流行的分范方法（图六，3，6，10）。

卣肩部的两环是和主体范一起浑铸而成（图六，9）。卣提梁亦进行水平分范，分几段还不甚清楚（图六，4）。少数提梁还进行垂直分范（图六，5）。环与提梁的套接方式是先铸好提梁，安装卣范时，把铜提梁安装在环内，再进行第二次浇注（图六，2，7）。

卣提梁上的浮雕兽头是在铸造提梁时，在兽头的位置铸出榫头，在提梁与器身上的环套接铸好后，再在榫头上合好兽头范，进行第三次浇注。凤鸟卣腹部横出方棱亦是第二次浇注而成（图六，1）。

卣肩部的兽头有的是和主体范上的纹饰做在一起的（图六，11），有的是在兽头的位置做一凹槽，然后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图六，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六　卣范

1 卣腹部横出方棱范（00AGH31:17）
2 卣环肩部范（03AXSH217⑥:2）
3 卣口部和肩部范（03AXSH414②:8）
4 卣提梁合范（03AXSH290③:10，11）
5 卣提梁范（03AXSH648:10）
6 卣口部和肩部范（03AXSH664③:77）
7 卣环和肩部范（03AXSH491:8）
8 卣范（03AXSH491:23）
9 卣范（03AXSH567:1）
10 卣口部和肩部范（03AXSH664:15）
11 卣合范（03AXSH679②:21，22）
12 卣合范（03AXSH679②:19，24）

7. 尊

辨认出尊范有觚形尊、折肩尊、鸟形尊三种，但鸟形尊范较少，且较碎，无法判断其分范方式。

观察到的觚形尊分范方式有3种：

（1）在颈上部近敞口处水平分为2段，每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尊需9块范。少数素面尊采用此方法（图七，6）。

（2）在上腹部水平分为2段，每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尊需9块范。多数花纹尊采用此方法（图七，3，4，5）。

（3）在上腹部、下腹部水平分为3段，每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尊需13块范。少数花纹尊采用此方法（图七，8）。

观察到的折肩尊分范方式有3种：

（1）在颈部、肩部、圈足水平分为4段，每段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尊需25块范。多数折肩尊采用此方法（图七，2，7）。

（2）在颈部、圈足部位水平分为3段，肩部和腹部连在一起，每段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尊需19块范（图七，9）。

（3）肩部、圈足部位水平分为3段，颈部和肩部连在一起，每段垂直分为6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尊需19块范（图七，1）。



图七　尊范

1 尊肩部和颈部范（03AXSH233:3）
2 尊肩部范（03AXSH269:37）
3 尊腹部和圈足范（03AXSH481④:3）
4 尊口部和颈部范（03AXSH481④:9）
5 尊腹部和圈足范（03AXST2506B④:5）
6 尊上颈部合范（03AXSH573⑥:64，67）
7 尊肩部范（03AXSH685:5）
8 尊腹部范（03AXSH546:3）
9 尊肩部和腹部范（03AXSH233:4）

1	2	3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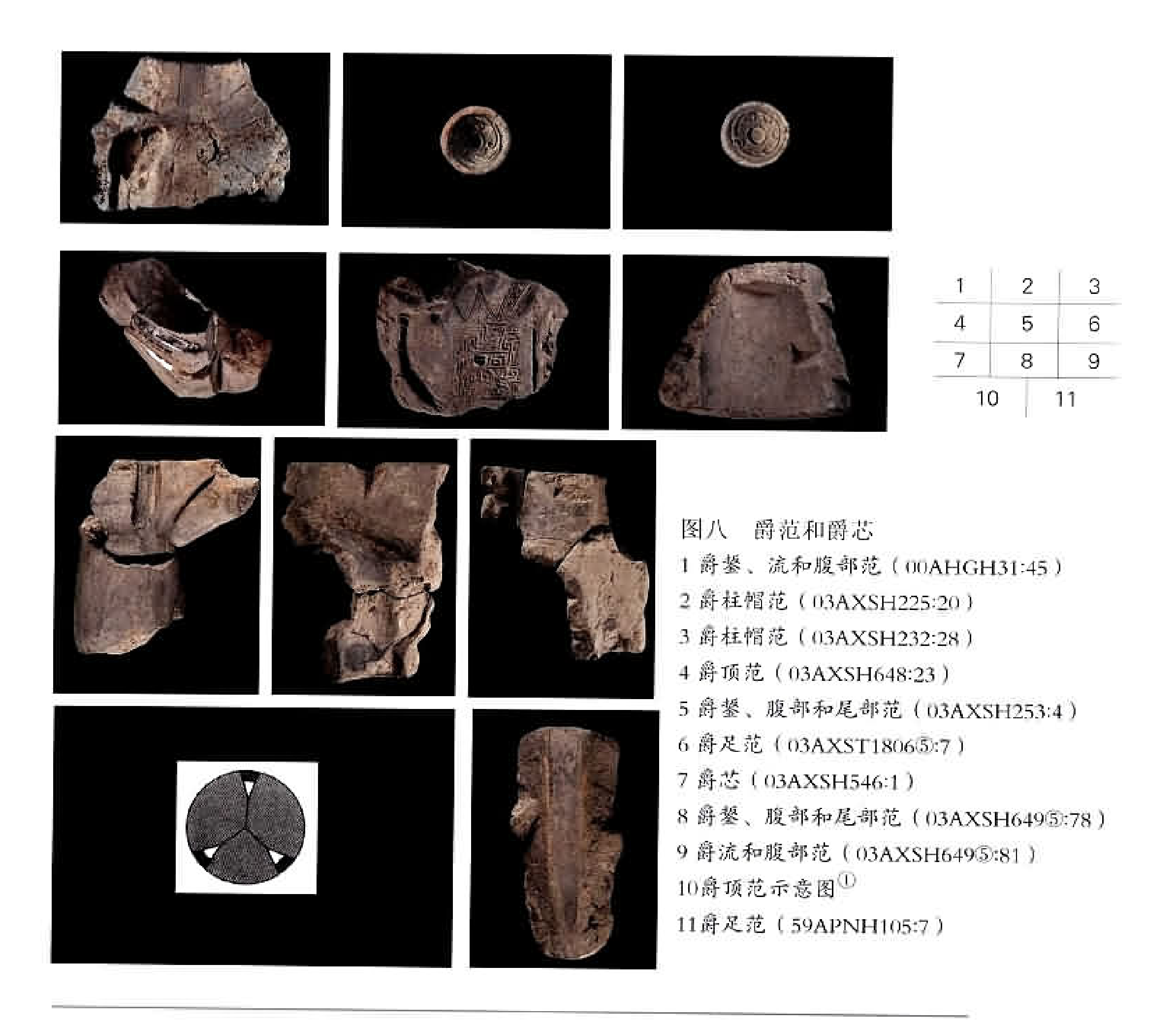
8. 爵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在下腹部近底处水平分为2段，上段垂直分为4扇，下段垂直分为3扇，2件帽范，有3块顶范，3块顶范各形成三足的内两侧面，三足的外侧面由3扇下段范形成。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爵需12块范（图八，2，3，4，6，8，9）。

（2）在下腹部近底处水平分为2段，上段垂直分为4扇，下段三足的内两侧面主要依靠3块顶范成形，嵌入3块足范，形成三足的外侧面，2件帽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爵需12块范（图八，10，11）。

爵鋬范是和腹部范制作在一起的，由自带泥芯形成鋬部空腔。鋬上的兽头范多数是与鋬范制作在一起的（图八，5），少数在兽头的位置做一凹槽，在凹槽内镶嵌兽头范（图八，1）。爵柱多做在腹部泥芯上（图八，7）。



图八　爵范和爵芯

1 爵鋬、流和腹部范（00AHGH31:45）
2 爵柱帽范（03AXSH225:20）
3 爵柱帽范（03AXSH232:28）
4 爵顶范（03AXSH648:23）
5 爵鋬、腹部和尾部范（03AXSH253:4）
6 爵足范（03AXST1806⑤:7）
7 爵芯（03AXSH546:1）
8 爵鋬、腹部和尾部范（03AXSH649⑤:78）
9 爵流和腹部范（03AXSH649⑤:81）
10爵顶范示意图①
11爵足范（59APNH105:7）

①[日]难波纯子：《关于殷墟四期青铜器制作之新动向》，《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9. 角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与爵大致相同，只是没有帽范。即在下腹部近底处水平分为2段，上段垂直分为4扇，下段垂直分为3扇，有3块顶范，顶范的制作和爵相同，应是两种方式均有。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角需10块范（图九，1，2）。

10. 觚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4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觚需3块范。少数素面觚采用此方法（图九，6）。

（2）在颈上部水平分为2段，垂直分为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觚需5块范。少数素面觚采用此方法（图九，7）。

（3）在上腹部水平分为2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觚需9块范。多数花纹觚采用此方法（图九，3，4）。

（4）在下腹部水平分为2段，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觚需9块范。少数花纹觚采用此方法（图九，5）。

11. 觯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觯需3块范[1]（图九，8）。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觯需5块范。（图九，9）。

12. 斗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由斗身中部垂直分为2扇，其中1扇为半个斗身范，另1扇为斗身和斗柄背面范，斗身底部有1块陶范，斗柄正面和斗身口部为1块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斗需4块范（图九，10，11）。







图九　角、觚、觯、斗范

1 角腹部和翼范（01AGH6:1）

2 角腹部和翼范（03AXSH252:1）

3 觚腹部和圈足合范（03AXSH570④:1，2）

1 | 2 | 3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58—26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4 觚口部和颈部范（03AXSH664⑨:136）
5 觚圈足范（03AXST1907④:27）
6 觚范（60APNT207④A:41）
7 觚口部和上颈部范（03AXSH679①:4）
8 觯范（03AXST3205⑦:7）
9 觯合范（00AGT14③:10，11）
10 斗柄范（00AGH13:39）
11 斗合范（03AXSH570④:19，20）

4	5	6
7	8	9
10	11	

13. 盖

辨别出的多数为卣盖范，少量是壶、觯等盖范。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5种：

（1）无水平分范，无垂直分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盖只需2块范（不含钮）（图十，4）。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盖需3块范（不含钮）。形体较小的圆形盖多采用此方式（图十，6，7，8）。

（3）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每面为1扇，有一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盖需5块范（不含钮）。无扉棱的罍、彝、瓿盖多采用此方式（见本书刘家庄北地M1046:25）。

（4）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8扇，每面各2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盖需9块范（不含钮）。有扉棱的罍、彝、瓿盖多采用此方式（见本书刘家庄北地M1046:1，图十，9）。

（5）盖覆体和立壁水平分为2段，覆体无垂直分范，立壁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盖需6块范（不含钮）。素面或带状花纹盖多采用此方式（图十，2，5）。

（6）盖覆体和立壁水平分为2段，覆体和立壁各垂直分为4扇，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盖需9块范（不含钮）。纹饰繁缛，且有扉棱的盖多采用此方式（图十，1，3）。



图十　盖范

1 盖立壁范（00AGT14护②:1）
2 盖立壁范（03AXST1906④:3）
3 盖覆体合范（01AGH25:1，2，3）
4 盖覆体范（03AXSH24:1）
5 盖覆体范（03AXSH491:20）
6 盖覆体范（03AXSH648:8）
7 盖覆体范（60APNH206:5）
8 盖覆体范（61APNH19:6）
9 彝盖范（03AXSH225:68）

1	2	3
4	5	6
7	8	9

14. 钮

辨别出的多数为卣盖钮范，少量是罍、彝、壶、觯等盖钮范。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无水平分范，无垂直分范，无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钮只需1块范（不含盖）。卣盖钮多采用此方式（图十一，5，6）。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2扇范，无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钮需2块范（不含盖）（图十一，1，2）。

盖与钮联接方式有4种：

（1）盖范内直接制作钮型腔，无需钮范（图十，7，8）。

（2）盖范内直接制作钮型腔，需1块钮底范。圈足捉手钮多采用此方式（图十一，3，4）。

（3）盖范与钮范组装在一起浑铸。多数盖钮采用此方式（图十，3，4，5；图十一，1，2，5，6）。

（4）采用铸接的办法，即先铸好盖，在钮的位置铸出一孔，然后在盖内外组装钮范，进行第二次浇注（图十一，7，8）。



1	2
3	4
5	6
7	8

图十一　钮范和青铜钮

1 蘑菇状钮范（00AGH31:13）

2 梯状方形钮范（00AGT15②:3）

3 圈足钮范（03AXSH24:10）

4 圈足钮范（03AXSH242:17）

5 蘑菇状钮范（03AXSH249:2）

6 蘑菇状钮范（03AXST2311②:1）

7 蘑菇状青铜钮内侧（94ALNM637:7A）

8 蘑菇状青铜钮外侧（94ALNM637: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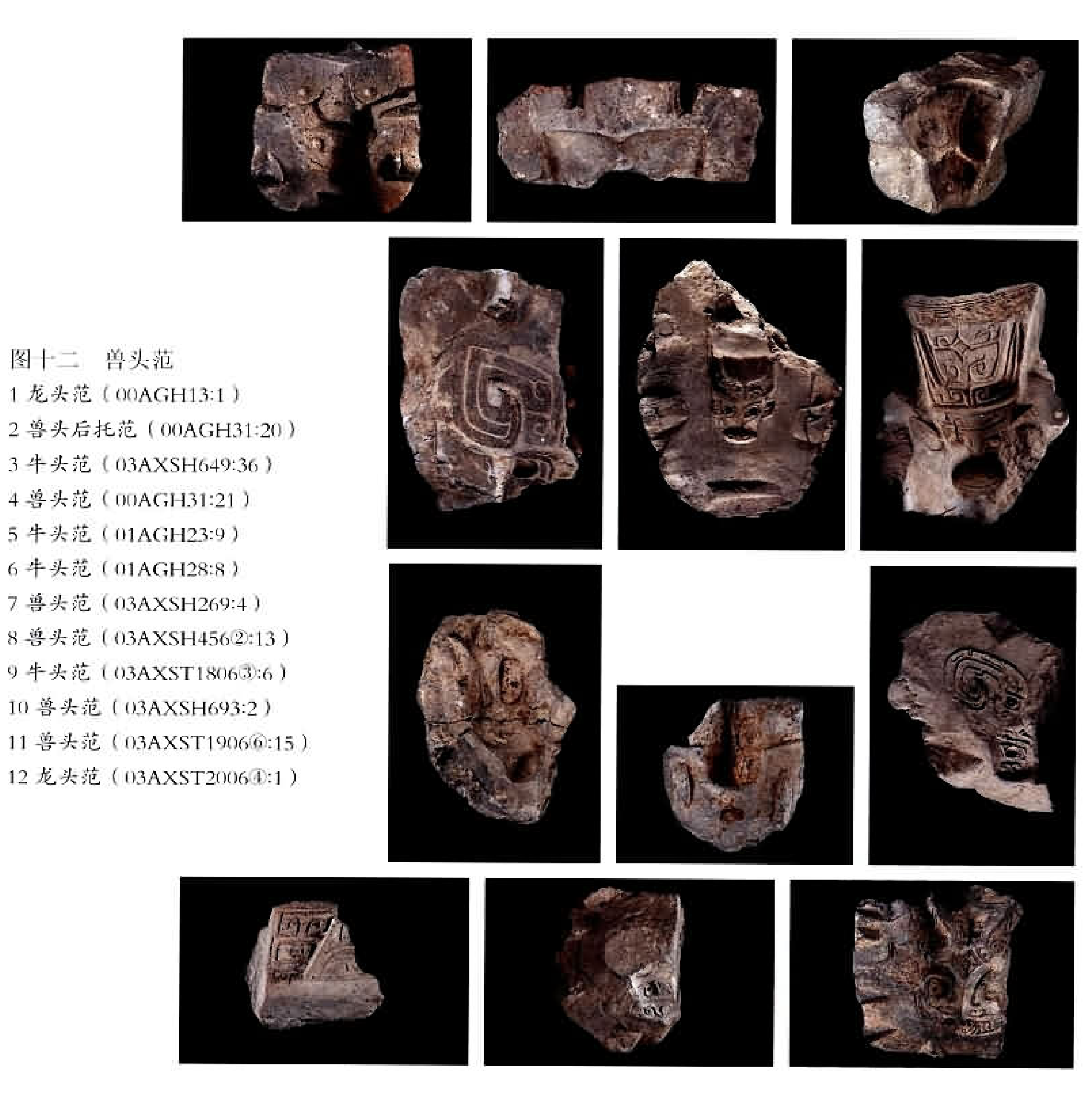
15. 兽头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3种：

（1）无分范（图十二，1，5，6，8，12）。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2扇（图十二，3，7，9，10，11）。

（3）有立耳的兽头范，立耳后面应有1块背范（图十二，2，4）。



图十二　兽头范

1 龙头范（00AGH13:1）
2 兽头后托范（00AGH31:20）
3 牛头范（03AXSH649:36）
4 兽头范（00AGH31:21）
5 牛头范（01AGH23:9）
6 牛头范（01AGH28:8）
7 兽头范（03AXSH269:4）
8 兽头范（03AXSH456②:13）
9 牛头范（03AXST1806③:6）
10 兽头范（03AXSH693:2）
11 兽头范（03AXST1906⑥:15）
12 龙头范（03AXST2006④: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　兵器和工具类

可辨别的器类和数量较少，兵器有戈和镞，工具有刀和锛。观察到的兵器和工具的分范较为简单，基本都是上下2块陶范相扣即可。

1. 戈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范上有1件戈的型腔。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戈只需用双面范扣合即可，无需泥芯[①]（图十三，5，6）。

2. 镞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

只需双面镞范扣合即可，无需泥芯。但有单镞和多镞范之分，单镞范即范面上只有1枚镞的型腔（图十三，7），多镞范即范面上有多枚镞的型腔（图十三，8、9、10、11）。

3. 刀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

只需双面刀范扣合即可，无需泥芯。但有单刀和双刀范之分。单刀范即范面上有1件刀的型腔（图十三，3、4），双刀范即范面上有2件刀的型腔（图十三，2）。

4. 锛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只有1种：范上有1件锛的型腔。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锛只需双面范相扣即可。需要泥芯（图十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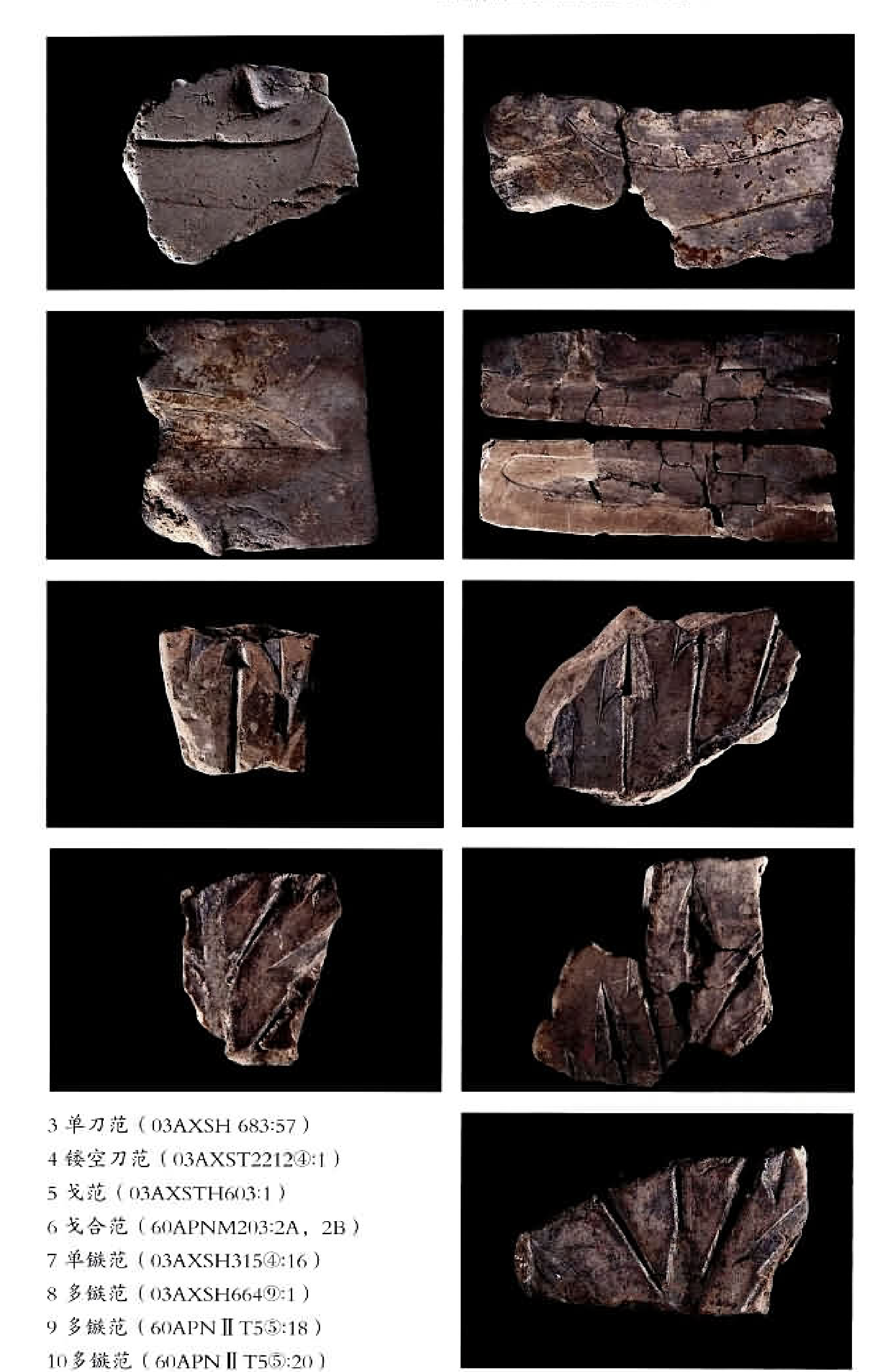


图十三　兵器和工具范

1 锛范（03AXSH491:26）

2 双刀范（03AXSH683:60）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58—267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3	4
5	6
7	8
9	10
	11

3 单刀范（03AXSH 683:57）
4 镂空刀范（03AXST2212④:1）
5 戈范（03AXSTH603:1）
6 戈合范（60APNM203:2A，2B）
7 单镞范（03AXSH315④:16）
8 多镞范（03AXSH664⑨:1）
9 多镞范（60APNⅡT5⑤:18）
10 多镞范（60APNⅡT5⑤:20）
11 多镞范（60APNⅣT5⑤:21）

三　车马饰类

可辨别的器类和数量很少，只有泡和軎两种。

1. 泡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单泡浇注，泡的芯座上只有1枚泡芯，范上亦只有1件泡的型腔，泡范和泡芯座相扣合即可。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泡只需1块单面范。较大的泡多采用此方式（图十四，3，4）。

（2）多泡浇注，泡的芯座上有多枚泡芯，每枚泡芯需用1块泡范，每块泡范和芯座上的每枚泡芯相扣合即可一次浇注多个铜泡。较小的泡多采用此方式（图十四，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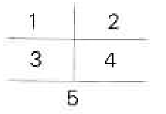
2. 軎

观察到的分范方式有2种：

（1）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2扇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軎需3块范。素面軎多采用此方式。

（2）无水平分范，垂直分为4扇范，有1块顶范，用此方式铸造1件青铜軎需5块范。花纹軎多采用此方式（图十四，5）。







图十四　车马器范和芯

1 泡范和泡芯（03AXSH632:1，H639:9）

2 泡芯（05AGLBH32②: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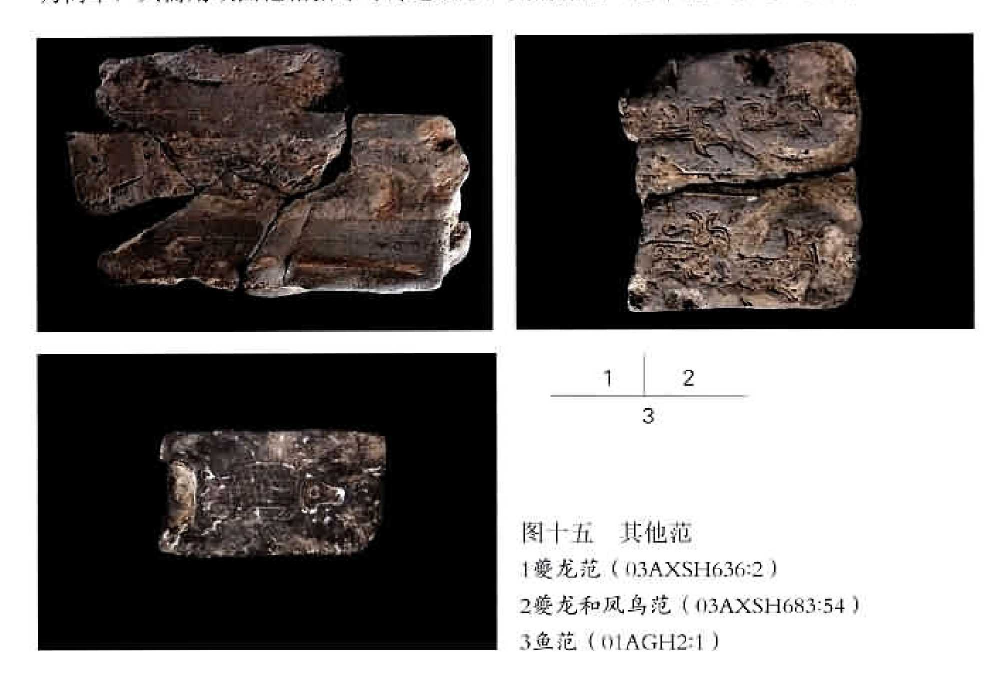
3 泡范（03AXST3204⑥:1）

4 泡范（03AXST3203⑥:1）

5 軎范（03AXSH636:5）

四 其 他

可辨别的多数为青铜器的小饰件范，观察到鱼、鸟、夔龙范等。它们的分范也较为简单，只需用双面范相扣即可铸造成形，无需泥芯（图十五，1，2，3）。



图十五 其他范
1夔龙范（03AXSH636:2）
2夔龙和凤鸟范（03AXSH683:54）
3鱼范（01AGH2:1）

结 语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绝大多数由两块或两块以上陶范组合浇注而成。我们通过对殷墟出土陶范的观察，总结出分范技术的几个规律：

1. 通常情况下，形体较大，纹饰繁缛、外形弧度变化大的铜器所需陶范的块数较多，而形体较小，纹饰简单或素面、外形弧度变化小的铜器所需的陶范块数较少。

2. 水平分范和垂直分范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分范的目的有二：（1）便于范脱模。（2）控制各块范的大小及高度，以便于操作，并减少范在制作、阴干、焙烧过程中变形的可能。

3. 水平分范的位置一般位于铜器器身弧度改变最大部位稍靠上一些，目的是为了更好合范，降低合范的难度。如圆鼎的水平分范位置通常在下腹部近足处，甗的水平分范位置在束腰部位稍靠上一些，簋的水平分范位置在圈足稍靠上一些。但水平分范有时表现出较多的灵活性。这可能是由于殷墟的工匠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关于陶范制作、烘干、合范等工序的经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以避免陶范由于尺寸或弧度过大而变形。

4. 垂直分范一般沿扉棱或兽头或鋬的中线进行分范，大部分垂直等分，少数不等分。有的简易扉棱处不进行垂直分范，也有少数从兽头的一侧进行垂直分范的现象。多数情况下，三足器一般垂直3或6分，圈足器一般垂直2或4或6分，方形器一般垂直4或8分。也有上下段垂直分范扇数不一样的，如爵范，一般上段垂直4分，下端垂直3分。

5. 安装1块顶范是殷墟时期普遍采用的铸造方式。但殷墟早期（即洹北花园庄期）部分容器不使用顶范，如洹北花园庄M10出土的铜鼎（M10:1）。有的三足器为了方便制作三足的型腔，则采用3块顶范的方式，如爵的顶范。少数大型铜容器则采用4块顶范的分范方式，如司母戊鼎。

6. 浑铸法铸造仍然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方法。但分铸法已普遍使用，如较大的浮雕兽头、鋬、耳、提梁等多采用第二次浇注（或先铸或后铸）来完成和器身的连接，少数器形特别复杂的铜器，如凤鸟卣的附件，甚至采用多次浇注来完成整个铸件。

图版和拓片



1. 圆鼎

Round Ding (Meat-stewing Tripod)
(99AHDM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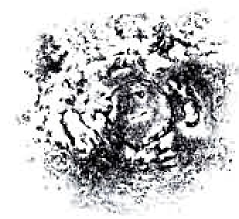
1999年出土于安阳市洹北商城10号墓内。窄折沿，方唇，口沿上有双立耳，鼓腹，圜底，上有多处修补痕迹，有人字形凸线铸痕，3扁圆锥状足，与器腹相连的足根部有一按窝。上腹部饰二周凸弦纹。通高18.1厘米，重1.0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一期。



2. 爵

Jue (Spouted Tripodal Liquid-serving Cup)
(99AHDM14:3)

1999年出土于安阳市洹北商城14号墓葬内。椭圆形口外侈。流较长，微上翘，断面略呈方形。流折处置双柱，柱断面略呈三棱状，菌状柱帽饰涡纹。尾宽短，略上翘。深腹较直，圜形底，三棱状足略外撇，与一足相对的腹部置一鋬。腹饰两组兽面纹。通高19.4厘米，重0.5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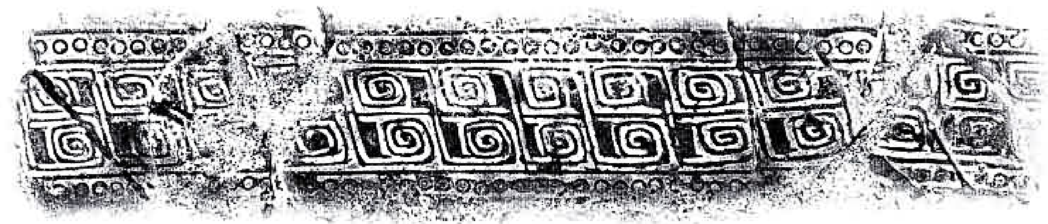


3．圆鼎

Round Ding

（92花南M115:1）

1992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南115号墓葬中。折沿，沿面微内斜，其上立对称双耳。方唇，口微敛，圆鼓腹，圜底，3锥状足。除沿下两周凸弦纹外，余均素面。器内底有铭文“韋”字，较模糊，通高19.2厘米，重1.1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一期。



4．圆鼎

Round Ding

（01花东M60:1）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内，被打碎成90余块碎片，大部分碎片均严重变形。器壁较薄，直耳，折沿，小方唇，3实足根上粗下细。3实足之两侧范线或打磨光滑，或保持原状。颈部以下饰两周凸弦纹，内为联珠纹，腹部偏上亦有同样的联珠纹带，两组联珠纹带之间饰一周云雷纹。鼎周身有黑色烟炱，说明此鼎在打碎随葬前是实用器。上腹部残高10.3厘米（连鼎耳），鼎足高7.9厘米，重2.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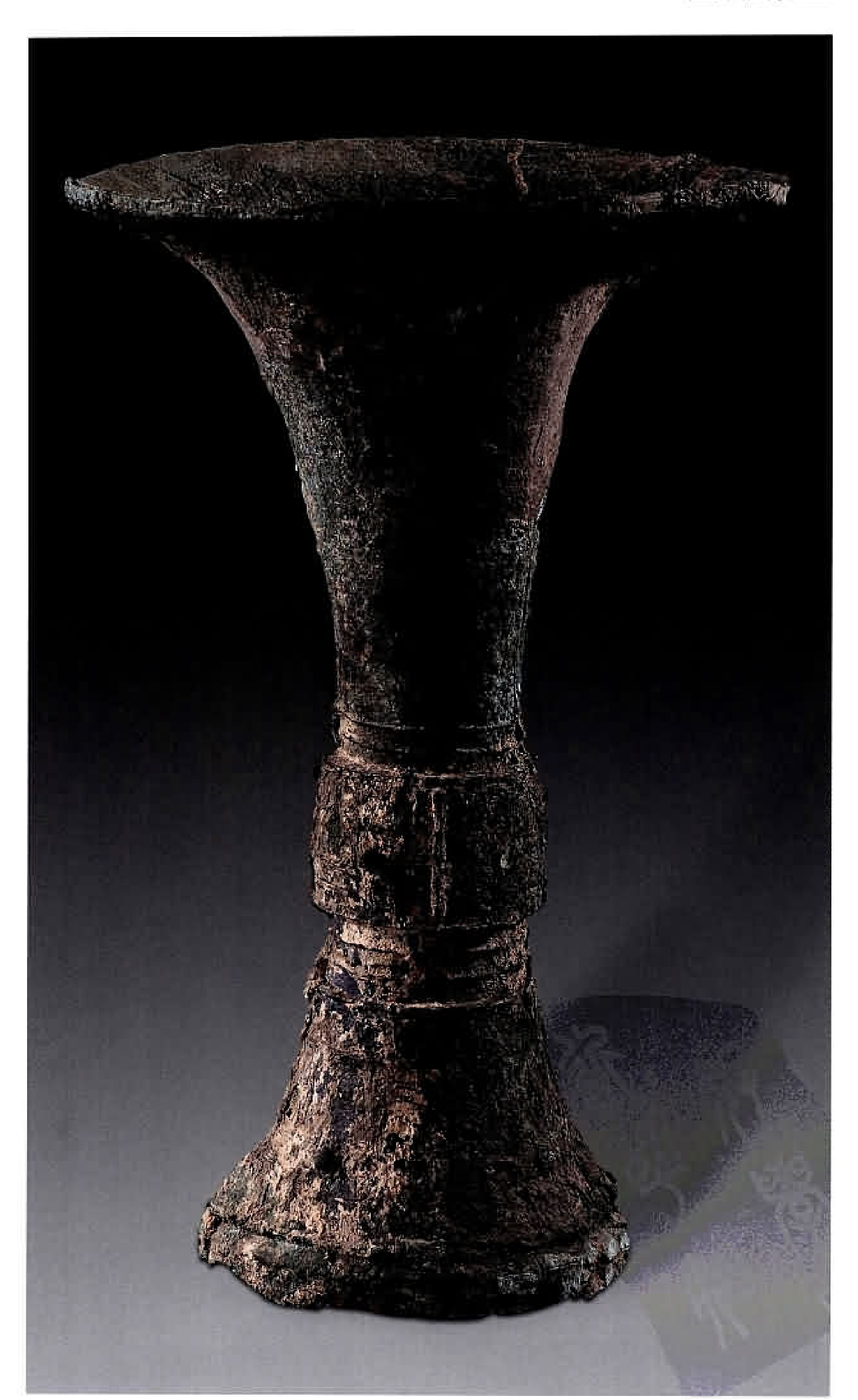


5．甗

Yan (Grain Steamer)

（01花东M60:5）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内。直口，斜平沿，小方唇，沿面之上直立绳索形耳。腰部直立。3袋足外鼓，实心圆柱状足，略扁，高裆。颈部饰两条凹弦纹夹一周兽面纹带，单层花纹。兽面纹有两个“目”形眼，内眼角大而下垂且内勾，瞳孔突起。其他部分均为云纹。腹部素面，留有未完全修整范线。袋足之上饰两道平行斜线纹。整个器体均布满烟炱。通高39.5厘米，重3.9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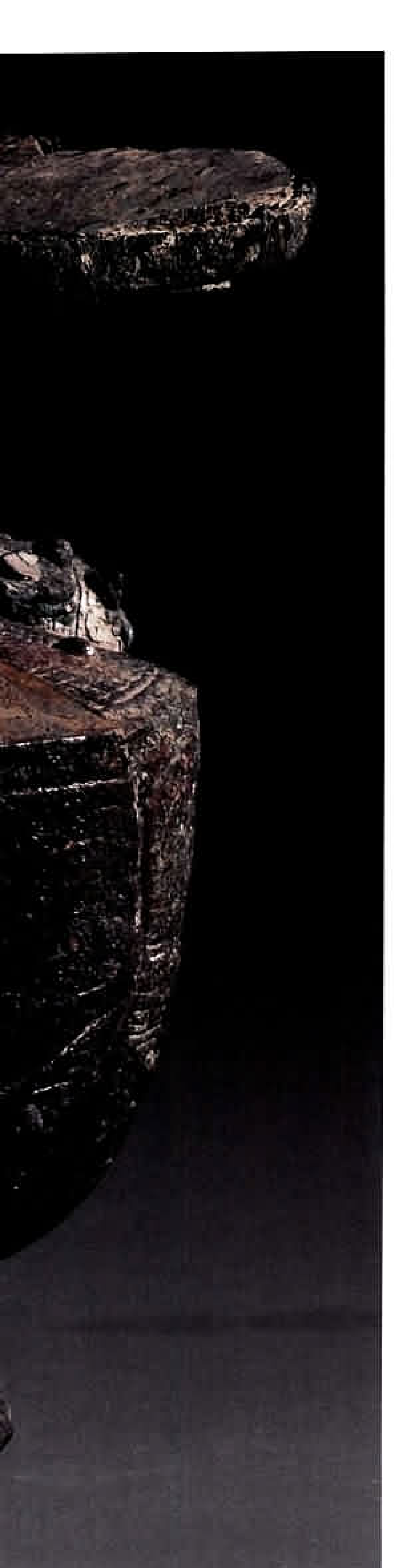
6. 觚

Gu (Liquid-serving Vessel with Trumpet-shaped Rim)

（01花东M60:2）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内。M60:2铜觚锈蚀严重。喇叭形口，直腹，高圈足，足下有切地小盘座，整体瘦高。从底至口两侧各有一条明显的范线，未经打磨。圈足上部两侧有“十”字形镂孔，腹部及圈足饰兽面纹，较模糊，腹部上、下各有两道凸弦纹。通高24.7厘米，重1.0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





7. 圆尊

Round Zun (Liquid-serving Vessel with Bulging Central Portion and Trumpet-shaped Rim)
（01花东M60:57）

2001年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内。敞口，方唇，束颈较短，斜肩，下腹斜收，平底。圈足略外撇，圈足之上有两个对称方形镂孔。器表纹饰模糊不清。颈下部饰两周凸弦，肩部、腹部及圈足饰单层兽面纹。兽头突眼，卷角，角根突起，角尖向上内卷，口部不明显。两侧兽面纹由卷云构成，较抽象。兽头下至腹部以扉棱为中心，上腹对称分布3组兽面纹。圈足之上饰一周云雷纹。通高21.7厘米，重5.4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







8. 圆斝

Round Jia (Tripodal Liquor-serving Vessel)
（01花东M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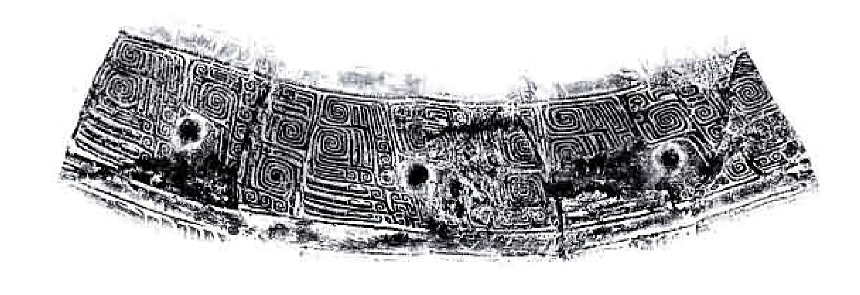
2001年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敞口，方唇。两根菌状立柱立于口部正中。腹部分两段，上腹较长，口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短，垂直，上下腹交接处形成一台阶。平底略圜。三棱形锥状足略外撇，断面呈“T”形。半圆弧形鋬与其中一锥足对应，截面亦呈“T”形。菌状柱上饰涡纹，上腹下部及下腹部均饰兽面纹，以范线处的扉棱将纹饰分为3组。以云雷纹衬地，有乳钉形目，由于锈蚀，纹饰不清。通高36厘米，重4.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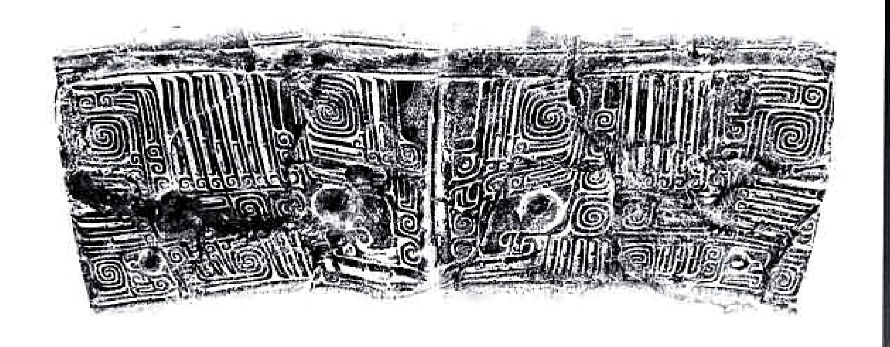


9. 瓿

Bu or Pou (Liquid Container with Bulbous Belly)
（01花东M60:4）

2001年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60号墓。口微敛，沿面略斜，方唇，短颈，溜肩，扁圆形鼓腹，平底，矮圆足。单层花纹，颈部饰二周平行凸弦纹，肩部饰9组单体夔龙纹。夔龙张口，目字形眼，乳钉式眼球，无足，单尾内卷，两夔间填云雷纹。腹部上下各有3组兽面纹。上部3组兽面纹扉棱突起，目字形眼，眼角内勾。下部3组较模糊，但乳钉状眼球突起。圈足饰一圈云雷纹，圈足上部有3个方形镂孔。通高19.8厘米，重3.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早段。











10. 95郭M26铜器组合

Set of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Tomb M26 at Guojiazhuang, Anyang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共出土青铜礼器12件，其中酒器6件，炊食器和其他6件。此墓为2套觚、爵规格的贵族墓葬。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11．圆鼎

Round Ding

（95郭M26:34）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直耳，折沿，方唇，口微敛，腹微鼓，圜底。空心柱形足。上腹部饰弦纹和6个凸起的圆泡，其间有窄扉棱6条，构成三组简化兽面纹。通高44厘米，重13.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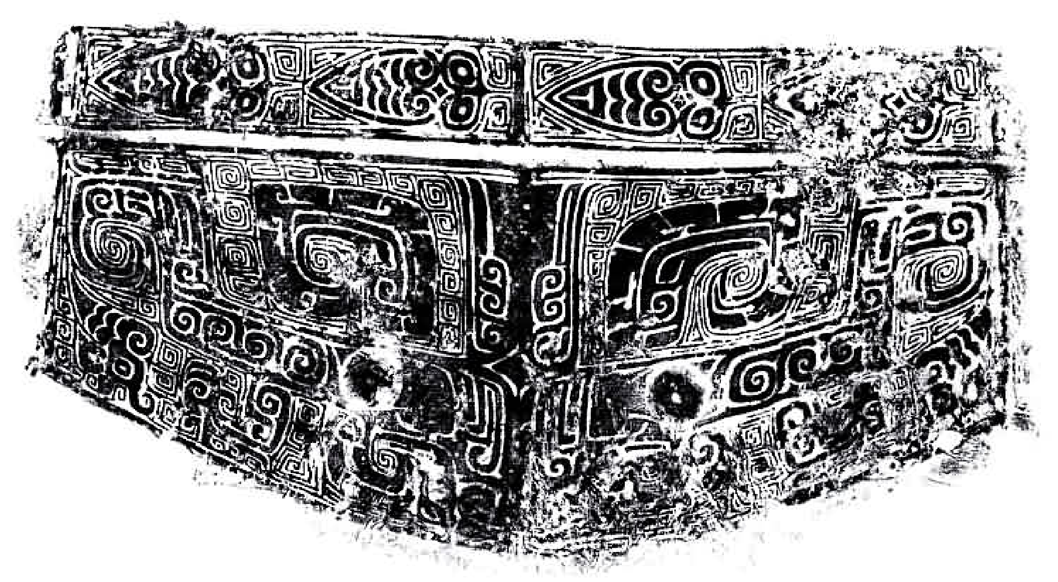
12. 分裆鼎

Fendang Ding (Ding Vessel with Pouch-like Extensions at Bottom)

（95郭M26:29）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直耳，折沿，方唇，下腹微鼓，分裆，3柱形足。口沿下饰带状蝉纹。腹部饰兽面纹和夔纹。腹内壁有铭文“𢄔”字。通高22.2厘米，重2.5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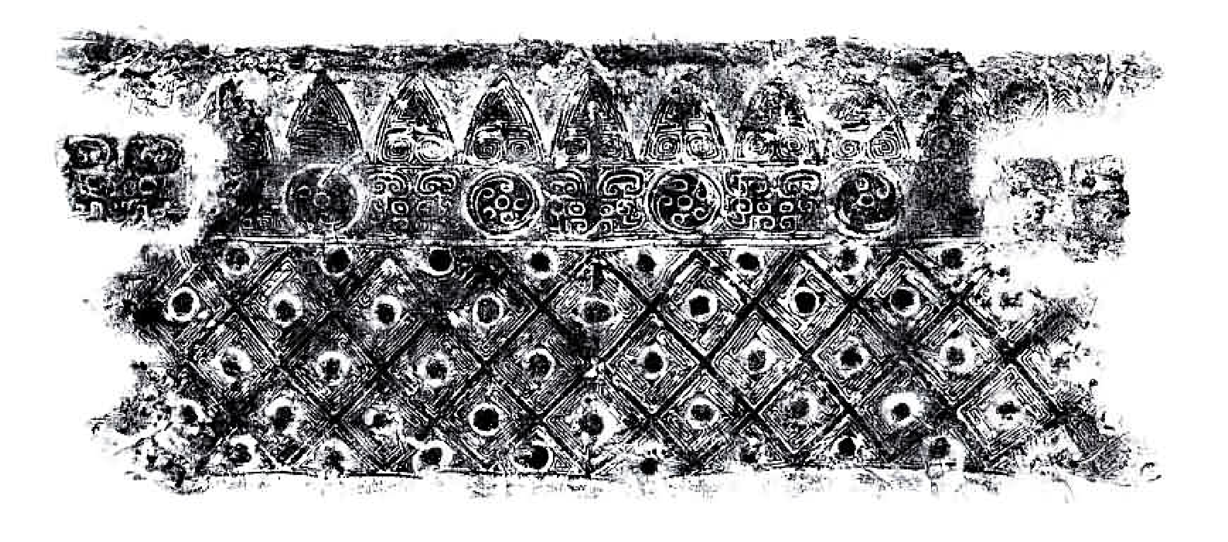


13．簋

Gui (Grain-offering Vessel)

（95郭M26:26）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侈口，束颈，腹微鼓，圜底，矮圈足。口下饰三角形云纹，颈饰圆涡纹，其间饰兽面纹，上铸兽头3个。腹饰斜方格雷纹和乳钉纹，足饰3组夔龙纹。通高13.4厘米，口径19.4厘米，重2.1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14. 甗

Yan

（95郭M26:38）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上下连体，直耳，折沿，方唇，深腹，束腰，下体如鬲，分裆款足，足下端呈柱状。口沿下饰凸弦纹二周，其间饰乳钉和小扉棱，构成三组简化兽面纹。表面有铸缝3条，自口部齐足分开，足内侧也各有一条铸缝。通高50厘米，重10.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15. 觚

Gu (Liquid-serving Vessel with Trumpet-shaped Rim)
（95郭M26:17）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喇叭口，颈、腹较粗，平底，高圈足。足上端有"十"字形镂孔，腹、足上有扉棱。口下饰蕉叶纹，下接一周云雷纹，腹、足饰兽面纹，腹足间饰二周凸弦纹。足上有4个十字形镂孔。通高28厘米，重1.1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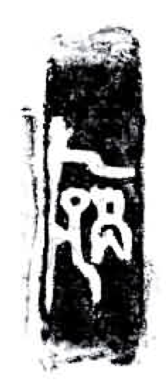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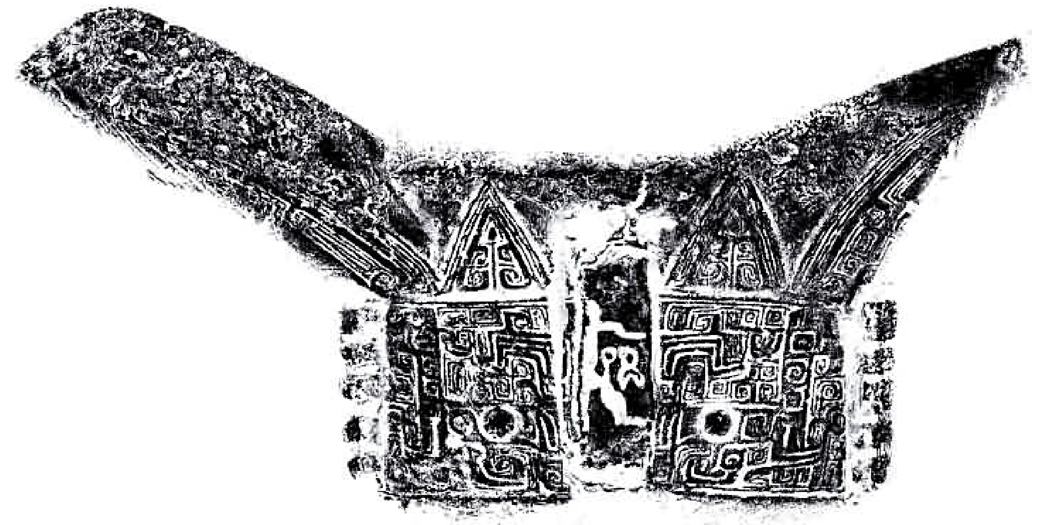
16. 爵

Jue

（95郭M26:18）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窄流，长尖尾，菌状钮，卵圆形底，半圆形錾，三棱形锥足。腹部有3条扉棱，柱顶饰圆涡纹。口、流、尾下饰蕉叶纹，腹饰兽面纹。錾内腹壁有铭文。通高20.8厘米，重0.8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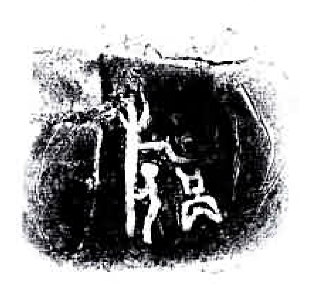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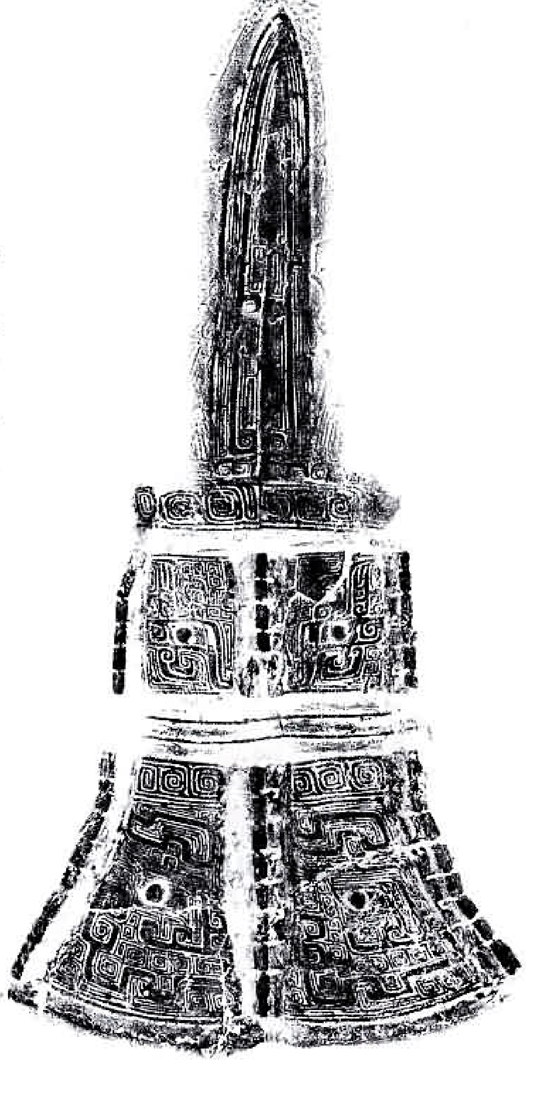
17. 觚

Gu

（95郭M26:16）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喇叭口，颈、腹较粗，平底，高圈足。足上端有十字形镂孔，腹、足上有扉棱。口下饰蕉叶纹，下接一周云雷纹，腹、足饰兽面纹，腹足间饰二周凸弦纹。足上有两个“十”字形镂孔。圈足内壁有铭文，但模糊不清。通高27.4厘米，重1.1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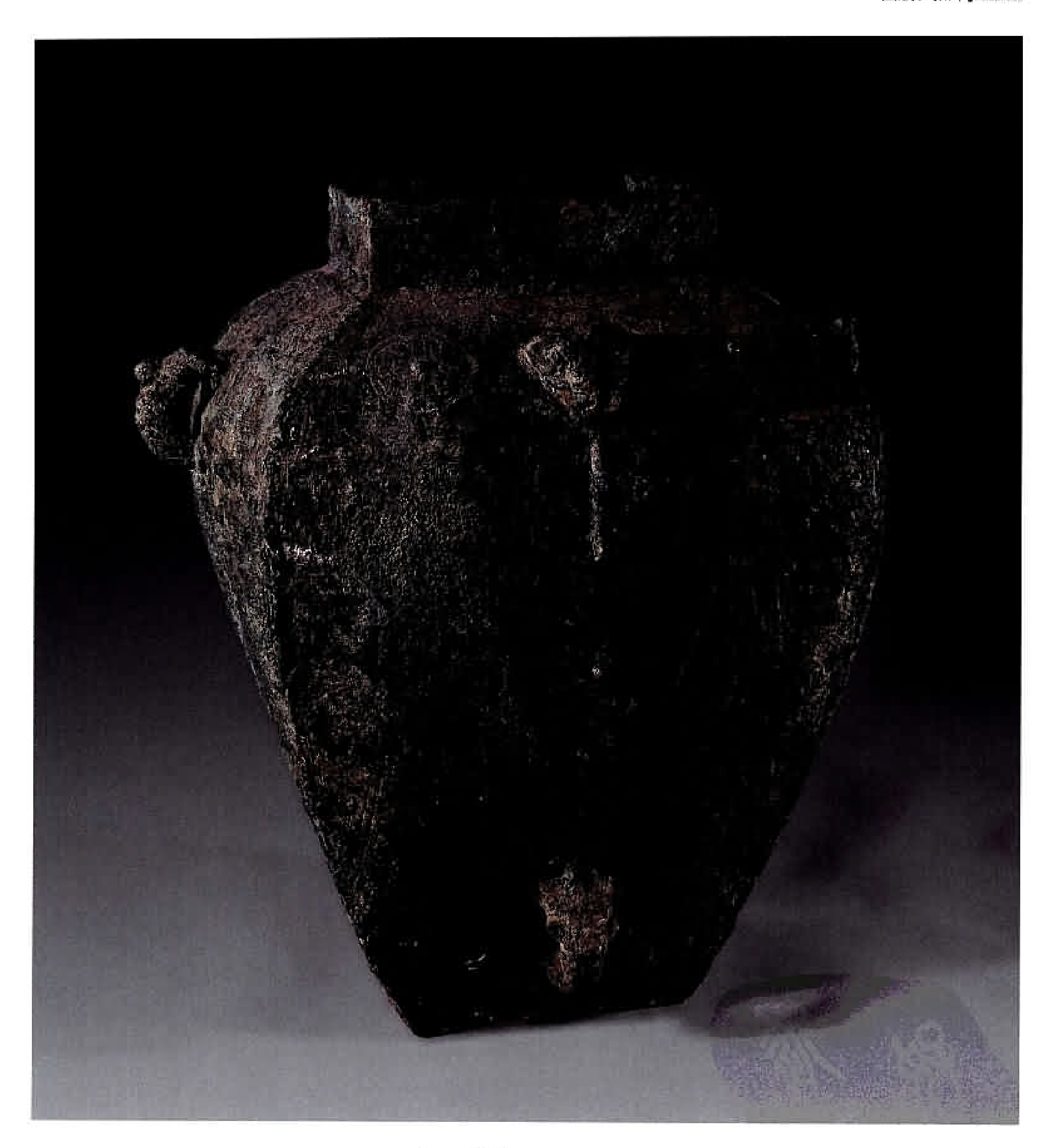


18. 爵

Jue

（95郭M26:19）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窄流，长尖尾，菌状钮，卵圆形底，半圆形鋬，三棱形锥足。腹饰凸弦纹三周。鋬内腹壁有铭文"㪚"字。通高21.2厘米，重0.99千克。时代应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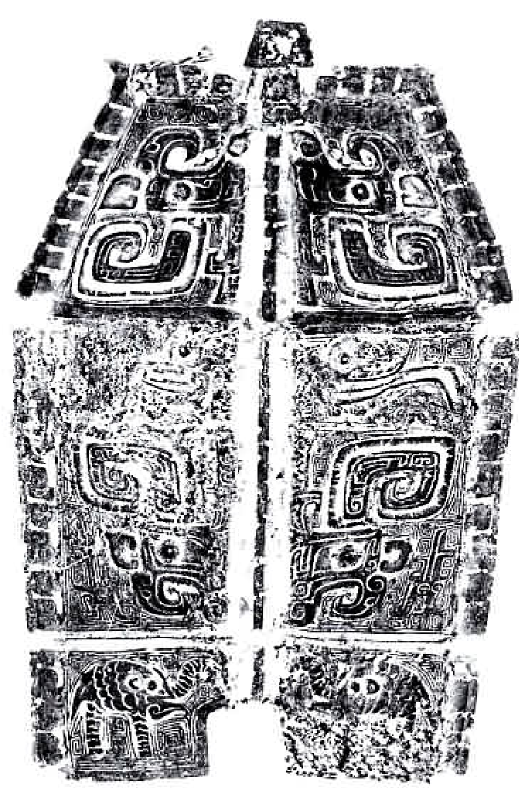


19. 方罍

Square Lei (Water Container with Broad Shoulders)
（95郭M26:11）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长方形直口，弧形肩，下腹内收，平底略内凹。肩部短边两面有对称的牛头半圆形耳，长边一面下腹部也有一同样的耳。口外侧饰夔龙纹，肩部饰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凸起圆涡纹4个及兽头2个，肩下饰夔龙纹一周，腹饰大三角夔龙纹。通高38.6厘米，重13.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20. 方彝

Square Yi (House-shaped Lidded Container Vessel)
（95郭M26:35）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有盖，长方形口，平沿，下腹略内收，平底，长方形圈足，足部四壁正中有弧形缺口，器身四周及四面正中均有突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口下饰鸟纹，腹饰兽面纹，足饰象纹。盖（26:23）似四阿式屋顶，正中有四阿式钮。盖的四角及四面正中亦有突棱，盖下有子母口与器口相合。盖面饰兽面纹，钮饰云纹。腹内底有铭文“[illegible]”字。通高25.4厘米，重2.9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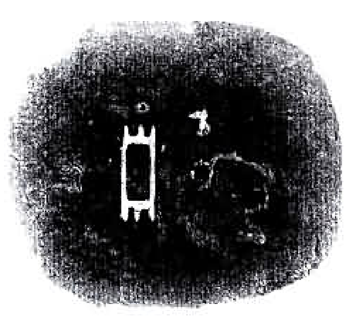
21. 铜铙组合

Set of Nao Bells (Bells with Round Shank, Mounted with Mouth Facing Upward)
（95郭M26:36（左）、32（中）、33（右）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次，为一套编铙。口内凹，呈弧形，口大于顶，平顶中部有一中空管状柄。器体两面饰凸回字形纹。M26:36，通高16.8厘米，重2.85千克；M26:32，通高17.4厘米，重1.85千克；M26:33，通高15厘米，重1.0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22. 鍑形器

Ring-footed Cauldron-shaped Vess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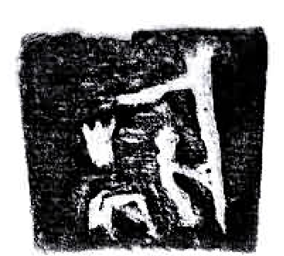
（95郭M26:28）

1995年出土于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口呈椭圆形，在弧度较大的两边口沿上有二个对称的直耳，内穿绹形提梁，侈口，束颈，下腹外鼓，底近平。底部有烟炱。颈饰凸弦纹三周。器内底部有铭文"□宁"二字。通高27.6厘米，重0.4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23. 箕形器

Dust Pan-shaped Bronze
（95郭M26:24）

1995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26号墓。形如簸箕，后“栏”正中有筒形斜柄，上平下弧。平面上端有铭文“㾏”字。通长24厘米，重1.3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24．83ASM663铜器群

Set of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Tomb M633 at Dasikong, Anyang

1983年出土于安阳西北郊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共出土青铜器44件，其中礼器9件，武器26件。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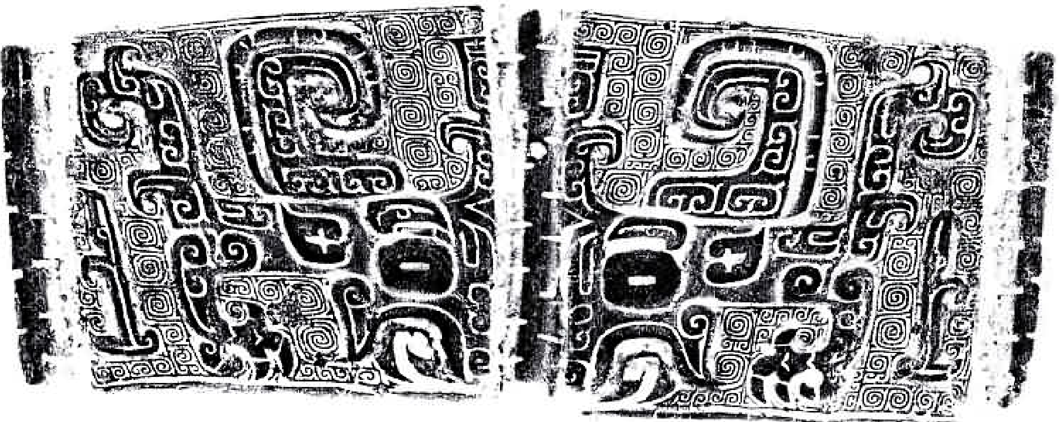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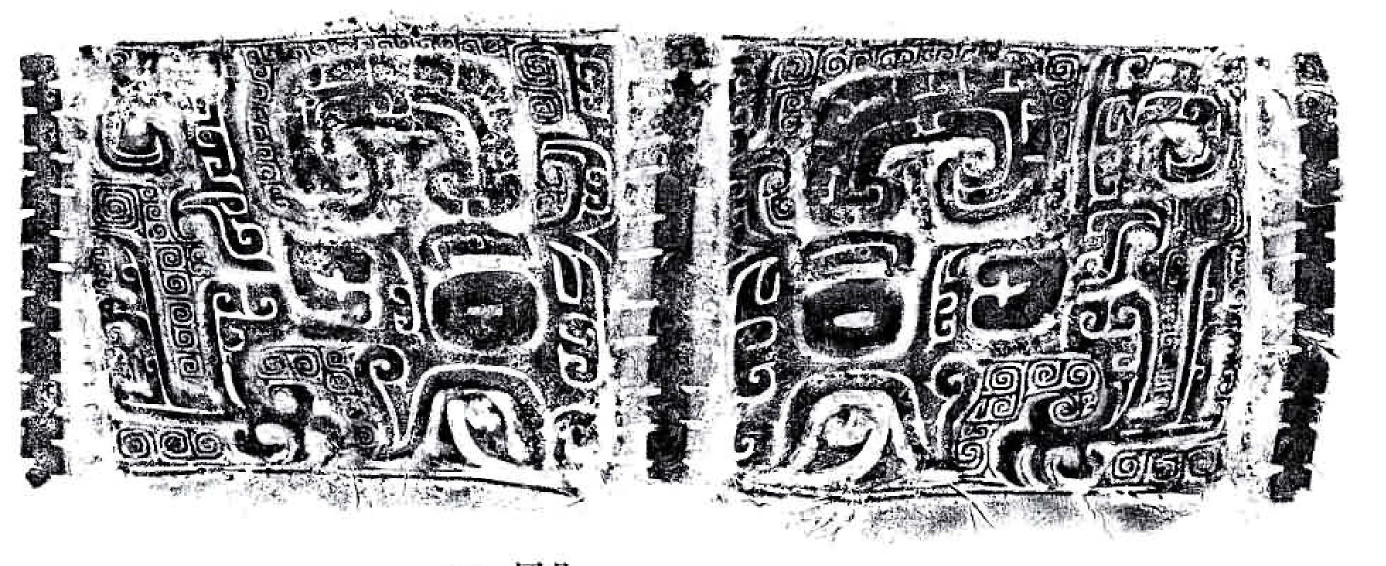
25. 圆鼎

Round Ding

（83ASM663:55）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直耳，方唇，侈口，直腹微鼓，圜底，圆柱形实心足。腹部有6条扉棱，其间饰三组兽面纹，云雷纹为其他纹，3条扉棱为兽面的鼻。足跟部饰一周云纹，下饰3个三角蝉纹。通高24厘米，重3.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26. 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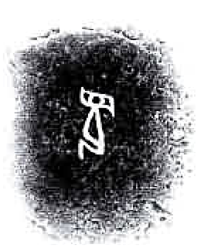
Round 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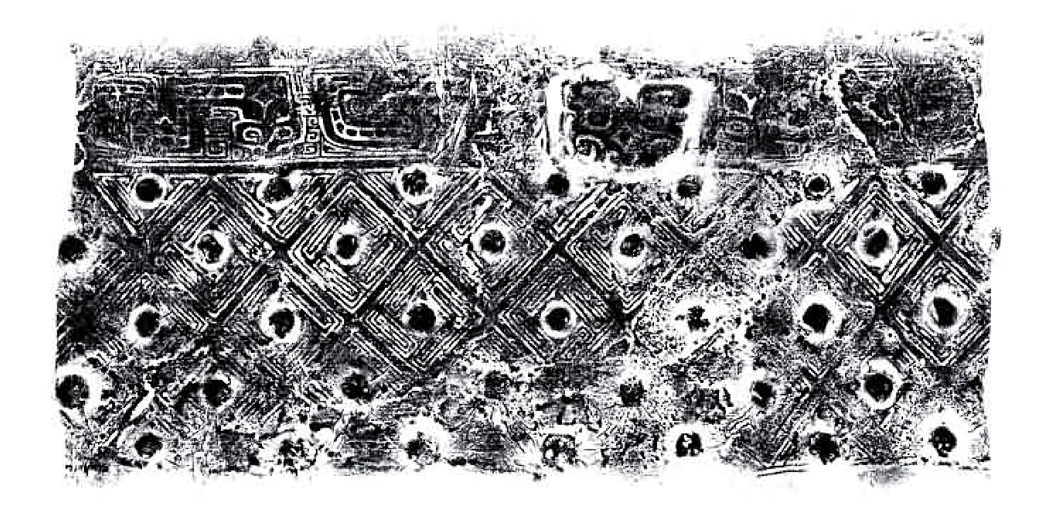
（83ASM6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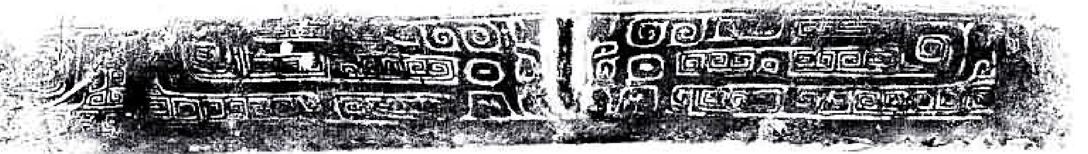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直耳，方唇，侈口，直腹微鼓，圜底，圆柱形实心足。腹部有6条扉棱，其间饰3组兽面纹，云雷纹为其他纹，3条扉棱为兽面的鼻。足微外撇。通高23.3厘米，重3.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27. 簋

Gui

（83ASM663:38）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侈口，薄唇，鼓腹，圜底，矮圈足。口下饰一周三角蝉纹，颈部饰兽面云雷纹，上铸3个兽头，腹部饰斜方格雷纹，其间填以乳钉纹，足饰3组夔龙纹，兽面鼻部为一细棱。底内有铭文“见”字。通高12.8厘米，重2.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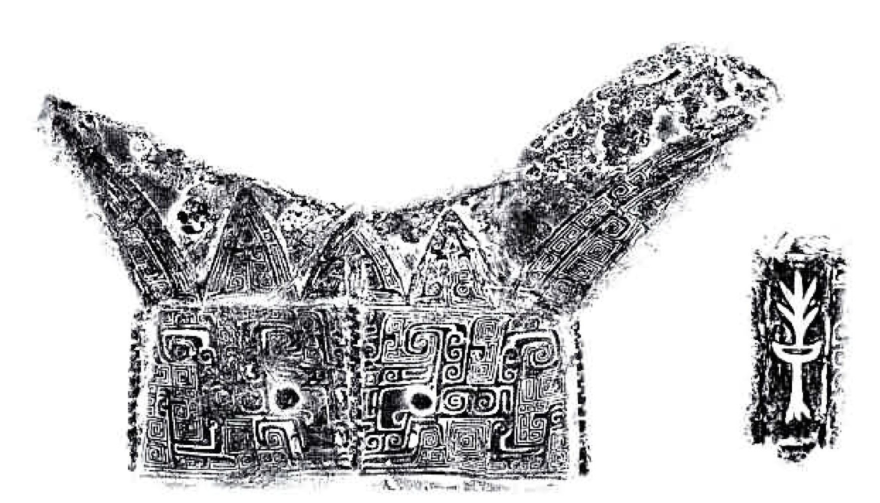


28. 觚

Gu

（83ASM663:50）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喇叭口，颈腹较细，高圈足，腹与足部有4条扉棱。口下饰蕉叶纹，下接一周云雷纹，腹饰兽面纹，腹足间有两道凸弦纹，足饰兽面纹。圈足内壁有铭文“古”字。觚通高28.7厘米，重1.1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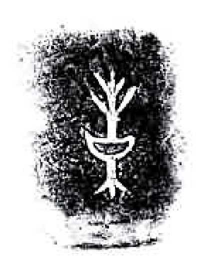
29. 爵

Jue

（83ASM663:54）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窄流长尖尾，菌状柱，卵圆形底，半圆形鋬，三棱形锥足。腹部有3条扉棱，柱顶饰圆涡纹，口、流、尾之下均饰蕉叶纹，腹部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兽面纹。鋬内腹有铭文一字。通高19.4厘米，重0.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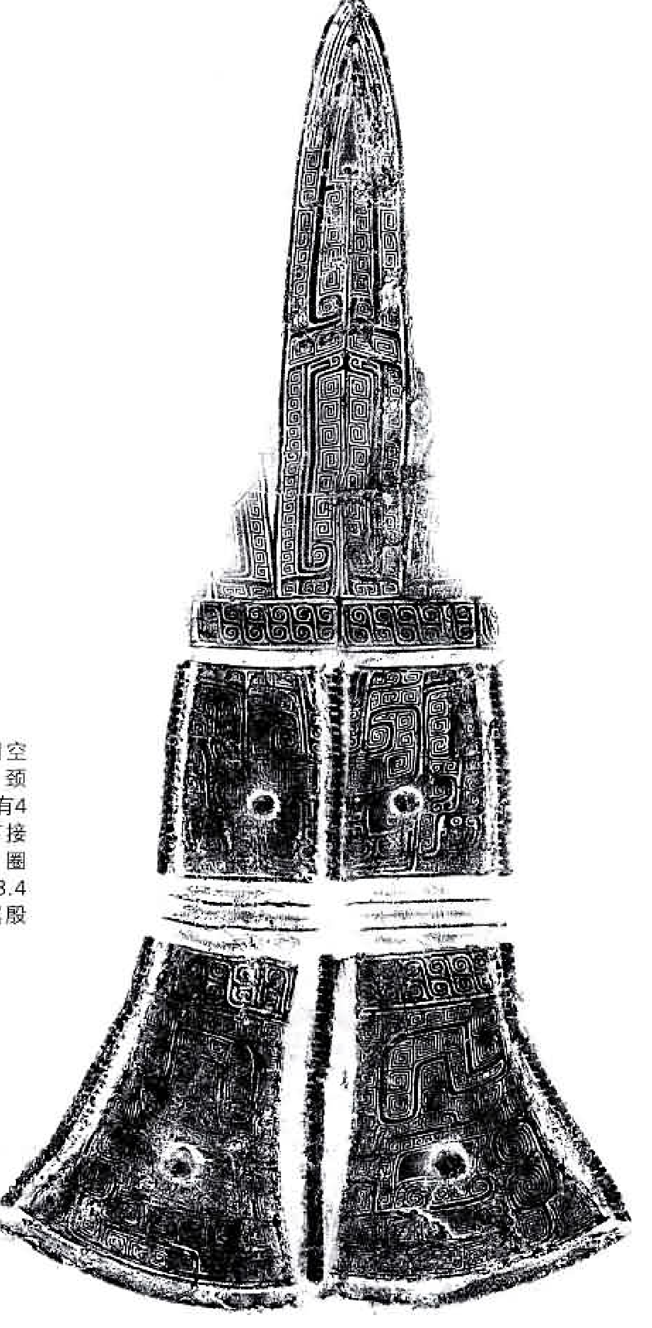


30.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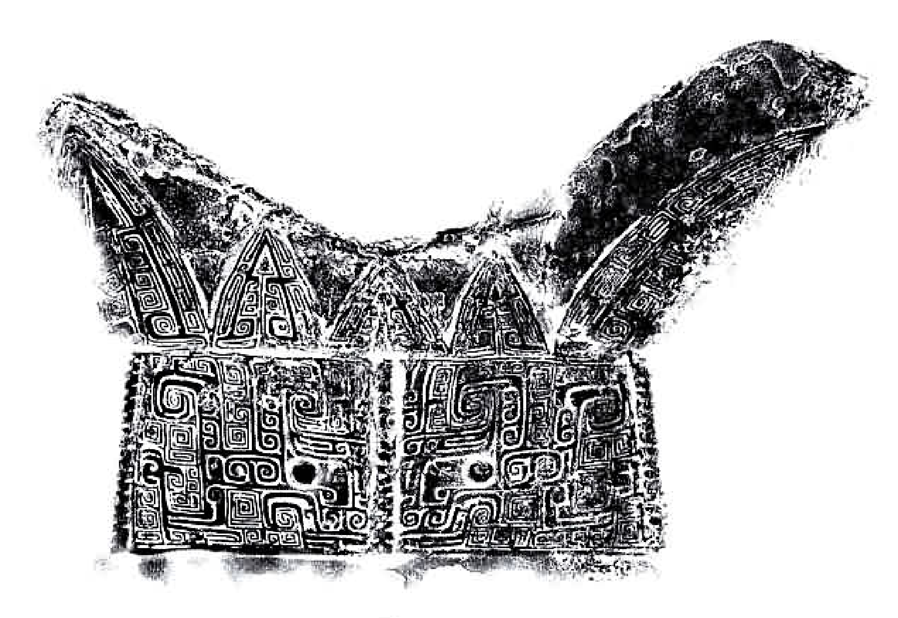
Gu

（83ASM663:53）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喇叭形口，颈腹较细，高圈足，腹与足部有4条扉棱。口下饰蕉叶纹，下接一周云雷纹，腹饰饕餮纹。圈足内壁有铭文一字。通高28.4厘米，重1.1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31. 爵

Jue

（83ASM663:49）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窄流长尖尾，菌状柱，卵圆形底，半圆形鋬，三棱形锥足。腹部有3条扉棱，柱顶饰圆涡纹，口、流、尾之下均饰蕉叶纹，腹部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兽面纹。鋬内腹有铭文一字。通高19.7厘米，重0.7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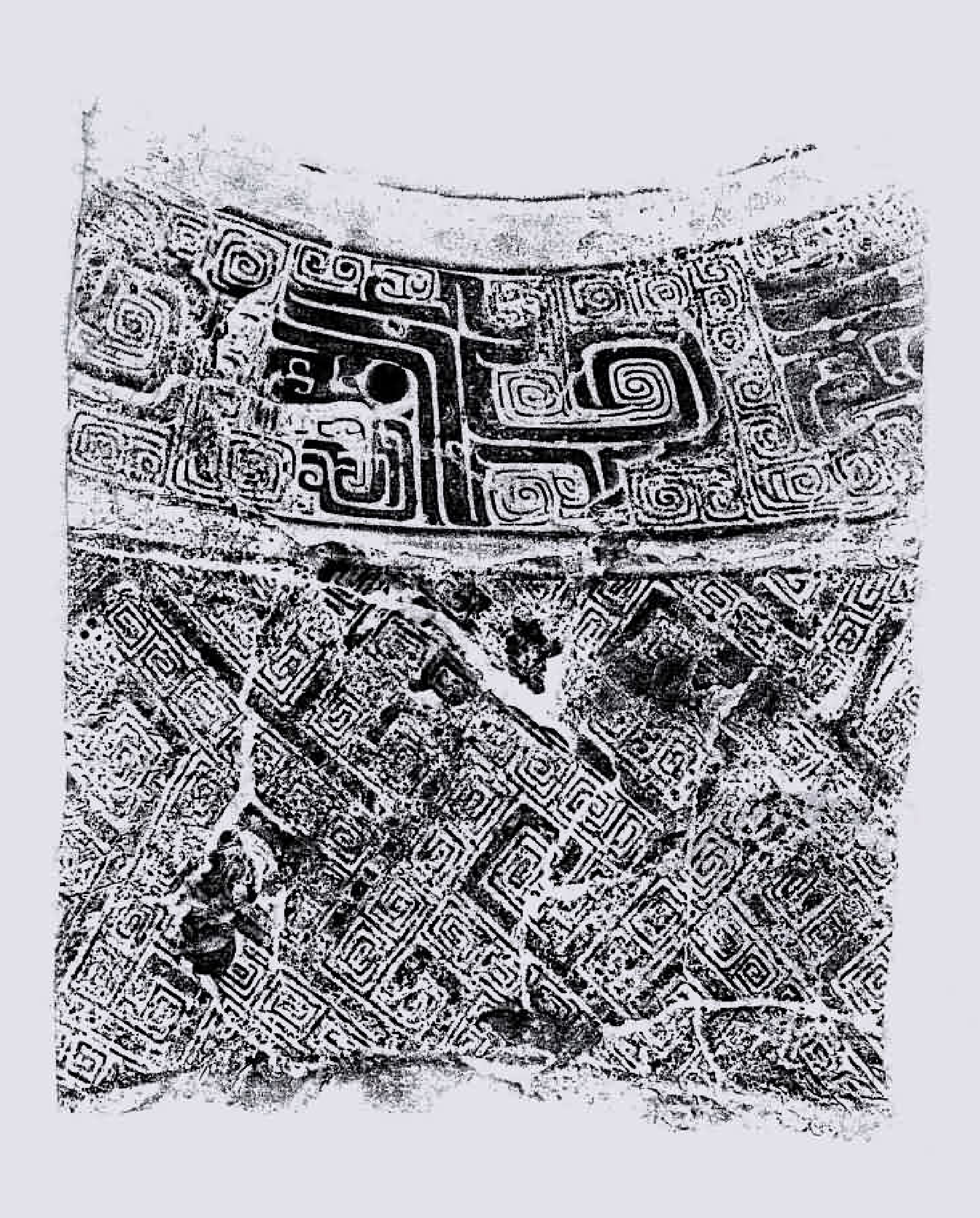


32. 瓿

Bu

（83ASM663:51）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器壁较薄，无盖，敛口，方唇，束颈，圆肩，鼓腹，平底微凸，矮圈足上有3孔。颈部饰两道凸弦纹，肩部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夔纹，腹部饰雷纹，足部饰夔纹。通高17厘米，重2.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33．方彝

Square Yi

（83ASM663:52）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有盖，长方形口，平沿，腹壁略内斜，平底，长方形圈足，足部四面正中有弧形缺口，器身四角及四面正中均有突棱。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口下饰鸟纹，腹饰兽面纹，足饰夔纹。盖似四阿式屋顶，正中有一四阿式钮，饰云纹。盖的四角及四面正中亦有突棱，盖下有子口与器口相合，盖面饰兽面纹。通高27厘米，重3.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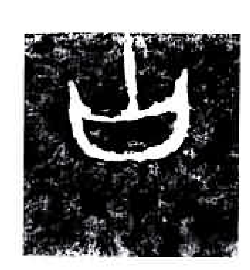


34. 铜铙组合

Set of Nao Bells
（83ASM663:4、2、1）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同墓出3件，形制、花纹相同，大小相次，为一套编铙。口内凹呈弧形，口大于顶，平顶中部有一中空管状柄，器体两面饰凸起的兽面纹。口内壁皆有铭文"古"字。M663:4，通高17.5厘米，重1.25千克。M663:2，通高14.8厘米，重0.7千克。M663:1，通高12.2厘米，重0.4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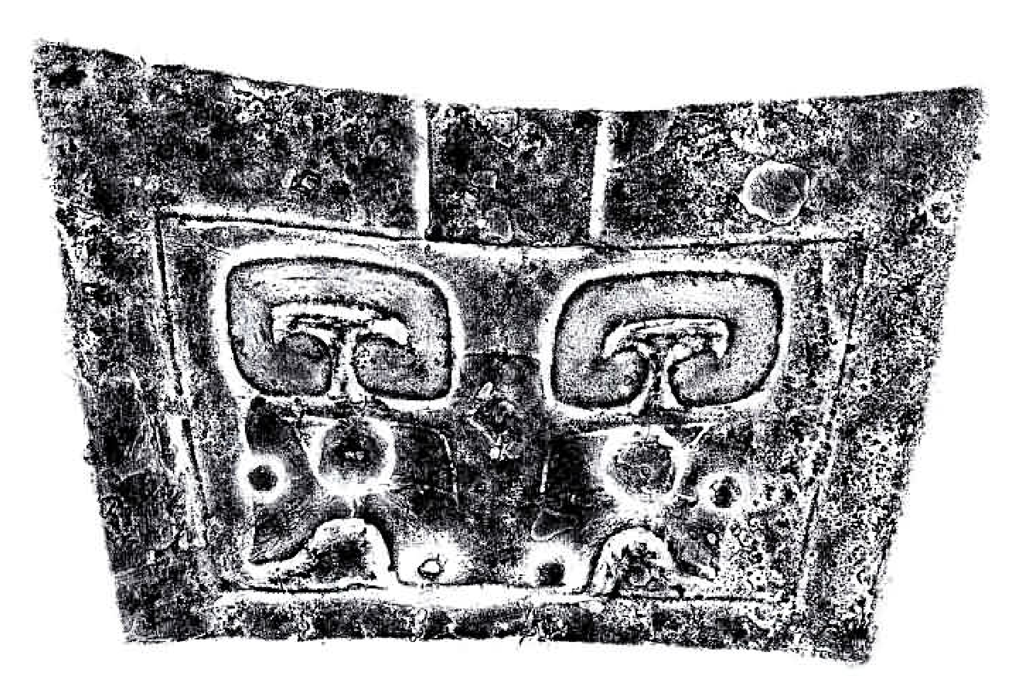


35. 铙

Nao Bell

（83ASM66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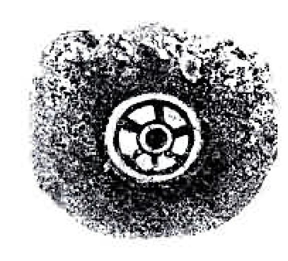
1983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东南663号墓。口内凹，呈弧形，口大于顶，平顶中部有一中空管状柄。器体两面饰凸起兽面纹。通高17.5厘米，重1.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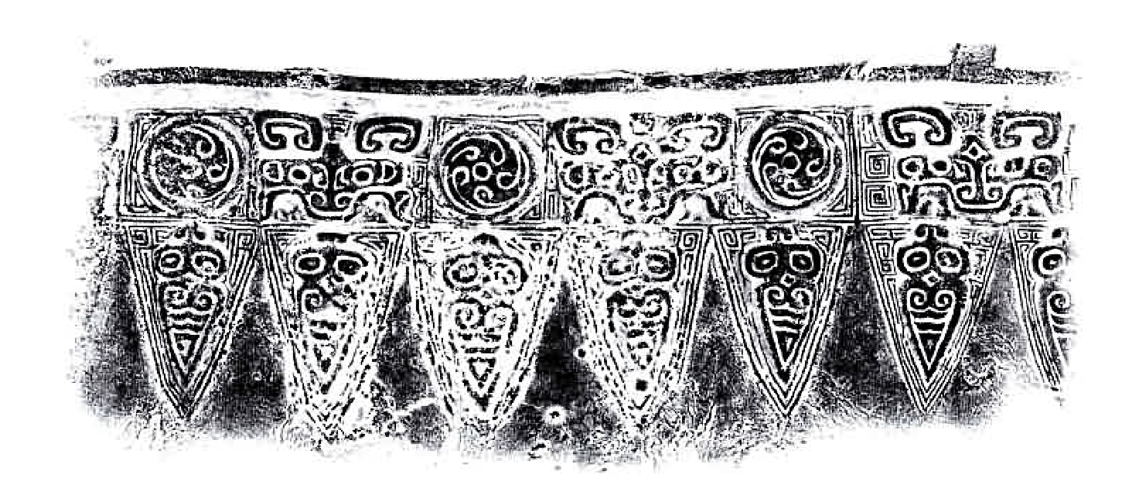
36. 圆鼎

Round Ding

（99APNM229:2）



1999年出土于安阳苗圃北地229号墓。直口微敛，方唇，平沿，沿面上立对称拱形双耳，深腹圆鼓，圜底。3柱足。上腹饰6个圆涡纹和6个独立兽纹，且两两相间分布；中腹饰12个三角纹，三角内填蝉纹。整个花纹布局简洁明快。腹内壁有一字铭文。通高20厘米，重2.3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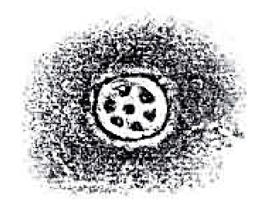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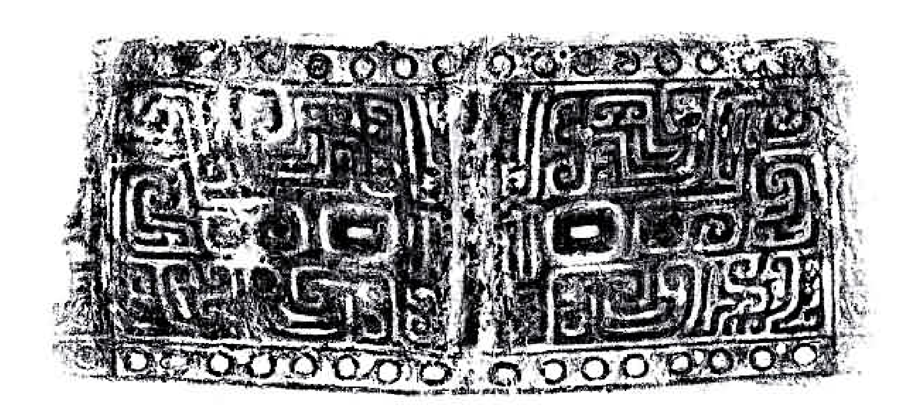
37.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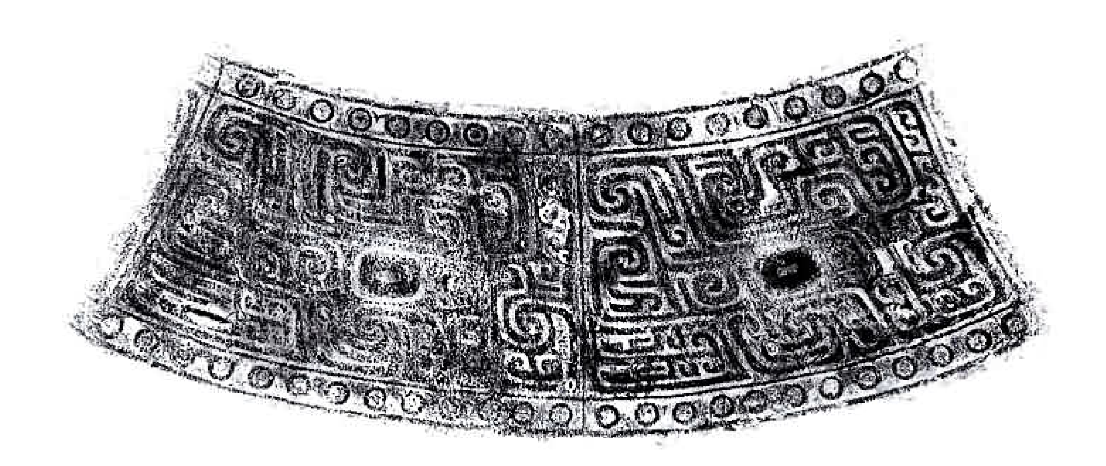
Gu

（99APNM2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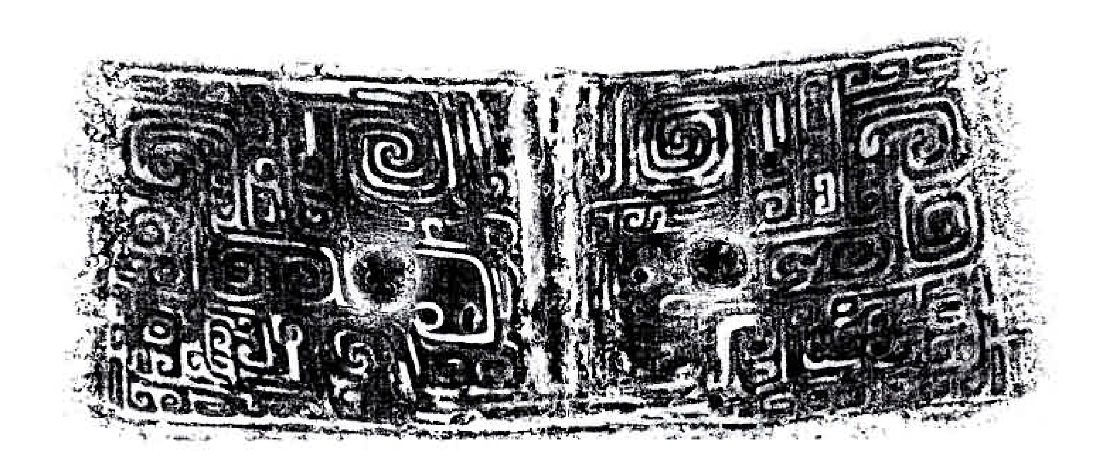
1999年出土于安阳苗圃北地229号墓。侈口，器体细高，高圈足。下腹部饰一周由两组兽面纹组成的纹饰带，圈足上有对称“十”字镂孔。圈足内底有一字铭文。通高29.1厘米，重1.1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38. 爵

Jue

（99APNM229:15）

1999年出土于安阳苗圃北地229号墓。同墓共出两件铜爵，形制、花纹均相同，应是一套酒礼器。此件为其中之一。窄流，宽尾，菌状钮，双柱靠近流折处，卵形腹，半圆形鋬，3锥状足稍外撇。鋬下有铭文“和母”二字。通高19.4厘米，重0.7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39. 鸮卣

You (Liquid Container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n Owl
（99APNM229:16）正面

1999年出土于安阳苗圃北地229号墓。整器呈两只背靠背的鸮鸟联体而成。有盖，盖面圆鼓，为鸮首，其上有塔形钮。器体为鸮身，四蹄形足分别为鸮鸟的两足；上腹部两鸮鸟之间置对称半环耳，内套绹索提梁。盖面以钮为界左、右各饰一独立兽面纹，器身以浅浮雕的手法雕出鸮鸟的翅膀。通高24.4厘米，重2.9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40. 鸮卣

Front and Side Views of the Owl-shaped You Vessel
（99APNM229:16）斜、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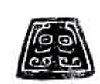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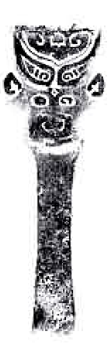
41. 盖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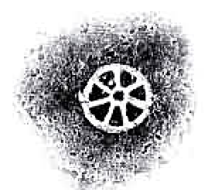
Covered Jia
(99APNM229:5)

1999年出土于安阳苗圃北地229号墓。有盖，盖面较平，兽首桥形钮。侈口，方唇，口沿上立对称塔式双柱，束颈，圆鼓腹，圜底，三棱锥状足外撇。中腹置牛首鋬。盖面饰蟠龙纹。颈部饰三角形纹，中腹有一周凹弦纹，弦纹上、下各饰三组由对夔构成的一首双躯兽面纹。腹内底有一字铭文。盖径 14.6厘米、通高22.6厘米，重2.3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42. 方罍

Square Lei
(99APNM229:4)

1999年出土于安阳苗圃北地229号墓。直口略外侈，高领，鼓肩，斜直腹，腹部断面为方形，腹部略带弧面，平底内凹。肩部置对称兽首鋬，一侧腹部置单一牛首鋬。整器满装花纹，布局合理，繁缛而又精致。肩部四边皆饰一首双躯龙纹，肩部置鋬的两边以兽首鋬为龙首，而无鋬的两边则以肩部浮雕的牛首为龙首；上腹部饰一周涡纹间以夔纹，中腹部四边各饰一首双躯兽面纹，下腹饰对夔蕉叶纹。云雷纹为地纹。通高33.2厘米，重8.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43. 方罍

Square Lei （side view and detail）
（99APNM229:4）侧面、局部



44. 圆鼎

Round Ding

（84AWBM259:5）

198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武官村北259号墓葬中。立耳，束颈，鼓腹，圜底，3柱足。除颈部饰一周由3组双躯兽面纹组成的纹饰带外，余均素面。通高 40厘米，重1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45. 甗

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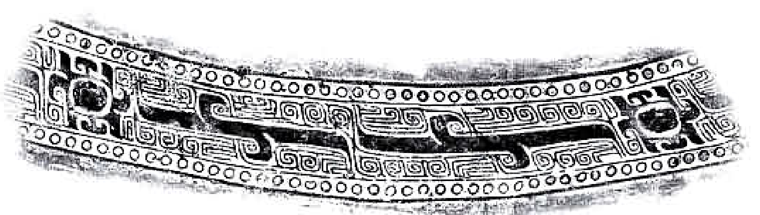
（84AWBM2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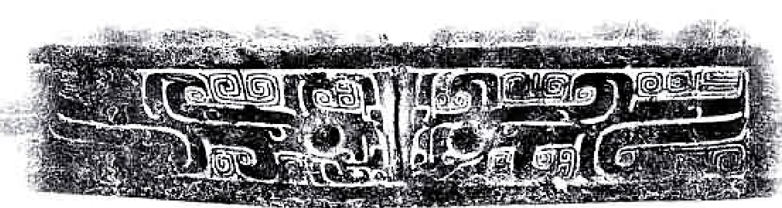
198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武官村北 259号墓葬中。出土时上腹部已压坏，腹内有一人头，这种用甗蒸人头的现象还见于1999年刘家庄北地发掘的M1046中。此甗大口，深腹，束腰，3袋足分裆。颈有凸弦纹三周，袋足各饰一组简化浮雕兽面纹，整个袋足看起来像大象头部，足跟部犹如象鼻子。通高47.5厘米，重16.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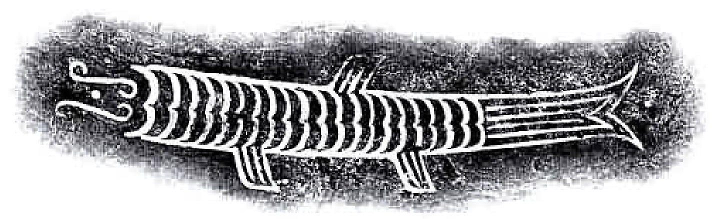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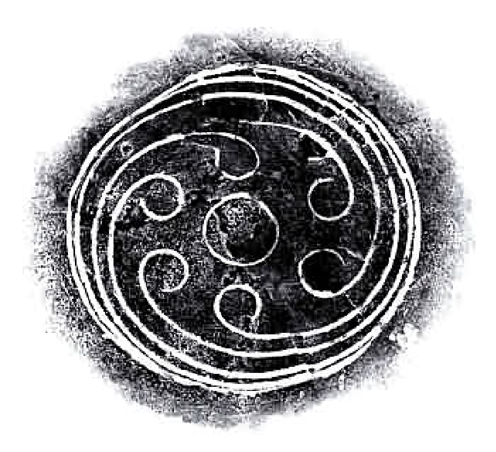












46. 盘

Dish

（84AWBM259:4）

198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武官村北259号墓葬中。宽折沿，沿面稍内斜，浅腹，圜底近平，高圈足，圈足上有3个小方孔。盆底内有一涡纹和3条鱼纹。外腹壁有一周纹饰带，上、下分别界以联珠纹带，中间为夔龙纹，圈足饰兽面纹。口径46.3厘米，通高19.4厘米，重7.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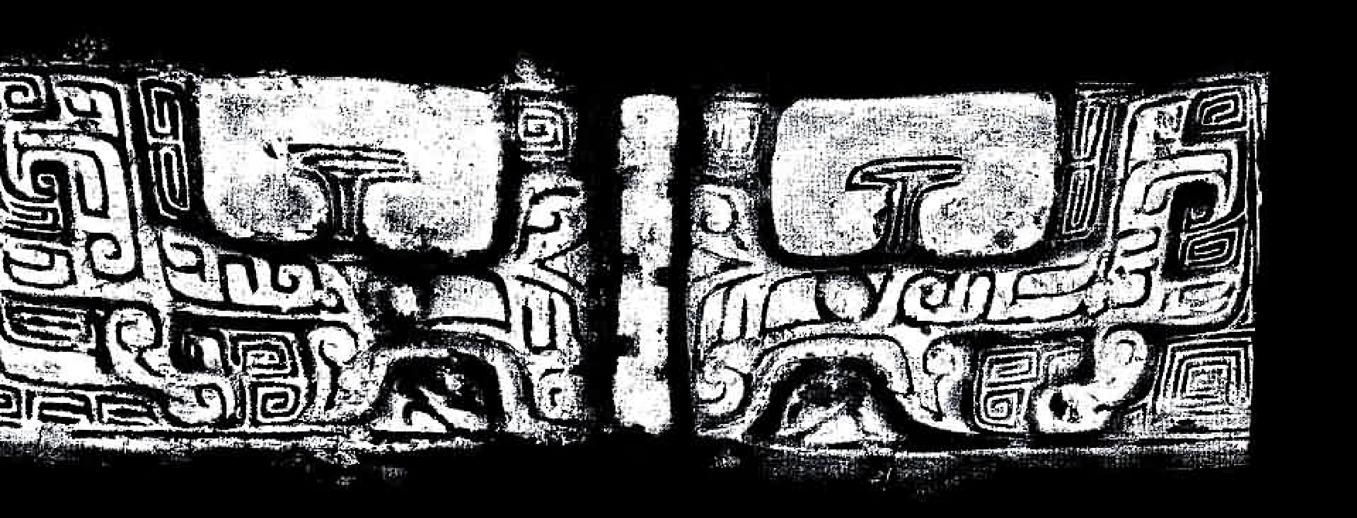


47. 圆鼎

Round Ding

（01花东M54:240）

2001年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平口，方唇，沿面微内斜，直耳，深腹微鼓，圜底，上粗下细中空蹄形足。沿下饰兽面纹6组。柱足上端饰兽面纹。内壁有铭文“亚长”。通高48．6厘米，重16．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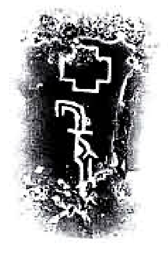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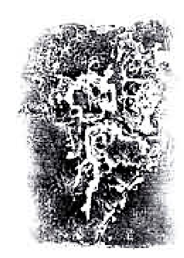
48. 圆鼎

Round Ding

（01花东M54:224）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内置数块兽骨。圆形，侈口方唇，直耳略外斜，束颈，鼓腹，平底，下有3根柱状空心足，与底贯通。其颈部饰3组夔纹、兽面纹带。腹部饰菱形云雷乳钉纹，3柱状足素面。上腹部内壁有铭文“亚长”。通高37.1厘米，重1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49. 方鼎

Square Ding

（01花东M54:191）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侈口外撇，方唇，两耳直立微外撇，直腹，平底，4条实心柱足。此类形制的方鼎在殷墟科学发掘品中属第一次发现。颈部饰三角形纹，四面腹部饰分解的兽面纹。足上部饰兽面纹，下部则为重环三角纹。内壁有铭文“亚长”。通高36.4厘米，重1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50. 方鼎

Square Ding

（01花东M54: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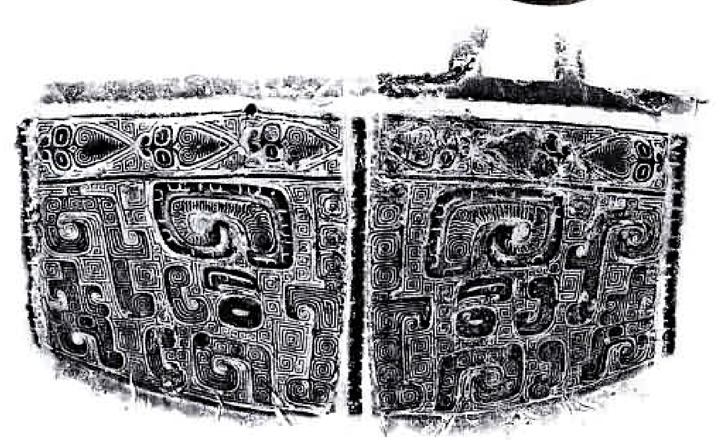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平沿略内斜，方唇，直耳，直壁，平底，4条实心柱状足。器壁四拐角及四壁中部均有突起的扉棱，四足与四壁拐角对应处也有扉棱。其主体纹饰均以浅浮雕的形式表现。两耳外侧有纹饰，但由于锈蚀严重，难辨其形，似为云雷纹。每面器壁饰上、下各一组对称纹饰带。两宽面器壁上部饰两头相对的夔纹，其下部饰兽面纹。立耳之窄面器壁饰兽面纹。四足以扉棱为中心的外侧上部饰一独立兽面纹。未发现铭文。通高32.3厘米，重1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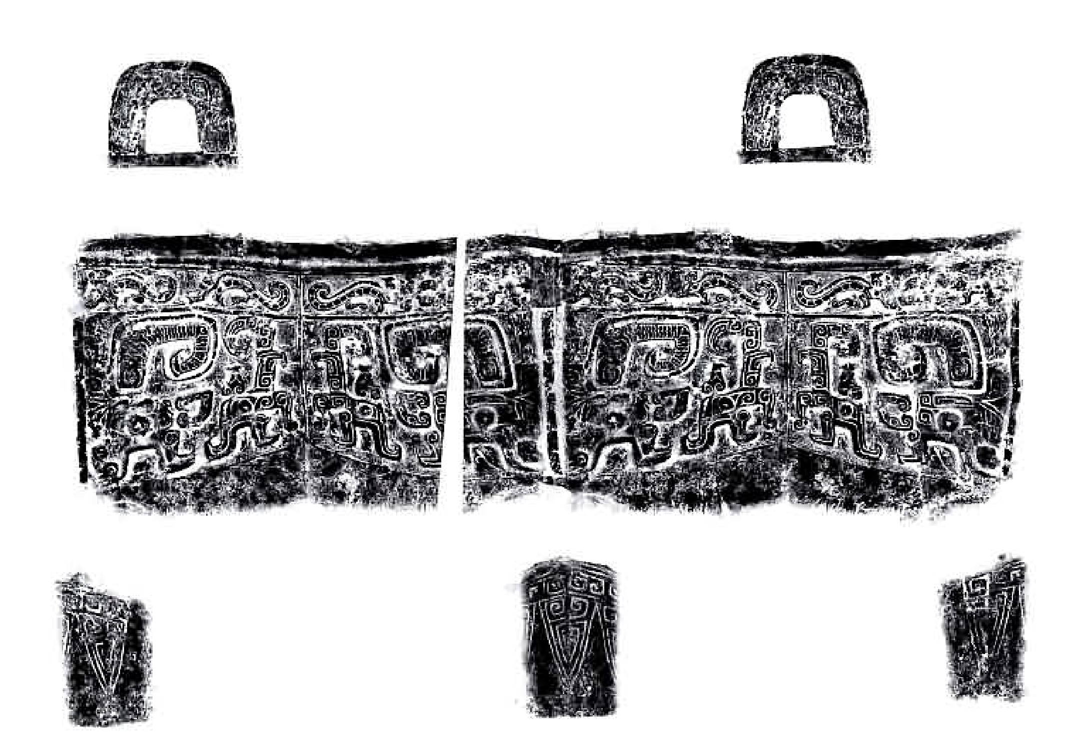
51. 分裆鼎

Fendang Ding

（01花东M54:166）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形制、花纹相似的分裆鼎4件，均为平沿，方唇，直耳，鼓腹，分裆，3裆线上部及3柱足对应之腹部共有6条扉棱，实心柱足较高。该件为其中之一。颈下饰一周蝉纹，腹部饰3组分解兽面纹，兽面纹两侧以倒夔纹补空，均以云雷纹为地纹。未发现铭文。通高18.2厘米，重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52. 分裆鼎

Fendang Ding

（01花东M54:181）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形制、花纹相似的分裆鼎4件，均为平沿，方唇，直耳，鼓腹，分裆，3裆线上部及3柱足对应之腹部共有6条扉棱，实心柱足较高。该件为其中之一。耳外侧两边饰倒立夔纹。颈部饰一周夔纹，腹饰兽面纹，浮雕感明显。每柱足上部饰一周云雷纹，其下饰三角形叶纹，内壁有铭文“亚长”。通高32.2厘米，重10.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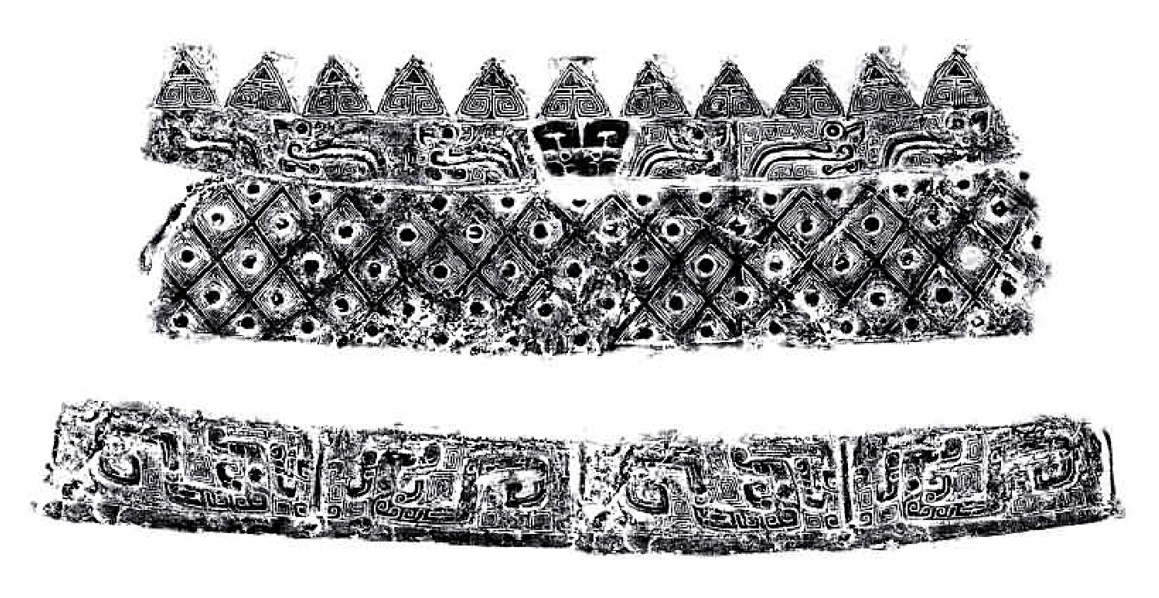


53. 双耳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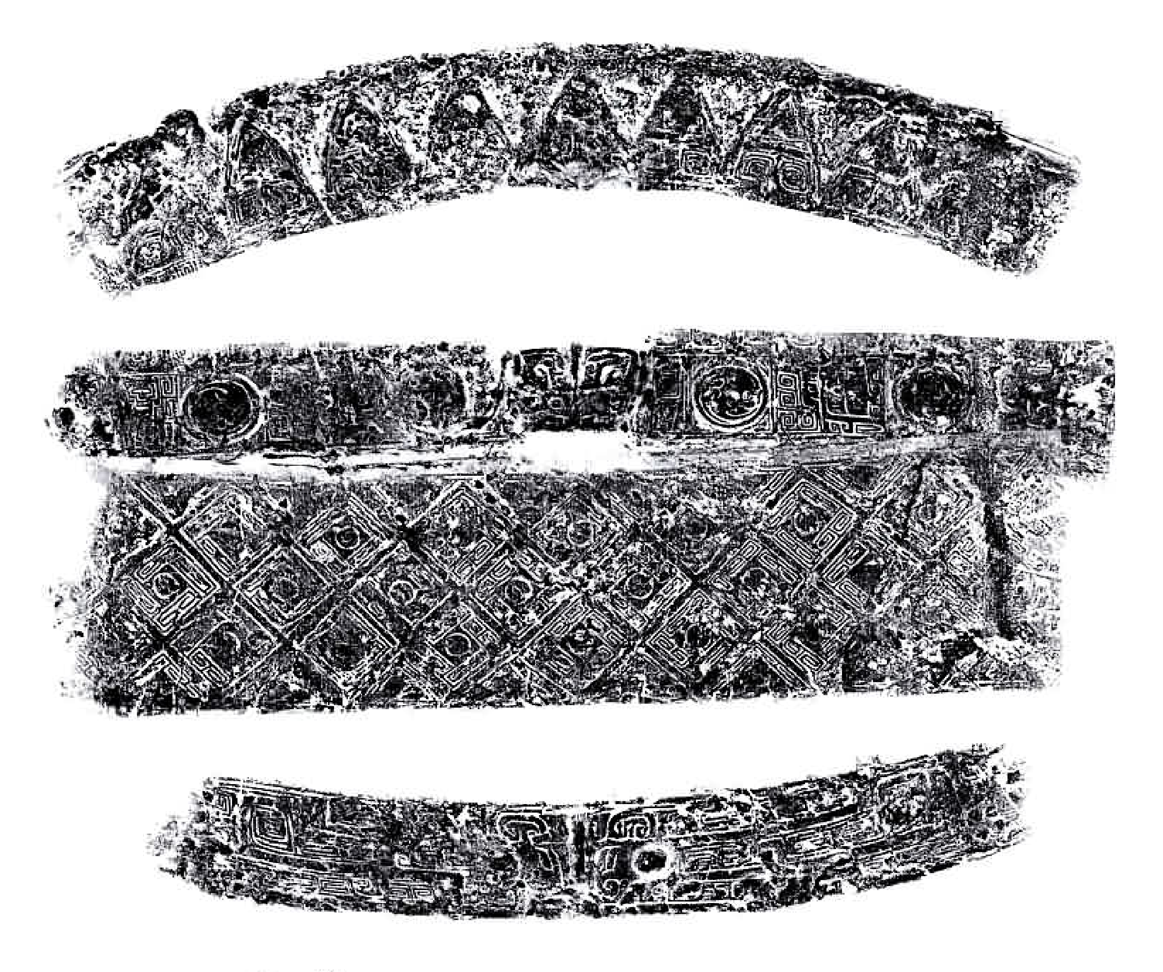
Gui with Two Lugs

（01花东M54:171）

2001年出土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侈口，方唇，束颈，下腹外鼓，平底，矮圈足，颈部有一对兽头状半环形耳。两耳间之中部各有浮雕形兽头。簋上花纹共由四部分组成。束颈部位饰一周三角纹。束颈下部，以两个浮雕兽头为中心，每个兽头两侧各有三个小鸟纹，12个。腹部饰菱形云雷乳钉纹。圈足共饰三组夔纹。未发现铭文。通高15.3厘米，重3.4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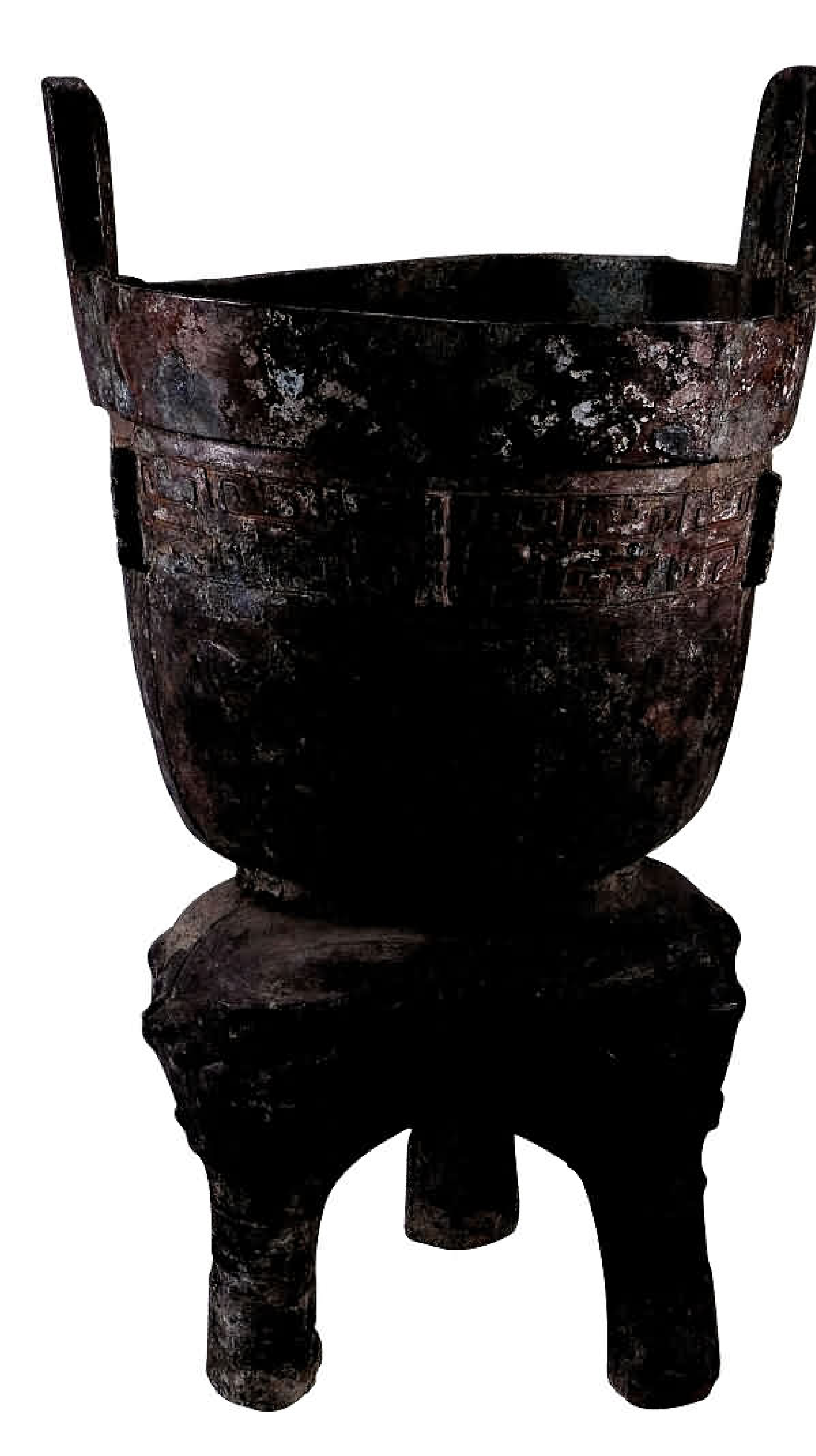


54. 簋

Guǐ

（01花东M54:177）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侈口，方唇，束颈，下腹外鼓，平底，矮圈足。沿下有一周共27组三角纹，三角纹上部为重环三角，下部为卷云纹。颈部以3个兽头三等分。每两个兽头之间有4个铜泡形凸起，上饰圆涡纹。腹部饰斜向方格云雷乳钉纹。圈足上3组兽面纹。未发现铭文。通高12.8厘米，重2.1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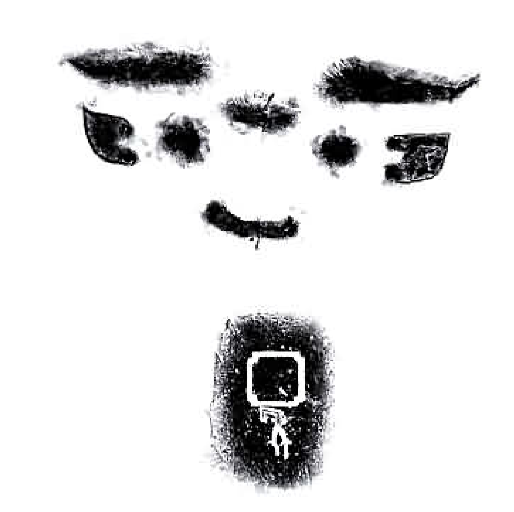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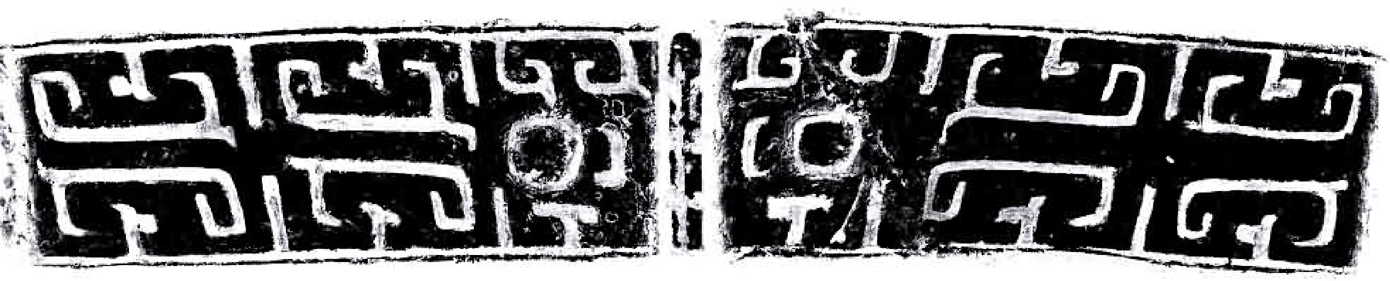
55. 甗

Yan

（01花东M54:154）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直口，方唇，直耳，深腹，束腰，分裆，柱足。承耳部分腹壁较宽，与下腹壁形成内外折棱。内壁折棱似承盖之用。甗腰内部呈圆角三角形以承箅。上腹饰抽象兽面纹。3袋足上分别饰分解简化兽面纹，浮雕感强烈。上腹内壁有铭文“亚长”。通高79.5厘米，重37.4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56. 觚

Gu

（01花东M54:237）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4件形制、花纹均相同的铜觚，应与同墓所出4件满装花纹的平底爵配套。此件为其中之一。觚体高大，通体四条扉棱。大敞口，腹微鼓，高喇叭形圈足。上腹部饰蕉叶纹，内填简化倒立兽面纹，蕉叶纹下饰一周蝉纹；下腹饰两组兽面纹；圈足上部有对称“十”字镂孔，下饰分解兽面纹。通高 35.4厘米，重2.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57. 觚

Gu

（01花东M54:190）

2001年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同墓出土4件形制、花纹均相同的铜觚，应与同墓所出4件满装花纹的平底爵配套。此件为其中之一。通高35.5厘米，重2.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58. 平底爵

Jue with Flat Bottom

（01花东M54:156）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4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的此类型铜爵。这件为其中之一。平底爵，伞状柱较高，紧靠流折处，腹置牛首鋬，3锥状足高而稍外撇。流、尾和器体均饰通体扉棱，显得豪华庄重。流、尾饰蕉叶纹，上腹部饰三角纹，腹部饰两组兽面纹。鋬下腹壁有“亚长”铭文。通高29.3厘米，重1.8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59. 觚

Gu

（01花东M54:194）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4件形制、花纹均相同的铜觚，应与同墓所出4件满装花纹的平底爵配套。此件为其中之一。圈足内壁有清晰的铭文“亚长”二字。通高36.1厘米，重3.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60. 平底爵

Jue with Flat Bottom

（01花东M54:155）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4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的此类型铜爵。这件为其中之一。通高29.6厘米，重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61. 平底爵

Jue with Flat Bottom

（01花东M54:165）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4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的此类型铜爵。这件为其中之一。平底，出土时残缺鋬与一柱。鋬所在位置外壁有铭文“亚长”。通高29.1厘米，重1.7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62.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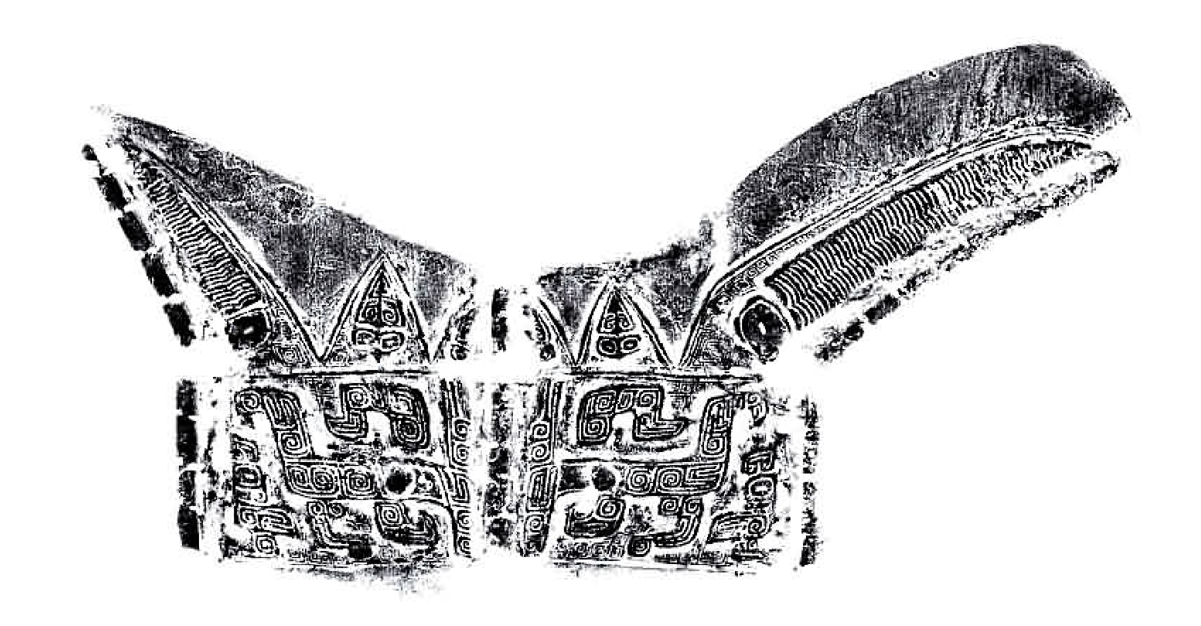
Gu

（01花东M54:192）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5件形制、花纹均相似的铜觚，形体相对较矮，仅下腹和圈足有扉棱。此件为其中之一。侈口，腹微鼓，喇叭形高圈足。上腹饰四组大蕉叶纹，内以变形兽面纹填补，蕉叶纹下饰一周四只首尾相接的鸟纹；下腹部饰两组分解兽面纹；圈足上部饰一周蝉纹，下部饰分解兽面纹。无铭文。通高28.8厘米，重1.3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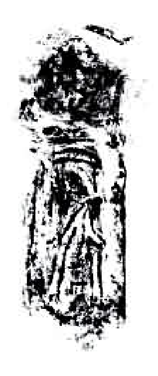




63.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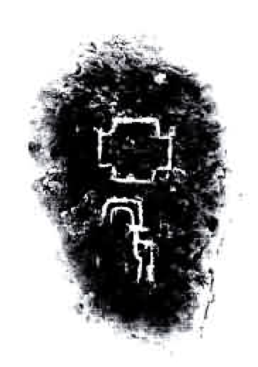
Jue

（01花东M64:184）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共出土5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的铜爵。此件为其中之一。保存完好。通高21.5厘米，重1.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64. 方尊

Square Zun

（01花东M54: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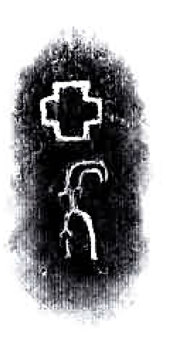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口近方形，外侈，束颈，斜肩，下腹略收，平底，高圈足略外撇。颈部以扉棱为对称轴，共有8个蕉叶纹。尊的肩部正中为浮雕式兽头。肩之四角各立一浮雕怪兽，似鸟有双翅，蹲踞于肩上。腹的最上部每面饰6个蝉纹。蝉纹下饰分解兽面纹。腹与圈足间即腰部饰两条凸弦纹，每面中部有透雕“十”字型镂孔。圈足亦饰分解兽面纹。在方尊颈部两侧外部，有铭文“亚长”二字。铭文铸于器身之外的做法殷墟时期发现较少。通高51.9厘米，重 27.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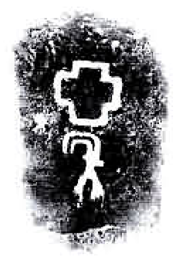


65. 牛尊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01花东M54:475）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时器身与器盖分置两处。整体呈牛形，体态健壮、肥硕。牛抬头前伸，微张口，口内中空。面额下凹，鼻梁凸起。两耳外展，两角圆弧形，向后伸展。背微下凹，上有长方形口，口边缘有凹槽以承盖。腹较肥，四腿粗短，从下至上中空，稍显蹄瓣。臀部微抬起，臀后有一尾，下垂，尾呈扁纺锤形。牛下颌下部饰小型鱼纹，耳下饰小鸟纹。颈两侧饰倒立夔纹。牛角后即颈上部饰兽面纹。由前腿上部至后腿臀部，饰虎纹。臀后尾两边各一夔纹。

器盖随器口形而设，长方亚腰形，两边翘起，中部有半环形钮。盖上饰对夔组成的兽面纹。在牛脖下及器盖内壁，有铭文“亚长”二字。从头至尾通长40.0厘米，带盖高22.2厘米，重7.1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66. 牛尊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01花东M54:475）另一面



67. 方斝

Square Jia (side view)

（01花东M54:43）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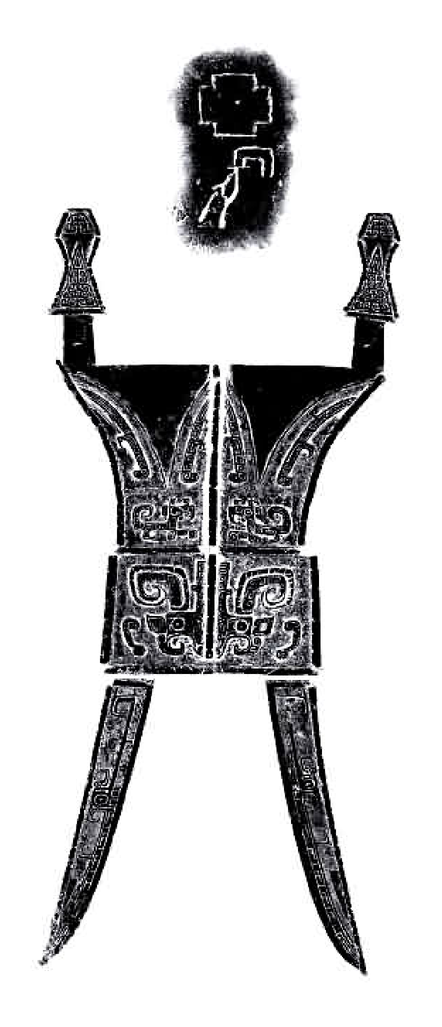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整体呈方形。斝口呈长方形，外侈，两短边口沿内侧铸有束腰方塔立柱，其顶端呈“四阿”式。发掘时一斝柱脱落，发现该立柱为单个铸件，下部留有“人”字形铆钉，正好卡在立柱下半部分预留的卡槽中。这种铸造方式以前未见。方斝腹壁较直，平底，四只三棱锥足外撇，一侧置兽首鋬。器腹四角和三面中部均有扉棱，上腹饰八组蕉叶纹，内填变形倒夔纹，其下饰对夔纹，腹部四面均饰兽面纹。足亦饰蕉叶纹。通高66.6厘米，重22.1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68. 方斝

Square Jia

（01花东M54:43）正面







69. 方罍

Square Lei

（01花东M54:136）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时未发现器盖。方形直口，短颈，鼓肩，下腹斜收，小平底。肩部有一对半环形耳，耳上部为兽头。耳内套有“亚”腰方形环，一端略宽。肩的另外两侧及下腹一侧各有一兽头，肩部靠上有两周凸弦纹，肩上每面兽头及耳两边各有一个铜泡形凸起，其他部位素面。未发现铭文。方罍通高36.1厘米，重7.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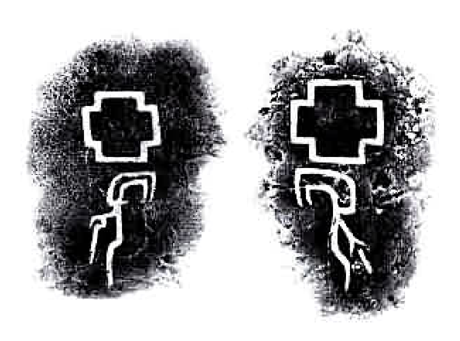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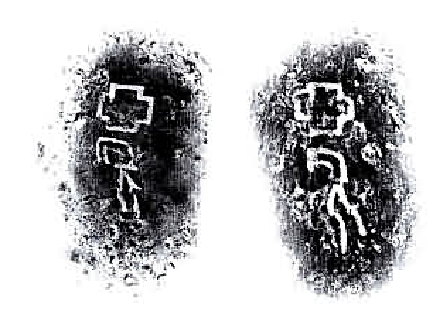
70. 方彝

Square Yi

（01花东M54:183）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内。器身方形，平沿，直壁，圈足，腹与圈足间以宽线凹弦纹为界。圈足四面正中有方形缺口。器盖呈四阿房顶式，下有子口，以套合在器身内，上有四阿式钮。口沿下饰两首相对的夔纹。腹部饰兽面纹。圈足之上饰象纹。器盖四面，饰倒立的兽面纹。钮上正面饰兽面纹，侧面饰云纹。器盖壁及器身内底部均有铭文“亚长”。器身高18.1厘米，重4.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71. 四足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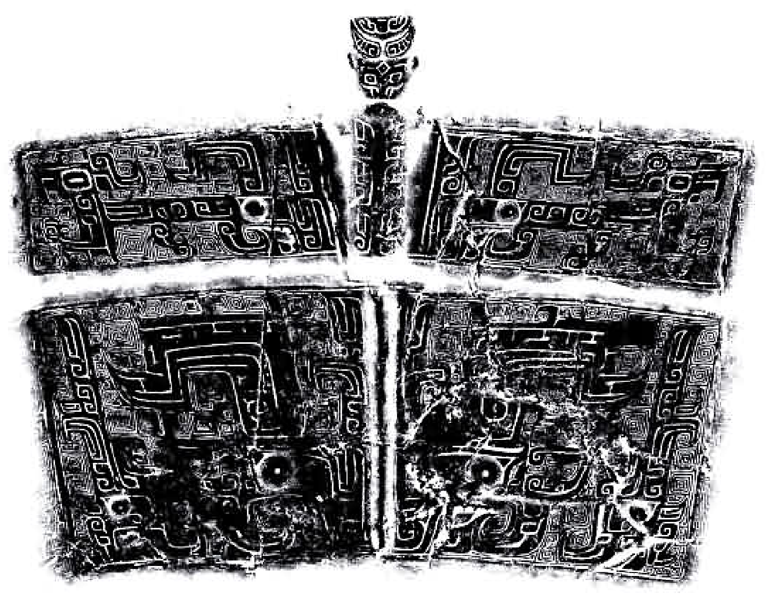
Gong Vessel with Four F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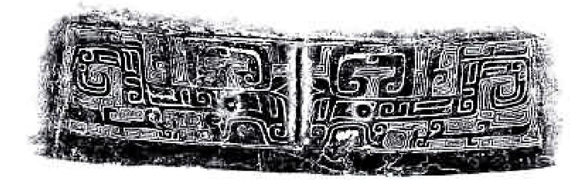
（01花东M54: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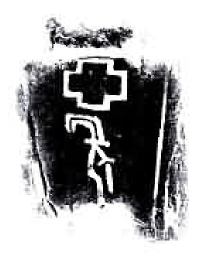
2001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器身短宽，流微上扬，腹呈扁圆形，略鼓，后有鋬，底较平，下有4只三棱锥状足，略外撇，器盖依器口而造，前端窄小，形似怪兽，稍低头以承流口，后端较大。盖面中部有菌状钮。器身近流处饰象纹。象鼻上部近流口处有一小型蝉纹，其鼻下有两条卷曲蛇纹。腹部两面饰分解兽面纹。四足根外侧饰简化兽面纹。器盖内壁及器底内壁均有铭文"亚长"。带盖通高18.7厘米，重1.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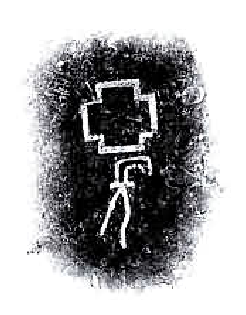


72. 大铜盂

Yu

（01花东M54:157）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两件，一大一小，形制大致相似。此为其中形体较大者。侈口，方唇，深直腹近底内收，高圈足微外撇。沿下有对称半环形牛首鋬，相对应的另外两侧下腹部有对称绹索状附耳。上腹饰四组由对称双首夔纹组成的兽面纹；中腹饰四组独立兽面纹，两侧以倒夔纹补空；圈足饰四组一首双躯兽面纹。均以云雷纹为地纹。在上腹部半环形鋬下腹壁上有铭文“亚长”二字。口径54厘米，通高42.5厘米，重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73．小铜盂

Yu

（01花东M54:169）

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同墓出土两件，一大一小，形制相似。该件是其中之一。侈口，方唇，深直腹下收，高圈足微外撇。从形制观察，该盂共由上、中、下3组（每组6块）范扣合浇铸而成，3组陶范的范线对应。其附耳为事先浇铸成型后固定在陶范内的，附耳对应器壁内有铜泡扣钉以稳固附耳，上饰涡纹。上腹饰3组兽面纹，对夔补空；中腹饰12个蕉叶纹，内填对夔兽面纹；圈足饰3组线条对夔兽面纹。器内底有铭文"亚长"二字。口径41.3厘米，通高29.5厘米，重12.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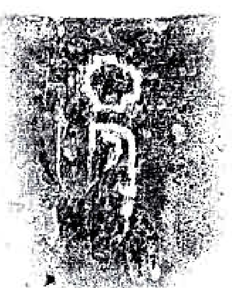


74. 铜铙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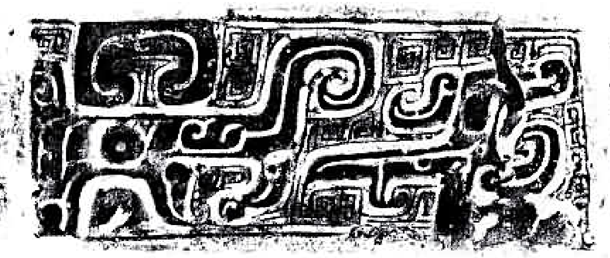
Set of Nao Be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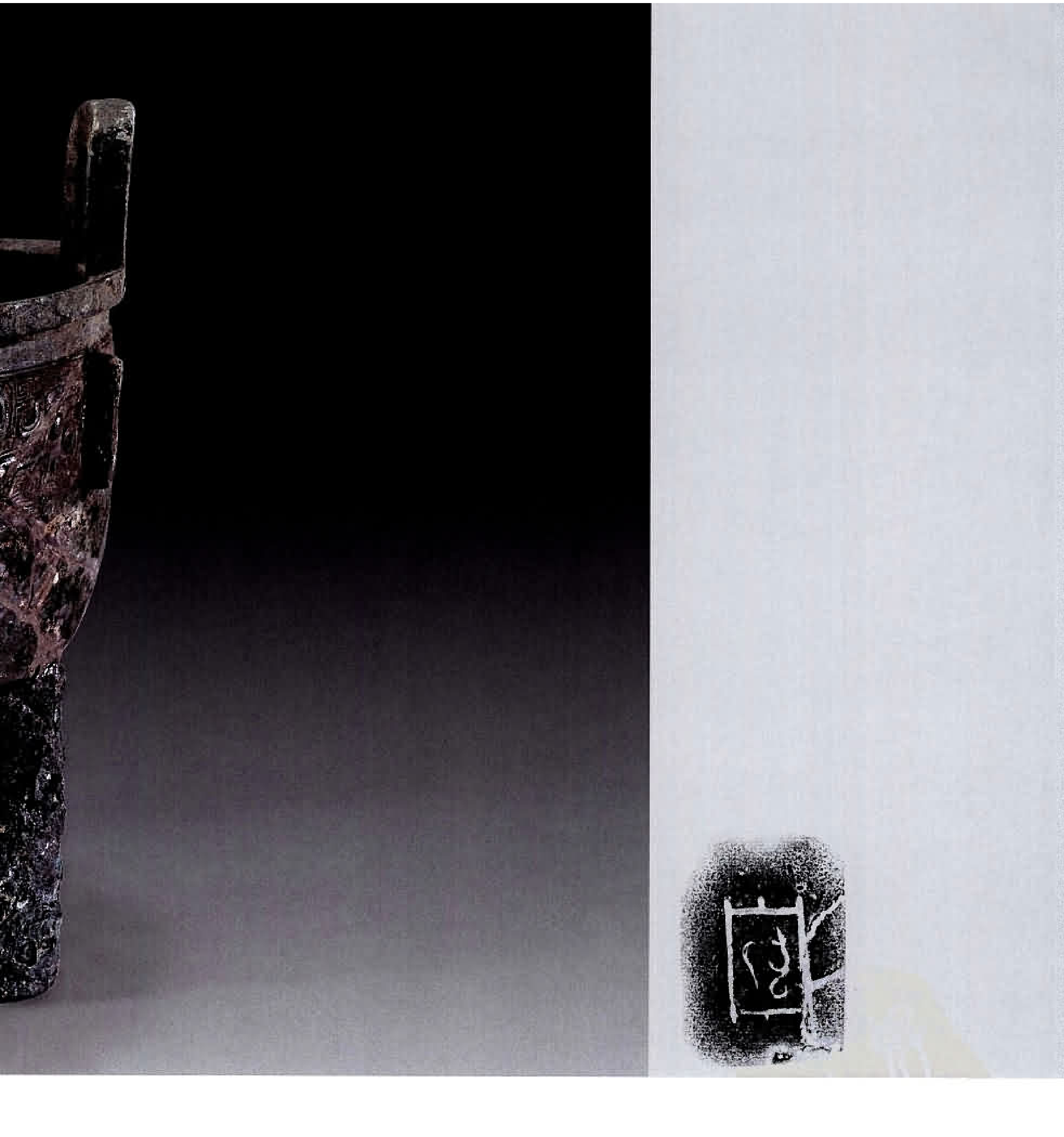
[01花东M54:199（左）、108（中）、119（右）]

一套3件铜铙，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形制、花纹、铭文相同，大小相次。体呈扁筒形，口内凹呈弧形，口沿略向内倾斜，口宽于顶。顶中部有管状甬，上细下粗，与钲相通。钲的两面均饰浅浮雕式兽面纹，没有地纹。鼓内壁有铭文“亚长”。M54:119，通高17.6厘米，重1.35千克。M5:108，通高14.4厘米，重0.86千克。M54:199，通高12.3厘米，重0.4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75. 圆鼎

Round Ding

（05范家庄M4:7）

2005年春出土于安阳范家庄4号墓葬中。直口微敛，方唇，沿面较平，上立对称拱形双耳，深直腹微鼓，圜底，3柱足较矮。上腹部置6条小扉棱，6条夔纹与扉棱相间分布，且两两对称构成兽面纹，并以倒夔纹补空。内腹壁有铭文“宁刈”。通高25厘米，重3.5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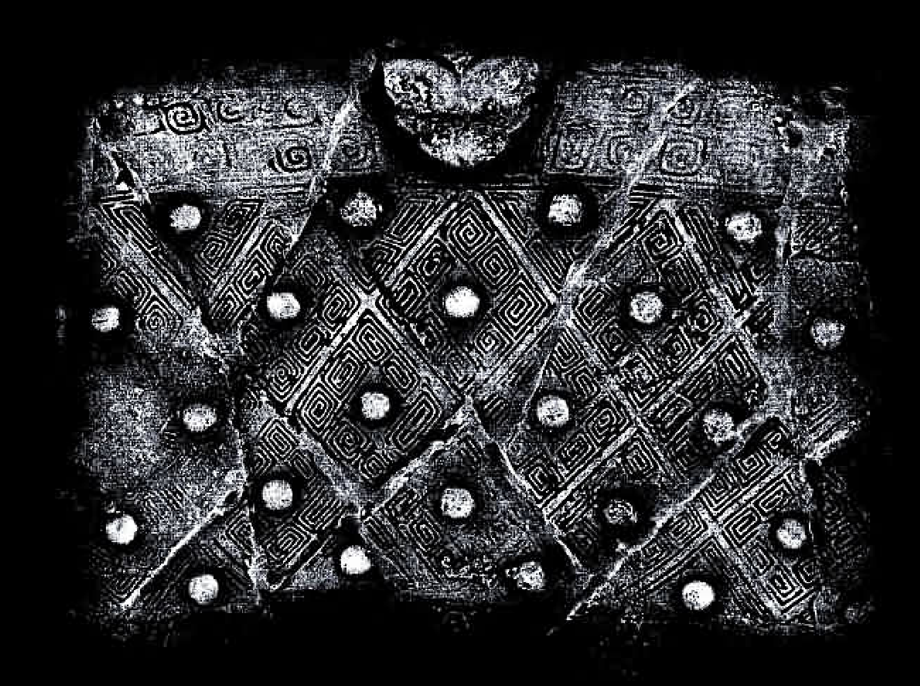


76.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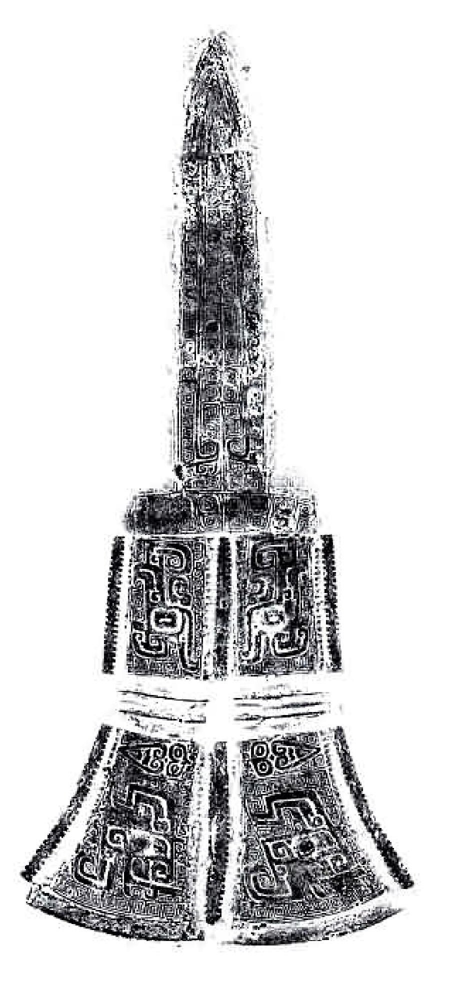
Gui

（05范家庄M4:5）

2005年春出土于安阳范家庄村东4号墓葬中。侈口，圆唇，深直腹稍内收，高圈足。口沿下置对称小兽头，腹部饰菱形雷纹乳钉纹，且乳钉高浮其上，颇具特色。圈足饰对夔兽面纹，上、下分别界以联珠纹带。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对夔兽面纹是以小扉棱为鼻梁，而此簋圈足上的对夔兽面纹鼻梁处则是两组“宁刎”二字铭文。口径28厘米，通高 19厘米，重3.5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77. 觚

Gu

（05范家庄M4:6）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范家庄村东4号墓葬中。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皆相同的铜觚，应为一套礼器。此觚为其中之一。通高30.5厘米，重1.1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78．爵

Jue

（05范家庄M4:8）

2005年春出土于安阳殷墟范家庄村东4号墓葬中。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均相似的铜爵，此件为其中之一。鋬下腹壁有"𠛬宁"二字铭文。通高20.5厘米，重0.7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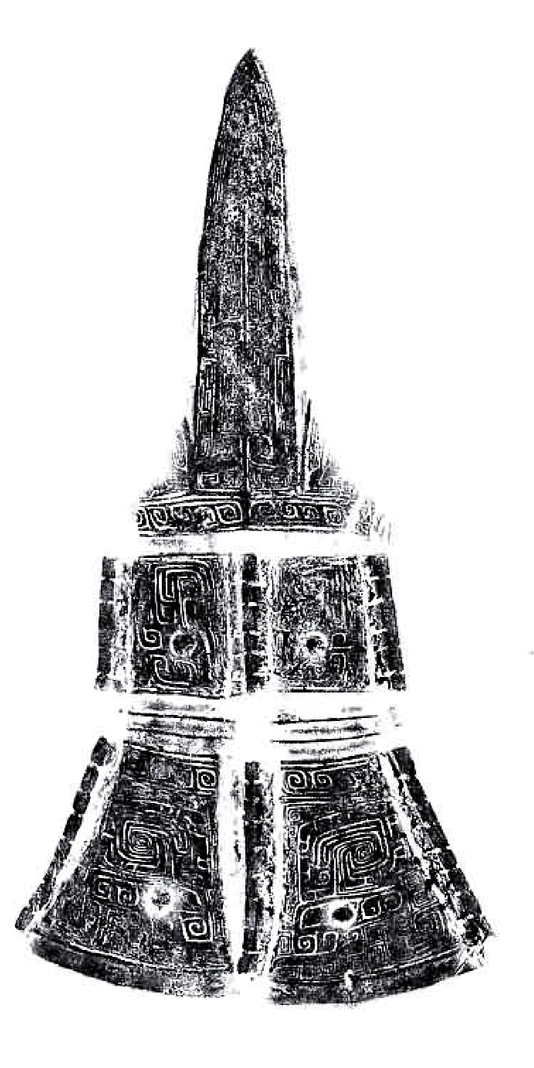
79. 卣

You

（05范家庄M4:4）

2005年春于安阳殷墟范家庄东4号墓葬中出土。带蘑菇钮器盖，直口微敛，扁圆鼓腹，喇叭形圈足。肩部设对称两耳，内套绹索状提梁。盖体饰三角纹，上腹口沿下饰一周纹饰带，共有两组花纹，中间为一小兽头，两侧饰对称夔纹。余均素面无纹。腹内底有铭文“宁𫝀”。通高28.5厘米，重3.9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0. 觚

Gu

（86ASNM29:7）

1986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南29号墓葬中。侈口，细高器体，高圈足。上腹饰蕉叶纹，蕉叶内填简化对夔纹，下腹和圈足分别由4条扉棱四等分，其间各饰一夔纹，且两两相对构成兽面纹。圈足上部有对称“十”字镂孔。圈足内壁有铭文，但模糊不清。通高27.8厘米，重1.0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1. 爵

Jue

（86ASNM29:1）

1986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南地29号墓葬中，蘑菇钮双柱立于流折处，卵形腹，圜底，3个刀形锥状足稍外撇，与一足对应的腹部置一半圆形鋬。腹饰三周凸弦纹。鋬下有“帚印”二字铭文。通高20.8厘米，重0.8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2. 圆鼎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1）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号楼5号墓。整器厚重，花纹简洁庄重。直口微敛，方唇，窄平沿，沿面直立双耳，深腹略鼓，圜底，3蹄足较高。上腹置6条短扉棱，其中3条扉棱为3组兽面纹的分界，3条扉棱则为兽面纹的鼻梁。蹄足上部饰独立兽面纹。通高46.3厘米，重16.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3. 圆鼎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32）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5号墓葬中。整器厚重。直口微敛，方唇，沿面立拱形双耳，深腹略鼓，圜底，三柱足。上腹饰9个涡纹和9个独立兽面纹，且两两相间；中腹饰15个三角形纹，三角形内填蝉纹。内腹壁有“[illegible]”字铭文。通高25.3厘米，重4.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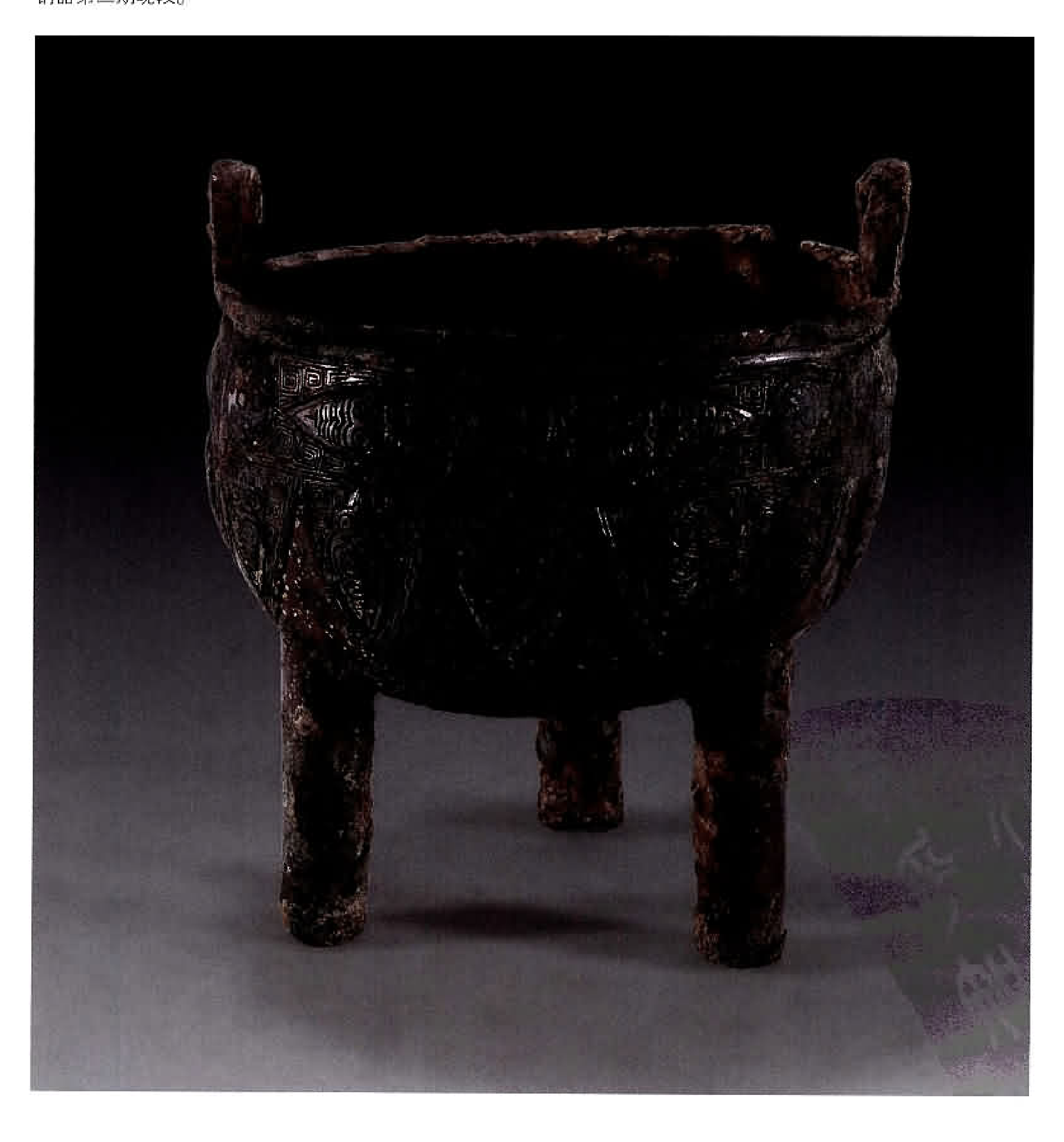


84. 圆鼎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4）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5号墓。直口微敛，小方唇，沿面直立双耳，深腹略鼓，圜底，3柱足较高。沿下饰6个涡纹和6只蝉纹，且两两相间；中腹饰12个三角形纹，三角形内填蝉纹，通高18厘米，重1.4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5. 分裆鼎

Fendang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8）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5号墓葬中。侈口，口沿上立拱形双耳，束颈，高领，鼓腹，分裆，3柱状足较矮。整器素面无纹。通高 16.5厘米，重0.7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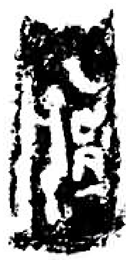


86. 甗

Yan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3）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5号墓葬中。上如甑，下如鬲。直口，器腹内壁口沿下出一周榫台以承盖，深直腹，3肥硕袋足，3柱足较高。上腹饰三周凸弦纹，袋足上饰双线“人”字凸弦纹。在3袋足中间均可见清晰的铸范线。通高62.4厘米，重16.7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7．爵

Ju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6）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5号墓葬中。整器厚重。窄流细长，三角尾上翘，蘑菇钮双柱靠近流折处，卵形腹，圜底，三个刀形锥状足稍外撇，与一足对应的腹部置一半圆形鋬。腹部饰三周凸弦纹。鋬下有铭文“庶”字。通高22.2厘米，重1.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8. 箕形器

Dust Pan-shaped Bronz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2）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5号墓葬中。器体呈长方箕形，后端接柄，柄部断面呈半圆形，平面朝上，内可装木柄。整器素面。柄部平面有两个“㶣”字铭文。通长23厘米，重2.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89. 觚

Gu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B7＃M1:9）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侈口，器体细高，喇叭形高圈足。腹饰两组兽面纹，圈足饰四组变形夔纹。通高29厘米，重1.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90.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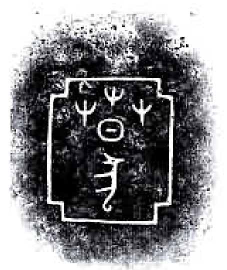
Ju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B7＃M1:8）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蘑菇钮双柱立于流折处，卵形腹，圜底，3个刀形锥状足略外撇，与一足对应的腹部置一半圆形鋬。腹部饰两组兽面纹。鋬下有一字铭文。通高20.5厘米，重0.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91. 提梁罐

Jar with Arc-shaped Movable Hanger (collected at Xiaozhuang)
（小庄采集）

20世纪80年代采集于安阳殷墟小庄村。侈口，方唇，束颈，圆鼓腹，矮圈足。肩部设对称环耳，内套置绹索状提梁。唯肩腹部饰两周凹弦纹，余均素面无纹。器内底部有铭文“亚獏”二字。通高19厘米，重4.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期。

92. 壶

Pot

（04ASPT1M9:6）

200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四盘磨村北9号墓葬中。整器略呈扁圆体。直口微外侈，长颈，深腹下垂，高圈足，颈腹间置对称贯耳。上腹和圈足皆饰两组一首双身对夔兽面纹，其余器腹光素无纹。口沿内腹壁有铭文“戈”字。通高33.5厘米，重5.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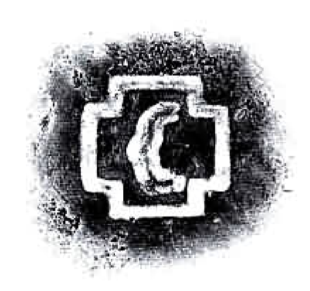




93．94ALNM793铜器组合

Set of Bronze Vessels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M793为一座土坑竖穴墓，墓室面积约8.4平方米，共出土青铜容礼器11件。从整体器群特征来看，应属殷墟铜器第二期偏晚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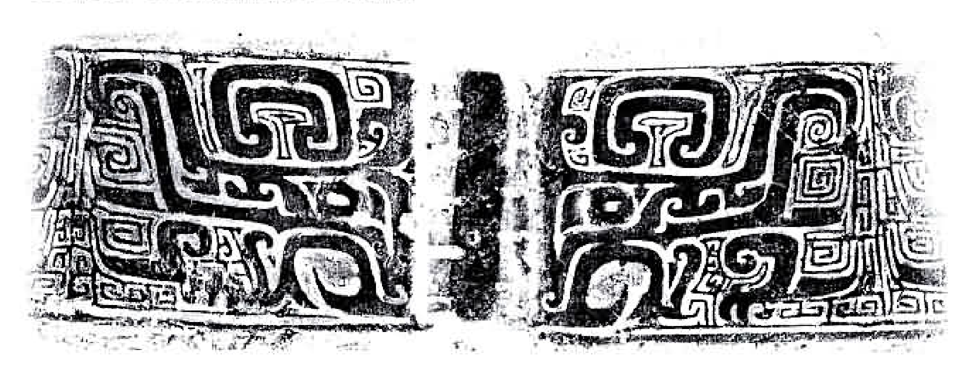


94. 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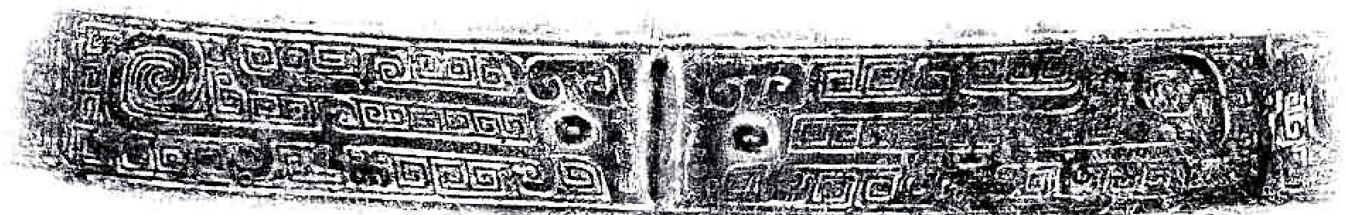
Round 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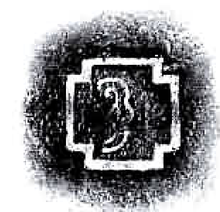
（94ALNM793:41）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直口，方唇，双耳稍外撇，深直腹，圜底，3柱状足较矮。上腹部饰6组兽面纹。器内底部有铭文“亚弜”二字。通耳高30.8厘米，重6.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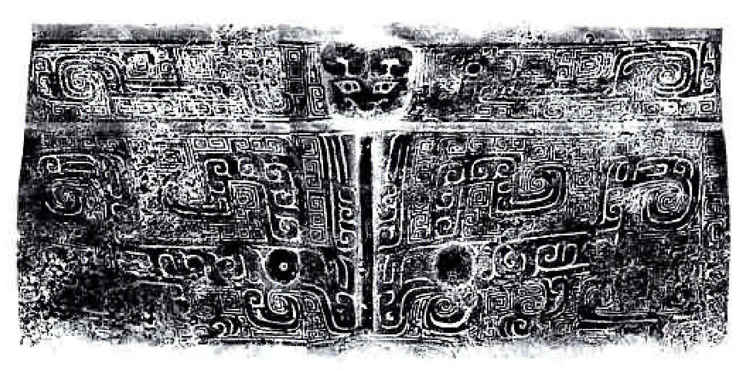
95. 圆鼎

Round Ding

（94ALNM793:47）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直口微敛，方唇，沿面立拱形对称双耳，深腹略鼓，圜底，3柱足较高。上腹饰3组对夔兽面纹。内腹壁有铭文“亚㚤”二字。通高20.5厘米，重2.1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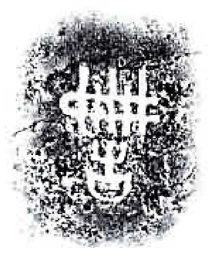




96.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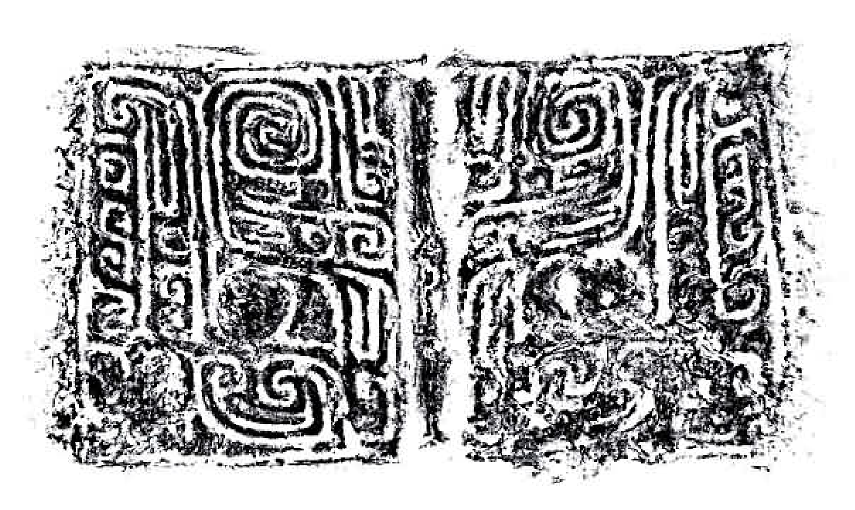
Gui

（94ALNM793:42）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侈口，束颈，鼓腹，矮圈足。颈置3个小兽头，两侧相向布列着6条夔龙纹，腹部饰3组大兽面纹，圈足上等距分布着3个“十”字镂孔，间以对称夔纹。圈足内底有“册告”二字铭文。口径18.5厘米，通高 12.5厘米，重1.8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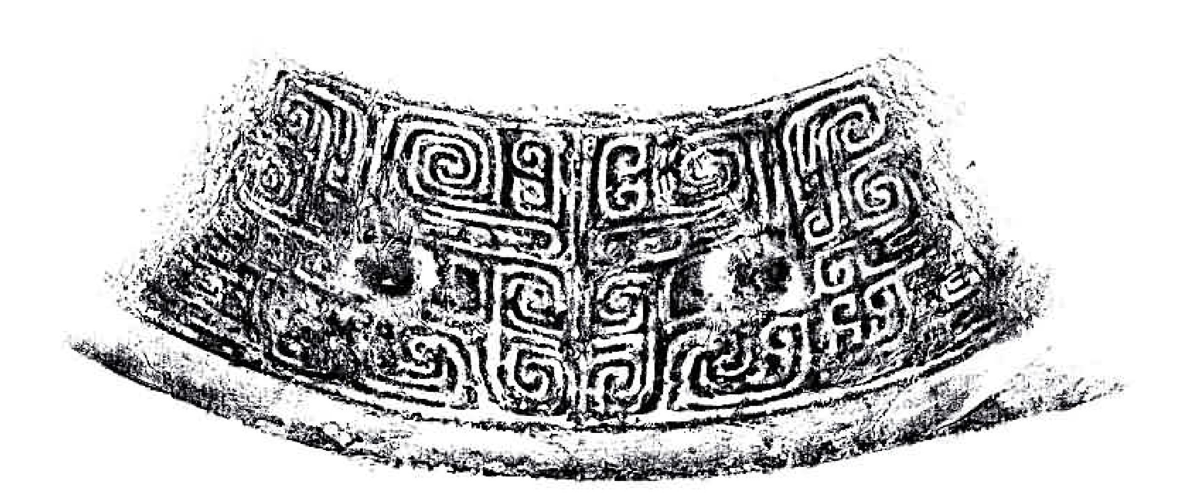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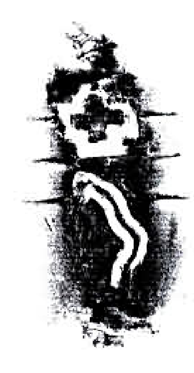
97. 觚

Gu

（94ALNM793:46）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79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和装饰花纹皆相同。此为其中之一。侈口，器体细高，喇叭形高圈足。下腹饰两组兽面纹，圈足上部饰两周凸弦纹和两个“十”字镂孔，下部饰四个变形夔纹。通高29厘米，重1.0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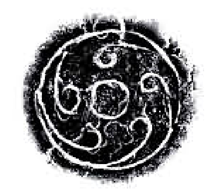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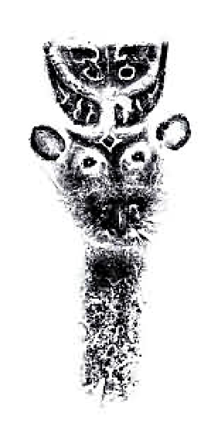
98. 爵

Jue

（94ALNM793:55）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铜爵，形制、装饰风格和铭文皆相同。此为其中之一。窄流、三角尾，均向上翘，蘑菇钮柱靠近流折处，卵形腹，圜底下垂，3锥状足外撇，与一足对应的腹部置一半圆形鋬。腹部饰三周凸弦纹。鋬内有铭文“亚弜”二字。通高18.7厘米，重0.5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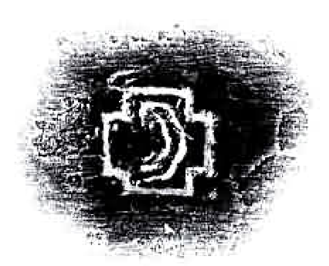
99. 圆罍

Round Lei

（94ALNM793:3）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侈口，方唇，束颈，广肩，斜直腹，平底内凹较甚，犹如小圈足。肩部置对称兽首鋬，下腹置小牛首鋬。颈饰两周弦纹，肩部饰6个凸起圆饼饰。通高40.2厘米，重9.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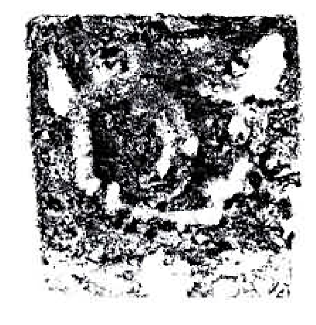


100. 方彝

Square Yi

（94ALNM793:44）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整器由盖和器体两部分组成。器盖为子口，呈四面坡形，犹如四阿式屋顶，棱脊均饰扉棱，顶有塔形柱钮。器体为母口，腹壁较直，上口略大于底部，矮圈足，圈足四边均设圆角方形缺口。盖面四坡皆饰倒向独立兽面纹，器体亦饰兽面纹，由于锈蚀严重，细部花纹漫漶不清。盖内壁有铭文"亚弜"二字。器口长12.5厘米，宽9.8厘米，通盖高21厘米，重2.1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101.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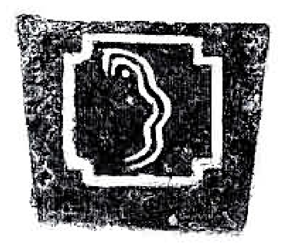
Spoon

（94ALNM79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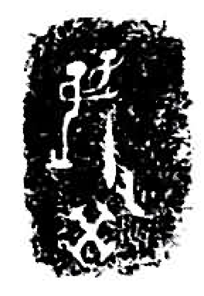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斗体呈圆形，直口，斜收腹，圜底。中腹部置中空的柄，可以承装木柄。此类铜斗在殷墟少见。柄部有铭文“亚弜”二字。斗体直径7厘米，柄长5.5厘米，重0.2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102. 箕形器

Dust Pan-shaped Bronze
（94ALNM793:1）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793号墓。前端器体呈长方箕形，后端有柄，中空，上平下弧，可承纳木柄，上有方孔以穿辖。柄部末端平面有铭文“亚弜”二字。前端器体长21厘米，宽19.3厘米，深5.5厘米，重2.8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



103．分裆鼎

Fendang Ding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1）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赛格金地基建工地13号墓葬中。直口微敛，方唇，平沿，沿面立对称拱形双耳，分裆，3柱足较高。腹部以袋足为单位饰3组独立兽面纹，其两侧以两倒夔填空。器腹内壁有"保父癸"三字铭文。通高21.1厘米，重2.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04. 爵

Jue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4）

2006年出土于安阳赛格金地基建工地13号墓葬中。窄流宽尾，蘑菇钮双柱较高，并靠近流折处，卵形腹，圜底，3锥形足略外撇，上腹与一足对应处置半圆形鋬。腹部饰两组兽面纹。鋬下有铭文“保父”二字。通高21.4厘米，重0.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05. 卣

You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6）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赛格金地基建工地13号墓葬中。整器呈扁罐形，两侧有明显的棱脊。有蘑菇钮母口器盖，器口直稍内敛，圆鼓腹，圈足较高且外撇。肩部置对称半环形双耳，内套绹索状提梁。器盖面和上腹部均饰菱形云雷纹带，上、下界以联珠纹，腹部纹饰带中部置对称小兽头。通高27.8厘米，重3.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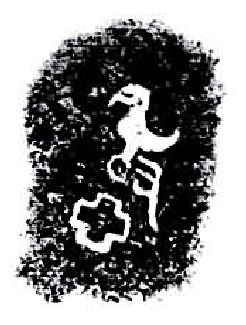
106. 分裆斝

Fendang Jia, or Jia Vessel with Pouch-shaped Extensions at Bottom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7）

200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赛格金地基建工地13号墓葬中。侈口，方唇，沿面立对称蘑菇钮双柱，高颈，鼓腹，分裆，3柱足，与一足对应的腹部置一牛首鋬，除3袋足上饰双线“人”字凸弦纹外，余均素面无纹。鋬下有“保父癸”三字铭文，其中“癸”字只有上半部分，可能是鋬内空间不足的缘故。通高2.7厘米，重15.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07. 簋

Gui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13）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侈口，小方唇，束颈，鼓腹，高圈足，中腹置对称牛首鋬。口沿下饰一周三角形纹，三角形内填简化对夔纹；颈部置对称浮雕小兽首，其两侧分别饰两夔纹，皆相向布列；腹部饰两组大兽面纹；圈足所饰纹样与颈部相同，唯由扉棱取代小兽头。器内底有铭文"获亚"二字。口径19.5厘米，通高15.2厘米，重2.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08. 觚

Gu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1）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同墓出土两件铜觚，但形制和花纹却不相同。这件细高，而另一件（文源绿岛M1:9）却相对粗矮。侈口，器体细高，下腹饰两组兽面纹，圈足饰两组对夔兽面纹。通高26.5厘米，重1.0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09. 爵

Jue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3）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1号墓葬中。蘑菇钮双柱立于沿上，远离流折处，卵形腹，圜底，3个刀形锥状足稍外撇，与一足相对的腹部置一半圆形鋬。腹部饰三周凸弦纹。通高17.8厘米，重0.4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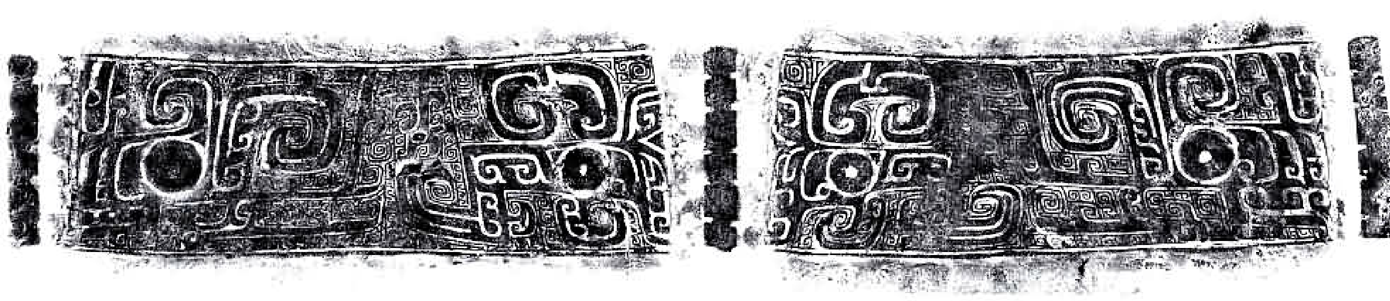
110. 圆鼎

Round Ding

（90郭M160:62）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大口，方唇，沿面略内斜，粗绹索纹耳稍外侈，深腹微鼓，圜底，马蹄形足半空。口下饰6组兽面纹，间以倒夔纹补空。鼎足上部亦饰独立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纹。鼎口内壁有铭文“亚址”。腹、足上均有大量烟炱痕迹。通高55厘米，重26.1千克。此鼎与1959年后冈圆形祭祀坑所出的戍嗣子鼎形制和花纹基本相似。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11. 圆鼎

Round Ding (detail)

（90郭M160:62）局部







112. 方鼎

Square Ding

（90郭M160:134）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折沿，沿面内斜，直腹内收，底近平。器体四角各有一扉棱，腹部四边所饰花纹基本相同。上腹部小扉棱两侧各饰两只小鸟纹，中腹饰勾连雷纹，两侧和下腹部分别饰3排乳钉纹。长边腹部饰乳钉纹87枚，短边腹部饰乳钉纹73枚。内底中部有铭文“亚址”。通高21.6厘米，重3.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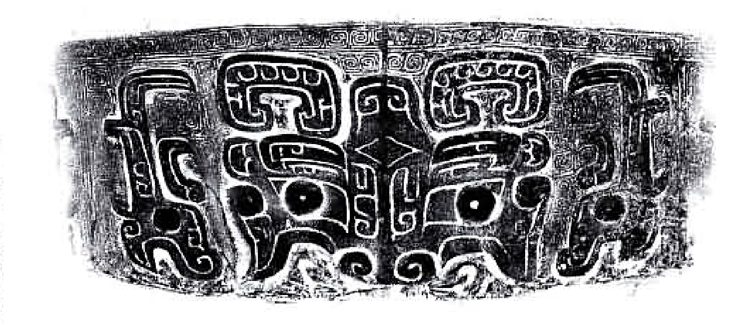


113. 分裆鼎

Fendang Ding

（90郭M160:135）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大致相同，应是一对。这件为其中之一。直口，耳稍外侈，浅腹微鼓，分裆，柱足。腹部以云雷纹为地，其上有3组有首无身的独立兽面纹，兽面纹两侧分别以倒夔纹填空，相互对称。鼎口内壁有铭文"亚枼止"。出土时鼎内有9根猪肋骨。通高21厘米，重2.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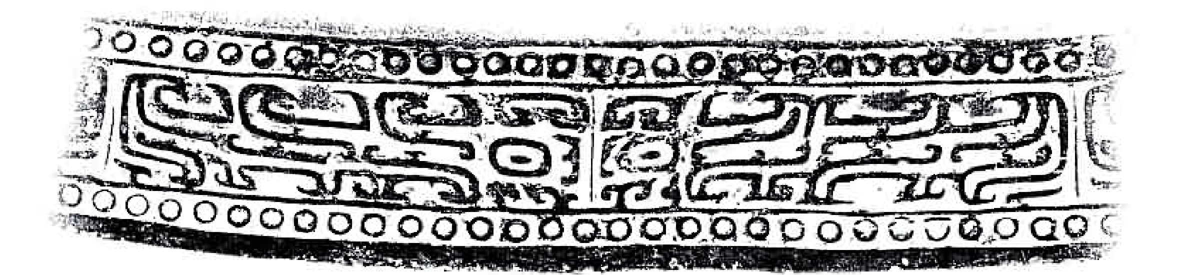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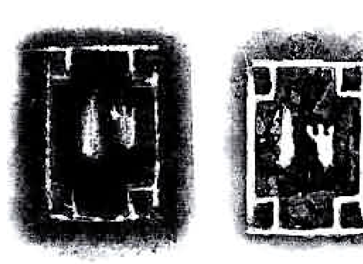
114. 分裆鼎

Fendang Ding (reverse,detail)

（90郭M160:135）反面局部







115. 提梁盖鼎

Lidded Ding with Arc-shaped Hanger
（90郭M16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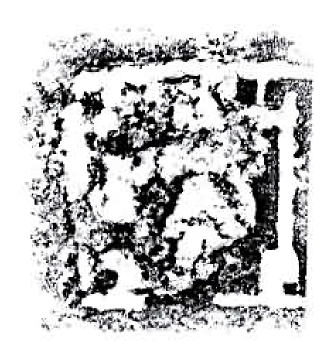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盖如覆钵形，上有两个对称把手，当盖反置时极平稳，可盛物品。盖表下部有4组兽面纹，其上、下各界一周圆圈纹。鼎口呈椭圆形，上腹部有圆环，内套绹索状提梁，下腹外鼓，底近平，短柱足。鼎腹上部饰一周兽面纹，其上、下亦各界一周圆圈纹。器盖内和器内底中部有铭文"亚址"。出土时盖与器口锈蚀在一起，密封较好，打开盖后，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鼎内盛有尚未完全腐烂的猪肉、肉皮和肋骨。通高33厘米，重8.2千克。此鼎造型奇特，为殷墟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时代为殷墟铜器第三期。

116. 去盖后的提梁盖鼎

Lidded Ding with Arc-shaped Hanger (cover removed)
（90郭M160:32）







117. 簋

Gui

（90郭M160:33）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侈口，直腹，底近平，圈足较高。口下及圈足上各有4个四肢目纹组成的带状纹饰，以云雷纹衬地，纹饰较模糊。内底中部有铭文“亚㝨址”。口径16.8厘米，通高12厘米，重1.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18. 甗

Yan

（90郭M160:51）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上如甑，下如鬲。侈口，方唇，索状耳，深腹，束腰，分裆，足呈柱状。腰内有3箅齿，箅遗失。上腹饰3条凸弦纹，下腹有3组简化兽面纹。出土时甗腹内装满炭化树叶，经鉴定为板栗叶子。通高50.4厘米，重1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19. 觚、角组合

Set of Gu and Jiao (Liquor Cup) Vessels

（90郭M160出土觚、角）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共出10套觚和角。10件觚均为方觚，为殷墟历年来首次发现；铜角虽然以前曾出土过，但与方觚的配套使用亦不多见。由于另一套觚、角在北京展出，故这里仅有9套。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20. 单套觚、角组合

Paired Gu and Jiao Vessels

[90郭M160:170角（左）、124觚（右）]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共出土10套觚、角。此为其中的一套。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21. 方觚

Square Gu

（90郭M160:116）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出土10件形制、花纹、大小和铭文均相同的方觚。此为其中之一。侈口，颈、腹较细长，平底，高足，足下部外撇较甚，下接方座。器体四角和四边中部各有扉棱一条。口下饰蕉叶纹，器体分布着四周分解兽面纹，云雷纹为地。整器呈深蓝色。足内壁有铭文“亚址”。通高30.2厘米，重1.9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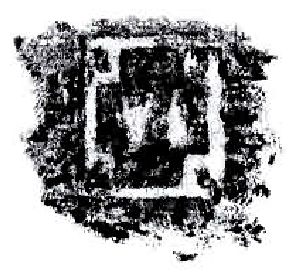
122. 角

Jiao

（90郭M160:143）正面（左）和反面（右）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共出10件，形制、大小、花纹和铭文均相同，应为同时一批铸造的成套酒礼器的一部分。口有两翼，作凹弧形，两翼尾呈锐角。深腹，卵形底；三棱形锥状足，足尖外撇，在上腹与一足相对处置兽首鋬。双翼下各饰一大三角纹，其间饰二、三个小三角纹，大三角内填变形倒夔纹。腹部饰两组兽面纹，其间补以变形倒夔纹，以云雷纹为地纹。鋬内腹壁有铭文“亚址”。通高21.6厘米，重0.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23. 方觚

Square Gu

（90郭M160:170）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共出土10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的方觚，此为其中之一。通高29.7厘米，重1.9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24. 角

Jiao

（90郭M160:124）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出土10件，形制、大小、花纹和铭文都相同。此件为其中之一。通高20.8厘米，重0.8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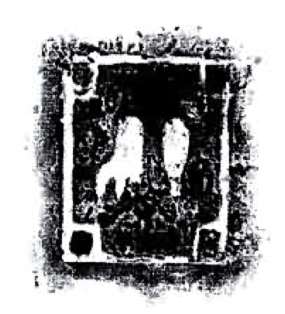
125. 方尊

Square Zun

（90郭M160:152）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皆相同，应为一对。这件方尊是其中之一。整器呈方体。方口外侈，束颈，斜肩，平底，高圈足外撇。尊体之四角和四边中部均有凸起的扉棱。口下饰对夔蕉叶纹。腹及圈足四面为分解式大兽面纹。中间填以夔纹补空。肩部四角与四边中部各有4个圆钉头，四角的钉头上套有4只象首，四边中部则套似鹿状的兽头。这8个兽首均为单独铸造套装上去，可自由取下。方尊内底中部有铭文“亚址”。通高43.9厘米，重21.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26. 方尊

Square Zun (detail)
（90郭M160:152）局部



127. 方尊
Square Zun
（90郭M160:128）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形制、花纹和铭文均与M160:152相同。通高44.3厘米，重 21.5千克。M160出土的这对方尊，与传世的“亚魏”方尊和“亚醜者姛”方尊的形制、花纹和大小都基本相似，特别是与后者，甚至连重量都完全相同。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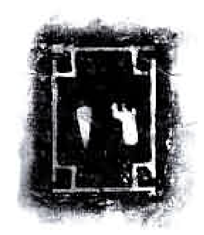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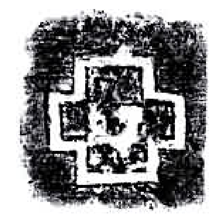


128. 凤鸟卣

You with Phoenix Designs

（90郭M160:172）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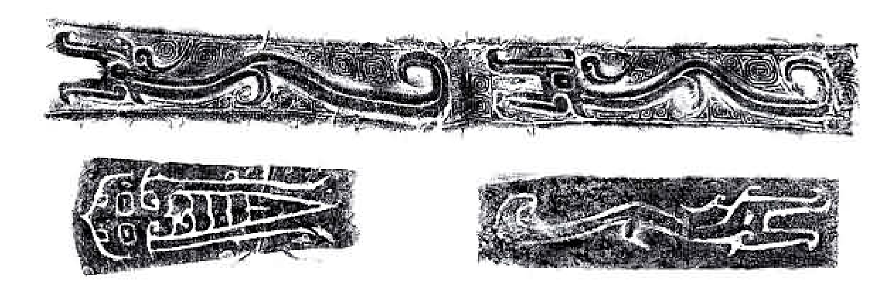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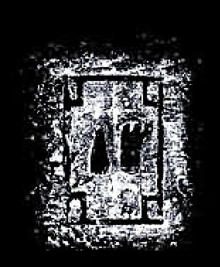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整个器体呈椭圆形，直口，束颈，下腹鼓，圜底，高圈足。腹上部两侧有圆环，环内套一兽头提梁，提梁的表、里两面均饰有4条夔纹。盖面和器体均由凸起的扉棱四等分。全器从盖至足共有鸟纹五周，鸟纹形态各异，有的长尾上卷，有的短尾下垂，腹下部的鸟纹羽毛用三组高低起伏的弧形线条勾勒出来，富有层次感。各周鸟纹均以云雷纹为地纹，以扉棱为中心，相互对称，盖钮之下及卣腹中部饰直棱纹。器盖上部内壁及器内底有铭文“亚址”。通高35.8厘米，重1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29. 凤鸟卣
You with Phoenix Designs (side view)
（90郭M160:172）侧面







130. 方斝

Square Jia (side view)

（90郭M160:111）侧面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铭文相同，应是一对。口部近方形，外侈，沿上有两个方塔形立柱。腹直且深，平底微外弧，4足。足呈四棱锥尖形，足尖外撇。腹四角和三面中部均有扉棱，另一面有兽头鋬。整器满装花纹，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配以蕉叶纹、三角纹、鳞纹和蝉纹。全器以云雷纹为地纹，花纹精致繁缛。内底中部有铭文“亚址”，通高43.5厘米，重7.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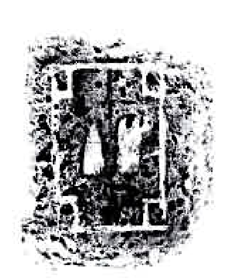


131. 方斝

Square Jia

（90郭M160:173）正面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这件方斝与M160:111的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应是一对。通高43.4厘米，重7.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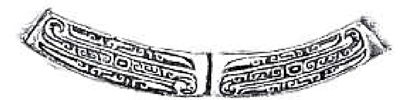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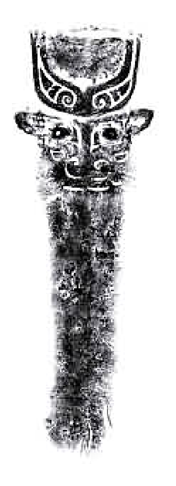
132. 方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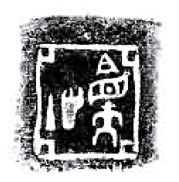
Square Jia (side view)
（90郭M160:173）侧面

整体呈方塔形。其下为方形柱体，上为方塔形柱帽。花纹共分三部分：最上的塔顶四面各饰一倒立的独立兽面纹，其下饰8个三角蕉叶纹，最下部每边饰一对倒夔纹，以云雷纹为地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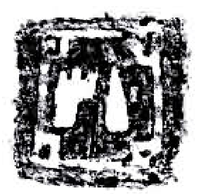


133. 分裆斝

Fendang Jia

（90郭M160:174）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侈口，长颈，鼓腹，分裆，柱足。颈、腹一侧有鋬，鋬上端饰牛头，从角的特征看，似水牛。颈饰二周凸弦纹，袋足上饰两个由凸弦纹围成的三角纹。上腹与分裆对应处，有短脊梁，其两侧各有一目雷纹，近似一首二身的夔形，以短脊为中心，两相对称。无地纹。器表从上腹至足有3条铸缝，足内侧亦有3条铸缝。口沿内与鋬相对的位置有铭文“亚𡩜址”。通高27.5厘米，重5.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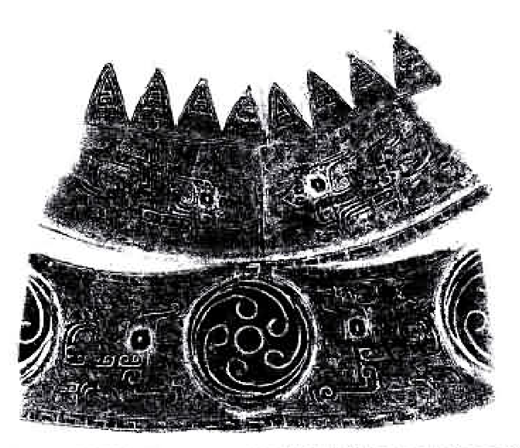
134．觚形尊

Gu-shaped Zun

（90郭M160:118）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喇叭形敞口，深腹下鼓，圜底，圈足较矮且外撇。腹中部饰凸弦纹二周，圈足中部饰凸弦纹一周。圈足内壁有铭文"亚址"。出土时腹中有小竹篓1只。通高25厘米，重2.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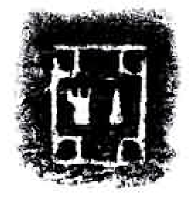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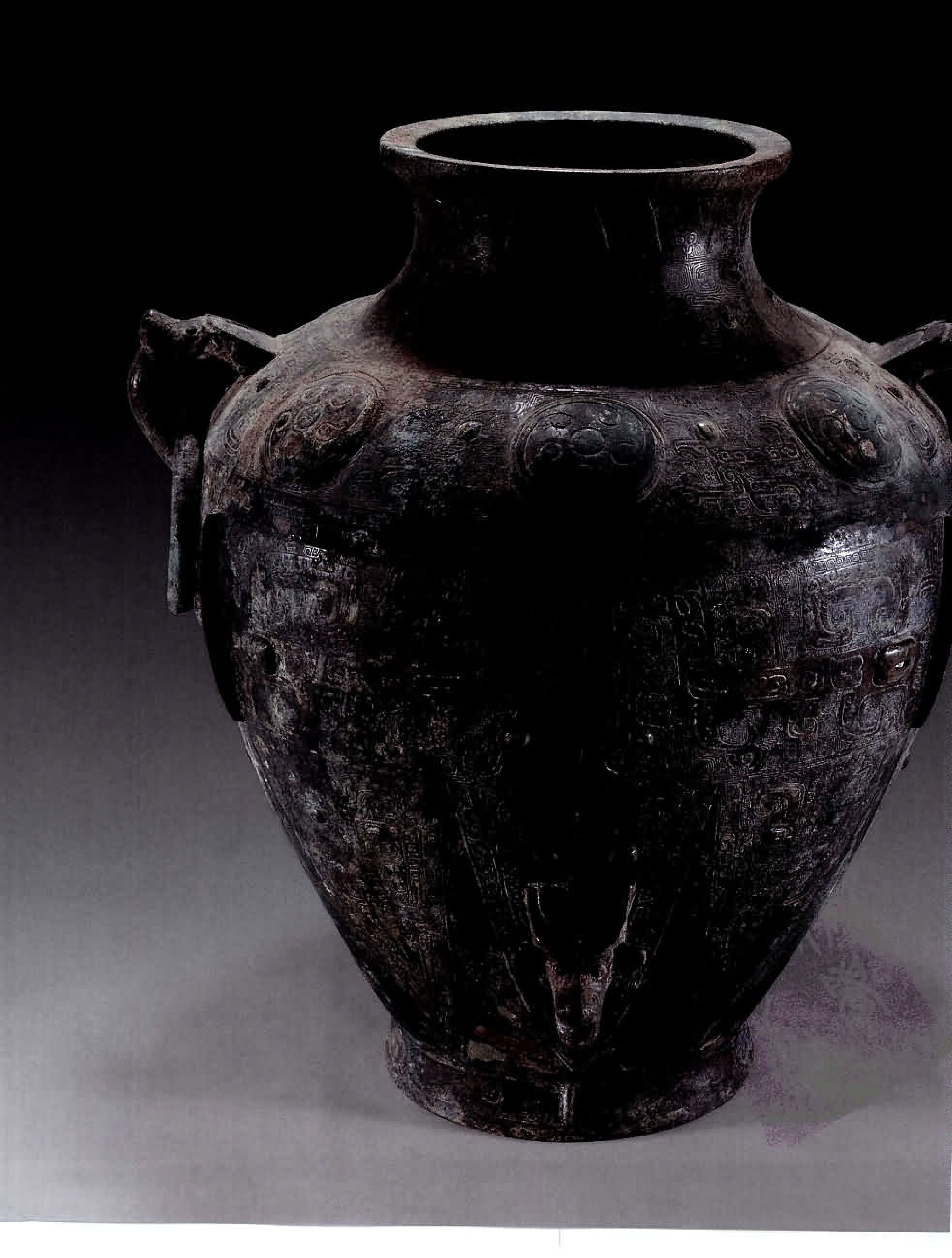
135. 圆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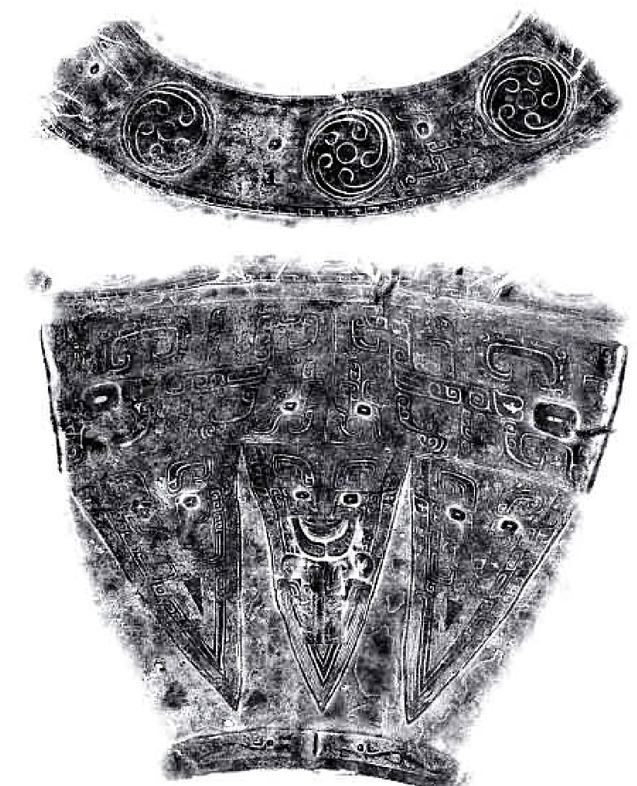
Round Lei

（90郭M160:140）正面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口微侈，方唇，沿面略内斜，颈较短，圆肩，深腹，底内凹，矮圈足。肩部设对称兽首衔环。下腹置一牛头形鼻钮。口沿下饰一周三角蝉纹带，由20个蝉纹组成，其下有6夔纹。肩部饰6个圆涡纹和夔纹。腹上部有3组由夔纹构成的大兽面纹。腹下部饰9个大蕉叶纹，蕉叶由竖立的对夔纹和三角纹组成。圈足上有一周夔纹。口沿内壁有铭文“亚址”。通高44.8厘米，重14.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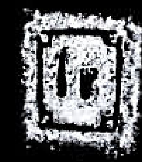


136. 圆罍

Round Lei (reverse)
（90郭M160:140）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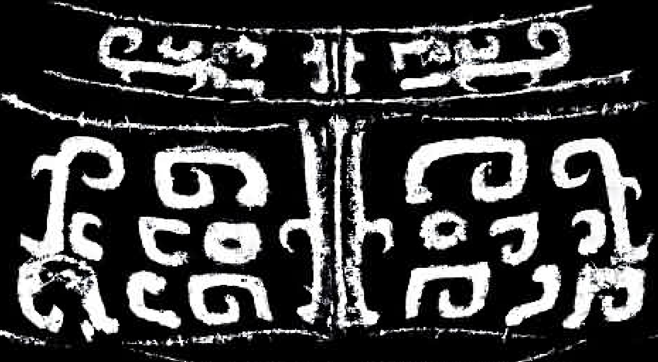
137. 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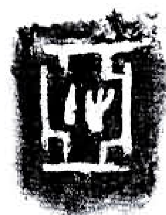
Dan

（90郭M160:126）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葬中。有盖，盖面呈弧形，顶有菌状柱钮。器体平面呈椭圆形，口外侈，颈较长，鼓腹，圜底，高圈足。盖面和腹部均饰两组兽面纹，颈、腹之间及圈足上部各有一夔纹带，无地纹。盖里内侧及腹内底中部均有铭文“亚址”。通高19厘米，重0.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38. 三足盉

He (Water-pouring Vessel) with Three Feet

（90郭M160:74）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有盖，侈口，深腹下鼓，圜底，三棱形锥状足，足尖外撇。腹上部一侧有管状流如茶壶状，与流相对的另一侧有鋬，鋬上端有兽头，似牛首形。盖顶有菌状钮。盖面与器体由一绹索状链条相连接。盖表及盉之上腹各饰三道凸弦纹。鋬内有铭文“亚址”。通高30.7厘米，重3.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39. 方卢形器

Square Vessel
（90郭M160:50）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口呈长方形。侈口，方唇，窄折沿，浅腹斜直，平底，高足呈几形。短腹两侧腹部正中各置一对半环形兽首鋬，内套绹索状提梁。腹中部饰凸弦纹二周，足上方饰凸弦纹一周。口长37.2厘米、宽31.5厘米，通高20厘米，重10.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40. 盘

Dish

（90郭M160:97）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大口，方唇，沿面略内斜，浅腹，圜底，高圈足。腹部正中等距离分布着3个凸起的兽头，兽头之间有14个鳞纹，其上、下方各有一排几何纹带。圈足上有3条细脊棱，与腹部的兽头相对，脊棱两侧有一对相向夔纹。盘内底正中有铭文“亚址”。口径38.8厘米，通高15.87厘米，重25.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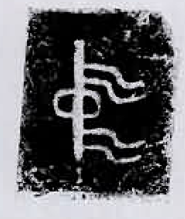
141. 铜铙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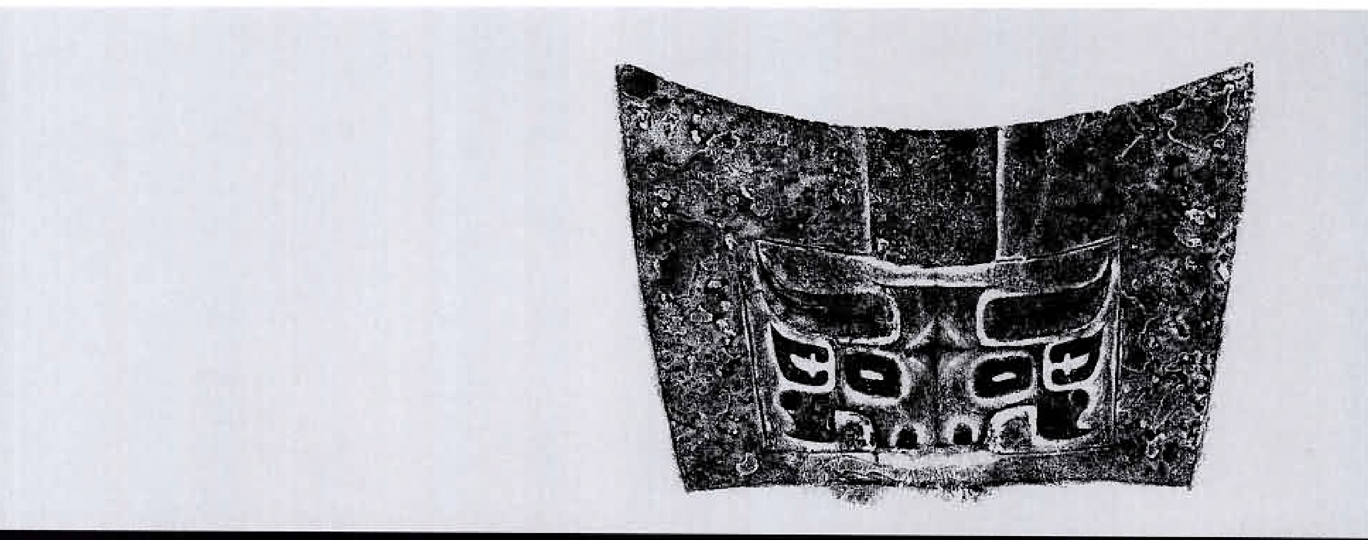
Set of Nao Bells

[90郭M160:41（左）、23（中）、22（右）]

1990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160号墓。一套三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大小依次相递减。器体呈扁筒形，口内呈凹弧形，平顶，顶较口稍窄。顶中部有管状甬，甬和钲相通。钲之两面饰粗线条兽面纹。从口至甬底有两铸缝，系由两块外范与一块内范合铸而成。鼓的内壁有铭文"亚㚖止"，甬之下部亦有一"中"字铭文。通高分别为24.6厘米，20.6厘米，17.2厘米；重分别为3.25千克，1.7千克，0.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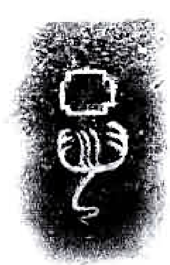


142. 94ALNM637铜器群

Set of Bronze Vessels

1994年安阳刘家庄北地出土。共出土青铜礼器7件，其中炊食器2件，酒器5件，是殷墟三期两套觚、爵规格贵族墓葬的典型铜礼器组合。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偏早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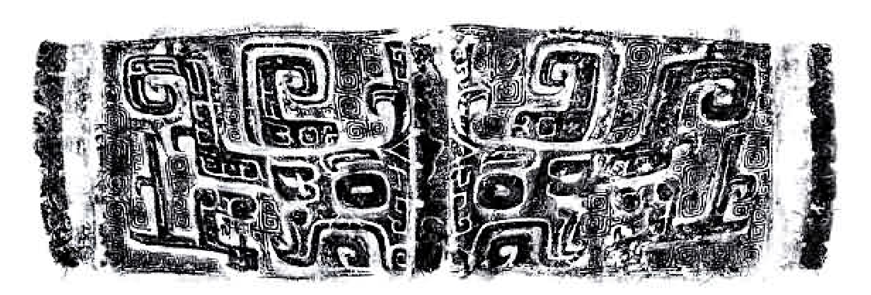


143. 圆鼎

Round Ding

(94ALNM637:1)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637号墓。直口微敛，方唇，平沿，沿面立对称双耳，深腹略鼓，圜底，3柱足较高。腹饰6条扉棱，饰3组大兽面纹，柱足上饰蕉叶纹。器内腹壁有铭文“亚若”二字。通高24厘米，重4.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44. 簋

Gui

（94ALNM637:4）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637号墓。侈口，小方唇，束颈，鼓腹，平底，高圈足。整器素面无纹。出土时器体粘有部分布纹。口径18厘米，通高11厘米，重1.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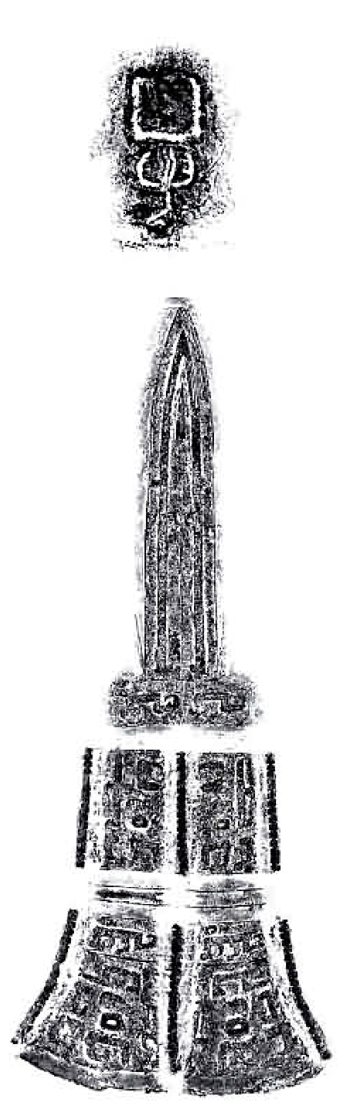


145. 觚

Gu

（94ALNM637:2）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637号墓。同墓出土两件铜觚，形制、花纹均相同。这件铜觚为其中之一。侈口，器体细高，直腹，高圈足，上腹饰四组蕉叶纹，其下饰一周夔纹，下腹饰两组对夔兽面纹；圈足上部饰对称夔纹，下部饰两组兽面纹。圈足内壁有铭文“亚若”二字。通高31厘米，重1.2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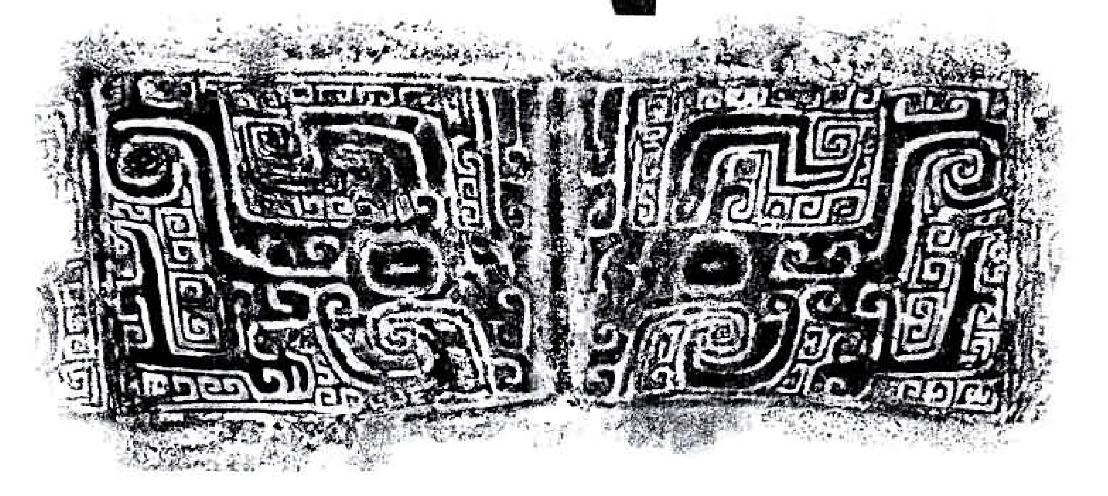


146. 爵

Jue

（94ALNM637:5）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637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这件为其中之一。窄流上翘，三角尾，菌状钮双柱较高，靠近流折处，卵形深腹，圜底，三棱锥状足稍外撇，半圆形鋬。腹饰两组兽面纹。鋬下腹壁有铭文“亚若”二字。通高17.7厘米，重0.5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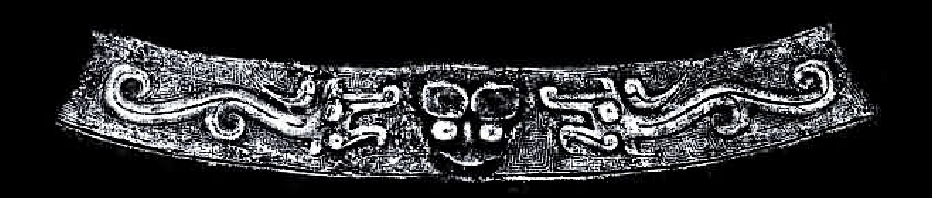
147.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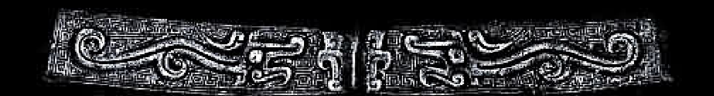
You

（94ALNM6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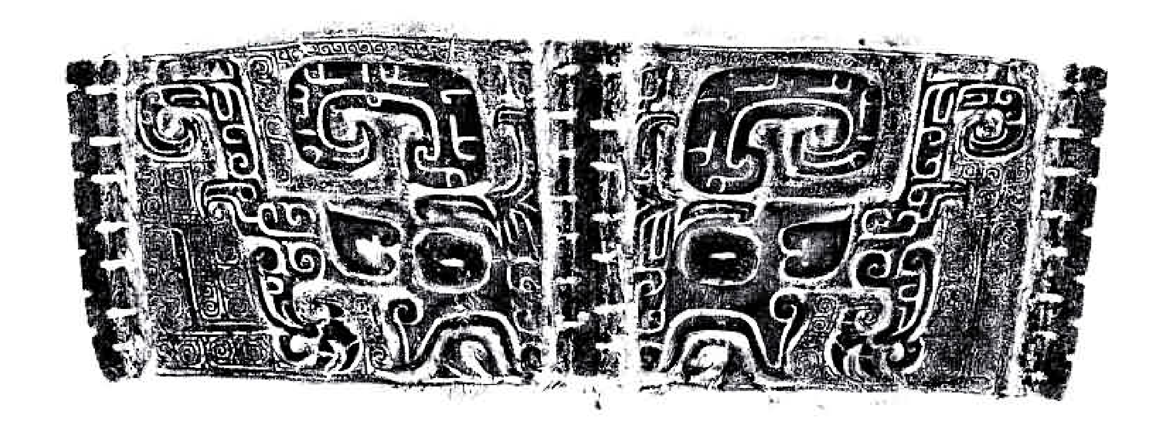
1994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637号墓。瓜棱钮器盖。直口微敛，高颈，圆鼓腹，高圈足。上腹部置对称半环形耳，内套绹索提梁。器盖上的瓜棱钮为预先单独铸好的铸件，然后再与器盖混铸在一起，在与器盖混铸时在器盖外面垫置一柿蒂形垫片。器盖表面饰两组对称夔纹，盖体饰16个三角形纹，上腹部和圈足亦饰对称夔纹，均无地纹。通高30厘米，重3.4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48. 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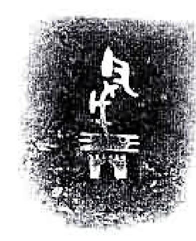
Round Ding

（86郭M1:3）

198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1号墓葬中。平折沿，方唇，直口微敛，沿面上置对称双立耳，深腹稍外鼓，3柱形足。腹部装饰花纹极为精致，由3组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大兽面纹组成主题花纹，主纹凸出在地纹之上，3组兽面纹由6条扉棱隔开，3条扉棱作为兽面纹之鼻，另3条扉棱作为3组兽面纹之界划。整体花纹布局合理，疏朗有致。通高22.6厘米，重2.8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49. 方鼎

Square Ding
（82APNM41:11）



1982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苗圃北地41号墓葬中。口呈长方形，方唇，平沿，沿面立拱形对称双耳，直壁，平底，4柱足较高。器体4角各有一条长扉棱，四边腹部所饰花纹基本相同。口沿下饰4只垂尾鸟，以小扉棱为界两两相向；中腹饰云雷纹，左、右和下腹皆饰凸起的乳钉纹。长边乳钉为81枚，短边乳钉为66枚。内腹壁有“父戊宁止”四字铭文。口长16.4厘米，宽13.5厘米，通高21.1厘米，重3.4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50. 方卢形器

Square Vessel

（02APNM2118:1）

2002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苗圃北地2118号墓葬中。M2118是带两条墓道的大墓，因早年多次被盗扰，墓室内随葬品所剩无几，这件铜方卢形器乃劫后所余唯一一件青铜礼器。整器呈长方形，方唇，折沿，沿面较平，直腹较浅，平底，高圈足。圈足四边各有一圆角长方形缺口。在短边腹上分别置一对环耳，内套绹索状提梁。整器素面无纹，庄重无华。口长35.5厘米、宽30.6厘米，通高15.2厘米，重8.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三期。

151．94ASM7出土铜器组合（13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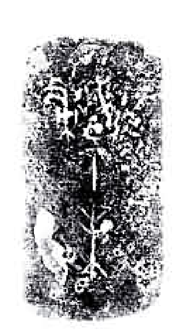
Set of Bronze Vessels

199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大司空东地7号墓。该墓为长方竖穴墓，墓室面积6.27平方米，共出土青铜礼器13件，其中炊食器4件，酒器9件。另外，此墓中还出土大量青铜兵器、陶器和小玉器。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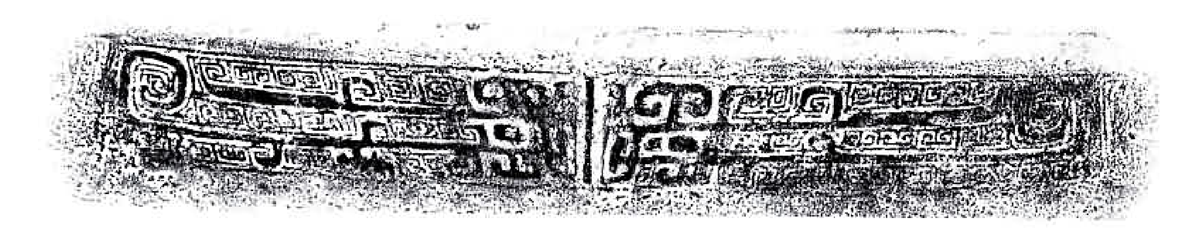




152. 圆鼎

Round Ding
（94ASM7:26）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地7号墓。侈口微敛，小方唇，沿面立对称双耳，耳稍外撇，深腹略外鼓，圜底近平，3柱足较高。腹饰3组一首双躯兽面纹。腹内壁有铭文“婦十，未”三字。通耳高19.2厘米，重1.1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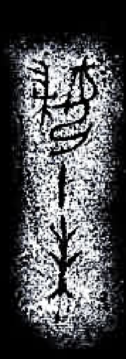
153. 觚

Gu

（94ASM7:32）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地7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和铭文皆相同的铜爵，此为其中之一。侈口，器体细高，下腹微鼓，喇叭形高圈足。腹部饰两组兽面纹，圈足饰四组变形夔纹。圈足内壁有“婦十，未”三字铭文。通高22.2厘米，重0.7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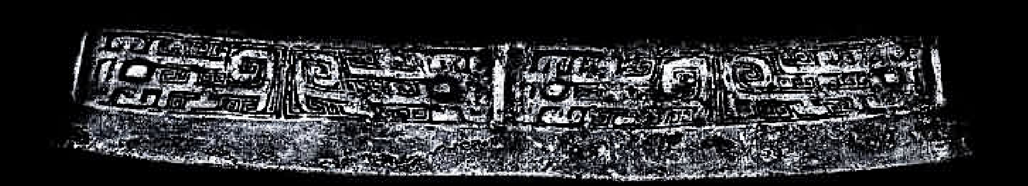
154. 簋

Gui

（94ASM7:34）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东地7号墓。侈口，方唇，束颈，鼓腹，高圈足，腹置对称半环形兽首鋬。上腹部置两只小兽头和八条夔纹，圈足饰3组对夔兽面纹。腹内底有“婦十，未”三字铭文。口径17厘米，通高11厘米，重1.2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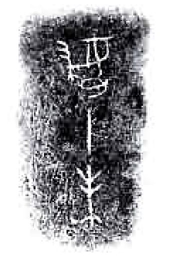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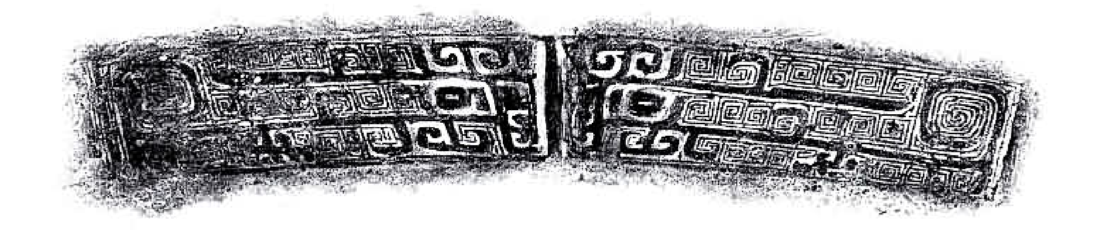
155.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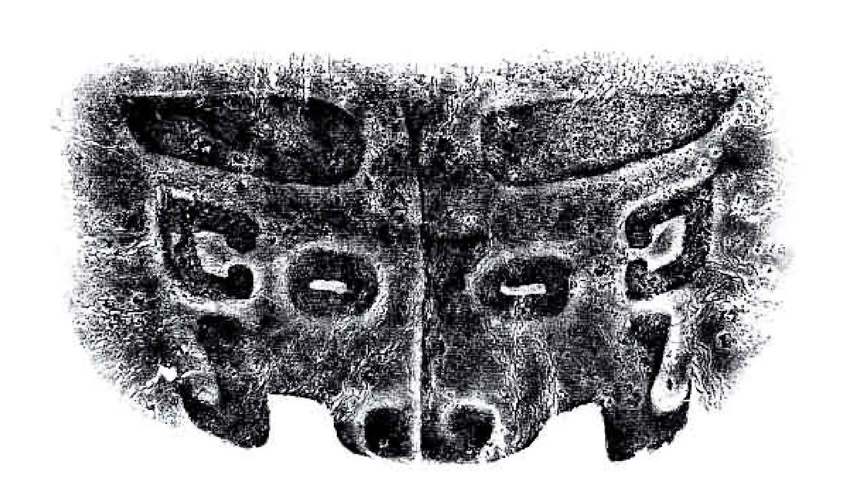
Yan

（94ASM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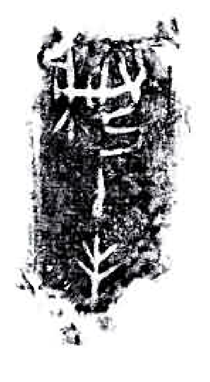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地7号墓。上如甑，下如鬲，中间加铜箅。侈口，小方唇，沿面立耳略外撇，腹深而斜直，分裆袋足，三柱足较高。铜箅近弧线三角形，箅面略下凹，中间置一桥形钮，钮四周有四个“十”字形镂孔。上腹部饰3组兽面纹，3个袋足均饰无地纹的兽面纹。腹内壁有“婦十，未”三字铭文。通高37.5厘米，重3.2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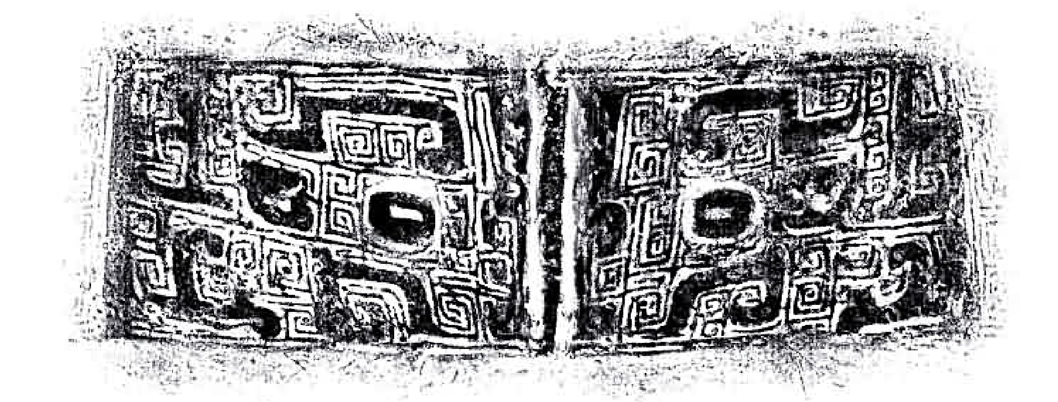


156. 爵

Jue

（94ASM7:30）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东地7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和铭文皆相同的铜爵。此为其中之一。窄流，三角尾，菌状双柱远离流折处，靠近桥形鋬，卵形腹略鼓，3锥状足外撇。与一足对应的腹部置牛首鋬。腹饰两组兽面纹。鋬下腹壁有"婦十，未"三字铭文。通高20厘米，重0.7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57. 觯
Dan
（94ASM7:24）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东地7号墓。口部略呈椭圆形，有子口器盖，盖面圆鼓，上饰两周凸弦纹，顶部有桥形钮。器体为母口，口外侈，束颈，深腹，最大腹径在下部，高圈足。腹部和圈足分别饰两周或一周凸弦纹。通高14厘米，重0.5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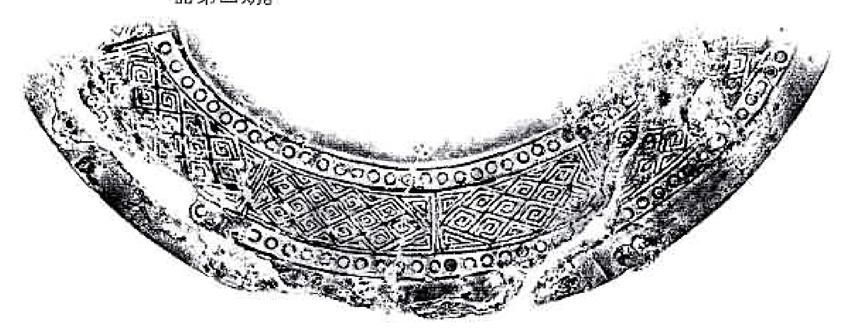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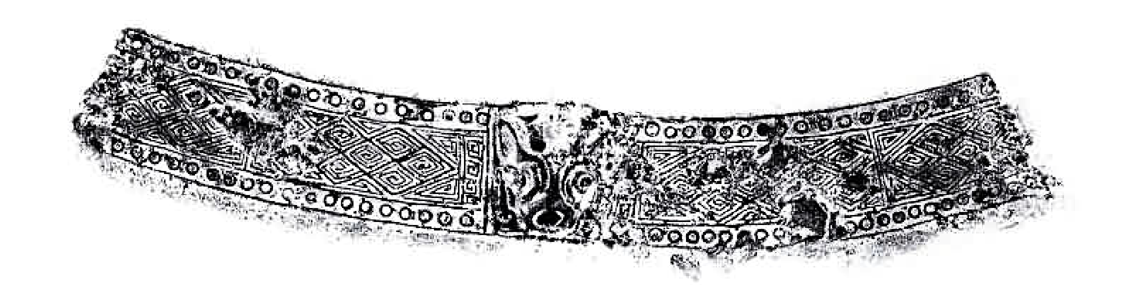
158. 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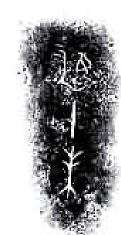
You

（94ASM7:25）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地7号墓。整器呈扁圆形。上戴捉手钮母口器盖，盖面饰菱形云雷纹，并界以联珠纹。器体直口稍内敛，鼓腹，最大腹径在中腹偏下处，喇叭形高圈足；上腹部置半环形耳，内套绹索状提梁。两耳之中部置两只小兽头，兽头两侧均饰菱形云雷纹，上、下界以联珠纹。通高29.5厘米，重2.9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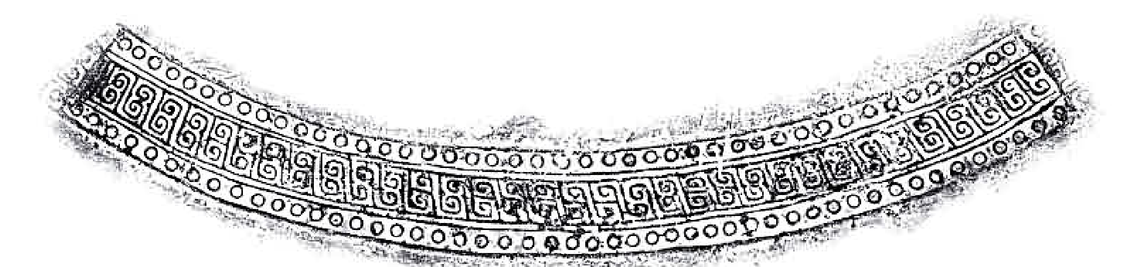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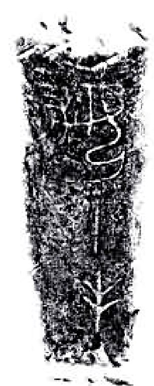
159. 瓿

Bu

（94ASM7:21）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地7号墓。口微敛，小方唇，窄平沿稍内斜，颈较高且直，圆鼓腹，圈足较矮。颈饰两周凸弦纹，肩部饰一周云雷纹饰带，上、下界以联珠纹，圈足有两个对称小方孔。瓿内底有"婦十，未"三字铭文。通高15.7厘米，重1.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60. 分裆斝

Fendang Jia

（94ASM7:33）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东地7号墓。侈口，小方唇，沿面立对称菌状钮双柱，柱较高且外撇；高颈，鼓腹，分裆，3柱足较高；颈、腹间置牛首鋬。颈饰两周凸弦纹，袋足上分别饰双线“人”字纹凸弦纹。鋬下腹壁有“妇十，未”铭文三字。通高28厘米，重2.5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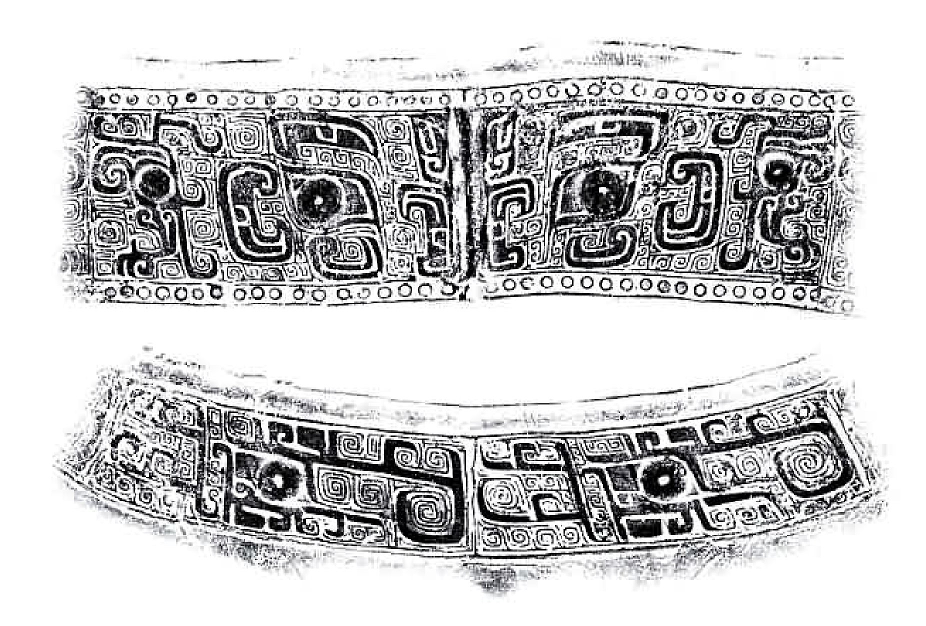


161. 觚形尊

Gu-shaped Zun

（94ASM7:28）

199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东地7号墓。侈口，小方唇，深腹，下腹微鼓，喇叭形高圈足。下腹部饰3组独立兽面纹，圆泡形兽目和长脊棱鼻梁突显于兽面纹之上，在兽面纹上、下界以联珠纹，再向外上、下各饰两周凸弦纹；圈足饰3组变形夔纹。器腹内壁有3行12字铭文："辛丑，亚易彭吕，用乍母丁彝。未。" 通高24.5厘米，重2.6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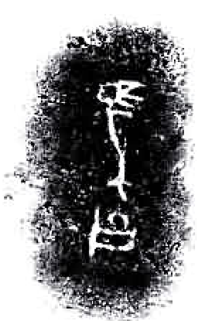
162. 04ASM303铜器群

Set of Bronze Vessels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该墓为长方竖穴墓，墓室面积9.14平方米。同墓出土42件青铜礼乐器，其中炊食器11件，酒器28件，乐器3件。该墓出土觚6、爵10，基本可算是10套觚爵规格的贵族墓。墓中所出铜器大多都有铭文“马危”二字。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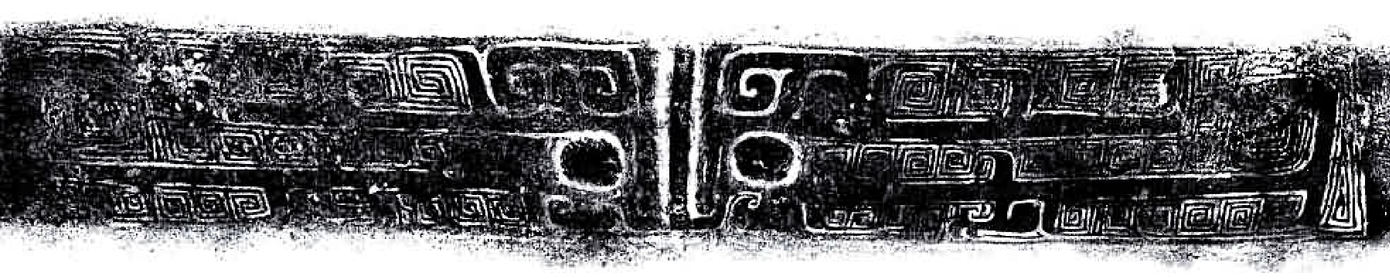


163. 圆鼎

Round Ding

（04ASM303:116）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南303号墓。双立耳，直口微敛，方唇，折沿，腹壁微鼓，圜底。3柱足较高。上腹部饰一周3组线条对夔兽面纹，尾部不但上卷而且下钩，云雷地纹。鼎内有许多兽骨，有的骨头受铜色沁润，为蓝色。腹内壁有铭文"马危"二字。通耳高34.4厘米，重6.75千克。时代为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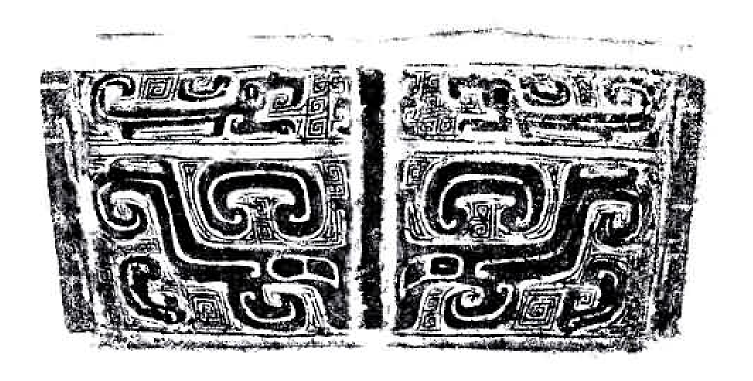


164. 方鼎组合

Set of Square Ding

[04ASM303:115（左）、114（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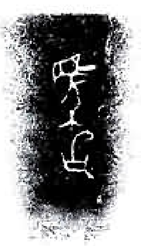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尺寸和铭文均相同，应为一对。长方形口，方唇，折沿，双耳立于短边中部口沿上，腹壁平直稍内收，腹体四角及四边中部有扉棱，平底微下垂。四柱足较高。腹体纹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对称钩喙夔纹，下部为一首双躯兽面纹。两鼎长边内腹壁均有铭文“马危”二字。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65. 方鼎

Square ding

（04ASM303: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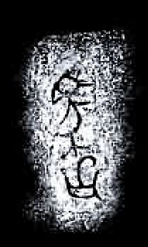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尺寸和铭文均相同，应为一对。口长16.5厘米，宽13.2厘米，通高21.7厘米，重2.6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66. 分裆鼎组合

Set of Fendang Ding

[04ASM303:82（左）、104（右）]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尺寸和铭文均相同，应为一对。口沿上立对称拱形双耳，稍外侈。直口微敛，方唇，折沿，腹微鼓，分裆较低。3柱足较高。口沿下饰一周云雷纹，腹部以分裆线为界各饰一组纹饰，居中为独立兽面纹，兽口正对鼎足，犹如衔咬鼎足之势，两侧各置对称倒夔纹，云雷纹为地纹。两鼎内腹壁均有铭文“马危”二字。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67. 扁足鼎组合

Set of Bianzu Ding (Ding Tripods with Flat Feet)
［04ASM303:112（左）、100（右）］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一对，大小、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双立耳外侈，敞圆口，方唇，平折沿，浅腹，圜底。三夔形扁足，夔首向上，夔尾平折着地。中腹饰一周纹饰带，分饰3组线条对夔兽面纹，云雷地纹。两鼎内腹壁均有铭文“马危”二字，阴线较粗深。时代为殷墟铜器第四期。



168. 扁足鼎

Bianzu Ding
（04ASM303:112）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一对，大小、形制、花纹和铭文均相同，此鼎为其中之一。通高23.6厘米，重1.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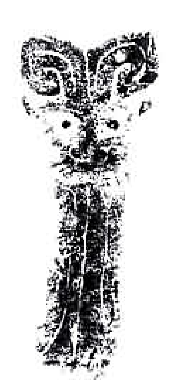
169. 双簋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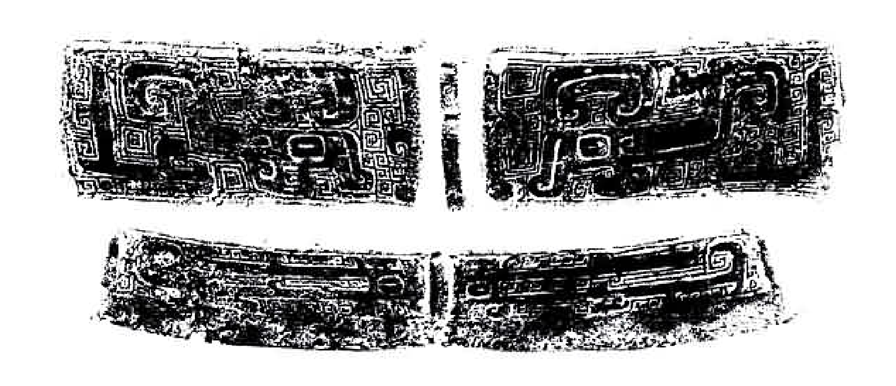
Paired Gui

［04ASM303:79（左）、81（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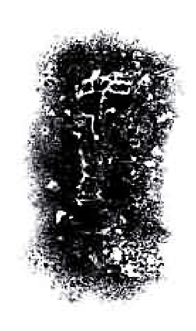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花纹、尺寸和铭文均相同，应为一对。方唇，侈口，束颈，鼓腹，半环形兽首双耳，高圈足。腹部满装花纹，以对称夔纹组成的兽面纹为主纹，云雷地纹；圈足饰对称共目双尾怪异兽面纹。出土时，口沿下有丝麻织品和草绳捆绑的腐朽痕迹，估计埋葬时器腹内应有食物，但已全部朽尽。两簋内腹底中部均有铭文“马危”二字。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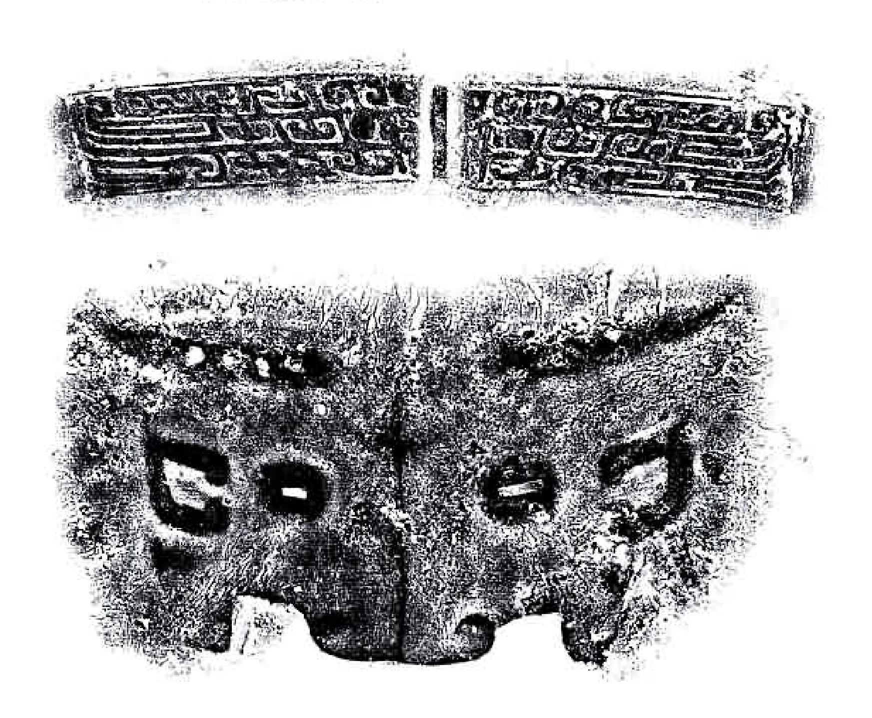


170. 甗

Yan

（04ASM303:57）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上如甑，下如鬲。方唇，侈口，绹索状双耳，腹壁斜直，下部内收。鬲裆较高，3柱状蹄足。甑部下底有铜箅子与鬲腔相隔，一端有穿与甑底所嵌铜环相扣，一端有半圆形环，可上、下活动箅子，箅上有 4个 "十" 字形镂空。器体大部分为素面，仅鬲部3袋足饰粗线条简化兽面纹，上腹部饰3组一首双躯兽面纹。上腹内壁有铭文 "马危" 二字。通耳高 37.2厘米，重4.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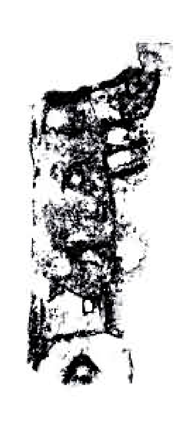


171. 觚

Gu

（04ASM303:110）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墓。同墓出土6件铜觚，形制、花纹都相同。其中有五件铜觚圈足内壁铸有二字铭文，阴、阳文均有。该件是其中之一。侈口，方唇，喇叭形口，腹较瘦，圈足较高。器体纹饰分上、中、下三区。上饰正向三角蕉叶纹，内填变形夔纹；其下为一周四组共目双尾怪异兽面纹；中腹饰对称倒夔解体兽面纹；圈足饰两周花纹，下为对称解体夔纹组成的兽面纹，上为一周四组共目双尾怪异兽面纹。圈足内壁有铭文"危马"（阳文）。通高27.1厘米，重1千克。时代为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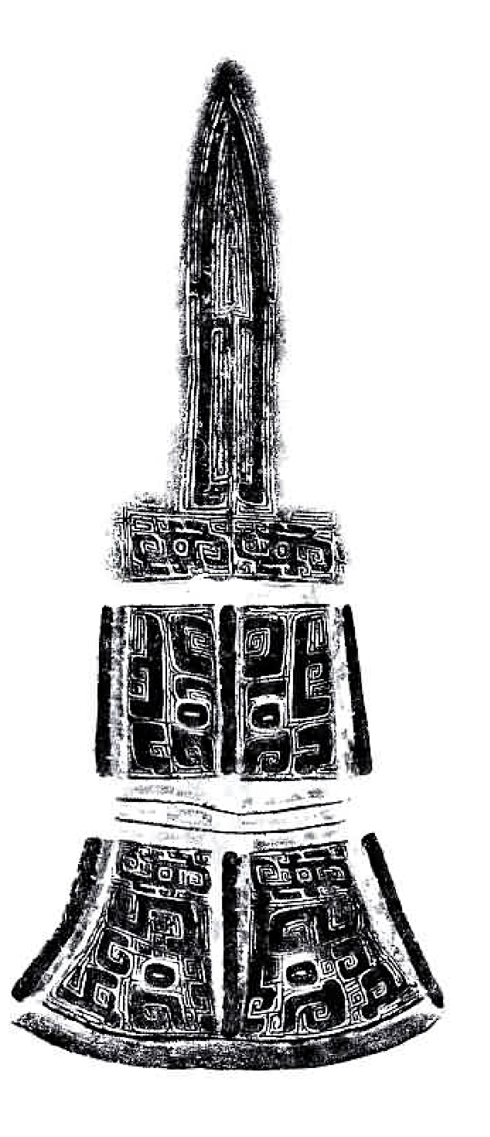
172.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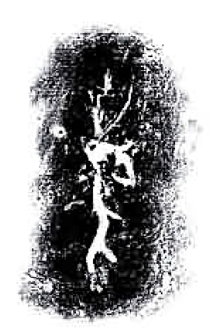
Jue

（04ASM303:93）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10件，形制、花纹基本相同。器体均较厚重，无烟炱痕迹，三足棱刃锋利，似为铸成后未经使用即埋入。其中多数在其鋬下铸有阳文或阴文的"马危"二字。这件为其中之一。流、尾上翘，卵形腹微鼓，三棱足外撇，蘑菇双柱较高，靠近流根部，半圆形鋬。腹饰对称解体倒夔兽面纹，鋬上饰小牛首。通高20.3厘米，重0.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73.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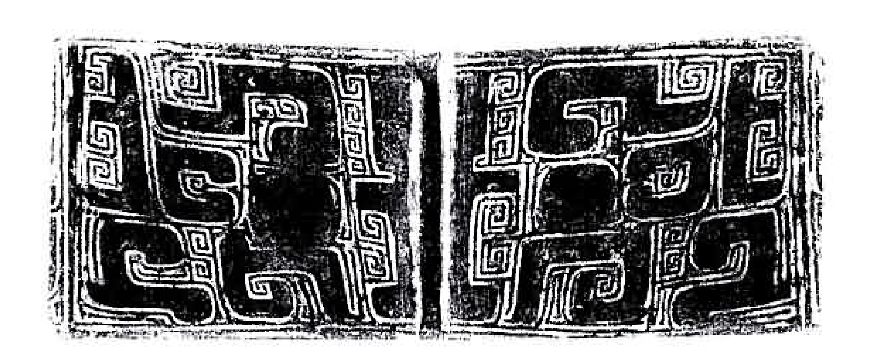
Gu

（04ASM303:105）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墓。同墓出土6件铜觚，形制、花纹都相同。圈足内壁有铭文“马危”二字。通高27.1厘米，重1.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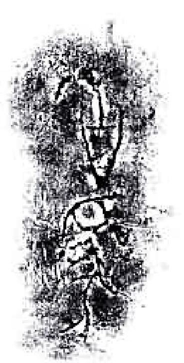


174. 爵

Jue

（04ASM303:90）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10件，形制、花纹基本相同。通高20.4厘米，重0.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75.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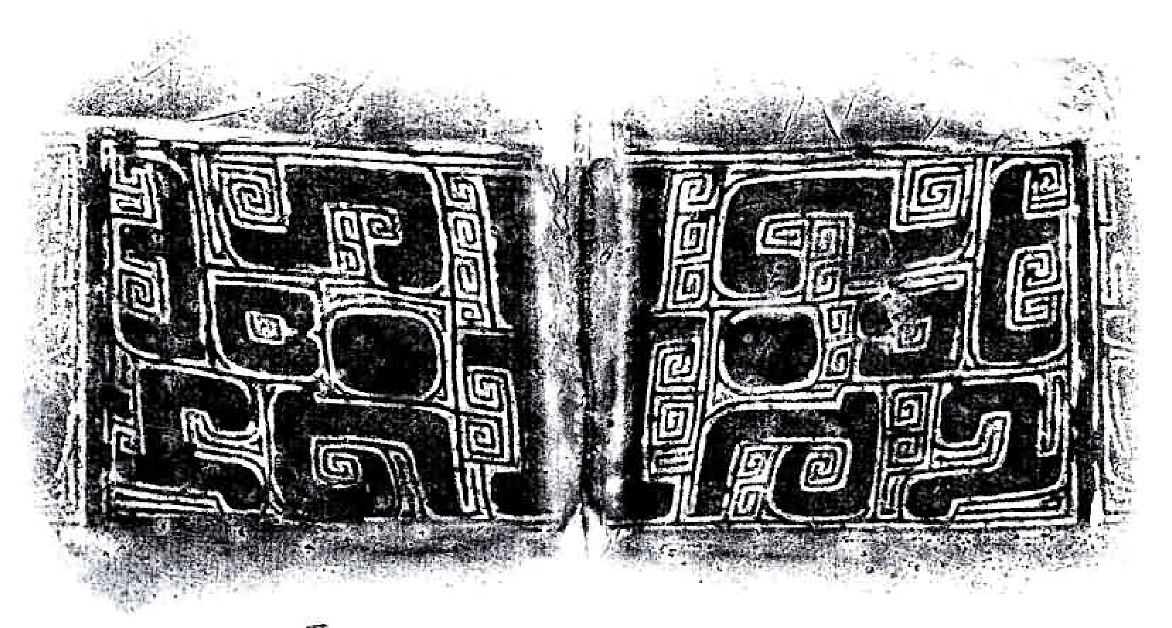
Gu

（04ASM303:107）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墓。同墓出土6件铜觚，形制、花纹都相同。此件铜觚是其中之一。圈足内壁有铭文"危马"二字（阳文）。通高27.1厘米，重1.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76. 爵

Jue

（04ASM303:96）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墓。同墓出土10件，形制、花纹基本相同。此爵铭文不清。通高20.7厘米，重0.9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77. 圆尊

Round Zun

（04ASM303:99）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大敞口，长颈，广折肩，高圈足。肩置3只高浮雕的牛首饰和3组兽面纹，腹饰3组一首双躯兽面纹，上、下界以联珠纹；颈和圈足分别饰两周凸弦纹。出土时，器口覆盖大量植物遗存，初步鉴定为某种植物花瓣，由于一直与尊中的美酒相伴，虽经3000年而不腐，弥足珍贵。通高36.1厘米，重1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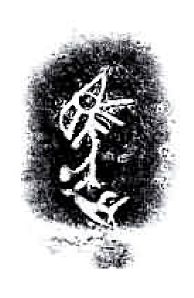
178. 双卣组合

Paired You

［04ASM303:120（左）、119（右）］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两件提梁卣，形制、花纹均相同，一大一小。时代均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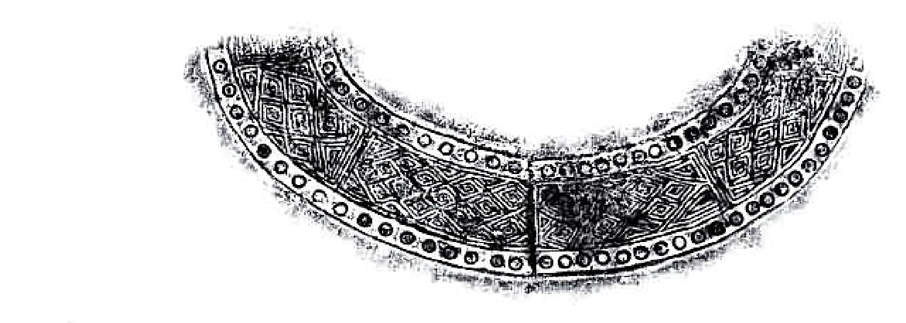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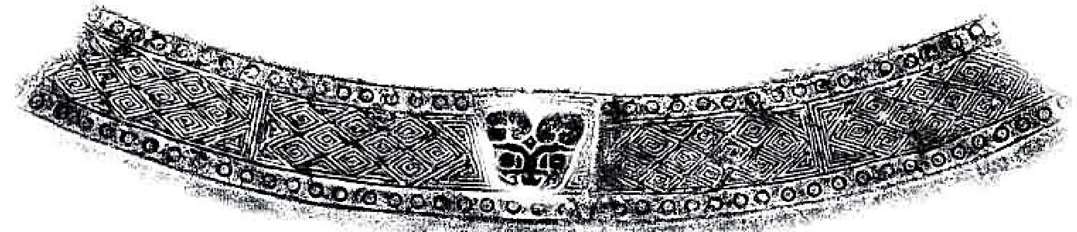
179. 卣

You

（04ASM303:120）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形制、花纹均相同的两件铜卣，不同的是一大一小。此为其中形体较大者。有盖，顶有瓜棱状钮，器体呈扁罐形。直口，平沿内钩，断面呈倒"L"形，鼓腹下垂，最大径在下腹部，上腹置对称半圆形耳，内套圆角方形的绹索状提梁，圈足较高且外撇。上腹双耳处饰一周菱形云雷纹，上、下界以同心圆纹，中间置小牛首饰；器盖凸面上所饰花纹与腹部相同；圈足上饰两周凸弦纹。盖内和器内底中部均有铭文"马危"。通高26厘米，重3.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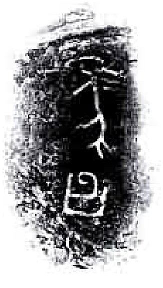
180. 提梁卣

You with Arc-shaped Hanger
（04ASM303:58）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有盖，盖顶有可以倒置的圈足状捉手。器体较长，横剖面呈圆形。直口，平沿内钩，断面呈倒“L”形，鼓腹，最大径在下腹部，上、下腹对应位置分装对称半圆形耳，上腹双耳内套圆角方形绹索状提梁，圈足较高且外撇。沿下饰一周纹饰带，中间置小牛首饰，两侧饰对称相向钩喙双夔，上、下界以同心圆圈纹。器盖弧面边缘饰一周纹饰带，两组八夔；圈足饰三组线条对夔兽面纹，全器纹饰均以云雷作地纹。通体几乎全部为褐色锈斑。器盖内壁有铭文“危马”二字。通高38.4厘米，重5.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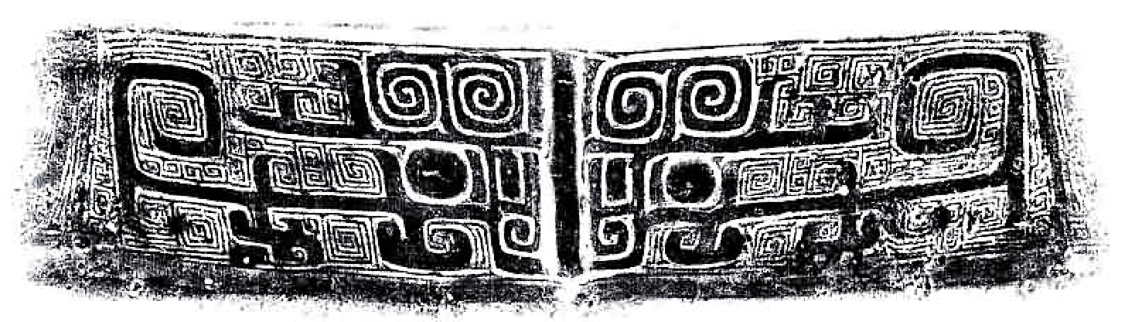


181. 斝

Jia

（04ASM303: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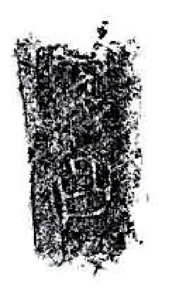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对称蘑菇双柱，方唇，侈口，尊式腹，下腹外鼓，器底略下垂，三棱足外撇，断面呈"T"字形，半圆形鋬。上腹素面，中腹饰二周凸弦纹，下腹饰一周三组兽面纹，云雷地纹，柱帽上饰涡纹。内腹底中部铸有铭文"马危"二字。通高36.7厘米，重4.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82. 分裆斝

Fendang Jia

（04ASM303:108）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口沿上立对称蘑菇钮双柱，方唇，侈口，高颈，鼓腹，分裆，3柱状蹄足，牛首鋬。腹饰双线“人”字凸弦纹，柱帽饰涡纹。鋬下铸铭文“马危”二字。通耳高34.3厘米，重5.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83. 圆罍

Round Lei

（04ASM303:59）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303号墓。有盖，盖顶瓜棱状钮。侈口，束颈，广肩，收腹，高圈足，肩部各置一兽首衔环。肩饰涡纹和变形夔纹，腹上部饰三组兽面纹，腹下部饰蕉叶纹；圈足亦饰三组兽面纹。出土时腹内盛有透明无色液体，器底有腐朽植物纤维的沉淀物，推测可能是酒类遗存。盖内有二字铭文"马危"。通高42.5厘米，重8.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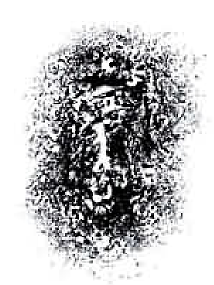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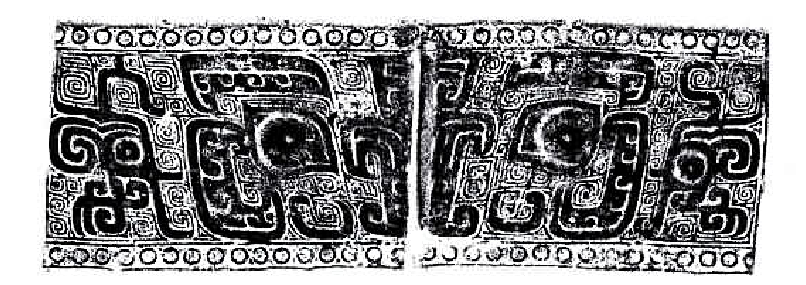
184. 觚形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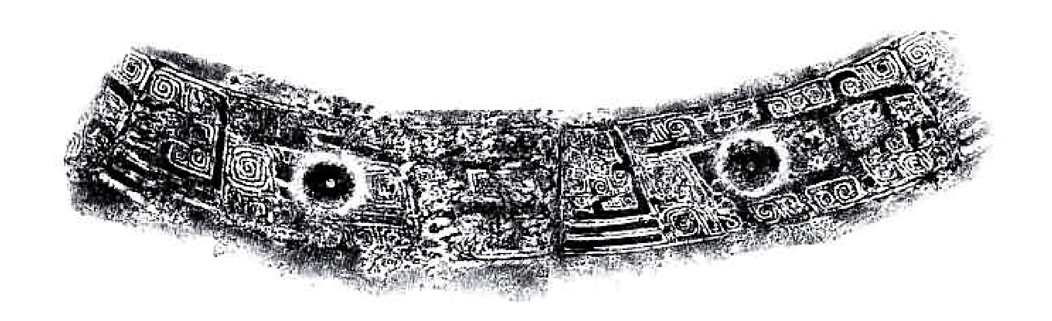
Gu-shaped Z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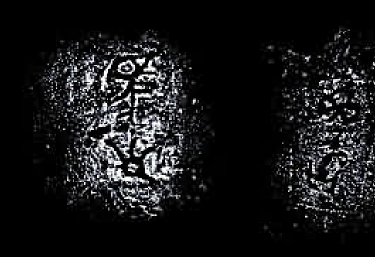
（04ASM303:83）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方唇，喇叭形敞口，直腹微鼓，圈足较高且外撇。中腹饰分解的独立兽面纹，两侧以对称的钩喙夔纹补空，云雷地纹，上、下各界一周同心圆圈纹；中腹上、下均饰两周凸弦纹；圈足上饰四组变形夔纹。圈足内壁铸有铭文“马危”二字。通高25.1厘米，重1.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85. 觯

Dan

（04ASM303:184）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有盖，顶部有蘑菇状钮。侈口，小方唇，长颈，鼓腹，圈足高且外撇。盖面和颈部均饰一周网格纹，上、下各界一周联珠纹。该觯出土于一件铜尊腹内，一直在液体中浸泡3000年，整器氧化为深蓝色。盖内有铭文“马危”二字。通高17.5厘米，重0.7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86. 三足盉

He with Three Feet
（04ASM303:117）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方唇，口微侈，束颈鼓腹，圜底，最大径在下腹部，三棱锥状足外撇，断面呈“T”字形，腹部一侧置牛首鋬，与鋬对应位置斜置管状流。除颈部饰三周凸弦纹外，整器素面。通高21.7厘米，重2.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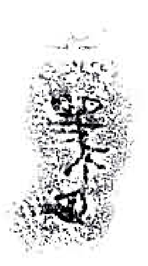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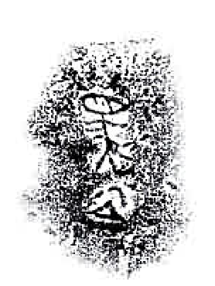
187. 盘
Dish
（04ASM303:56）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方唇，宽平沿，敞口，浅腹，平底，圈足高且外撇。中腹饰三组花纹，每组均由一牛首和四夔组成，牛首居中，四夔分置两侧，相向布列，上、下分别界以同心圆圈纹；圈足上饰三组线条对夔兽面纹，仅在纹饰带的上缘界以同心圆圈纹。腹部圈足的主纹均以云雷纹作地纹。口径34.3厘米，通高12.9厘米，重3.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88. 铜铙组合

Set of Nao Bells

［04ASM303:123（左）、125（中）、124（右）］

2004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东南303号墓。同墓出土一组3件，形制、花纹、铭文均相同，大、小依次相递减。体呈扁圆形，口内呈凹弧形，平顶，顶较口稍窄。顶中部有管状甬，上端较细，下端较粗，甬、钲相通。钲之两面均饰独立兽面纹，纹饰高出钲体平面。钲体两侧，从口到甬底有铸缝两条，系由两块外范和一块内范合铸而成。鼓内壁铸有“马危”二字铭文（阳文）。123号铙，出土时鼓体有明显的布纹，通高20.3厘米，重1.5千克；125号铙，通高17.6厘米，重1千克；124号铙，通高14.8厘米，重0.7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89. 分裆鼎

Fendang Ding

（87郭M50:6）

1987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50号墓葬中。侈口，口上有拱形立耳，束颈，分裆，足上粗下细，其断面呈橄榄形。器身厚重。整器饰满花纹，颈部饰3组对夔组成的兽面纹，其上、下分别界以联珠纹带，腹部饰3组兽面纹，以扉棱为鼻，三足与扉棱垂直相应，从整体看，如3个象面，足则为象鼻。内壁口沿下有铭文三字“乍册兄”。通高22.4厘米，重2.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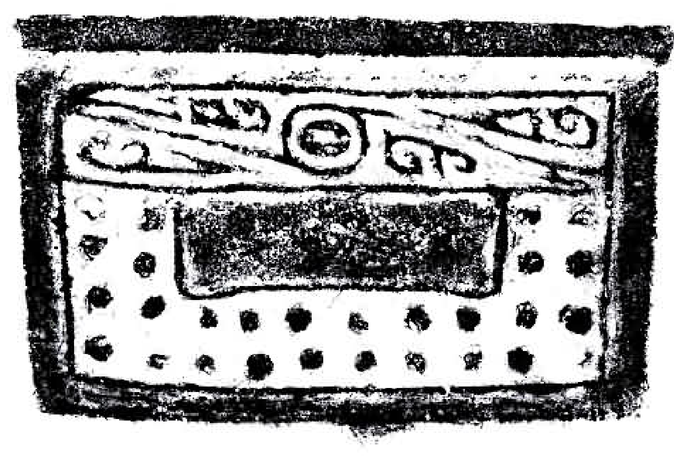
190. 小方鼎

Small Square Ding

（87郭M1:19）

1987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1号墓。无扉棱，足较粗短。器底内与四足相接处有小洞。四壁纹饰同。上部饰斜角目云纹，中部空白，下部及两侧饰乳钉纹。足上部有三周凸弦纹。内有动物骨骼。通高10厘米。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1. 小方鼎

Small Square Ding

（87郭M1:19）

1987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1号墓。因受压而稍变形，形制、纹饰、大小与上件相似。通高10厘米，重0.5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2. 豆

Dou (Stem Bowl)

（87郭M1:21）

1987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南1号墓。深盘，平沿外侈，高圈足盘外壁及圈足上饰凸弦纹。豆盘内有鸡骨。通高9.4厘米，口径10.2厘米，圈足径7.5厘米，重0.3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3. 觥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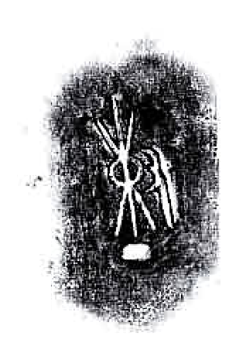
Lid of a Gong (Pouring Vess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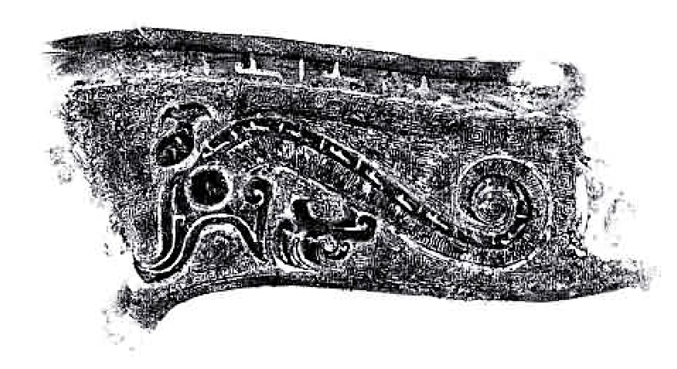
（91后冈M9:1）侧面（左）、鹿头正面（右）

1991年出土于安阳后冈9号墓。此器为铜觥的盖子，因9号墓早年多次被盗掘，觥体缺失不见。前端为立雕的鹿头兽面，后端为立雕的虎头兽面，两只虎耳也雕成夔龙的形象。盖下为子口，缺失的器体应为母口。盖面中部有一条长龙形象的扉棱，龙头爬伏在鹿头双角之间。扉棱的两侧饰对称的夔纹。整器以云雷纹为地纹。盖内有铭文“敕丁”二字。通高13.7厘米，长29.1厘米，重1.71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4. 觥盖后端
Lid of a Gong (reverse)





195. 方爵

Square Jue

（91后冈M9:10）

1991年出土于安阳后冈9号墓。这是目前殷墟所见的4件方爵之一。窄流，短尖尾，伞状柱，方腹平底，半圆形鋬，4足呈四棱形尖足。4角及流、尾之下有6条扉棱。流下饰云雷纹，口、尾之下饰三角纹，腹部饰倒夔纹。鋬内腹壁有铭文“□虎”二字。通高17厘米，重0.5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6. 分祒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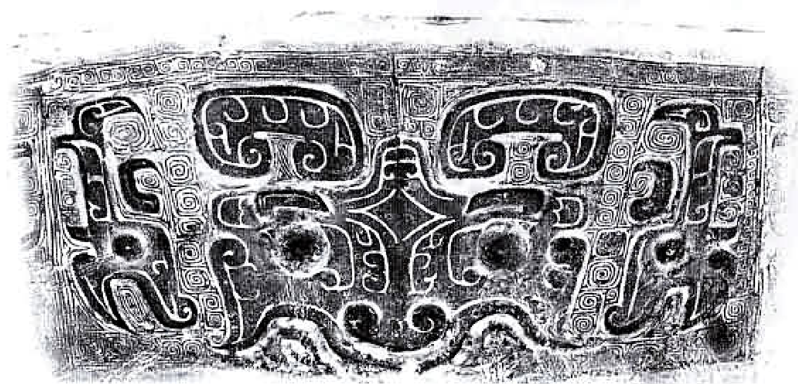
Fendang Ding

（84AGM1713:27）

198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西区墓地1713号墓葬中。方唇，平沿，沿面双立耳。直口，腹微鼓，圆柱足。颈饰一周云雷纹，腹部以云雷纹为地纹，上饰3组半浮雕的独立兽面纹和倒夔纹。器内壁有铭文3行21字："壬申，王易亚鱼贝，用作兄癸尊，在六月，隹王七祀翌日。"通高19厘米。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7. 簋

Gui

（84AGM1713:33）

198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西区墓地1713号墓葬中。侈口，方唇，束颈，鼓腹，高圈足。双耳上饰鹿头，颈饰两组相对夔龙纹组成的兽面纹带。器内底有铭文两行12字："辛卯，王易寝鱼贝，用作父丁彝。"口径19.5厘米，通高14.3厘米，重2.5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8. 盖爵

Lidded Jue

（84AGM1713:50）正面

1984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西区墓地1713号墓葬中，有盖，盖前部有一鹿头，背上有桥形钮。窄流尖尾，伞形柱，腹圆鼓，3锥状足略外撇。腹上部饰一周以夔纹组成的兽面纹，足外侧饰“人”字纹，鋬上饰一牛首。盖内有图形铭文“亚鱼”两字，尾部有铭文两行12字“辛卯，王易寝鱼贝，用作父丁彝。”通高22.2厘米，流至尾长20厘米。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199. 盖爵
Lidded Jue (reverse)
（84AGM1713:50）反面

200. 盖爵

Lidded Jue (detail)
（84AGM1713:50）局部





201. 99ALNM1046铜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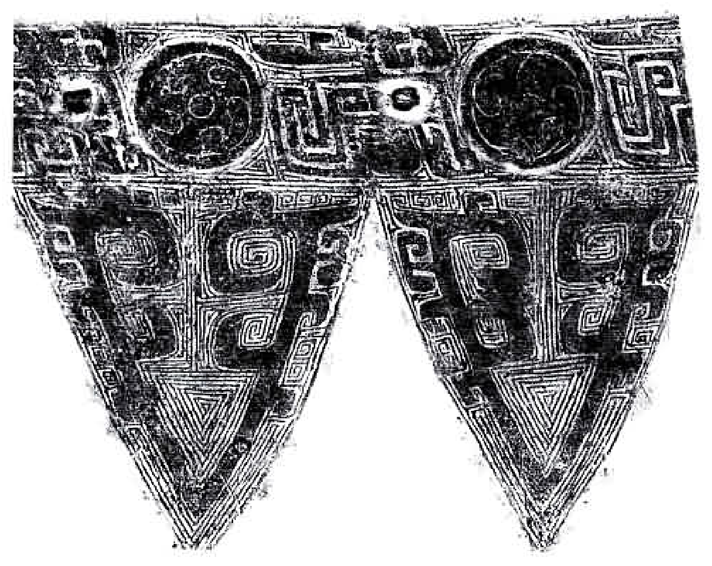
Set of Bronze Vess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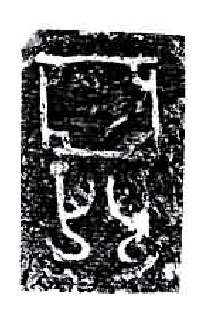
1991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该墓为土坑竖穴墓，墓室面积为9.18平方米。共出土青铜礼器33件，其中炊食器9件，酒器23件，水器1件。此墓觚爵组合非常特殊，为3觚、5爵、2角，为前所未见的礼器组合群。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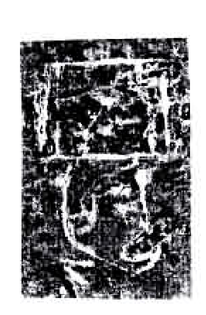




202. 圆鼎

Round Ding
（99ALNM1046:3）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耳微外侈，敛口，腹微鼓，圜底，柱足。颈饰相间兽面纹和圆涡纹，腹饰三角形纹，内填变形夔纹，云雷纹地。内壁有铭文“亚鼎”二字。通高34.7厘米，重5.2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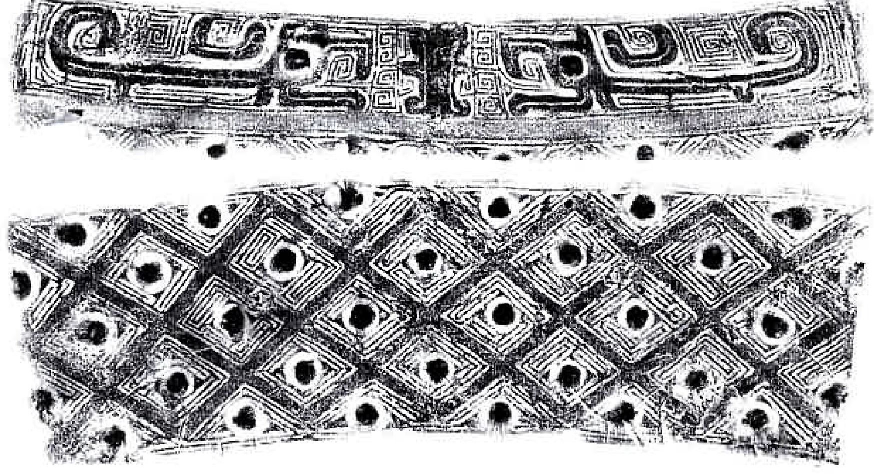


203. 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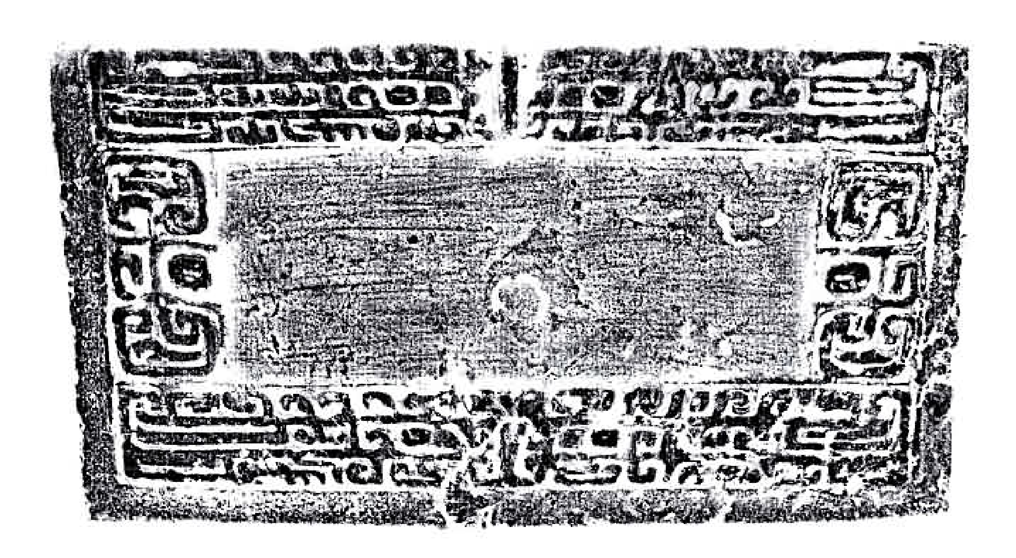
Round Ding

（99ALNM1046:71）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耳微外侈，敛口，下腹外鼓，圜底，柱足。口沿下饰六个夔纹，云雷地纹，腹饰菱形雷纹乳钉纹。内壁有铭文“亚夙”二字。通耳高25.1厘米，重2.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04. 方鼎

Square Ding

（99ALNM1046:17）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此方鼎为其中之一。直耳，长方形口，斜腹，平底稍垂，近马蹄形柱足。腹部各面边缘均饰由云雷纹组成的带状兽面纹，中间为素面，足上部饰简化兽面纹，其下部有两周凸弦纹。内壁一长边有铭文“亚凧”二字。通耳高21.8厘米，重1.92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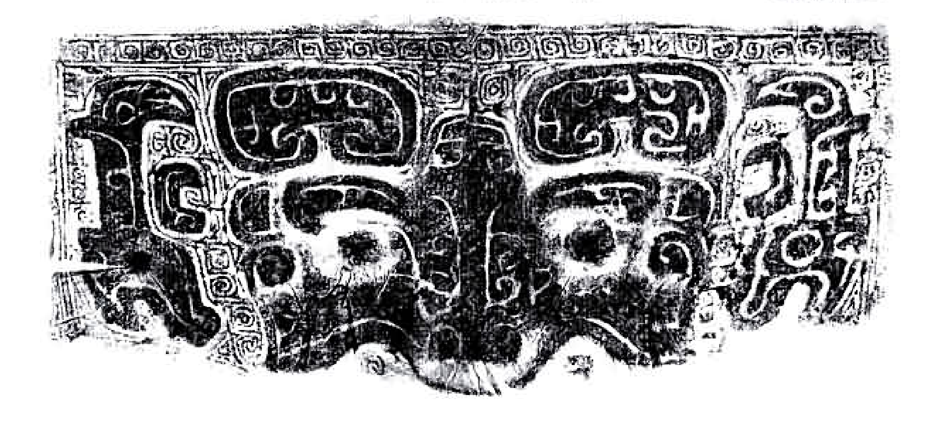


205. 分裆鼎

Fendang Ding

（99ALNM1046:27）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土两件，形制、大小、花纹和铭文均相同，应是一对。此鼎是其中之一。直口，立耳，浅腹，分裆，高柱足。颈饰一周云雷纹，腹以云雷纹衬地，饰3个半浮雕兽面纹和6个倒夔纹。器口内壁有铭文"亚凧"二字。通耳高18.2厘米，重1.3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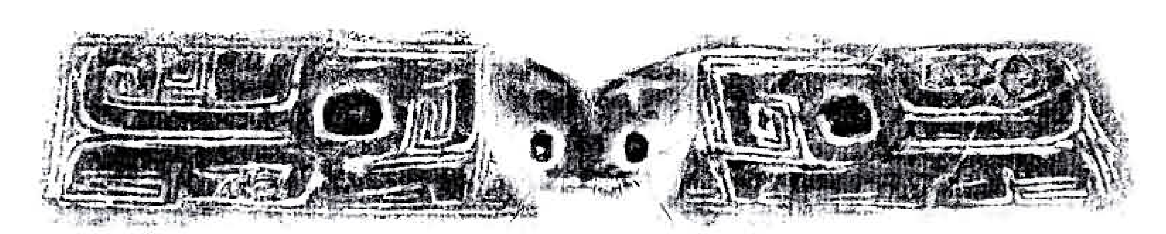


206.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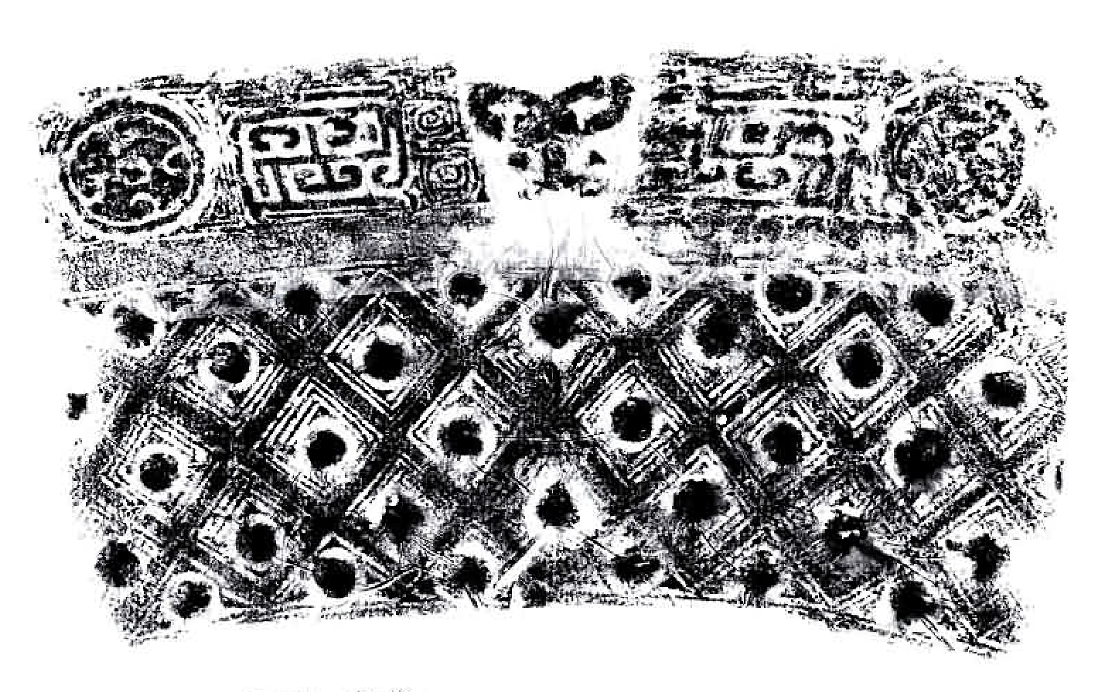
G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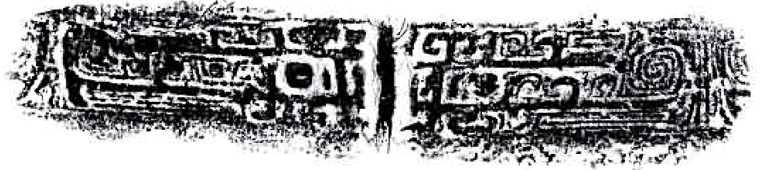
（99ALNM104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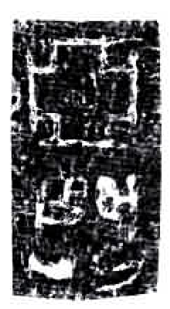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土两件铜簋，但形制和装饰风格均不同。侈口，小方唇，颈微束，鼓腹，高圈足，腹两侧有兽首大环耳。颈饰夔纹，耳间有突起的兽头，圈足饰线条对夔兽面纹，云雷纹衬地。器内底有铭文“亚朋”二字，模糊不清。通高13.3厘米，重1.8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07. 簋

Gui

（99ALNM1046:60）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敞口，斜腹，高圈足。腹两侧有兽首大环耳，下有垂耳。颈饰相间兽面纹、圆涡纹和两只半浮雕小兽头，腹饰菱形雷纹乳钉纹，圈足饰线条对夔兽面纹，云雷地纹。器内底有“亚朿”二字铭文。通高14.7厘米，重1.6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08. 甗

Yan

（99ALNM1046:4）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侈口，绚索状耳，略外撇，深腹下收，束腰，分裆，柱足（下部稍粗）。腹上部饰3组云雷纹组成的带状兽面纹，线条粗疏，无地纹。3足上部各饰一兽面纹，似牛头。器口内壁有铭文“亚朋”二字，锈蚀不清。器内蒸一人头。一耳外侧残留有苇席痕迹。通耳高36厘米，重4.75千克（含人头在内）。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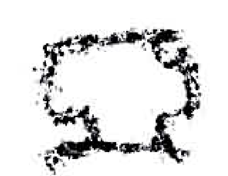


209. 爵

Jue

（99ALNM1046:15）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土5件铜爵，唯这件爵形制不同于其他共出铜爵。宽流尖尾，菌状柱，立于流后口上，腹较浅，卵形底，三棱锥足，腹侧有兽首鋬。腹饰两组兽面纹，云雷地纹。柱帽饰圆涡纹。鋬内有铭文"亚宀凧"三字，较模糊。出土时器壁粘有4层纺织品痕迹，为保留这些珍贵资料，未做全部清理。通高21厘米，重0.7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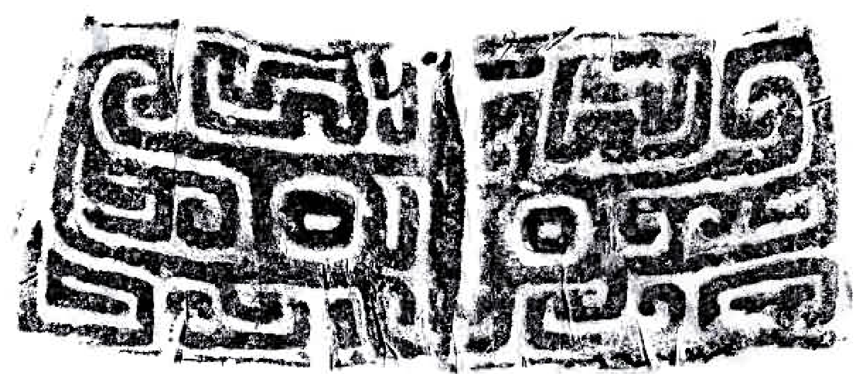


210. 觚

Gu

（99ALNM1046:9）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类型的铜觚该墓出土两件。觚体粗矮。喇叭形口，腹外鼓，圈足外撇。腹饰两组兽面纹，线条粗疏，无地纹。其上、下各饰凸弦纹两周。圈足内壁有阳文铭文"亚"字。通高21.4厘米，重0.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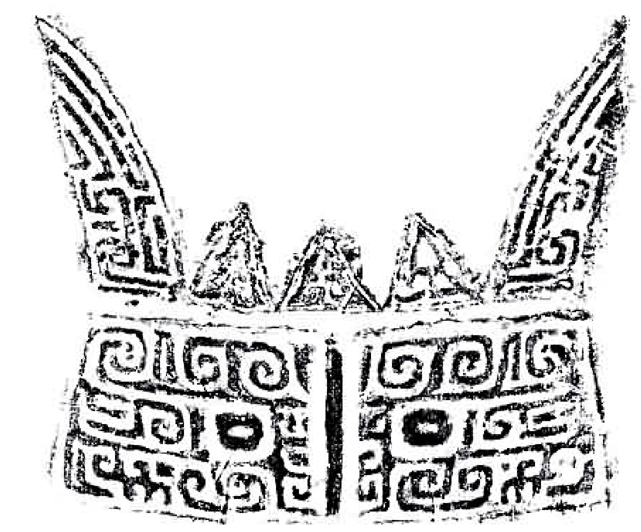


211. 爵

Jue

（99ALNM1046:21）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土该类型铜爵4件，此为其中之一。宽流尖尾，菌状柱，立于流后口上，深腹，圜底，三棱锥足较短。腹侧有半环形鋬，与一足对应。腹上部饰三周凸弦纹，柱帽饰圆涡纹。鋬内有阳文铭文“亚”字。通高18.2厘米，重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12. 角

Jiao

（99ALNM1046:12）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土两件。这件铜角的形制、大小、纹饰基本与M1046:18相同。无铭文。通高18.2厘米，重0.5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13. 方尊

Square Z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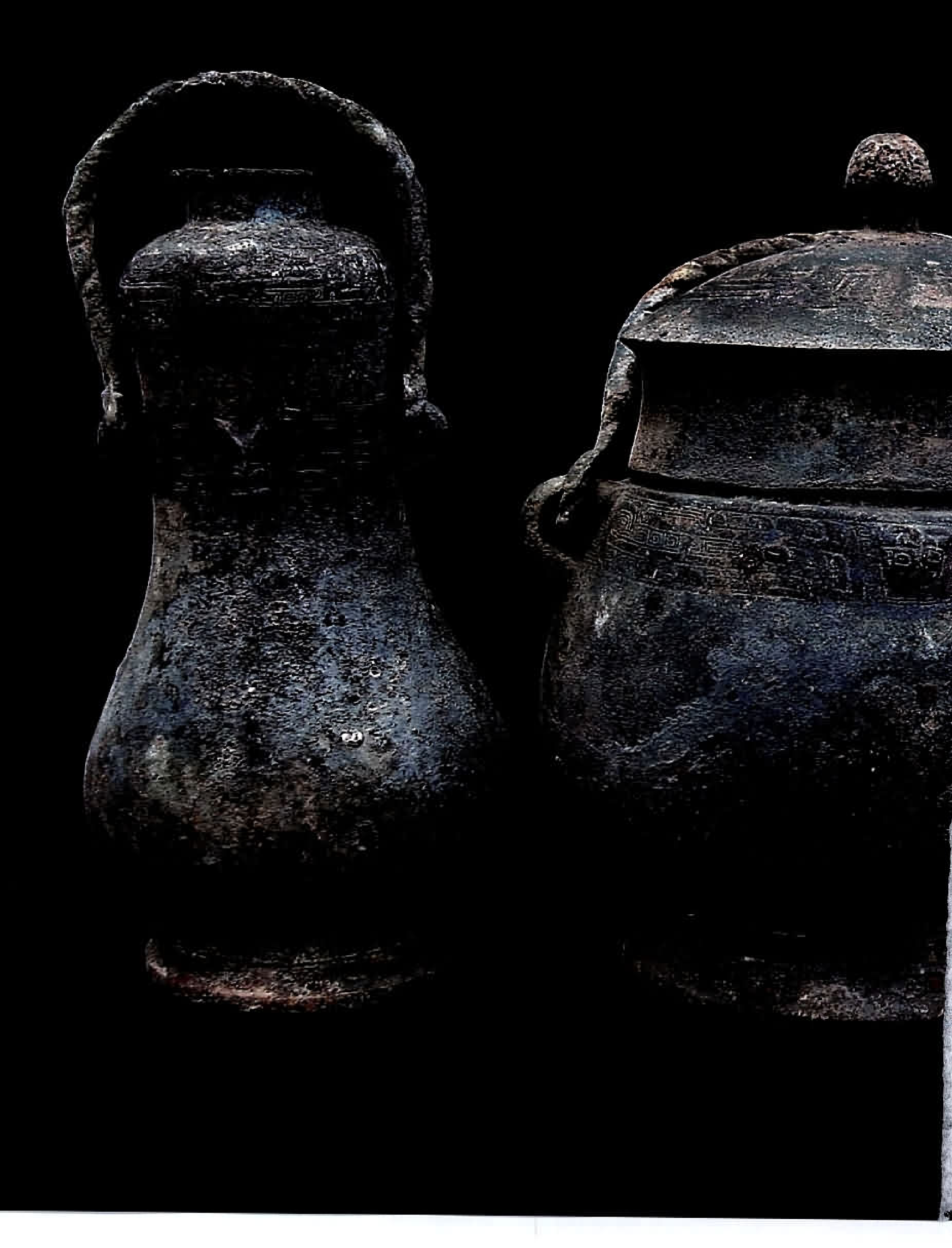
（99ALNM1046:23）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同墓出两件，形制、大小、花纹和铭文都基本相同，应是一对。此方尊就是其中之一。方口外侈，束颈，斜肩，底近平，高圈足外撇。器体四角和四面中部均有扉棱。口下饰对夔蕉叶纹，颈、肩和上腹各饰一周夔纹。下腹和足部四面各饰一分解式兽面纹，以中部扉棱作鼻梁，两侧以变形倒夔纹补空。均以云雷纹衬地。器内底均有铭文“亚毌”。通高29.4厘米，重3.6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14. 方尊
Square Zun
（99ALNM1046:45）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形制、大小、纹饰和铭文均与M1046:23方尊基本相同。通高29.3厘米，重3.6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15. 99ALNM1046三卣组合

Set of Pot and You Vess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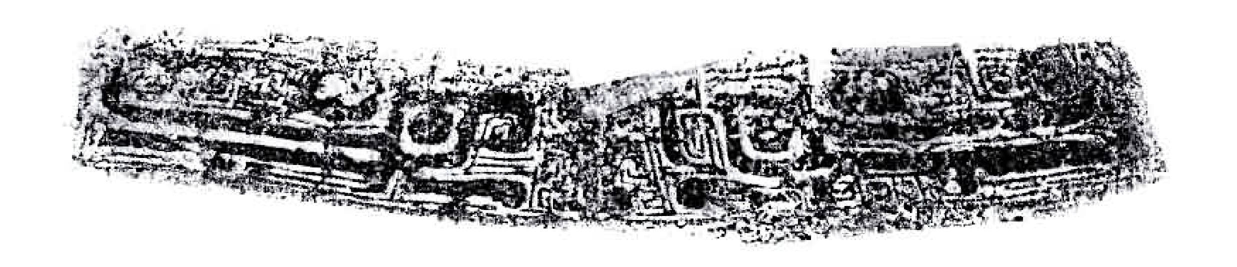
［M1046:6（左）、10（中）、5（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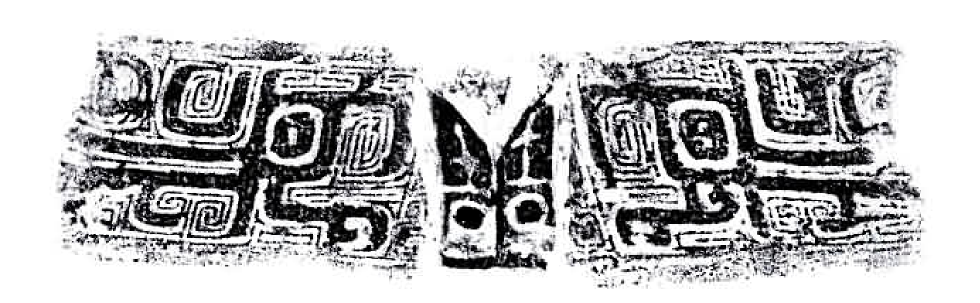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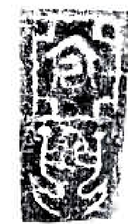
216. 提梁卣

You with Arc-shaped Hanger
（99ALNM1046:6）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圆体，小口，长颈微束，垂腹，圜底，圈足。口上置覆钵形捉手钮器盖。颈部两侧各有一半环形钮，内衔绹索状提梁。盖、颈各饰一周夔纹，颈部间以小兽头，云雷纹地。圈足饰一周凸弦纹。通盖高25.7厘米，重1.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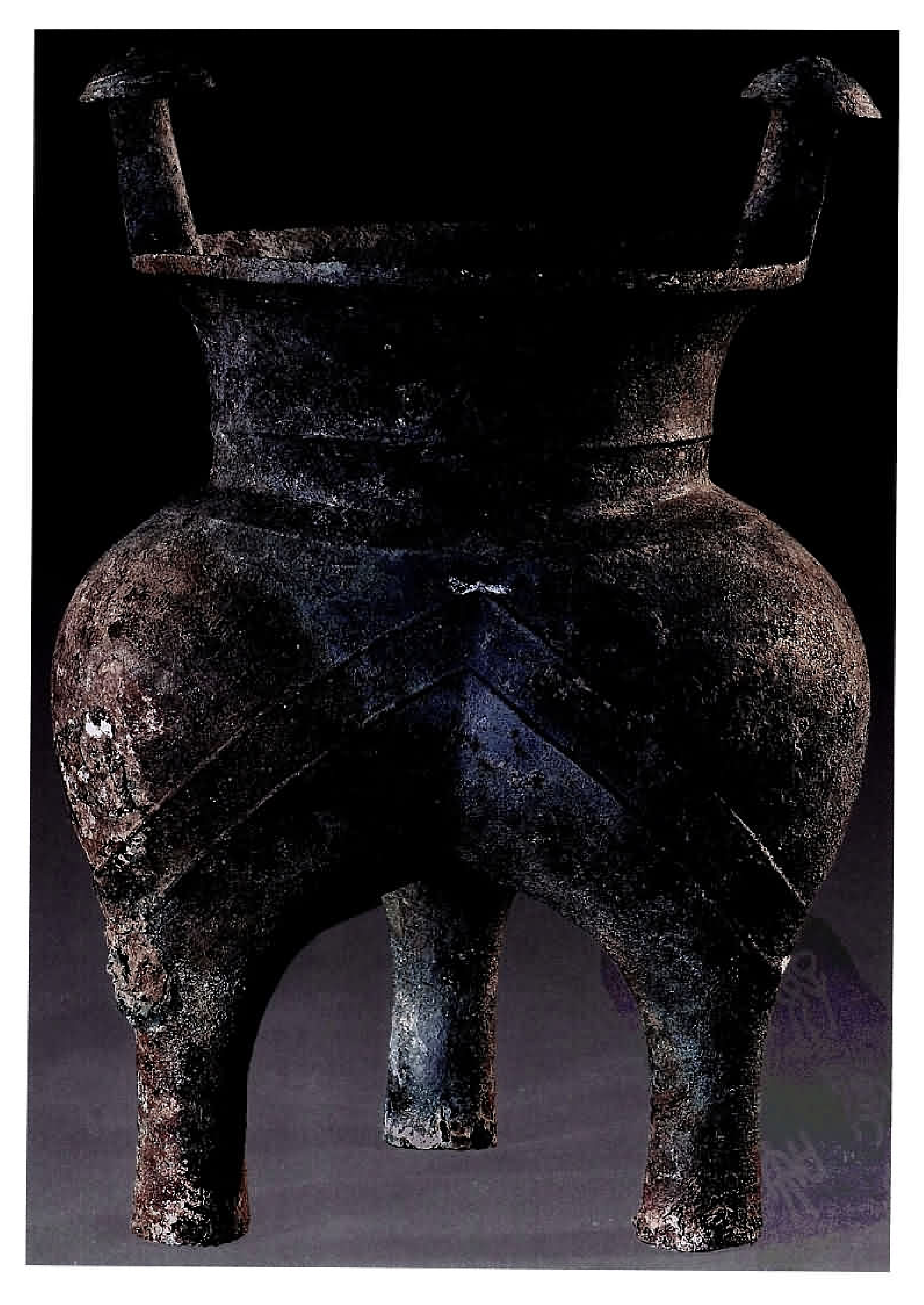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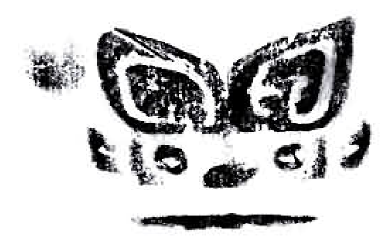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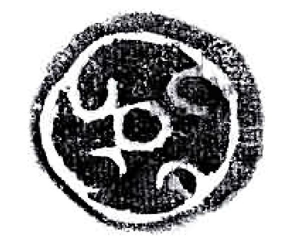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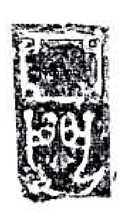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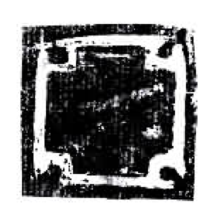
217. 分裆斝

Fendang Jia

（99ALNM1046:20）侧面（左）和正面（右）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侈口，口上有两立柱，菌状钮，束颈，鼓腹，分裆，柱足。腹侧有一兽首鋬。颈饰一周凸弦纹，袋足饰双线“人”字形凸弦纹，柱帽饰圆涡纹。鋬内腹外壁有铭文"亚它胤"三字。通高24.3厘米，重2.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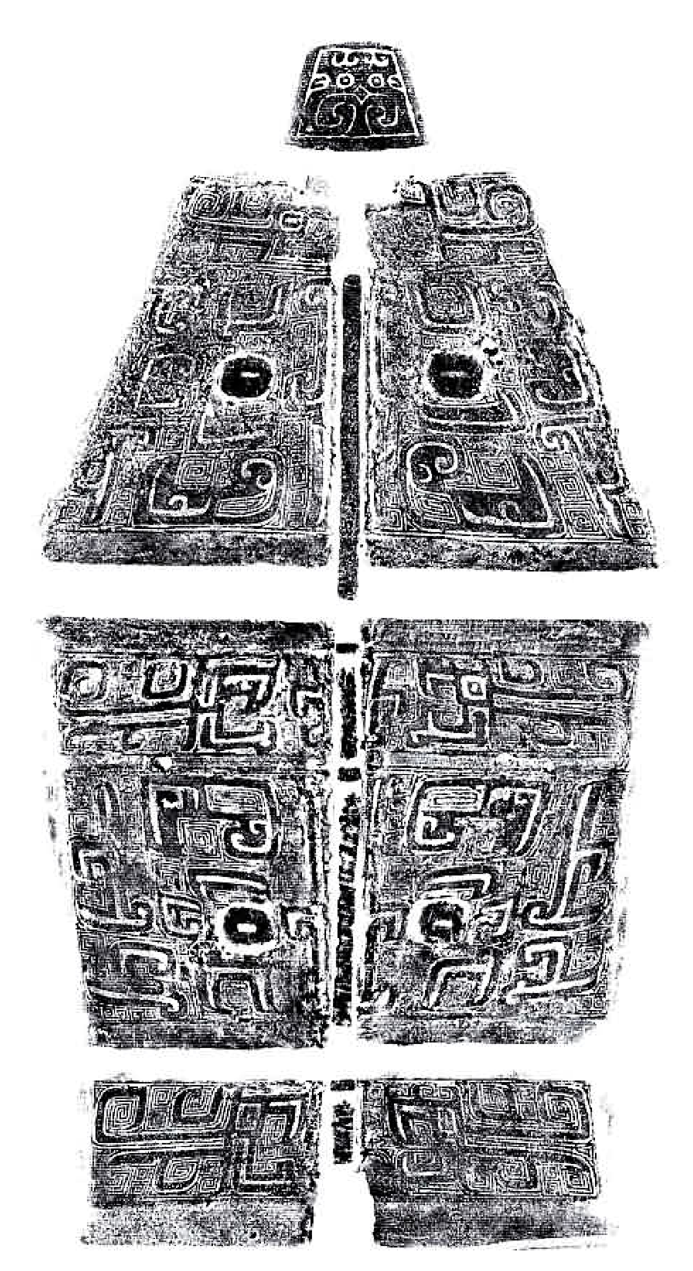
218. 方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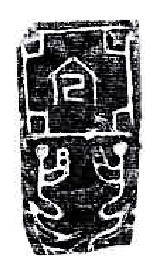
Square Lei
(99ALNM104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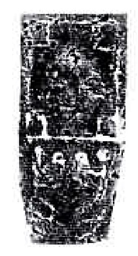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长方直口，高颈，圆肩，下腹内收，平底，高圈足。有盖，盖呈四阿屋顶形，有子口与器口相吻合。罍肩部置对称兽首衔环。下腹一侧亦有一半环兽首耳。肩部饰凸弦纹、圆涡纹和兽头。器口内壁有铭文“亚鬲”二字，盖内壁有铭文“亚”字。出土时器内留有植物纤维的炭化物。通高44.4厘米，重4.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19. 方彝

Square Yi

（99ALNM1046:1）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长方形口，平沿，下腹内收，平底，高圈足。盖呈四阿屋顶式，盖有子口与器口相吻合，顶脊上置四阿式钮。盖和器体四角以及四边中部均有扉棱。圈足四面正中各有一弧形缺口，与中部扉棱对应。盖近脊处、器口下和圈足各饰一对夔纹。盖下部、腹部皆饰分解兽面纹，两侧以变形倒夔纹补空，盖之兽面呈倒状，嘴朝盖钮。钮饰简化兽面纹和三角云纹。以云雷为地纹。盖内一宽面有铭文“亚宅凬”三字，器底有铭文“亚凬”二字。通高33.9厘米，重5.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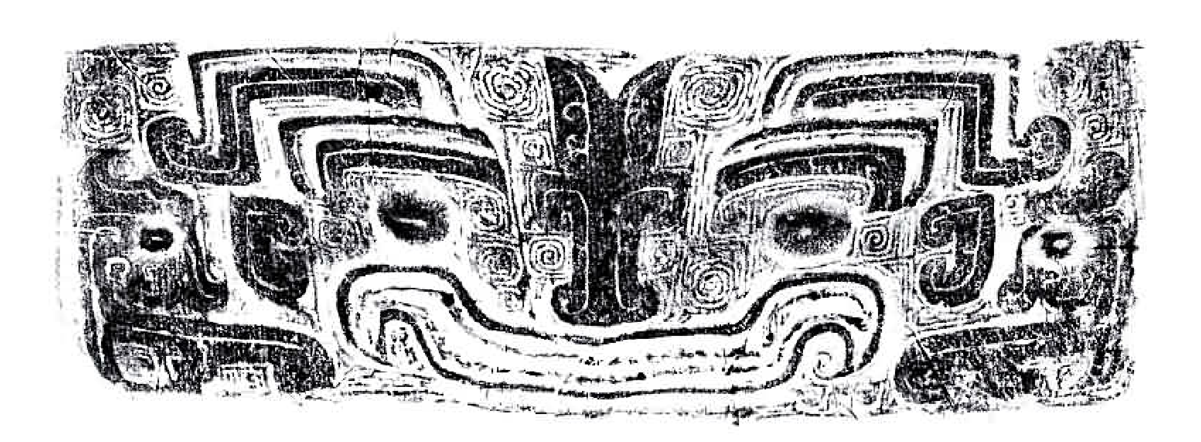


220. 觚形尊

Gu-shaped Zun

（99ALNM1046:7）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直筒体。敞口，深腹微鼓，圈足略外撇。腹饰一对兽面纹，方形眼，粗眉长角，鼻梁突起，张嘴龇牙。两兽面之间，又以回首夔龙纹补空，以云雷纹为地纹。腹上下又各饰凸弦纹两周。足内壁有铭文“亚凧”二字。通高25.5厘米，重1.6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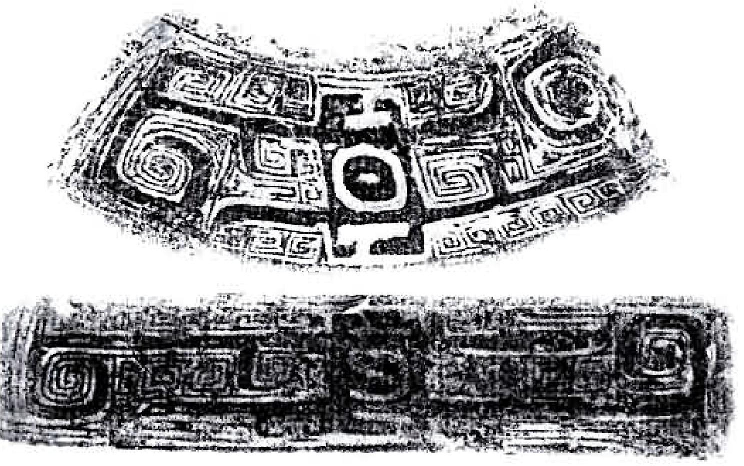


221. 觶

Dan

（99ALNM1046:22）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圆体，整器瘦高。侈口，束颈，垂腹，圜底，高圈足。盖呈弧形，顶有半环形钮，有子口套合于器口内侧。盖、腹、足各饰凸弦纹两周。通高19厘米，重 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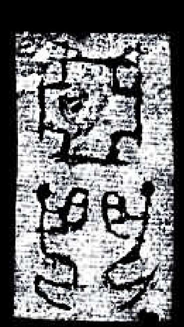


222. 四足盉

He Vessel with Four Feet
(99ALNM1046:2)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口呈圆形，微侈，高颈，鼓腹，分裆，4柱足细高。上腹有一管状斜流，对应一兽首鋬。弧形盖，顶有半环钮。盖面与鋬相对应之一侧有半圆环，内套一链带，以连接盖与器。盖、颈各饰一周四肢目纹，以云雷纹衬地。出土时器内有少许液体和植物纤维残渣，推测可能为酒类遗存。通高22.2厘米，重1.7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23．盘

Dish

（99ALNM1046:8）

1999年出土于安阳刘家庄北地1046号墓。敞口，浅腹，底近平，圈足高且外撇。腹饰夔龙纹带，以云雷纹为地纹，上嵌3只半浮雕兽头，足饰两道凸弦纹。盘内底有铭文"亚鼎"二字。通高10.5厘米，口径32.7厘米，重1.9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24. 带盖簋

Lidded Gui

(GT231③:18)

20世纪50年代末出土于安阳殷墟小屯村西231号探方第三层中。捉手钮弧面器盖，敛口，圆球形腹，高圈足，腹置对称双兽首鋬。口沿下和圈足均饰对称夔纹，腹部主体纹饰为两组大兽面纹。该器装饰花纹疏朗有致，不设地纹。器盖内和器内底部均有“大亥乍母彝”五字铭文。通高23厘米，重4.7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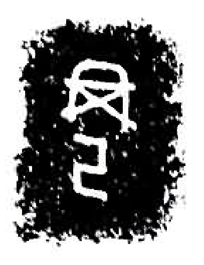


225. 瓿

Bu

（05徐家桥综合楼M1:1）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徐家桥综合楼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直口稍内敛，方唇，平沿，长颈，圆鼓腹，喇叭形高圈足。除颈部饰一周凸弦纹外，余均素面无纹。器内底部有铭文“冉己”二字。口径15.6厘米，通高16.3厘米，重2.1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26. 圆鼎

Round Ding

（05徐家桥综合楼M1:3）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徐家桥综合楼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直口微敛，方唇，窄沿面较平，沿上立拱形对称双耳，深腹稍外鼓，圜底，3柱足稍高。腹饰3组由对夔兽面纹构成的纹饰带。器腹内壁有铭文“戈”字。通高27.6厘米，重4.85千克。时代应属殷墟铜器第三期晚段，但埋入殷墟四期墓中。





227. 分裆斝

Fendang Jia

（05徐家桥综合楼M1:2）

2005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徐家桥综合楼基建工地1号墓葬中。侈口，方唇，口沿上立对称菌状钮双柱，柱体外撇，长颈，3只肥硕的袋足，实足尖较高，颈腹间置一鋬。整器素面无纹。通高31.2厘米，重4.40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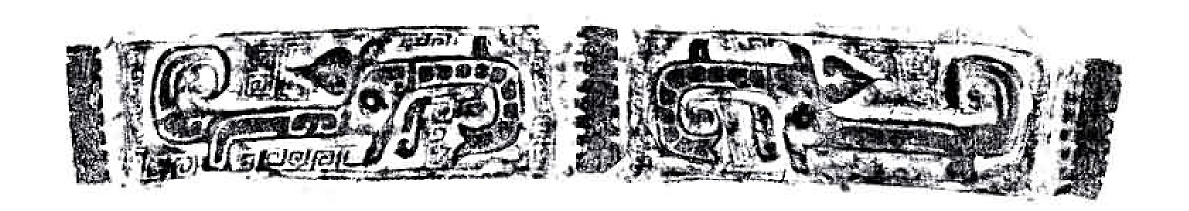




228. 扁足鼎

Bianzu Ding
（91ALNM313:1）

199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313号墓葬中。方唇，折沿，沿面立对称拱形绚索状双耳，口微敛，浅腹微鼓，圜底，3夔形扁足，夔首向上支撑鼎腹，夔尾平折上卷着地。腹部饰6条扉棱和6只象首夔龙纹，且夔龙两两相向构成3组完整的对夔图案。器腹内壁有铭文“父戊”二字。通高15.7厘米，重0.9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29.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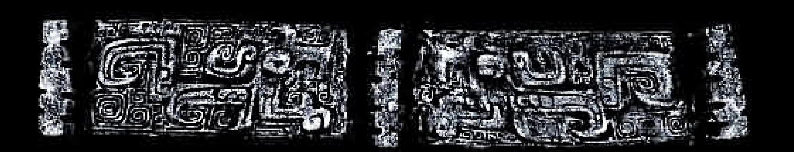
Gui

（93新安庄M225:2）

1993年出土于安阳殷墟新安庄225号墓葬中。直口，方唇，沿面稍内斜，直腹，底近平，高圈足。口沿下饰一周对夔纹，中腹以下饰菱形雷纹乳钉纹，圈足饰两组对夔纹。簋内底有铭文“犬”。该器最大特点是其腹部的乳钉纹高高地突出于器腹，这类装饰风格的器物少见于殷墟，而多见于关中地区。口径24.6厘米，通高18.5厘米，重3.8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30. 觚

G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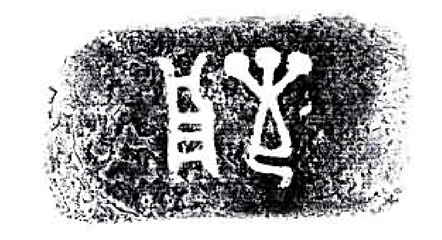
（99ALNM911:4）

1999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911号墓葬中。喇叭形口，方唇，细高器体，圈足较高且外撇。整器除下腹和圈足饰简化兽面纹外，均为素面无纹。但较为特殊的是，这件铜觚整体形成一层完整的红褐色包浆层，为殷墟青铜器中所罕见。通高25.3厘米，重0.9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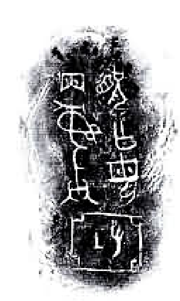
231. 筒形卣

Cylinder-shaped You
(92ALNM350:25)

1992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350号车马坑中。整器呈圆筒形，蘑菇钮器盖，直口微敛，直筒腹，矮圈足，足径与腹径相同。口沿下的上腹部置对称贯耳。圈足上设对称“十”字镂孔和对称圆孔，圆孔的位置与上腹部的贯耳位置上、下对应。整器素面无纹。这是目前殷墟科学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筒形卣。器口内壁有铭文。器体粘满清晰的席纹。通高30.8厘米，重2.54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32. 觥

Gong

（87郭M53:4）

1987年出土于安阳殷墟郭家庄南53号墓葬中。整器分为盖和身两部分。盖一端为鹿头，柱状鹿角带有短斜叉，非常形象，另一端为鹿尾，器身为长流，束颈，鼓腹，矮圈足。盖内和器内底部均有七字铭文："颀乍母丙彝，亚址"。器体残留大量绢痕。通高19.2厘米，重1.0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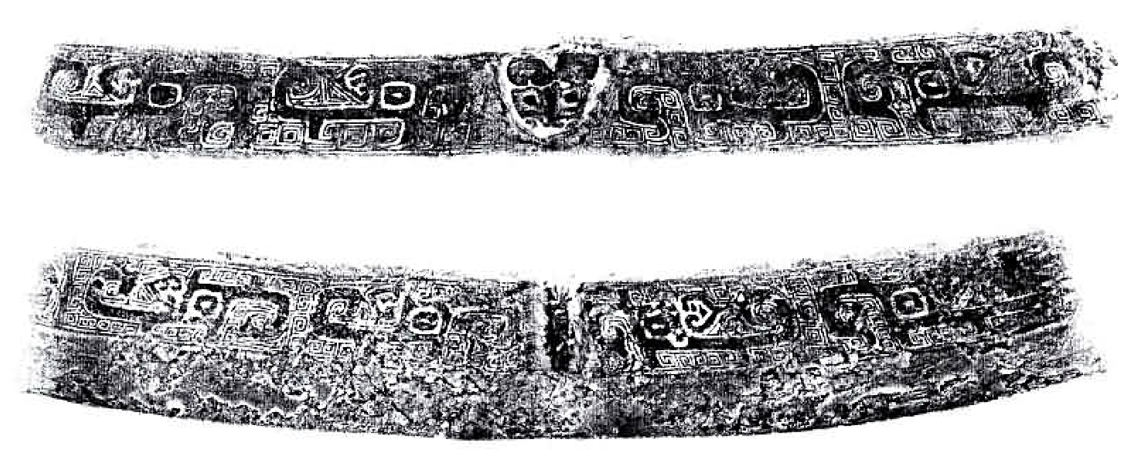


233. 簋

Gui

（95铁西房地产开发公司M4:3）

1995年出土于安阳铁西路4号墓。侈口，方唇，束颈，鼓腹，高圈足，腹两侧有兽头环状耳。整体形状与84AGM1713:33铜簋相同。颈饰由夔龙纹组成的兽面纹带，纹饰模糊。腹内底有铭文两行10字："𠭯辛酉易贝，用作妣庚毁"。口径17.5厘米，通高13厘米，重1.95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234. 簋

Gui

（98安阳水利局M67:5）

1998年出土于安阳郭家庄东市水利局院内67号墓。侈口，尖圆唇，束颈，鼓腹，腹置半环形对称兽首鋬，高圈足。上腹置对称小兽头饰，并饰两组对夔兽面纹，圈足饰三组兽面纹。腹内底有"□□父庚"铭文（第一、二字模糊不清）。口径19.5厘米，通高14.6厘米，重2.3千克。时代属殷墟铜器第四期。

图版索引



32. 瓿 106
Bu
（83ASM663:51）



33. 方彝 108
Square Yi
（83ASM663:52）



34. 铜铙组合 110
Set of Nao Bells
（83ASM663:4、2、1）



35. 铙 112
Nao Bell
（83ASM663:4）



36. 圆鼎 114
Round Ding
（99APNM229:2）



37. 觚 116
Gu
（99APNM229:1）



38. 爵 118
Jue
（99APNM229:15）



39. 鸮卣 120
You (Liquid Container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n Owl
（99APNM229:16）正面



40. 鸮卣 121
Front and Side Views of the Owl-shaped You Vessel
（99APNM229:16）斜、侧面



41. 盖斝 122
Covered Jia
（99APNM229:5）



42. 方罍 124
Square Lei
（99APNM229:4)



43. 方罍 125
Square Lei (side view and detail)
（99APNM229:4）侧面、局部



44. 圆鼎 126
Round Ding
（84AWBM2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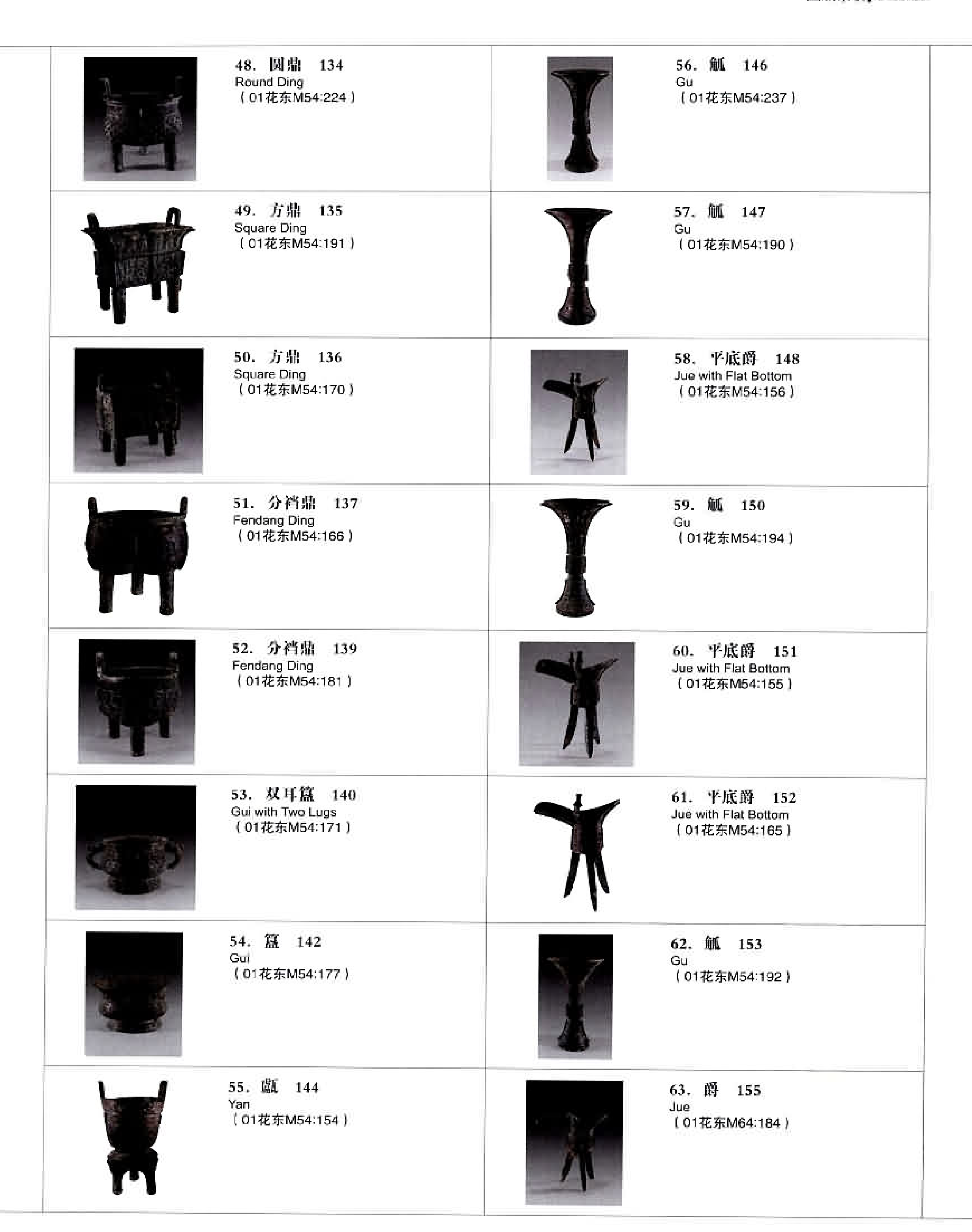
45. 甗 128
Yan
（84AWBM259:6）



46. 盘 130
Dish
（84AWBM259:4）



47. 圆鼎 132
Round Ding
（01花东M54:240）




64. 方尊 156
Square Zun
（01花东M54:84）


65. 牛尊 158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01花东M54:475）


66. 牛尊 161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01花东M54:475）另一面


67方斝 162
Square Jia (side view)
（01花东M54:43）侧面


68. 方斝 163
Square Jia
（01花东M54:43）正面


69. 方罍 164
Square Lei
（01花东M54:136）


70. 方彝 166
Square Yi
（01花东M54:183）


71. 四足觥 168
Gong Vessel with Four Feet
（01花东M54:195）


72. 大铜盂 170
Yu
（01花东M54:157）


73. 小铜盂 172
Yu
（01花东M54:169）


74. 铜铙组合 174
Set of Nao Bells
[01花东M54:199（左）、108（中）、119（右）]


75. 圆鼎 176
Round Ding
（05范家庄M4:7）


76. 簋 178
Gui
（05范家庄M4:5）


77. 觚 180
Gu
（05范家庄M4:6）


78. 爵 181
Jue
（05范家庄M4:8）


79. 卣 182
You
（05范家庄M4:4）



80. 觚 184
Gu
（86ASNM29:7）



81. 爵 185
Jue
（86ASNM29:1）



82. 圆鼎 186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1）



83. 圆鼎 188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32）



84. 圆鼎 190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4）



85. 分裆鼎 191
Fendang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8）



86. 甗 192
Yan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3）



87. 爵 193
Ju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6）



88. 箕形器 194
Dust Pan-shaped Branz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2）



89. 觚 196
Gu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B7＃M1:9）



90. 爵 197
Ju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B7＃M1:8）



91. 提梁罐 198
Jar with Arc-shaped Movable Hanger (collected at Xiaozhuang)
（小庄采集）



92. 壶 200
Pot
（04ASPT1M9:6）



93. 94ALNM793铜器组合 202
Set of Bronze Vessels



94. 圆鼎 204
Round Ding
（94ALNM793:41）



95. 圆鼎 206
Round Ding
（94ALNM793:47）



96. 簋 207
Gui
（94ALNM793:42）



104. 爵 218
Jue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4）



97. 觚 208
Gu
（94ALNM793:46）



105. 卣 219
You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6）



98. 爵 210
Jue
（94ALNM793:55）



106. 分裆斝 220
Fendang Jia, or Jia Vessel with Pouch-shaped Extensions at Bottom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7）



99. 圆罍 211
Round Lei
（94ALNM793:3）



107. 簋 222
Gui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13）



100. 方彝 212
Square Yi
（94ALNM793:44）



108. 觚 224
Gu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1）



101. 斗 214
Spoon
（94ALNM793:56）



109. 爵 225
Jue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3）



102. 箕形器 215
Dust Pan-shaped Bronze
（94ALNM793:1）



110. 圆鼎 226
Round Ding
（90郭M160:62）



103. 分裆鼎 216
Fendang Ding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1）



111. 圆鼎 228
Round Ding (detail)
（90郭M160:62）局部


128. 凤鸟卣 256
You with Phoenix Designs
（90郭M160:172）正面


129. 凤鸟卣 258
You with Phoenix Designs (side view)
（90郭M160:172）侧面


130. 方斝 260
Square Jia (side view)
（90郭M160:111）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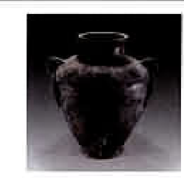

131. 方斝 262
Square Jia
（90郭M160:173）正面


132. 方斝 264
Square Jia (side view)
（90郭M160:173）侧面


133. 分裆斝 266
Fendang Jia
（90郭M160:174）


134. 觚形尊 267
Gu-shaped Zun
（90郭M160:118）


135. 圆罍 268
Round Lei
（90郭M160:140）正面


136. 圆罍 270
Round Lei (reverse)
（90郭M160:140）反面


137. 觯 272
Dan
（90郭M160:126）


138. 三足盉 274
He (Water-Pouring Vessel) with Three Feet
（90郭M160:74）


139. 方卢形器 275
Square Vessel
（90郭M160:50）


140. 盘 276
Dish
（90郭M160:97）


141. 铜铙组合 278
Set of Nao Bells
［90郭M160:41（左）、23（中）、22（右）］


142. 94ASM637铜器群 280
Set of Bronze Vessels


143. 圆鼎 282
Round Ding
（94ALNM637:1）



144. 簋 283
Gui
（94ALNM637:4）

145. 觚 284
Gu
（94ALNM637:2）



146. 爵 285
Jue
（94ALNM637:5）



147. 卣 286
You
（94ALNM637:7）



148. 圆鼎 288
Round Ding
（86郭M1:3）



149. 方鼎 290
Square Ding
（82APNM41:11）



150. 方卢形器 292
Square Vessel
（02APNM2118:1）



151. 94ASM7出土铜器组合（13件） 294
Set of Bronze Vessels



152. 圆鼎 296
Round Ding
（94ASM7:26）



153. 觚 297
Gu
（94ASM7:32）



154. 簋 298
Gui
（94ASM7:34）



155. 甗 300
Yan
（94ASM7:22）



156. 爵 302
Jue
（94ASM7:30）



157. 觯 303
Dan
（94ASM7:24）



158. 卣 304
You
（94ASM7:25）



159. 瓿 306
Bu
（94ASM7:21）



224. 带盖簋 408
Lidded Gui
（GT231③:18）

225. 瓿 409
Bu
（05徐家桥综合楼M1:1）

226. 圆鼎 410
Round Ding
（05徐家桥综合楼M1:3）

227. 分裆斝 412
Fendang Jia
（05徐家桥综合楼M1:2）

228. 扁足鼎 413
Bianzu Ding
（91ALNM313:1）

229. 簋 414
Gui
（93新安庄M225:2）

230. 觚 416
Gu
（99ALNM9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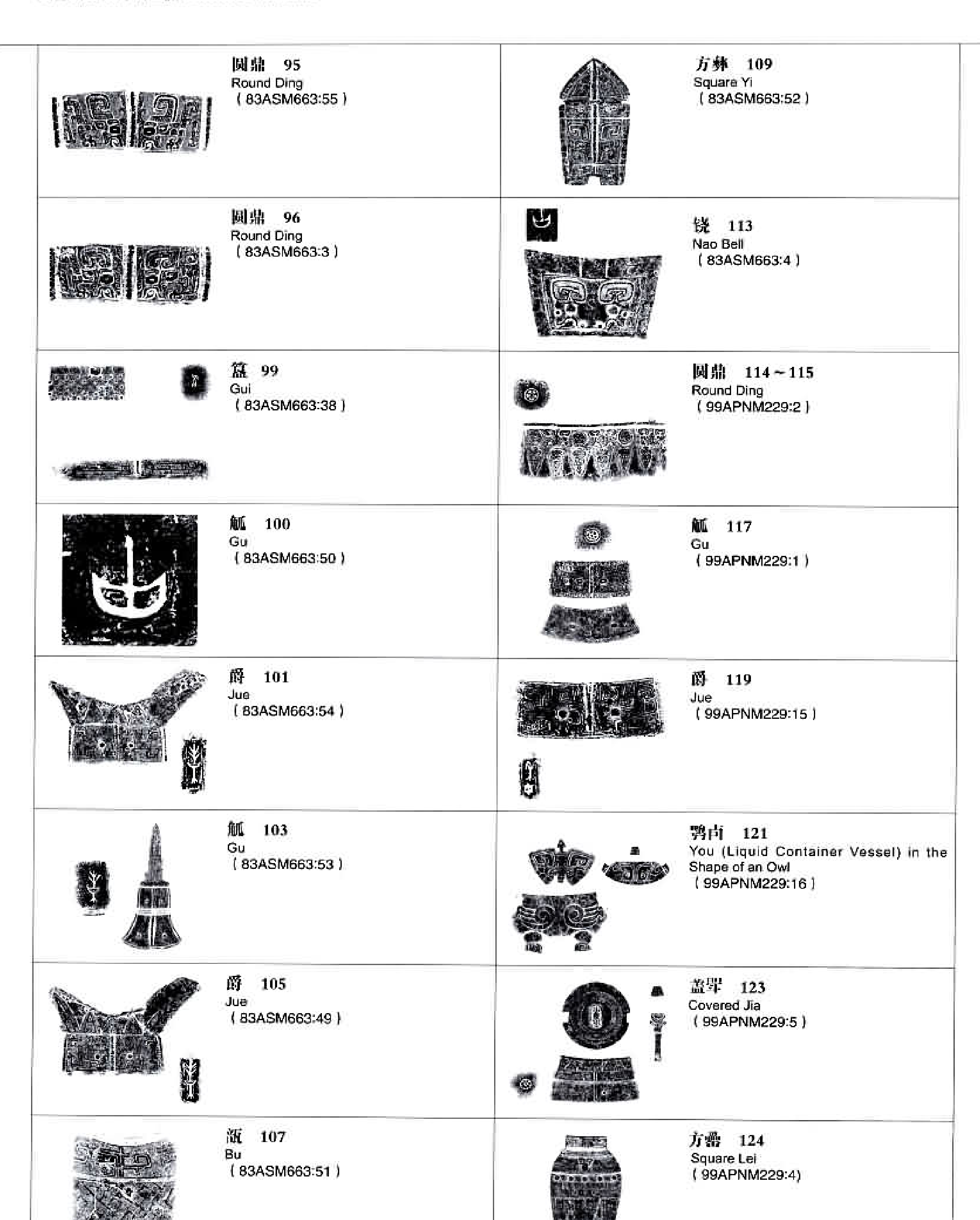
231. 筒形卣 417
Cylinder-shaped You
（92ALNM350:25）

232. 觥 418
Gong
（87郭M53:4）

233. 簋 420
Gui
（95铁西房地产开发公司M4:3）

234. 簋 422
Gui
（98安阳水利局M67:5）

拓片索引



圆鼎 95
Round Ding
(83ASM663:55)

方彝 109
Square Yi
(83ASM663:52)

圆鼎 96
Round Ding
(83ASM663:3)

铙 113
Nao Bell
(83ASM663:4)

簋 99
Gui
(83ASM663:38)

圆鼎 114～115
Round Ding
(99APNM229:2)

觚 100
Gu
(83ASM663:50)

觚 117
Gu
(99APNM229:1)

爵 101
Jue
(83ASM663:54)

爵 119
Jue
(99APNM229:15)

觚 103
Gu
(83ASM663:53)

鸮卣 121
You (Liquid Container Vessel) in the Shape of an Owl
(99APNM22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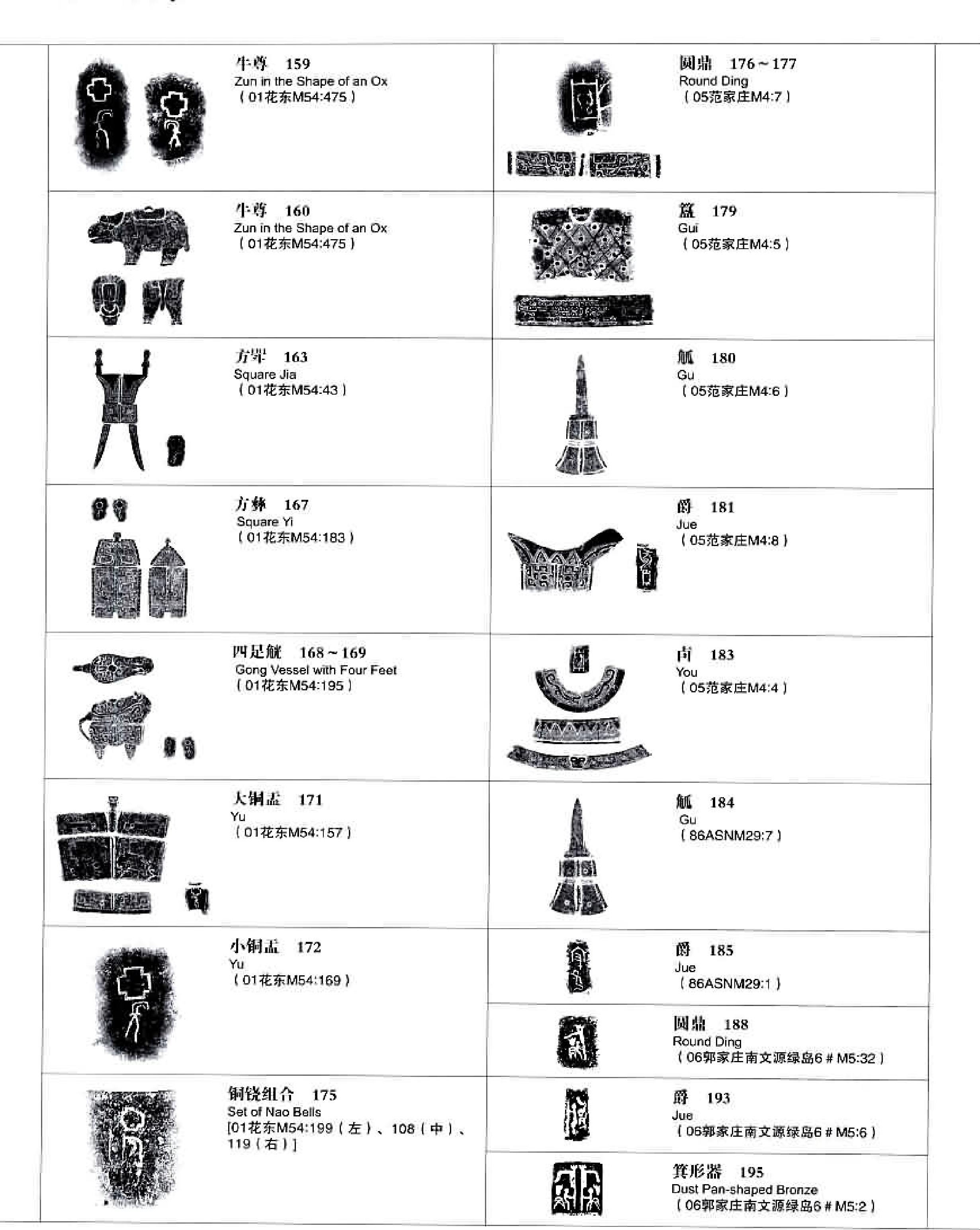
爵 105
Jue
(83ASM663:49)

盖斝 123
Covered Jia
(99APNM229:5)

瓿 107
Bu
(83ASM663:51)

方罍 124
Square Lei
(99APNM229:4)


甗 129
Yan
（84AWBM259:6）
盘 131
Dish
（84AWBM259:4）
圆鼎 133
Round Ding
（01花东M54:240）
圆鼎 134
Round Ding
（01花东M54:224）
方鼎 135
Square Ding
（01花东M54:191）
分裆鼎 137
Fendang Ding
（01花东M54:166）
分裆鼎 138
Fendang Ding
（01花东M54:181）
双耳簋 141
Gui with Two Lugs
（01花东M54:171）
簋 143
Gui
（01花东M54:177）
甗 145
Yan
（01花东M54:154）
觚 147
Gu
（01花东M54:190）
平底爵 149
Jue with Flat Bottom
（01花东M54:156）
觚 150
Gu
（01花东M54:194）
平底爵 152
Jue with Flat Bottom
（01花东M54:165）
觚 153
Gu
（01花东M54:192）
爵 155
Jue
（01花东M64:184）
方尊 157
Square Zun
（01花东M54:84）



牛尊 159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01花东M54:475）

牛尊 160
Zun in the Shape of an Ox
（01花东M54:475）

方斝 163
Square Jia
（01花东M54:43）

方彝 167
Square Yi
（01花东M54:183）

四足觥 168～169
Gong Vessel with Four Feet
（01花东M54:195）

大铜盂 171
Yu
（01花东M54:157）

小铜盂 172
Yu
（01花东M54:169）

铜铙组合 175
Set of Nao Bells
[01花东M54:199（左）、108（中）、119（右）]

圆鼎 176～177
Round Ding
（05范家庄M4:7）

簋 179
Gui
（05范家庄M4:5）

觚 180
Gu
（05范家庄M4:6）

爵 181
Jue
（05范家庄M4:8）

卣 183
You
（05范家庄M4:4）

觚 184
Gu
（86ASNM29:7）

爵 185
Jue
（86ASNM29:1）

圆鼎 188
Round Ding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32）

爵 193
Ju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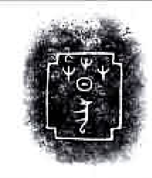
箕形器 195
Dust Pan-shaped Bronz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6＃M5:2）



爵 197
Jue
（06郭家庄南文源绿岛B7＃M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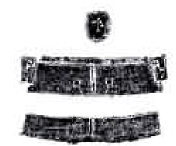
圆罍 211
Round Lei
（94ALNM7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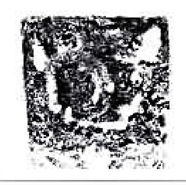
提梁罐 199
Jar with Arc-shaped Movable Hanger (collected at Xiaozhuang)
（小庄采集）



方彝 213
Square Yi
（94ALNM793:44）



壶 200～201
Pot
（04ASPT1M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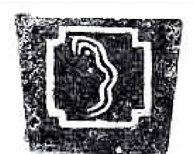


斗 214
Spoon
（94ALNM793:56）





圆鼎 204
Round Ding
（94ALNM793:41）



箕形器 215
Dust Pan-shaped Bronze
（94ALNM793:1）



圆鼎 206
Round Ding
（94ALNM793:47）



分裆鼎 216
Fendang Ding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1）



簋 207
Gui
（94ALNM793:42）



爵 218
Jue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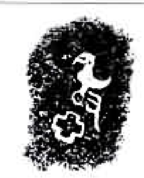
觚 209
Gu
（94ALNM79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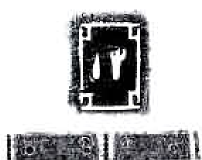
分裆斝 221
Fendang Jia, or Jia Vessel with Pouch-shaped Extensions at Bottom
（06郭家庄南赛格金地M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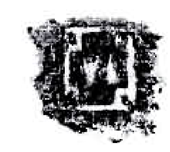


爵 210
Jue
（94ALNM79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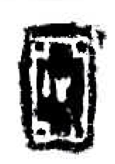


簋 223
Gui
（05郭家庄南文源绿岛2＃M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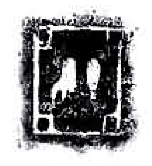

圆鼎 226～227
Round Ding
（90郭M16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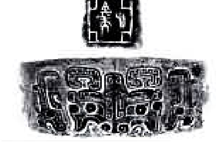

方觚 248
Square Gu
（90郭M160:170）


圆鼎 228
Round Ding
（90郭M160:62）


角 249
Jiao
（90郭M160: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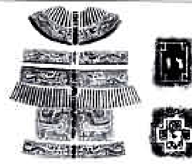

方鼎 231
Square Ding
（90郭M160: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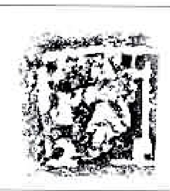

方尊 253
Square Zun
（90郭M160: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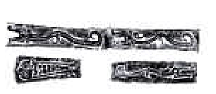

分裆鼎 233
Fendang Ding
（90郭M160: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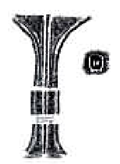

方尊 255
Square Zun
（90郭M160: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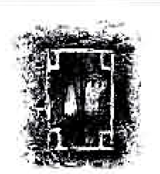

提梁盖鼎 235
Lidded Ding with Arc-shaped Hanger
（90郭M160:32）


凤鸟卣 257
You with Phoenix Designs
（90郭M160: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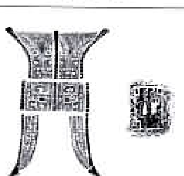

簋 238
Gui
（90郭M160:33）


凤鸟卣 259
You with Phoenix Designs
（90郭M160:172）


方觚 245
Square Gu
（90郭M160:116）


方斝 261
Square Jia
（90郭M160:111）


角 246～247
Jiao
（90郭M160:143）


方斝 263
Square Jia
（90郭M160:173）



分裆斝 266
Fendang Jia
（90郭M160:174）

觚形尊 267
Gu-shaped Zun
（90郭M160:118）

圆罍 269
Round Lei
（90郭M160:140）

圆罍 271
Round Lei (reverse)
（90郭M160:140）

觯 272～273
Dan
（90郭M160:126）

三足盉 274
He (water-pouring vessel) with Three Feet
（90郭M160:74）

盘 277
Dish
（90郭M160:97）

铜铙组合 278～279
Set of Nao Bells
［90郭M160:41（左）、23（中）、22（右）］

圆鼎 282
Round Ding
（94ALNM637:1）

觚 284
Gu
（94ALNM637:2）

爵 285
Jue
（94ALNM637:5）

卣 287
You
（94ALNM637:7）

圆鼎 289
Round Ding
（86郭M1:3）

方鼎 290～291
Square Ding
（82APNM41:11）

圆鼎 296
Round Ding
（94ASM7:26）

觚 297
Gu
（94ASM7:32）

簋 299 Gui （94ASM7:34）	方鼎组合 314 Set of Square Ding ［04ASM303:115（左）、114（右）］
甗 301 Yan （94ASM7:22）	方鼎 315 Square Ding （04ASM303:115）
爵 302 Jue （94ASM7:30）	分裆鼎 317 Fendang Ding （04ASM303:104）
卣 305 You （94ASM7:25）	扁足鼎组合 318 Set of Bianzu Ding (Ding Tripods with Flat Feet) ［04ASM303:112（左）、100（右）］
瓿 306 Bu （94ASM7:21）	扁足鼎 318 Bianzu Ding （04ASM303:112）
分裆斝 307 Fendang Jia （94ASM7:33）	双簋组合 320～321 Paired Gui ［04ASM303:79（左）、81（右）］
觚形尊 309 Gu-shaped Zun （94ASM7:28）	甗 323 Yan （04ASM303:57）
圆鼎 313 Round Ding （04ASM303:116）	觚 324 Gu （04ASM303:110）



爵 325
Jue
（04ASM303:93）

觚 327
Gu
（04ASM303:105）

爵 329
Jue
（04ASM303:90）

觚 330
Gu
（04ASM303:107）

爵 333
Jue
（04ASM303:96）

圆尊 335
Round Zun
（04ASM309:99）

卣 339
You
（04ASM303:120）

提梁卣 341
You with Arc-shaped Hanger
（04ASM303:58）

斝 342
Jia
（04ASM303:118）

分裆斝 343
Fendang Jia
（04ASM303:108）

圆罍 344～345
Round Lei
（04ASM30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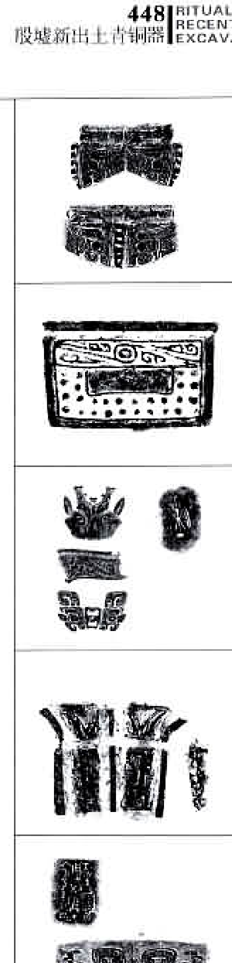
觚形尊 347
Gu-shaped Zun
（04ASM303:83）

觯 348
Dan
（04ASM303: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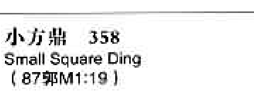
盘 351
Dish
（04ASM303:56）

铜铙组合 352～353
Set of Nao Bells
[04ASM303:123（左）、125（中）、124（右）]

分裆鼎 354
Fendang Ding
（87郭M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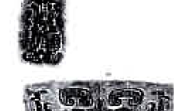
分裆鼎 355
Fendang Ding
（87郭M50:6）



小方鼎 358
Small Square Ding
（87郭M1:19）

觥盖 363
Lid of a Gong
（91后冈M9:1）

方爵 365
Square Jue
（91后冈M9:10）



分裆鼎 367
Fendang Ding
（84AGM171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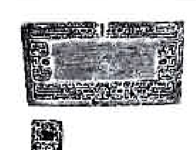
簋 368
Gui
（84AGM171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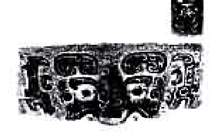
圆鼎 376
Round Ding
（99ALNM10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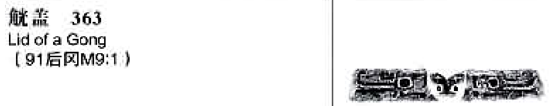
圆鼎 377
Round Ding
（99ALNM104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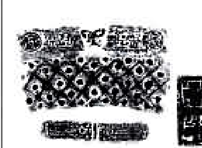
方鼎 379
Square Ding
（99ALNM104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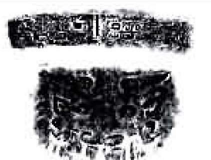
分裆鼎 380
Fendang Ding
（99ALNM104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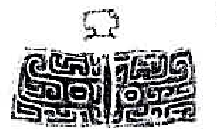
簋 381
Gui
（99ALNM104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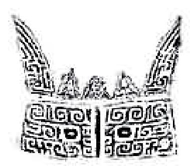
簋 383
Gui
（99ALNM104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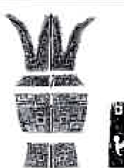
甗 385
Yan
（99ALNM1046:4）



觚 387
Gu
（99ALNM1046:9）



角 389
Jiao
（99ALNM1046:12）



方尊 390
Square Zun
（99ALNM1046:23）

后记

编撰出版“殷墟系列图录”，最早于2006年秋由岳洪彬提出，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安阳工作站唐际根站长审定，并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未来四年的科研计划。《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为其中第一本。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自2007年1月开始，历经一年多的标本筛选、编排和撰写，至今日终于完稿了。虽然编排图版和撰写文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本书的完成却凝集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全体成员数十年的辛勤和汗水，正是他们长年坚持在田野一线兢兢业业的发掘和研究，为本书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首先要感谢郑振香、陈志达、杨锡璋、刘一曼和徐广德等老前辈们，是他们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奠定了殷墟考古现在的辉煌，也正是他们无私的支持给了我们编写本书的勇气和动力。

本书选用标本主要采自下列先生的劳动成果。

1. 大司空M663、郭家庄东南M26和后冈M9，由徐广德提供。
2. 安钢M1713、武官村北M259和郭家庄M160、M50、M53，由杨锡璋和刘一曼提供。
3. 花园庄东地M60和M54以及范家庄M4，由徐广德、何毓灵提供。
4. 大司空M7、刘家庄北地M637和M793，由谷飞和郭鹏提供。
5. 刘家庄北地M1046和四盘磨M9，由岳占伟提供。
6. 苗圃北地M229，由刘忠伏提供。
7. 新安庄M225，由唐际根提供。
8. 大司空M303，由岳洪彬、岳占伟、何毓灵提供。
9. 郭家庄南文源绿岛和徐家桥等地的资料，由孔德铭提供。

此外还用到部分早年发掘和采集的零星资料。

书中标本由岳洪彬、岳占伟和孔德铭筛选。已发表过的标本，图版说明参考简报和报告，未发表过的标本均由岳洪彬撰写，书中照片由马怀民和岳占伟拍摄，线图由刘小贞绘制，拓片由何海慧、王艳丽完成，线图和拓片由苗霞排版，图版和拓片目录以及图版的电子编排由岳洪彬、杨霞和李燕完成，英文翻译由王刃余承担。

在本书编排过程中，安阳工作站的全体干部、职工，除承担繁重的发掘任务外，为本书的基础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员工们，也曾为协助本书图片的拍摄通宵达旦。对此，我们深表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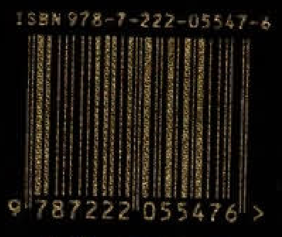
另外，本书的编排还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资料中心朱乃诚、季连琪和罗明的支持，《考古》杂志社的施劲松、苗霞、顾智界、曹楠等同志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我们尤其要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拨冗为“殷墟系列图录”撰写总序；王巍、杨锡璋和刘一曼三位先生，于百忙中通阅全文，为本书审稿。

最后，我们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市文物局的领导和同事们，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编著者

2008年4月15日


ISBN 978-7-222-05547-6
9 787222 055476 >
定价：699.00元